

習近平剖析
權力基礎、權術秘笈和憲法政變

《中國局勢》系列（115）

紅太陽帝國

——中共最後的分贓



◎夏 明

明鏡出版社

紅太陽帝國

明鏡
出版

旅美著名藝術家鄭連杰題寫書名

Hongtaiyang DiGuo
By Xia, Ming

Published in 2015 by Mirror Books
© Copyright by Mirror Book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o. 978-1-63032-801-6

Publisher: Pin Ho
Cover by Li Zi
P O Box 795, Deer Park,
NY 11729, USA

TEL:(516)338-6976

Web:www.mingjingnews.com

E-mail:mirrorpublishing@yahoo.com

中國局勢系列 (115)

書 名: 《紅太陽帝國
——中共最後的分贓》

作 者: 夏 明

出 版 人: 何 頻

責任編輯: 謝 銘

校 對: 方 子

封面設計: 栗子工作室

監 印: 明鏡出版集團

出 版: 明鏡出版社

網 址: www.mingjingnews.com

電子郵件: mirrorpublishing@yahoo.com

通訊地址: P O Box 795, Deer Park,
NY 11729, USA

電 話: (516)338-6976

國際統一書號: 978-1-63032-801-6

定 價: HK148 NT488

版 次: 2015 年第一版

明鏡出版社出版品受國際版權公約保護
版權所有, 禁止翻印, 轉載, 複印, 違者必究

本出版品並不代表本社立場
本出版品缺頁或裝釘錯誤, 請寄回更換

目录

鳴謝

導言：帝國的本質 /7

第一章：罪惡的權力 /23

“門衛國家”與“更夫國家”

死得有尊嚴：最後的人權

國保：中國特色的國寶利器

狗腿子政權的成型

槍桿子、刀把子和筆桿子

第二章：最後的分贓 /75

十八大前的信息危機

中共十八大的責任

王立軍案引爆中共權力鬥爭

“重慶三部曲”何時樂休舞止？

薄家悲劇與中共的魔戒

附錄三篇採訪（法廣、澳廣）

第三章：老路、邪路和新路 /111

中國民主化的瓶頸

再思政改新加坡模式

中國的轉基因政改

天下為私還是為公？

弱主惡政與民主轉型

中共將走什麼路？

附錄：西方多黨制與中國一黨執政

第四章：習近平剖析 /147

習近平的權力基礎

習 – 李元年

習近平的憲法政變

習近平的權術秘籍

習大大、習澤東和習特勒

附錄：本性難移、惡習不改

第五章：最後的謊言 /181

誰來為你作證？

綁架中國的“寡頭轉型”

四川：從“豪邁”再回悲壯

中共意識形態的癲癇症

人大制度：政治花瓶？政治曇花？

習式反腐為何注定失敗？

附錄：與“法廣”四談腐敗和反腐

第六章：血淚的反抗 /227

大衛的反抗

自曝、自虐、自殘和自焚

雪域血紅自由火

與中國學者談藏人自焚

新聞人唯有抗爭才有自由

“西單四勇士”

第七章：面對魔鬼的誘惑 /271

特權是一根絞索

解讀中共智囊王滬寧

敘利亞戰場上的中國人

漂流的思考，飄逸的思想

陳平六十大壽致辭

第八章：未完的北京屠城 /301

培育仇恨的政權

六四，64！

屠殺依然進行時

民主女神，自由女神

香港城邦革命

附錄：未來“六四”的解決會成為中國民主革命的一個原因

第九章：帝國的黃昏 /333

錢荒帶來政權恐慌

布爾喬亞的美德

吃喝拉撒皆有道

2014: 你有離岸船票嗎？

周永康：劫後天府毀證忙

中國變局：評估和預測

第十章：21 世紀世界之癌 /369

網絡戰爭：國際大戰和鎮壓人民的內戰

附錄：斯諾登事件

中南海馬年三馬鬧心

中共四砸孔家店

居中夜叉國

拯救中國人於恐懼之海

附錄：習近平掌權人權倒退

結束語：黑暗中尋找陽光 /407

獻給朋友、學友、戰友軍濤

鳴謝

本書的宗旨是要解析 21 世紀中共政權的本質、解構它的意識形態和權力機制、幫助中國人做好準備來參與和成就本世紀人類最大的偉業——建立民主中國。在過去的三年裡，我跟蹤觀察了中共政權從 18 大的權力接班到習近平兩年掌權，這本書是基於這項觀察的思考結果。

由於各篇文章在不同時間段完成，為了幫助讀者閱讀方便，我標註出寫作時間，反映出特定的語境。

在本書送交出版之際，首先我要感謝《陽光時務周刊》的陳平和鄧志新、《動向》雜誌的張偉國、《縱覽中國》的陳奎德、英國廣播公司中文部的李文，是他們給我機會就一系列重大問題撰寫文章，因此我獲得了系統思考中國政治、整理自己思想的機會。

我的好友、旅美著名藝術家鄭連杰再次慷慨相幫，為我的書題寫了書名。我的另一位好友、著名畫家肖維把他的漫畫給我用在書中。他還專門為本書創作了幾幅作品，同時還設計了書的封面。感謝我的藝術家朋友，你們是最熱愛自由的！

最後感謝明鏡集團的何頻，他的幫助讓本書能夠得以出版。

夏明

2015 年 3 月 6 日於紐約家中

導言：帝國的本質



帝國的本質

(2015.01)

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十四億人口居住在世界第三大的國家領土上，被人類歷史上和當今世界上最大的專制政黨統治，建立起了人類前所未有的極權主義體制。這是中國人和人類共同體在二十一世紀面對的共同挑戰。

紅太陽帝國

有人把習近平執掌權力後的當下中國稱之為“紅色帝國”。“專制主義”和“帝國”在幾千年的人類歷史上就已出現並綿延不斷，但極權主義的帝國卻只是二十世紀後的產物，它有精神和物質的兩大支柱來撐掌：前者是極端主義的意識形態，後者是現代科學技術（包括大規模殺傷武器和監控、鎮壓機器）。極端主義的意識形態包括法西斯主義（二戰中的意大利、日本和德國）、德國納粹主義、蘇聯和中共的共產主義，以及在當今二十一世紀世界蔓延的作為意識形態的伊斯蘭主義。他們的一個共同點是具有在空間上和時間上無限擴張以求實現一個同質實體的權力意志。而這種無限的權力意志似乎又被科學技術的進步所證實，並作為

一個載體工具試圖實現從有限到無限的征服和控制。

何為帝國？《漢語大詞典》的解釋是，“由帝王控制，實行君主制的國家，”“後特指實行君主制而擁有殖民地或無君主而恣意向外擴張的國家。”簡·伯班克和弗里德里克·庫珀（Jane Burbank and Frederick Cooper）在《世界史上的帝國：權利和差異政治》一書中，把“帝國”界定為：“帝國是龐大的、擴張主義的或是具有權力在空間外延記憶的政治單位，隨著它們併入新的人民依然還維持差異和等級的政體。帝國的概念預設政體中不同的人民將被區別治理。”而且，他們的書以羅馬帝國和中華帝國為切入點。可見中國在帝國研究中的分量和地位。

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一個帝國嗎？首先我們可以明確地說，“人民共和國”是中共政權的對立體，而不是它的實質。最早在古希臘，“共和制”（Politeia，英文的 Republic）與“民主制”（democracy，當時更是後來所說的“暴民制”，Mobocracy）是對立的。在政治學之父亞里斯多德那裡，政體首先分為“正義的”（或者叫“自然的”）和“不義的”（“變態的”）兩大類。所有服務公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雙方利益）的政體就是“正義政體”，根據統治者人數多少，它又分為三類：君主制（一人統治）、貴族制（少數人統治）、共和制（多數人統治）。與此相對應，統治者只為自己個人或統治集團謀利而犧牲被統治者利益即為“不義政體”，它也包括三類：暴君制、寡頭制、暴民制。中共六十多年的統治，從未跳出不義政體的類別，只是在暴君制（毛的個人獨裁）、寡頭制（鄧小平的“八老治國”、胡錦濤的“九龍治水”，即所謂的“集體總統制”）和暴民制（“文革”串聯和武鬥時期）之間循環。

其次，我們必須認識到，中國今天的版圖基本繼承了清帝國的遺產。由於清帝國是由滿人征服漢人、納入蒙古人、藏人和新疆地區的回人而形成的多民族帝國，民國和中共都試圖建立一個“中

華民族”的民族國家概念，來整合各民族成為一體。一百年的時間過去了，台灣失而復得、得而復去，西藏和新疆以宗教、文化為動力的反抗和分裂運動在二十一世紀重新激化，香港在大陸收復主權後反而醞釀出“城邦革命”，都是在挑戰人造的“中華民族”文化認同，實質上帶來的是一場帝國的危機。如果我們不反思由於民主共和建設的失敗而帶來的“中華民族”認同構建的失敗，由於公民權的缺失阻礙了漢、滿、蒙、回、藏等民族平等參與再造一個新文化認同並加入其中，我們就無法理解當下中國民族危機的根源，也無法想像中國可能面臨的蘇聯式的帝國的崩潰。

最後，隨著中國在過去三十年時間裡的經濟騰飛和國力上升，中國向外擴張的態勢愈發明顯。它首先表現在中國在釣魚島、南中國海諸島嶼問題上與日本、越南、菲律賓等國的衝突升級上。在第三世界尋求資源（能源、礦產、建材和食品等）推動的非洲、拉美和中亞戰略，中國越來越像西方殖民主義國家。中共的“大外宣”部署的對外文化滲透，尤其是對海外華人的控制，以及由政府 and 國家軍隊主導的網絡“黑客”行為和商業間諜活動，都帶有帝國的特徵。中共黨魁毛澤東曾經發明過“社會帝國主義”的概念來描述追求霸權擴張的蘇聯，後來阿爾巴尼亞的共產黨把蘇聯和中國都稱之為“社會帝國主義”國家。所以，把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放在“帝國”的分析框架下並非牽強。

“紅太陽帝國”是我給暴發的專制中國的命名。“紅”顯然是要表述它的共產黨政權的實質，而“太陽帝國”則來自當今中共最高智囊王滬寧對日本“太陽帝國”的仰慕、他認定“太陽帝國”會戰勝美國體制的自信、和他渴望中國能成為向美國發出挑戰的下一個民族的夢想。1988年下半年，王滬寧在美國進行了六個月的訪問（順便說一下，當時我們已經是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的同事，他在美國訪問期間住在我的博士導師家裡），寫下了《美國反對美國》一書，用批判態度來揭示美國社會內在的矛盾，“用

事實的美國反對想像中的美國。”

該書的最後一章的最後一節是“太陽帝國”。著者從他在美國觀看的《太陽帝國》電影說起，首先注意到“西方人在二戰期間被關進集中營，由一隊日本兵看守著，受盡折磨，忍飢挨餓，人的尊嚴受到侮辱。”然後，王滬寧筆鋒一轉，聯繫到八十年代日本對美國的新一輪挑戰。他寫道：“太陽帝國正在逼迫美國就範。”“太陽帝國的影子正籠罩著美國。”“太陽帝國的力量像核聚變那樣增長。”“太陽帝國對美國的挑戰是嚴峻的。”“有人說，美國同日本比，東方文化就占了上風。”他得出了兩個重要結論：第一，“美國的體制，總的來說建築在個人主義、享樂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基礎上，但它正明顯地輸給一個集體主義、忘我主義和權威主義的體制。”第二，“在下個世紀裡，必然會有更多的民族也向美國提出挑戰。”“美國社會上存在的種種相斥因素和力量如果繼續這樣運動下去，不僅會使其優勢發揮不出來，而且會構成不可阻擋的危機的潛流。”可以說，二十年以後，王滬寧和他所服務的黨國正是以這樣的心態，替代日本，以“紅太陽帝國”的態勢，試圖把美國，或者說她賴以立國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的箴言，推向危機和失敗。

習特勒的思想武庫

學法語出生的王滬寧不會不知道法國的“太陽王”路易十四世。他的名言“朕即國家！”和“我死後，管他洪水滔天！”多多少少反映了中共掌權者的心態。在2008年北京奧運的世紀慶典上，中共黨國如日中天，它的領導人權力意志也隨之膨脹起來。全能主義、全權政府成為政府體系優化的目標。

中共在21世紀建立的“紅太陽帝國”產生於三大制度傳統：“東方專制主義”、馬恩列斯的共產主義和“歐洲的極權主義”。

有意思的是，王淦寧在他為浙江人民出版社主編的《當代中國政府理論研究叢書》的總序中寫道，中國學者必須用“政治生態學”來觀察政府體系優化，用馬克思在《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裡的思想來分析亞洲和中國。他尤其提到亞洲水利社會的傳統和影響，以及提到“亞細亞生產方式”。儘管他試圖規避“亞細亞生產方式”，但中國政界和學界都無法繞過馬克思的論述：亞洲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在中國、俄國、印度和中亞地區）使得這些國家與西方分野：歐洲中世紀經歷的封建社會階段在亞洲大國（日本除外）並未出現，它們而是進入到了“東方專制主義”。德裔美國學者卡爾·魏特夫在他的煌煌巨著《東方專制主義：對於極權力量的比較研究》中揭示出，“亞細亞社會是由一個官僚專制國家所控制的。”由於治水的需要，中國出現了特殊的“管理者政權”，國家比社會強大。儘管私有財產（土地和商業）也存在，但他們是分散的、無力的，而國家所有制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官僚地主制度、官僚資本主義和士大夫階層，構成官僚極權主義。統治手段採納全面的恐怖威脅，臣屬民眾表現出全面的屈從，最高統治者、官員和普通民眾都陷入全面的孤獨：“統治者不相信任何人，官員永遠在猜疑中，民眾擔心被牽連。”國家奴役就是全面奴役。共產黨極權主義就是東方專制主義的變形。甚至列寧曾經明確提出在革命後的俄國出現了“亞細亞復辟”。可見中、俄兩國在共產主義革命前、後和今天，都有制度上的相似性和政策行為上的趨同。普金和習近平熊抱相互取暖壯膽也就自然了。

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體制是解析“紅太陽帝國”的又一把重要的鑰匙。作為共產主義創始人的馬克思受到法國大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影響，創立了他的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的學說。但更多在列寧的思想和實踐中，共產主義直接繼承了法國大革命中最血腥的遺產，把暴力在歷史中的作用浪漫化。由於俄國歷史上的專制、暴力、農民土地革命的暴力衝突等原因，列寧基本上拋棄了馬克

思認為非暴力革命在英、美等國的可能性的觀點，把馬克思主義和沙皇專制主義結合在一起，或者是說“將沙皇的外衣前後反穿”（《共產主義黑皮書》第 732 頁）。但列寧和他的布爾什維克在暴力程度上卻比沙皇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又是因為他把階級鬥爭發展成為無產階級專政，並用共產黨這個所謂的“職業革命家”和“先鋒隊”來推行一個“科學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在科學的名義下，“這個意識形態轉變成了教條和絕對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共產黨自認為真理的化身，它的領導人也成了永不犯錯的先知，進而用“改造世界觀”來取代多元的思想，創造出“社會主義新人”，把人的本體價值抹殺，甚至不惜大規模在肉體上消滅“反動階級”、“剝削階級”及他們的代理人和追隨者。

列寧時期即已出現的階級屠殺到了斯大林時期，由於戰爭的需要，又進一步演化為黨國的高度集權以及黨國對社會的全方位專政。斯大林主義後來變成了個人獨裁，同時即便戰爭結束後，他仍然維持了“永久的戰爭狀態”，只是外部敵人變成了內部敵人。通過把“敵人”非人化和動物化，在理論的“抽象”過程中隔斷殺戮與具體個人或人群的聯繫，對社會、黨的機關、國家官僚展開大規模清洗。這種反人類的“政治屠殺”和“犯罪政權”成為“共產主義的遺傳密碼”（《共產主義黑皮書》第 754 頁），影響了所有後來建立的共產主義政權。

共產主義政權早於法西斯，而又比法西斯持續更久，甚至在第一個共產主義政權蘇聯崩潰後，它還在中國延續，並試圖在大國崛起中捲土重來。根據 1997 年法國出版的《共產主義黑皮書：犯罪、恐怖和壓迫》（1999 年哈佛大學出版社英文出版，第 4 頁，14 和 15 頁），納粹法西斯致使大約兩千五百萬人死亡，而共產主義政權造成至少一億人的死亡。儘管共產主義的邪惡勝過法西斯主義，但共產主義從未遭受到徹底的清除。根據同一研究，共產黨國家 65% 的死亡（至少六千五百萬）來自中國，與此相比較，

蘇聯有兩千萬的死亡。但中共還繼續存在，而且在國際上還逃脫了蘇共經歷的討伐。更為可怕的是，人類史上第一屠夫毛澤東在中國血脈未斷，今天習近平還要再續香火。如果我們意識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共產主義政權是以法西斯的敵人而獲得勝利的，一方面，這一對立掩飾了共產黨的罪惡和拖延了對它的清理，另一方面，毛澤東在口頭上和思想上還試圖與法西斯保持一定距離。但今天，中共的法西斯化卻越來越明顯。最重要的例子是，納粹法西斯哲學家卡爾·施密特的著述被系統翻譯成中文和他的思想在北京思想界風行時髦。

從八十年代初期卡爾·波普爾和他的“開放社會”、“自由主義剃刀”、證偽方法和“歷史決定論的貧困”席捲中國思想界，到今日卡爾·施密特成為新寵，真是180度的轉變。那麼，施密特到底那些思想和上了習近平和他的智囊們的胃口？首先，施密特徹底反對自由民主制、議會民主制和自由憲政主義。在他看來，“個人自由”和“國家民主”形成了內在的矛盾，讓議會民主制“議而不決”。第二，自由民主制不僅會帶來危機，而且無力解決它。因此，憲政需要主權者來行使決斷權。“緊急狀態權力”成為維護憲政的“超憲政權力”，而只有專制體制能有“定奪人”來做決策。第三，在施密特看來，“敵友之分”（誰是敵人，誰是朋友？）是政治的核心概念。統治的目的就是要制止敵人獲得政權。最後，“主權者”或“領袖”成為滿足上述要求的重要條件。希特勒自然而然成為施密特的意中主子，自然施密特甘願為法西斯效力。

歷史很快證明施密特的理論錯誤。二戰民主國家在羅斯福、丘吉爾、戴高樂等領袖的決策下，人民爆發出犧牲精神、堅韌勇氣和創造力，擊敗了法西斯國家聯盟。施密特所青睞的“有決策力的元首領袖”走上了自絕之路。同時，德國制訂的《基本法》、日本在美軍占領下制訂的新憲法、法國戴高樂的《第五共和國憲法》都做出了憲法創新，解決了施密特所說的“自由”和“民主”

帶來的憲法矛盾。這裡需要特別強調，施密特看到的魏瑪共和國的憲政危機，其實只是在自由民主體制下由多黨制和議會制組合而出現的特定問題，並非民主國家的通病。如果通過兩黨制、總統制或法國的“混合總統制”以及一些憲政機制（例如德國的“建設性不信任投票”和“政黨進入議會需過5%選票最低門檻”等），施密特所說的“議會民主制危機”都得到了解決。儘管施密特的論斷為歷史所證偽，但因為他似乎為現在中共的統治危機提供了偏方，所以，中共的御用文人利用這些所謂的先進精深的論述，來為習近平的“國家元首體制”鳴鑼開道。總之，除了本土的傳統東方專制主義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以外，德國的極權主義（還有歐洲大陸的國家主義）以及日本的法西斯軍國主義（王滬寧所欣賞的“太陽帝國”）都對中共政權產生了影響。

權力的全息控制

極權主義體制是否在中國存在過、是否當下已經成為極權體系？學術界一般認為毛澤東統治時期（毛主義時代，尤其是從“反右”到“文革”）是一種極權主義。而毛後的政權是一種威權主義，甚至是“裂塊型的威權主義”。

根據《民主百科全書》（The Encyclopedia of Democracy, 1995年，第103頁），“威權體制是由一個領導人或一個小集團不受正式約束而行使權力的體制。威權統治不允許民主體制的兩項定義性特徵：自由競爭政治職位和公民自由參與政治。”儘管威權體制並不允許制度化的反對派和反對機制，但反對勢力和活動還是可以在社會上以各種形式存在（例如教會、工會、大學和公民社會等）。但極權主義是不允許任何反對勢力以任何形式存在的。弗里德里克和布熱津斯基在《極權專政和獨裁》（1956年，第9和第10頁）給出的極權主義經典定義包括六項特徵：1. 一個官方意識形態；2.

一個通常由一人領導的大規模政黨；3. 恐怖的警察（包括秘密警察）控制體系；4. 黨和官員基本上完全控制所有的有效傳媒；5. 同樣基本完全控制武器；6. 中央控制和指導整個經濟。對照這六項特徵，中國在毛時代和 21 世紀，都是地道的極權主義獨裁政體。

正如我們前面所說，蘇聯的共產主義是“沙皇的專制外套前後反穿”，那中國的極權專制主義就是裁剪東方專制主義、蘇聯共產主義體系和法西斯主義拼湊成的極權獨裁百衲衣。例如，習近平把毛、鄧、江、胡全盤繼承，打通貫穿中共歷史的前後三十年，奉行馬恩列斯毛，還要加上孫中山和孔子。習和他的智囊們既要利用布丹的主權理論，盧梭的“公義”和“眾意”思想，又要學黑格爾把國家推上“神在地上行走”的高度；他們既要從當代西方學者亨廷頓那裡學“新權威主義”，從哈巴馬斯那裡借用“協商民主”，又要還魂施密特，重建“元首體制”。更為惡劣的是，中共還有“馬列主義套衫里外反穿”的習慣：馬克思批判過的波拿巴主義與中共的專制何其相似，中國的農民就是被戶籍制度、計劃生育、新農村運動變成了一袋馬鈴薯。當馬克思批判資本來到人間，每一個毛孔都滴着肮臟的血，中共權貴官僚就是要用“血與火”、“圈地”、“強拆”、竊取來完成他們的資本積累。當列寧揭露資本主義議會是為“錢袋子”服務的“清談館”，中共就是要將人大和政協變成這樣。總之，中共從不顧及語言邏輯內涵、理論互洽和學派傳承，以庸俗實用主義的態度，在古今中外的思想寶庫和垃圾堆裡吸收養料，把好的變成壞的，把壞的變成更壞的，完成中共政權的雜種化，創造出人類政體史上的巨型惡性腫瘤。

中共這個政體之癌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的危險：第一：用韋伯和羅伯特·達爾的權力定義來看，權力是一種能力。中共已經掌握了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的總體資源，聚合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能力，尤其是對暴力的壟斷，來追求財富、地位、榮譽和使得統治地位永久化。中共政權存在的目的除了加強執政黨

的能力、維護自身的執政地位以外，沒有任何其他實質性的東西。

第二，權力的隱蔽行使來自於結構性的權力給既得利益集團帶來的特權和對弱勢群體的忽視。所謂“控制議事程序”就是讓弱勢群體消聲，把他們的痛苦（或者說關係國計民生的問題）排除在討論議題之外，用一些無關痛癢或畫餅充飢的話題，諸如“八榮八恥”、“核心價值觀”、“中國夢”，來充斥話語空間。

第三，權力的第三個方面來自於通過“洗腦”（改造世界觀、培養紅色接班人，等）、“腦控”把人變成“幸福的奴隸”，也就是當下中國無處不在的“腦殘”的“憤青”和“五毛”。共產主義政權發明了許多意識形態灌輸和教育的方式，例如，篡改語言、推行“新話”和“兩面語”（所謂的辯證思維）、學習檢討、批評與自我批評、訴苦和聲討、送勞改營和關精神病院、相互告密、群眾運動和內戰、對所謂無可救藥的採取肉體消滅，等等。今天，中共利用 21 世紀的高科技，一方面要全面建構黨國確定的“現實世界”來植入進每一個人的心和腦，也就是說，黨國的宣傳機器要壟斷所有人們思想所需要的原料（語言和事實），來設置思想的程序。設想，如果我們都像一台絞面機，得到的是麵粉供應，要么生產出的是中式麵條，或者是西式通心粉，無論如何也生產不出香腸。為了說服眾人這種植入的思維程序和思想原料是唯一的、正確的和可求的，中共對所有其他妨礙其思想壟斷的媒體和事實進行封殺。谷歌、面書、推特、亞馬遜和任何翻牆軟件都是敵人，傳播和運用它們就是犯罪。《紐約時報》、彭博通訊社、美國之音、英國廣播公司、法廣等等都是“反華勢力”。在中共的掌控下，“現實”不是由每一個個人通過接觸社會、解讀生活、尊重常識、相互交流、抽象昇華來構建的多元、多面體，而只是官方獨家界定和壟斷推銷的、反應官方權力意志的表象。官方的真理是封閉自證的，它不需要更高層面的阿基米德幾點來提供合法性，也不需要科學－哲學－神學的抽象階梯來層層提供有效性的保障。在《聖經》第

一篇創世紀裡，神說有了天地就有了天地，神說有了萬物就有了萬物。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裡，中共說這是真理就有了真理。共產黨占據了神的位置，但它又不像神，不在天外宇宙之間或是民心靈魂之中。共產黨是每天在地上行走的神。

兩千多年前的希臘哲學家柏拉圖講述的“洞穴的比喻”精闢地揭示了當下中國黨國與人民的關係。在《理想國》一書中，有一群囚犯被枷鎖禁錮在山洞裡。他們面壁而坐，不能轉身側頭，只能看到後面光線投射在壁上的影子。囚禁他們的牢頭躲在一堵牆後面，拿出各式稀奇古怪的東西（石刻或木刻的人像或動物等），像玩皮影戲一樣，把影像投射在壁上。如果有人從外面經過發出聲音，洞穴裡就會產生回音。他們就會認為這是牆上影子發出的。假設這些囚犯從小就被關進了洞穴，他們能夠交流的話題就只能是圍繞這些怪異的影像的。“完全徹底的，這些囚犯會認為，現實不過是人造的各種物件的影子而已。”（The Republic of Plato, 1945 年牛津版，第 227-229 頁）

第四，為了完成觀念的生產（或者說培訓更多的洞穴牢頭和操縱木偶的人），從而通過知識實現政治控制，來給現實世界提供合法性（所謂黑格爾的名言：“存在即合理，合理即存在。”），中共黨國直接控制知識分子的生產，這包括知識分子的腦力勞動生產和知識分子本身的再生產。中共不斷對知識分子進行的迫害，從“整風”、“反右”、“四清”、“文革”、“反精神汙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天安門屠殺”到今天習近平的“七個不講”、教育部長袁貴仁的“三個絕不允許”，無不是要把權力的研究主體變成權力的控制客體。正如法國哲學家福柯所揭示的，政權用權力來界定知識，然後用知識來鞏固權力。

權力的四個層面的熟練運用，構成中共權力厚黑學。其殘暴具體表現在“生體控制權力”上，亦即通過控制、占領身體內部來完成整個社會控制。千萬人被屠殺、勞改、餓死、關押和被酷

刑折磨。一代又一代人被迫接受強制洗腦。國家權力通過“計劃生育”國策和計生辦，滲透到臥室床第；又通過強制絕育、墮胎，控制生殖器官和功能，在女性子宮建立計劃暴政。一屆一屆的領袖，一批一批的貪官，從毛澤東到薄熙來、周永康、徐才厚和令計劃，都是傷害無辜少女、良家婦女、影星藝人的淫蕩之徒。通過官黑勾結、官商勾結，黃色產業的興起把一、兩代農家女性和城市底層婦女整編為“黃色娘子軍”，供整個官僚階層集體施淫享樂。“二奶”、“小蜜”、“通姦”、“裸官”、嫖妓、“開苞玩處”、“小學校長開房”，從北京通到西雅圖，從廣州蔓延到全球各地的“紅磨坊”，從香港、澳門醉死夢生到拉斯維加斯花天酒地。以上所有這些，都是共產黨控制、占領、蹂躪身體權力的例證。

西方後結構主義著名哲學家邁克爾·哈特和安東尼奧·尼格理在《帝國》（Empire, 2000年，前言第14-15頁）一書中寫道：

帝國的概念最根本上是由缺乏疆界為特質的：帝國的統治沒有盡頭。首先最重要的是，帝國的概念設定了一個有效包納了空間全部的一個政權，或者說，它統治了整個“文明”世界。沒有領土的邊界限制它的統治。第二，帝國的概念不是以歷史上通過征服而建立的政體，而是一個有效地終結了歷史並因此把現存事物狀態凝固為永恆的新秩序。從帝國的視角看，這是萬事萬物將總是如此，而且一直是被期望如此的一種道。換言之，帝國呈現出的統治不是歷史運動中的一個短暫時刻，而是一個沒有時間限制的政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帝國是歷史以外的，或是歷史終結點上的。第三，帝國的統治在社會秩序的各個層次運作，延伸到社會世界的深層處。帝國不僅管理一片領土、一方人口，而且創造出它自己居住其中的世界。它不僅規範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還要試圖直接治理人性。它統治的目標是全部的社會生活，因此，帝國呈現出控制身體性權力的範式形態。最後，儘管帝國的實踐不斷要沐浴在血水中，帝國的概念卻總是致力於和平，一個超出

歷史之外的永久的、普天下的和平。

在 21 世紀共產黨奴役下的中國就是這樣一個帝國，或者說是有這樣的雄心的帝國正在進行時。在溝通行為理論中，德國哲學家哈巴馬斯提出了“生命世界殖民化”（colonization of the lifeworld）的概念。從某個意義上來說，中共黨國就是這樣一個殖民者，而中國千千萬萬的家庭、公共空間和生活在其間的上億臣民就是它的殖民對象。

第一章：罪惡的權力



1.1 “門衛國家”與“更夫國家” (2013.01.09)

若要說“門”，北京當為全中國城市之最。一般的城市就是東門、北門，或加上南門、西門。從北京的天安門出發，順時針行走你就會遇到前門、宣武門、復興門、阜成門、西直門、德勝門、安定門、東直門、朝陽門、建國門、崇文門，最後可以回到新華門、地安門。作為幾百年的帝都，北京烘托出了“門”所具有的強烈政治控制和軍事防衛含義，也最典型地詮釋了中國最重要的三個政治符號：隔開國內與國外的“國門”，區分民眾與官府的“衙門”，和幫助權勢利益集團逐利分贓的“後門”。

由於這一原因，北京總是我試圖迴避的城市，我把中國的希望和未來更多地寄託在南方中國，所以，我在南方積累了更多的過門經歷。下面就給讀者講幾個我在南方的故事（如果南方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就不言而喻了）。

故事 1：深圳，2001 年

九十年代末，我參與了一項與廣東深圳市委在美培訓幹部的項目。2001 年夏天我到了深圳，入住華強賓館。市委組織部的谷秘書告訴我，陳部長和其他一些組織部官員想和我開個碰頭會，總結一下過去的工作，同時計劃和佈置下一步在美培訓工作。谷

秘書說，“明天我帶車來賓館接你。”對我來說，資源最大的浪費是一個大活人跑來跑去浪費時間。我就回答說：“從賓館走到市委也就五分鐘的距離，你不用來接我。我走著去，明天下午兩點我會準時到會。”

第二天冒著南方的酷熱，我來到深圳市委。門衛攔住我，要我出示證件並登記。我拿出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頒發的護照。門房裡的一位男性門衛說，“這不是有效的證件，要出具工作證。”我拿出了我的紐約城市大學的工作證。門衛又說，“這不是有效證件，我要中文的。”我解釋說，“我在美國大學工作，沒有中文工作證。”門衛也說：“我在中國工作，你不能要求我們都懂英文。”我請求道：“你這兒有內線電話，能否給組織部打個電話，告訴谷秘書我到了，他會出來接我。”門衛回答說：“既然是內部電話，就不會給外人使用。要打電話，你到附近的街上找去。”我知道，要在政府部門附近找到公共電話幾無可能。大夏天，我要么走回賓館，或走到商業區。可這樣我又會遲到。所以，我有點生氣，說：“你們不能成心這樣折磨人。我就走進去，看你怎麼樣。”值班室內的一位女性門衛出來解圍，說：“看你可憐，就讓你登記吧！”因為她的開恩，我才準時到了會議室。

故事 2：深圳，2001 年

因為深圳是我研究中國政治經濟轉型選的一個點，我意識到“深圳革命”在改革開放中的重要價值，所以我去深圳做過幾次實地採訪調查。2001 年夏天，我和市國土局的一位處長在上午見面訪談後，他把我帶到了國土局的城巿發展和規劃展，要我看一看。我懷著濃厚的興趣參觀展覽。可沒過一、二十分鐘，一個門衛就要我離開，說是午間休息，要清場了。我看了看表，只有十點四十多分。我問，“你們幾點鐘下班午休？”門衛說：“十二點。”我說，“那現在還沒到時間。”他說，“但我們十一點就要閉館。”我又說，“那時間也沒到。”他又說，“但十點三刻我們就要清場，

準備關門。”我看了看整個展廳，其實就是市國土局一樓大廳。我問道：“既然所有的模型和文字都在玻璃櫥窗和櫃子裡，這又有這麼多門衛和保安，能不能讓我自己參觀完後離開？”他說：“不行。想看下午再來。”我問他：“下午幾點開館？”他說：“兩點上班，兩點半開館。”我告訴他，“三個多小時我沒辦法安排其他的事。我住在遠處的賓館，來回出租車也要幾十塊。”他的回答依然是堅絕不行，然後把我驅趕出門。

終究我未能參觀完展示深圳現代化新形象的櫥窗。事後向國土局的處長提及此事，該處長說：“沒辦法，我們中國人就是要午休。”我說，“這不是中國人的問題。銀行、商場和飯店裡都是中國人，為什麼他們不關門午休？恐怕還是官僚的問題。”想想在深圳碰到的大大小小的官員都以深圳位處中國現代化的前沿而自豪，我只能無語。

故事 3：湖南鳳凰城，2007 年

2010 年兩位少女阿紅和麗麗在鳳凰城受辱於四名公安干警手中和前者墜樓身亡，有了這樣的悲劇，我在湘西的經歷也就變得非常平淡無奇了。但我還是願意講給大家聽。

2007 年六月 20 號，趁我講學空隙，我帶著妻女到鳳凰城去旅遊。山山水水以外，我最想去的地方莫過於沈從文的故居了。到了門口售票點，我要買三張票。票房的工作人員告訴我，“一共 820 元。”即便我是從紐約來的，聽到這樣的價格也吃驚不少。如果折合成美元也有 120 多美元。在美國、甚至在歐洲，即便在巴黎的盧浮宮，一張門票也不要四十美元。我於是問售票員，“怎麼這麼貴？”他說，“這是通票，你可以參觀沈從文故居、熊希齡故居（我記不得其他的地方了）五個地方。”我說，“我不買通票，我只要單票。”他又說：“我們不買單票，只有通票。”我說：“我們對其他景點沒有興趣，再說我們要趕回吉首，也沒有時間參觀五個景點。”但售票員堅持說沒有單票買。我指著他

們掛著的一個紅色條幅說：“上面說要把鳳凰城建成國際旅遊景點。我們不扯國際那麼遠，就說說我的老家成都。杜甫草堂、武侯祠等門票是 60 元一張，你可以買單票。如果你想玩杜甫草堂、武侯祠、青羊宮、浣花溪和錦裡，你可以買 180 元的套票。你們也應該給消費者一個選擇嘛！”售票員還是說，“我們就是這樣的規定。這是領導決定的，我也沒權作主。”我提出一個折中方案：“要么這樣，我買一張套票，我們全家三口就參觀沈從文故居，你把票全部收掉。”這時已有負點小責的工作人員過來，告訴我：“這不行，我們的協作單位會有意見的。”我說，“市場經濟下你們這樣做，就是強買強賣。你應該向領導反映一下消費者的意見。”他說，“我們只執行領導的決定，我們沒有權利向領導反映意見。你有意見，你去向領導反映。”

作為專門從事中國政治制度研究的一位學者，我倒有興趣深探一下基層制度的運作，我就請教他們，問何處可以找到他們的領導。他們告訴我，“你朝前走 100 來米，左轉就是旅遊局。”於是我帶著老婆孩子去到了縣旅遊局，到了門衛收發室，說要找局長。門衛覺得我來勢不小，直接去局長室找局長。很快出來一位顯得較年輕的中年男子，向我說，“我是副局長田斌，可以接待你吧？！有什麼事情？”於是我向他講了來龍去脈。田斌副局長態度非常好，也很認真（他現在已升任局黨委書記，一點不讓我感到意外）。他指著牆上的一個政府部門職權分工圖表對我說：

“其實，你的問題不屬於我管，而是屬於物價局。不過，我打個電話瞭解一下情況。”田局長撥通了沈從文故居的電話，說了一通話後，放下電話，告訴我：“我已經為你們安排好了，去參觀，不用買票。”我非常感激局長幫忙，但卻感到非常難為情，因為我也想為鳳凰城的地方經濟出力，所以還是堅持要付一點門票。田局長有點不耐煩了：“這不好操作，你就不要為難我了。去吧去吧！”事情的結果是，我們一家三口，受惠於田局長的安排，

免費參觀了沈從文故居。近五年了，我永遠不會忘記田局長施予我的恩惠，希望今後田局長到紐約考察旅遊時，能與我聯絡，讓我能有機會盡地主之誼，了卻一樁心事。但我更想知道的是，沈從文故居的售票制度是否已有所改進。

故事 4：湖南吉首大學，2007 年

上面提到我參觀鳳凰城，那時我在湘西的吉首大學講學，給歷史文化學院的研究生講“全球化及其批評者”。那裡的研究告訴我，沈從文和黃永玉是湘西文化的兩大瑰寶，吉首大學的黃永玉美術館絕對不能錯過。但因為忙於準備講稿和與學生交流，我一直到講學結束的那一天才抽出空，在離開吉首前參觀美術館。一天前，我的妻子和女兒已經參觀過了，她們也強烈推薦，要我不要錯過。我到了美術館，說要買一張票。一男一女兩位門衛，告訴我，“二十元。”我問他們：“昨天我的妻子和女兒剛參觀過，她們告訴我，門票五元一張。”門衛說：“那她們是家屬，外來的要 20 元。”我說，“我也不是外來的，我是歷史文化學院的訪問教授。”他們說：“如果你是訪問教授，那你就不要門票。但你必須出具介紹信。”我問，“該由誰出具介紹信？”答曰：“校長辦公室。你先要到歷史文化學院出具證明，然後到校長辦公室開證明。”望著外面六月的驕陽，而且學校又已經放假，如果走完一圈，即便拿到介紹信，恐怕也沒有時間看了。我於是提醒他們：“從你的電腦上你可以看到，我的名字列在歷史文化學院的網頁上的。”他們說：“這不算數，必須要有介紹信。”我只好作罷，決定買票，不管是二十元還是三十元，同時請求道：“可以給我看一下收費標準嗎？”他們回答說：“沒有收費標準，以我們說的算。”我感到非常詫異：“如果我在學校網頁上的信息都不作數，那憑什麼你們口說就更權威？”

其實，對我來說，事情的核心不在五元還是二十元。作為一個熱愛藝術的文化人，即便沒有收費，我也總會在募捐箱或功德

箱裡塞些錢。如果他們沒有門票，只有隨喜募捐的箱子，我也會給上三、五十塊。問題是，門衛可以隨意決定，他們的話就成了規則。當然我無法改變他們的工作作風和方法，也只好交上二十塊才得進門參觀。可以說，黃永玉的繪畫作品讓我永世難忘。但遺憾的是，與門衛的無效說理也同樣讓我難以忘懷。

故事 5：上海華東政法大學，2007 年

從湘西回到上海，覺得事情要好辦一些，畢竟我在上海生活和工作過整整十年，對上海還算瞭解。再說，同學、學生和家庭的關係網在上海也還不算差。由於研究黑社會課題的緣故，我到華東政法大學去拜會了幾位同行，與邱格屏等教授討論黑社會問題。我的復旦老同學童之偉也在那裡做教授。在那裡小住期間，童教授給我他的借書證，讓我到資料室去看一看資料。我拿著童教授的借書證，到了教工 / 研究生資料室。照著美國的規矩行事，我沒有冒充是童教授，晃一下證件、徑直進去，而是告訴資料室的門衛，我是由童教授介紹過來的，這有證件為憑，想看一下資料。門衛不允許，而把我領到了資料室負責人的辦公室。這位負責人說：“我們的教工 / 研究生資料室只為本校師生員工服務，是內部的，不對外開放。”根據我在國內各大學、甚至中國社科院有關研究所的經歷，我知道它們就我所做的課題的資料收藏基本達不到我的個人收藏的三分之一，我只要瀏覽一遍，就可以知道那一、兩本書是我沒有的。所以我要求只用一個下午。結果還是不行。我給他們解釋：在美國，我們幫助了無數中國學者查找資料，帶他們到圖書館，從未遇到過任何障礙。這位負責人還是不通融，堅持要有介紹信。我說，“那我去找《法學》編輯部的主編童之偉教授出具一份介紹信。”傍邊的一位工作人員笑了起來：“《法學》編輯部的行政級別比我們圖書館還要低，他們的介紹信管什麼用？”我想既然我來這裡與邱格屏交流，我說，“那我去找科技處的邱格屏處長開一個介紹信，行嗎？”結果這位工作人員又笑了，

“科技處的級別才和我們一樣高。我們只認校長辦公室的介紹信。”當然，要找到校長辦公室也不是難於登天，也許會動用一下同學、學生和家人的關係，或者動用一下我主持的上海幹部留美培訓項目的學員。但畢竟為了此等區區小事、浪費一、兩天時間實在是不值。我的沮喪一定溢於言表。最後那位負責人說：“我可憐你一下吧，科技處的介紹信也可以。”結果，我又跑去找邱格屏，折騰了一天，兩天後拿著蓋著紅色印章的介紹信，再去資料室。不出我的預料，我也就找到了兩本書不在我的收藏之列。

特權和方便

過去幾年，每當我把上面的故事講給親朋好友聽時，一般有三種反應：第一，為什麼這樣的爛事全都被你碰到？我從來不會遇到如此麻煩。我到哪兒去都是一路綠燈。沒安排好，我就不去。第二，這有什麼大驚小怪的？哪兒都是這樣的。我們都習慣了，所以也不覺得奇怪，甚至感覺不到了。第三，你真是吃飽了沒事幹，天真得很，還去自找麻煩。你還算幸運了。遇到更不講理的，你麻煩還會更大。這三種反映來自三類不同的人：有特權的、麻木的和怕事的。我能理解所有的三種心態。記得2005年我被邀請到杭州參加《2005 警察與科學國際講壇：情報信息主導警務》，就有關中國黑社會問題作報告。我們坐的車都有警車開道，進出大門都有武警開門、敬禮。由於這次會議的緣故，武漢市公安局的一位局長邀請我到他的局裡給幹警作報告，同時給我在武漢調研黑社會犯罪和打黑工作提供方便。市局給我配備了一輛黑色的奧迪，車牌是“鄂0-A0096”，還有一位外事處辦公室主任和一位接待科副科長隨行陪同。這輛車既可以穿紅燈，又可以逆向行駛，還可以開到東湖景區的楚雲台下、離騷碑前；甚至在車未到時就有東湖景區警署的政委在辦公樓前等候。設想，如果我坐上深圳

市委派來的車接我到組織部辦公室去開會，我就不會遇到刁難，門衛甚至會給我立正敬禮。

在中國這些生存的藝術我還是明白的。但我還是有這個疑惑：為什麼中國社會運作的邏輯現在依然如魯迅所言：“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席。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席的廚房。”魯迅還指出，中國也只有兩種人：“主子”和“奴才”：“我們自己是早已佈置妥貼了，有貴賤，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別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別人。一級一級的製馭著，不能動彈，也不想動彈了。”（《魯迅全集》，第一卷，《墳：燈下漫筆》，第195-200頁，唐山出版社1989年版）。我想探出的究竟答案無非是，有特權的人當然樂於做主子，小人物也安於做“奴才”，因為就像任何一個守門的，他（或她）都有機會“凌虐別人”。一道道關卡、一道道門就必然成了中國人從“奴才”搖身變為“主子”的戲台，也成了中國人層層盤剝掠奪陌生人的機關。當整個國家都以這樣的邏輯運行時，這個國家也就成了“門衛國家”或者“守門人國家”。

管、卡、壓和政府尋租

美國著名歷史學家、紐約大學教授弗里德里克·庫珀（Frederick Cooper）在研究後殖民時期的非洲專制政權時，提出了“守門人國家”（the gatekeeper state）的概念（見他的Africa since 1940）。許多的新興國家在獨立後儘管取代了殖民主義國家，其實依然只是控制著幾個關鍵的“門”來攫取資源、分配機會和維護權貴階層的蔭護關係。例如，控制本國與國際商業交往的海關，本國貨幣與國際貨幣兌換的外匯管制，進入官僚體系的人事部門，審批准入各個行業的監管機構，等等。“守門人國家”通常並不能真

正控制社會的末端，但它可以控制官僚體系和地方政府，在官僚主義、腐敗分贓和裙帶關係瀰漫的情況下，國家極易墮落為掠奪性國家或“竊賊國家”。蒙博託之下的紮伊爾就是一個經典案例。同時，“守門人國家”把控制人才、資源和信息的各個“門”的重要性抬得如此之高，政治鬥爭經常又集中表現為“門戶”爭奪或者是想方設法繞過各種“門檻”。所以，在這樣的國家裡，有特權的“走後門”，有資源的收買門房，不守法有本事的“翻牆”，遵紀守法的良民往往會碰到“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的窘境。

與非洲的後殖民國家相比，中國可以說是一個“看門人國家”，但它對社會內部的控制力要遠遠強於非洲國家。尤其對聯繫各個地區、部門、單位、行業、社區和公民的“關節點”，中國的國家更具有超強的控制力。中國國家的特徵是有特定的歷史背景的：一方面受到革命時期建立“革命國家”的傳統影響，另一方面又受到改革開放時期建立的“發展型國家”的影響。中國的“革命國家”面臨的首要任務是“拒敵於國門之外”：這裡的敵人包括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它的主要特徵是“閉關鎖國”和“自我封閉”。到了鄧小平時期，國家面臨的首要挑戰是經濟落後和民窮國弱。鄧小平提出了“發展是硬道理”，經過“摸著石頭過河”、“白貓、黑貓”和“三個有利於”的各階段，中國建成了“發展型國家”。它的主要特徵是“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從1979年查封“民主牆”到1989年拉薩戒嚴和天安門開槍鎮壓，再到1999年鎮壓“法輪功”，在鄧、江時期中國基本處於“專制發展型國家”階段。隨著中國經濟的起飛、全球化程度的深化和民眾權利意識的提升，中國國家的內在邏輯和外在职能應當逐漸向“民主發展型國家”進化。

自由主義剃刀

關於國家內在邏輯和外在职能的“理想模式”莫過於“更夫

國家”（或者又叫“守夜人國家”）的概念了。人們通常把它歸於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一書中所創。其實，“守夜人國家”最早是由德國的社會主義活動家斐迪南·拉薩爾 (Ferdinand Lassalle) 於 1862 年在柏林的一次演講中使用的。作為左翼的社會主義者，他的本意是要抨擊“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國家”無所作為，結果自由主義很樂意地採納了這個概念，並用來界定國家的理想職能。既然亞當·斯密被奉為現代自由資本主義的鼻祖，許多作者將這一概念與《國富論》論述的國家職能聯繫在一起。從《國富論》的第五卷我們可以看到，斯密為國家界定了三項基本職能：建立軍隊維持國防安全、建立司法體系維護國內秩序和公正、提供私人無法或不願提供的公共工程和服務（例如，教育和商業基礎設施等）。除此之外，任何國家新職能的擴張都必須受到“自由主義剃刀”的檢審。如卡爾·波普爾所說：“國家是一種必要的罪惡：如無必要，它的權力不應增加。可以把這原則稱為‘自由主義剃刀’。（類似於奧卡姆剃刀，即那條著名的原則：如無必要，實體或本質不應增加。）”（見：《猜想與反駁》，上海譯文 1986 年版，第 499 頁）在自由主義的思維里，國家具有保護功能、管制功能和服務功能。當國家像一個“更夫”忠於職守巡邏社區時，衛民護財卻不擾亂鄉里，同時能夠尊重各家各戶、各個個體安居樂業。與此相比，“門衛”國家卻是更像一個懶惰卻又貪婪凶狠的看門人，有人就管、卡、勒索甚至凌辱，無人就睡大覺，根本疏於巡邏，遠離民眾，忽略鄉里的生命財產安全。

在上個世紀 80 年代，也就是波普爾的著作被譯為中文，並風靡學術界的時候，中國的改革已提出了“大社會、小政府”的思路，在海南也開始了實驗。發展的專制主義模式有可能逐漸轉向民主發展型國家。但鄧小平沒有遠見成全這一轉型，也沒有能力來主導這一轉型。他繼續依賴暴力這一粗暴原始的手段來解決中國的政治、社會問題，結果製造了震驚世界的天安門屠殺。由於

暴力高調走到政治前台，有了暴力的保駕護航，中國的國家逐漸喪失了發展型的特徵，而其掠奪性特徵愈加明顯和強化。既然暴力直接成為權力合法性的論證方式，權力就更加肆無忌憚、肆意妄行。在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下，國家權力成為“點金術”，官府職位成為“吸金管”。面對日益市場化和全球化的經濟，權力在每一個人力、物質、資金、信息進行銜接、流通和交換的關節點上設置層層關卡，壟斷控制各種機會和資源，尤其是市場和行業的准入。官僚們以此顯示權力，收取租金，為自己獲得權力、財富和地位的全方位豐收。權力的尋租加快了國家的腐敗，守門人監守自盜的現象成為頑疾。執政黨和權勢既得利益集團為了給“門衛國家”構建出堅實的銅牆鐵壁，不僅收緊了對政治活躍分子和異議人士的控制，要么把他們關在鐵門後面（例如，王炳章、劉曉波、劉霞、劉賢斌、馮正虎、陳西、郭泉等），要么把他們拒於國門之外、剝奪他們的族權、文化認同權和歸家認祖續親情的權利；而且還封鎖信息自由門，築建防火牆。以至中國的“門衛國家”不僅行為荒謬怪誕，而且心態越發封閉、狂妄自大。從我與中國社會和官府互動的親生經歷而言，儘管過去二十年基本一脈相承，但2004年胡溫執政後中國向“門衛國家”的下滑呈現了加速度發展。

中、西反差對比

在美國生活了二十多年，也遊走了近三十個國家，在生活的細微層面上經常可以感覺到“門衛國家”和“更夫國家”的巨大差異。記得在復旦大學讀書任教時，最煩的是每次進出校門都要出示證件。男同學要訪問女同學，更要簽名登記、抵押證件，而且有規定的時間。好在我讀書時是班上年紀最小的，與班上女同學有兩歲的差異，沒有動力往女生宿舍跑，所以麻煩倒不大。只

是我的學哥們經常是帶著對守門老太的怨氣回到寢室。後來我有學生在學生工作部跑腿，加入了復旦巡夜糾察隊，每個隊員拿著電筒專門到樹叢後面、花園角落去捉雙。我的岳父在上海交通大學的一位女博士生在我們家還抱怨，交大的巡夜糾察隊還專門喜歡照進女生宿舍的蚊帳。我至今還記得，無論走到中國的哪一個機構或辦公室，常聽到的訓斥是：“誰叫你進來的？門上有寫讓你進來嗎？”最讓我意外的是，我在無數國家進行過國際航班轉機，只有“改革開放”的中國會把我阻攔住。儘管我手持美國護照，早已跳出中共掌心，在廣州白雲機場也不許我過關換乘下一個國際航班。

到了美國，第一個發現是美國的大學沒有校門（我現在的學校恐怕是紐約唯一有校門加門衛的）。另外，只要沒有“訪客止步”的明示，任何公共場所和機構都是對外人開放的，政府機構尤其如此。因為擔心如果沒有給納稅人提供服務，政府財政預算和部門都有可能會被削減，美國的政府和公益辦公室非常歡迎你去麻煩他們辦事。我在華盛頓工作的一年間，我最喜歡的是所有的國立博物館都免費（對外國人也如此！）。到日本參觀京都的皇宮，天皇御所管理局為你提供精美的導遊圖，在休息室提供空調間和免費茶水，高水平的翻譯導遊陪同參觀一小時，所有這一切都免費。我琢磨其中的道理，原來是政府讓利於民，不與民爭利。如果遊客都喜歡到日本，來得越多，儘管政府的景點不收費，但給商家創造了更多的商機，讓百姓可以有錢可賺。這就不奇怪了：我全家在奧地利自駕游，沒有碰到過一個警察來找麻煩，沒交過一次罰款，沒有在國家經營的景點買過門票，但旅遊業卻給奧地利帶來了近 50 % 的國民生產總值。

繁瑣、蠻狠、低效率、尋租和腐敗以及由此製造的屈辱和尊嚴的喪失是“門衛國家”的共同特徵。當一個國家把最簡單的事情可以搞得複雜起來，把日常生活的正常運作控制在行政官僚體

系和規章之下，這樣的國家每一時刻、每一地點、在每一樁小事上都製造出“交易成本”，它是不可能成為“競爭型國家”的。在全球化使得國家創造和維持競爭優勢的“誤差幅度”（margin of error）越來越小的情況下，“門衛國家”必然會喪失創新力和競爭力。前蘇聯從一個超級大國走向崩潰就是一個例證。對於一個民族來說，這樣的命運也許難以避免，所以我們看到非洲的幾十個國家在半個多世紀的歲月裡就在裡面打滾。但對我個人選擇來講，我可以儘量做到少與“門衛國家”糾纏，多居“更夫國家”休閒。

祖國愛你嗎？

由於殘存的文化認同，我過去極力動員和說服我的女兒與我一道去中國旅遊。對於出身在費城郊區的她來說，美國就是她的祖國，她沒有任何動力想去一個遠方陌生的國度。為此我給她把中國說的如何的好、如何的美。她反問我：“如果中國這麼好，你為什麼還要離開她？”我只好說：“中國真的很好、很美，只是少點自由，所以我離開了。”她又問：“什麼是自由？”面對五、六歲女兒天真的眼神，我只好告訴她，以後給她解釋什麼是自由。過了幾年，我們又回到上海，然後又離開回美國。在出浦東國際機場時，安檢搜查了我女兒的背包，查出一把小剪子，並當場沒收。熱愛美術的女兒當然不願意她心愛的藝術剪子被沒收，一下子大哭起來。我向安檢解釋，這是兒童用的塑料剪子，不含金屬，而且也沒有刀刃，是否可以例外。安檢說，“所有刀具都不許帶上飛機，這是刀具，一定要搜繳。”看著幾位安檢警惕性極高、而且毫無通融的樣子，我只好給女兒做工作：“這其實也是為我們好。你知道本·拉登組織劫持飛機，炸了我們紐約的世界貿易大廈，所以飛機要有安全保障。”我女兒並未被說服，她反問一句：“如果不許帶上飛機，我怎麼又可以把它從紐約帶到上海呢？”我頓

時無言，只好對她說：“記得你以前問過我，為什麼我說中國好，但又離開了中國。我說，因為中國少點自由。你問我什麼是自由？我現在告訴你，這就是自由。你可以把藝術小手工剪子從美國帶到中國，但你沒法從中國帶回美國，就是因為中國少點自由。”我女兒馬上說道：“我不喜歡中國！我再也不來中國了！”真的，從此以後，我們父女倆再也沒有回過中國了。

不知何故，在行文結束時我想起了紅色革命教育殘留在記憶裡的葉挺的《囚歌》：

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
為狗爬出的洞敞開著。
一個聲音高叫著——
爬出來吧，給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我深深地知道——
人的身軀怎能從狗洞裡爬出！
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
將我連這活棺材一齊燒掉，
我應該在烈火與熱血中得到永生！

1.2 死得有尊嚴：最後的人權 (2012.06.04)

讀著黃文廣的《紅小兵》(2012年)一書，我越發感到不安，禁不住問自己：我是否剽竊了黃的人生？或者，黃的家庭回憶錄其實是把我的家史揉合在一起的小說？

黃的回憶錄把我們帶回到了四十年前，述說了發生在毛澤東共產黨政權下的真實故事。本書講述了作者在新、舊中國發生劇烈衝突年間成長的經歷。它不僅重現了過去，而且也會激發我們的興趣、幫助我們瞭解二十世紀中國複雜的歷史和政治。

相同軌蹟的人生

1974年十歲的黃作為家裡的長子成了奶奶棺木的看護人。晚上他還睡在旁邊。自從1949年共產黨建立政權後，政府廢除了傳統的土葬。但黃的奶奶堅持要死后土葬。隨著年歲增加，她也愈發關心自己的歸宿。為了滿足老人的心願，黃家不得不悄悄地做好棺木土葬的準備。這一下就是十五年。期間家庭時刻生活在擔憂之中，唯恐被政府察覺，因為那個年代政府把傳統的婚喪嫁娶責斥為“舊時代腐朽、殘酷行為”，沿襲舊習慣會帶來不測的懲罰。

家里為此也時常爆發衝突。

我和黃文廣的人生軌蹟有著驚人的相似，而且有六年還在復旦校園相會。1964年黃出生在西北陝西省首府西安；一年後，我出生在鄰近的西南四川省首府成都。他生長在一個三世同堂的七人大家庭裡，爸爸是一個共產黨員，單位幹部。我也有一模一樣的家庭結構。作為長子，黃受到更多疼愛，家庭對他也抱有最多希望。作為家裡的小兒子（我父母喜歡說，“皇帝愛長子，百姓愛么兒。”），父母也更疼我，尤其外婆嬌慣我最多。我們倆人童年最溫馨的記憶都來自我們的奶奶和外婆，她們都把我們當成沒有暖氣的嚴寒冬天的“腳煨子”。黃家的棺木讓我想起了我父母為我外婆準備的黑色棺木，但由於有黃家父母同樣的擔憂，1984年我外婆去世後被送去火化，棺木並未派上用場。

我和黃文廣都以優異成績從高中畢業，遠離家鄉到上海復旦求學；黃比我晚一屆。他是外文系英語專業的，我學的是國際政治（但我係有復旦“第二外語系”之稱）。我們都同住七號樓宿舍。毛時代後的校園掀起了知識啟蒙，康德、尼采、薩特、弗洛伊德等西方思想家風靡一時，對我們都產生了極大的衝擊。“美國之音”成了我們學英語和聽新聞的伙伴。喬治·奧威爾的《1984》讓我們同樣激動。我們的校園生活都被父親的病逝打斷，而且他們同樣患的是肺癌。後來我們都不顧其他家人的反對，堅決支持我們的母親再婚。

同樣不顧父母的告誡，我們倆人都積極捲入了1989年的學生運動，最終受到紀律處分。因為我當時已是教師，不再是“天真單純”的學生，遭遇要慘些。後來我們又都以同樣的方式得到解救：我們在校園結識的美國教授幫助我們進入美國的大學讀研究生。1990年，黃怀揣60美元來到美國；在幹過餐館工等各種經歷後，他畢業後成了作家以英文寫作為生。也就只有100美元，我到費城開始我的新生活。現在，這本書和書評又把我們連在了一起。

對比我們的人生軌跡，也基本把本書的故事梗概說清了。如果說我們生命中的平行和交匯給我某種優勢來品評本書，我對書中內容的熟悉又使我成了更加挑剔的讀者。我必須說，作者把許多普通的人和事編制成了一個引人入勝的敘述。通過一系列驚奇、諷刺和荒誕的小故事，作者緊緊抓住了讀者的心。我們知道，要找到真實的故事不容易，要寫出精彩的小說也不容易。而在此書中，黃給我們講述了一個既真實而又精彩的故事。

棺木和死亡焦慮

在閱讀本書時，我始終在想三個問題：作者都回憶了些什麼？在描述一代中國人時，我們又看到了那些缺失？通過寫作，作者又發現了什麼？

在黃的記憶中，奶奶的棺材占據了顯著的位置，不斷提醒人們生命的不測、焦慮和死亡。在中國儒、釋、道三教合一的傳統文化中，棺木具有多種含義。它既是裝屍體的，是活人的最終歸宿，是人們的“老屋”，又是超渡人們生死輪迴的舟筏。傳統的中國人信奉生死輪迴、祖先保佑、陰間團聚和靈魂感應，為活人預備棺木是要讓他熟悉“老屋”，減少對死亡的畏懼，同時加強代際之間的關係。書中的父親不止一次地提到，體面的土葬是對父母儘自己的孝道和感恩。

但書中的悲劇在於，棺木成了家庭矛盾衝突的根源，結果老少兩代最終都對它產生了某種不快。在中國物質匱乏的年代，做個棺木是個不小的經濟負擔，存放也不容易，矛盾難免不產生。再說，政府力行“破除四舊”，其殘忍方式使人心存畏懼。尤其對被控制得更嚴的城里人來說，為了生存，他們必須得跟對風向、占對立場。而1973年，在書中的奶奶要過73歲生日時，身體日漸衰老的她更是強烈地感到大限的臨近。七十年代的自然災害，

例如頻繁的地震，時刻提醒她死亡的威脅。但我更傾向於認為，奶奶的焦慮更多產生於她日漸猜疑她的兒子是否會給她土葬。她的媳婦從未支持過做棺木、搞土葬，而全國推行火葬的政治壓力也愈來愈大，她的兒子是個黨員，這些都讓她信心不足。

如果說，在傳統中國，家中的棺木使得死亡變得不那麼可怕，那在共產黨中國，棺木卻把生命用死亡籠罩起來，不斷侵蝕著生命。中國共產革命打斷了中國文化傳統，引入了無神論和唯物論，剝奪了人們的靈魂、信仰和心靈安慰，使得死亡變得恐怖不堪。今天在天安門中央人們還可以看到共產黨統治的虛偽和矛盾：毛澤東禁止中國人依照傳統自由選擇死亡安葬儀式，他卻給自己一個特權躺在水晶棺裡，供世人瞻仰敬拜。

書中的奶奶最終並未送歸故里，與她的丈夫合葬一起。我自己的外婆也是送去火化，沒能用上給她預備的棺木。保留棺木和土葬成了無數中國家庭保存傳統、抵制黨的控制的一種方式。但對中國無數的守棺人來說，共產主義的破壞力勢不可擋。

棺木、喪葬和死亡構成了書的主旋律。傳統觀念讓書中的奶奶篤信，只有安放在棺木中土葬，她才會與她的丈夫在陰間團聚。她不敢想像，死後被丟進焚化爐裡去燒。但共產黨的宣傳，尤其是階級理論的一套，把傳統的喪葬描繪成富人的死亡儀式，他們不忘犧牲窮人，尤其是窮人小女孩，讓他們繼續在陰間還服侍富人。作者用了近乎荒誕的手法描述了毛的追悼會，開始流露出他對傳統喪葬的矛盾心理：他想讓自己的奶奶也能享用同樣的排場；另一方面，他這個孩子對大人們過火的表演又感到不適。他的一位爺爺輩的親戚的喪事讓他有了更多的負面看法。在大學裡看過話劇《北京人》，行將就木的老太爺和他那口已反復漆了十五年的壽木給黃帶來了極大的震動。沉溺於死亡既可是內心空虛的表現，又會變得荒誕。黃更進一步懷疑保留傳統喪葬的必要，開始反叛中國傳統文化。這一反叛部分解釋了為何他缺席奶奶的喪事和在

父親的喪葬活動中表現欠佳。但我們從 70 年代秦始皇墓兵馬俑的開發和利用可以看到中國傳統消失的又一因素：古董的商業化開發利用並未真正將中國人與傳統在精神意義上連接起來，而只是把中國的傳統暴露在更快速的風化雨蝕之中。黃家在河南的祖墳最終被埋在了新開發項目下，也再次證明市場化的列寧政權對中國傳統的殺傷力。

在我看來，書中的棺木更可能是一個政治比喻。用美國作家沃克·珀西（Walker Percy）的小說來比喻，中國始終生存在“死亡綜合症”下：一方面，生存等同於無窮無盡的磨難，人們有嚮往死亡的衝動；另一方面，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灌輸的無神論和唯物主義摧毀了人們最後的精神慰藉，對死亡的恐懼又無比強烈。就像珀西小說裡的官員和科學家所作所為，共產主義政權把毒素注射進人民的精神意識層面，阻止越軌行為（比如“四舊”和“腐朽的西方生活方式”之類），塑造整齊劃一。這種控制體系卻又在階級鬥爭的掩蓋下鼓勵人們從事各種黨認可的犯罪。

生和死的尊嚴

本書清楚地告訴讀者，基於個人的自由意志生活是人的基本人權，但在中國它遭到了系統的剝奪。同時中國人也被剝奪了最後一項人權：死得有尊嚴。

如黃在書中描寫的，生活在毛時代的中國，面臨的是物質匱乏和被剝奪，而仇視、挫折、恐懼、猜忌、出賣、荒誕、犬儒和拉關係充斥日常生活。生活中卻鮮見個性、獨立性、創造性、高遠志向和對國內外人類生存狀況的客觀認識。在英國留學以後，同時見證了自己母親在父親去世後的內心覺醒後，作者猛然意識到，親暱、溫馨和愛情在中國家庭裡是不存在的。黃在書中寫道自己的覺悟：“我渴望生命中的自由，而不是受制於安排。我感

到我已經有能力在生命中做出自己的獨立選擇，而不是按家庭或國家的要求去做。”

中國人的物質匱乏在過去三十年的經濟奇蹟中多多少少地得到了解決。但中國的問題遠較此更為複雜。作者寫道：“一夜之間把一個國家與悠久的歷史傳統割斷開來是複雜的事。它最明顯地反映在我父親的矛盾性中。而我就在這種矛盾中長大，把意識形態和信念混雜了起來。”深層的情感、心理和精神上的被剝奪恐怕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修復。作者的、也是我的同代人現正在運作和管理中國，也正在準備接任統治中國。但這是一個深受到創傷的一代。即便他們之中的佼佼者也未能經歷良好的道德和精神教育。黃是少有的幸運者之一。在追溯整個二十世紀的家族史、訪問自己的老家後，在歐美學習、工作和生活若干年後，作者有幸找到了愛、親密和溫馨的意義，發現了個性、人格完合，同時還有靈魂、轉世和宗教信仰（即有佛教也有基督教）。書的結尾處讓人感到某種希望，因為作者最終與他的父母、爺爺奶奶實現了精神上的溝通；也與中國傳統和中國文化魂連為一體。但恰在此時，他遭到了中國政權更大的排斥。讀到書的最後文字，卻讓我傷心：“每次從海外旅行歸來，從飛機上看到熟悉的芝加哥，我都要悄悄對自己說：‘我回家了。’”我自己作為一個漂泊者，我知道我現在比我在中國時更中國；但只在紐約我才有歸家感。儘管毛已死三十多年，但對中國人來說，肉體上的流放仍然是內心覺醒的前提或結果。具有批判精神、創新精神和自省意識的思想家在中國仍然不受歡迎。這或許在提醒我們，一個黑色的棺木依然還沉沉地掛在中國上空，阻礙著中華民族真正回歸到自己精神和文化的家園。

閱讀此書不難引起我的共鳴。為了知道作者是否能跨越文化和代際的障礙，征服美國年青讀者，我要我的在美國出生長大的女兒與我同讀該書，並寫出她的評論。竹力這樣寫道：

儘管我喜歡讀書，但偏好小說勝過非小說類作品。黃文廣的回憶錄《紅小兵》是今年我讀的一部感人之作。黃把他的過去生動地再現出來。我尤其欽佩他把事件和故事串起來的技巧。老實說，我對政治不感興趣，對毛時代的政治更是如此。但讀完本書後，我對共產黨體制的弊端及其對老百姓日常生活的衝擊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紅小兵》展示了毛為首的中國政府的虛偽性和服從、壓迫所帶來的諸多問題。這些主題一定會激發起美國年青人的興趣。不僅他們可以更好地瞭解一個他們不熟悉的社會和文化，而且會更加珍惜自由和探索這些普世主題。我特別推薦高中的世界史課把它用作選讀教材。幾週以前我和我的同學們讀了一本有關北朝鮮政權的書，激發了我們在課堂上和課外的許多討論。我相信這本書會產生同樣、甚至更大的效果。

我喜歡此書的又一個原因是，它的許多具體細節和內容讓我想到我父母講給我聽的他們的童年。在對待政治問題上，黃和他父母的衝突使我聯想到我父親與他父母的衝突。黃和我的父親就讀的是同一所復旦大學。

讀完《紅小兵》，讀者會更清楚地認識到自由的真諦是普世需求，而不是一項特權。不管是否面對奴役、政治壓迫和社會不義，人性的力量和精神都會引領我們通向自由。

德國哲學家阿多諾和他的合作者們在《專制人格》一書中寫道：“如果恐懼和破壞是法西斯主義的情感源泉，那大愛則屬於民主。”在一個正常社會，愛應該滲透到整個生活。人們不僅可以享受民主的生活方式，而且愛也應該充滿死亡的過程。這也許就是我和我女兒從該書領悟到的最重要的啟示。

1.3 “國保”：中國特色的國寶利器 (2015.01)

徐友漁、華澤的《遭遇警察：中國維權第一線親歷故事》在2012年夏天就已出版。到現在，它的英文版（*In the Shadow of the Rising Dragon: Stories of Repression in the New China*, Palgrave, 2013）也已出版一年多。由於我和作者、編者、譯者都有緣分，所以該書在成書過程中就為我所知。早在2011年利用我的學術休假，我把華澤的《飄香蒙難記》翻譯成英文，發表在紐約的《中國人權》雙周刊上。華澤親筆簽名的書放在我的案頭也有兩年半。直到2015年年頭，我才動筆寫下我的書評，兌現給朋友的承諾。

野蠻的黑森林

我一年通常可以讀一二十本、甚至幾十本書，但《遭遇警察》讓我讀了三年。受阻的主要原因是我不願進入黑暗深處。人生至此，我悟透了但丁《神曲》開篇之言：“當人生的中途，我迷失在一個黑暗的森林之中。筆直向前的路徑已經失落。啊，對我而言，要說明那個森林的荒野，殘酷和廣袤，是多麼的困難啊！僅僅是這想法本身，就會激發新的恐懼。”另外一個原因是，我始終無

法開悟，為下面的問題找到答案：我們如何穿過黑暗，又如何找到光明？思想的目的不僅僅是要感受他人的經歷，或只是看到人性的美醜。更重要的是，我們如何從一個一個的案例中，發揮我們的“社會學想像力”來揭示、總結和歸納出模式、制度和政治社會宏觀的變遷（C·賴特·米爾斯）。尤其重要的是，這種社會學想像力帶來的飛躍從而引申出的結論，恐怕並非會為編者和作者所直面或接受。當一位創造者對他的成果還處在舔犢情深的階段，我把他人的智慧之子當成一個完全獨立的解讀對象，稍不小心恐怕造成誤讀，引起朋友之間的誤解。

讀罷《遭遇警察》，合卷深思，腦海裡留下的是恐怖、陰森和野蠻的黑森林。22位作者、22篇文章，篇篇催人淚下，讓人唏噓不已。正如作者們指出的，中國還是一個“法外的、野蠻的國度”（徐友漁），是一個比“冷風刺骨”的冬天還冷的地方（滕彪），一個“圍城之國”——外面的人進不去，裡面的人出不來（小喬），是一個“荒謬的社會”（遊精佑），是一個“邪惡政權”下的“神棄之地”、“恐怖的國度”和“毒化的中國”（李昕艾），是一個停留在“不正常時代”的“奇蹟之國”（慕容雪村），是一個“警察無處不在”、“極權主義全面控制社會生活”的“警察國家”、“一個野蠻國家、黑幫政府”（華澤）。

出版人金鐘指出，這種建立在“和諧謊言之上”的警察國家，“只有納粹的蓋世太保和蘇聯的克格勃可以類比”。而其核心機構就是“國內安全保衛局或大隊”，簡稱“國保”。這一中國特色的“蓋世太保”對中共黨國的維穩體系來說，就是一個國寶，一個濫用“毫無必要的橫暴”（徐友漁語）治國的利器。

“毫無必要的橫暴”

本書的作者們提供了大量親身經歷，展示了“國保”的殘忍

和暴虐。最讓人震驚的是傷害致傷的濫用。例如，滕彪是這樣描述他所遭受的“難以想像的身體及精神折磨”：綁架、失蹤、帶黑頭套、狠踢、“扭胳膊、摳腦袋、掐脖子，推、抓、拽，非常粗暴地將我摳倒。”而他的一位同道也是“被多次辱罵，腦袋被摳到地上，臉被搗，手指被猛攢，右手大拇指和手腕有明顯傷痕。”古川的妻子李昕艾寫道：“古川被祕密關押期間，經歷了帶黑頭套、不讓睡覺、不給飯吃、不准走動、肆意辱罵、拳打腳踢、耳光如風、扒光褲子、被逼下跪等種種酷刑……負責審訊他的‘國保’陳世傑見古川不肯屈服就範，就拿兩個孩子來威脅要挾。”

北京獨立製片人何楊這樣描述他關押時半夜被隔壁聲音驚醒：

“‘我X你媽，X你媽……’一陣怒吼和謾罵聲，有人呻吟，低沉的呻吟聲。又是一陣謾罵和怒吼……從這種暴虐的聲音中不難判斷隔壁的情形。”記者雨聲這樣記述了他莫名其妙遭受的警察的毒打：那人一拳打到我臉上……又一人揮拳打到我的頭上。“更多的拳頭，頭、臉、胸、腹，紛紛中招。兩個人各扳我一條胳膊使勁往上抬，其中一人一邊抽我的皮帶，一邊用拳頭打我的胸腹，另一個人主要攻擊我的頭部，身後還有一人可能湊不到跟前，於是跳到旁邊小桌子上，抬腿對著我的頭和臉就是兩腳，他的動作提醒了另一個人，那人也跳上桌子一起踢我的頭。”

本書編者和作者徐友漁觀察到：“在二〇〇八年之後我聽說的許多事例中，警察是蠻橫粗暴的，他們張嘴就罵、抬手就打，對待女性也如此，完全沒有策略一說。”本書的一大特色是幾乎一半的作者是女性，而且多是知識女性，而且還涉及其他許多“閃耀的女性”（何培蓉）。她們的記錄也不缺少殘酷的暴力折磨，而且還有專門針對女性的“微侵”。福建福清為弟弟申冤的吳華英半夜被從家中拷走，下面是她記述的隨後經歷：“我被按坐在一張‘老虎凳’上。‘老虎凳’用鐵條和鋼管焊成，扣上前面的橫版，我被固定在裡面不能動彈。”“審訊輪班進行。”“長時間被強

光照射，我已分不清白天、黑夜。身體裡的水分也在悶熱中蒸發流失。被固定在‘老虎凳’上的身體麻木酸疼，滴水粒米未進的腸胃開始一陣陣痙攣。我一邊用手摀著胃，一邊彎著身子，以減輕腸胃痙攣造成的疼痛。審訊者時而戳我腦袋，時而猛踢‘老虎凳’，時而拽著我的肩膀晃動，不讓我因極度疲乏而昏睡過去。”

性騷擾還包括：“女犯”洗澡間讓在裡邊“如廁洗澡的人春光外洩”，送飯的師傅、巡邏的管教都會偷窺（吳華英）；“穿的裙子被掀起來”和“不讓穿衣服”，還有“警察衝進來把她們帶到和什麼裡派出所，拳打腳踢，讓她們承認賣淫，還給她們嘴上捂三層口罩，每層都塗上芥末油，連嗆帶憋，不是人受的罪”（王荔蕪），上洗手間有女警一直貼身跟隨，“不能關閉洗手間的小門”（小喬），等等。慕容雪村還寫道劉沙沙的例子，講到女性參與維權的危險，特別提到陳光誠住的“東師古離我們有好幾千年，遠在叢林時代，有許多詭異的特產：布袋蒙頭、拳頭打腦袋、腳踢褲襠，還有搶劫和猥褻。”

刻意算計的“微侵”

曾在央視供職的紀錄片製片人華澤“被人從後面按住，仰面架起，一邊向後拖，一邊黑頭套從天而降。”她寫道：“掙扎的過程中，黑頭套被我掙脫了，在被七八個大漢頭朝下腳朝上塞進麵包車時，記住了這個最後的鏡頭：我用雙腳勾住白色麵包車的門框，不肯就範。一個綁匪變形的臉，惡狠狠地俯視我：‘再掙巴就弄死你！’隨後便失去了知覺。”後來，一個她稱之為“打手”的將她的手腕往後扣，一邊從牙縫裡罵：“你叫啊，快叫！你不是厲害嗎？我就捏死你！捏死你這個賤B！”華澤記述道：“我的手腕被他擰得和胳膊形成了三十度銳角。四肢開始痙攣，漸漸麻木，失去了知覺。”與身處社會邊緣的下層女性相比，這樣的

對待當然還不是最殘忍的。但華澤卻細緻地描述了“國安”（比“國保”還要會“精緻迫害”的安全部門）微侵的新手法。所謂“微侵”（微觀細小處的侵犯和傷害，microaggression），用這項研究最有名的美籍華裔心理學家隋文（Derald Wing Sue）的定義，就是“故意或下意識的，短暫的和每天常見的言語、肢體行為、或環境氣氛傳達的屈辱。針對種族、性別、性傾向、宗教等差異，它們是要向被選定的個人或傷害的受眾傳遞敵視的、貶損的、負面的冷淡或侮辱。”（Derald Wing Sue, *Microaggressions in Everyday Life*, 2010, 第五頁）。華澤給我們一個例子：

審訊開始了。其他人都退出房間，只留下“一號”（我把審訊者按先後順序編了號）。他看上去三十歲左右，頭髮打了厚厚的摩絲，像招手停一樣翹著，窄腰的短上衣吊在身上，衣領敞開，露出足有一公斤的銀項鍊。

他誇張地活動活動手腕，點上一支煙，套上一個透明煙嘴，用帶著銀戒指的蘭花指捏著，踱過來，一屁股坐到靠近我的床邊。我低下頭不看他。過了一會兒，他用一根手指按著我的腦門把我的頭頂起來，把牽拉下來的一縷頭髮挑到耳後。然後深深地吸一口煙，悠悠地吐到我的臉上。顯然他是想激怒我，我閉上眼睛，不上他的當。又過了一會（感覺有一個世紀那麼長），他把胳膊輕輕搭在了我的腿上，身體向前傾，幾乎是耳語：“看著我。啊？你看著我嘛。”

我冷冷地抬起眼睛，接住了他挑逗地目光。他一隻眉頭向上挑起，擠眉弄眼的湊到離我不足一尺的距離。

在另一天，華澤又遭遇了類似的傷害。她寫道：

我把頭埋在雙膝上默默地想著，門“砰”地開了，湧進來一幫人，其中一個緊挨著我坐在了床墊上。是“一號”，那個小流氓。他用胳膊肘捅捅我的肋骨：“抬頭！看我！”

我不動，沉默。他捅一下，又捅一下。仍然沉默。他點上煙，

吸一口，找准位置，“噗”把煙從我趴著的頭和胳膊縫隙間吐進來。我朝遠處擲了擲，繼續埋著頭。他也跟著擲到床墊中間：“呃，你怎麼這麼淡定啊？在台灣受過訓吧？”周圍嘻嘻哈哈一片笑聲。

華澤還寫道另外一個“國保”：

他火了，圍著床墊走了兩個來回，開始破口大罵：“你個賤B，你以為你是誰呀？裝TM什麼丫挺的？……”繼續罵，不堪入耳。

我豁出去了，猛然坐起來：“你什麼東西？給我滾出去！”

他逼近我：“你再說？我弄死你！”打手一邊將我的手腕往後扣，一邊從牙縫裡罵：“你叫啊，快叫！你不是厲害嗎？我就捏死你！捏死你這個賤B！”

類似的侮辱、揶揄例子在本書中不勝枚舉：“國保”對劉沙沙吆吼：“你一個女人家！”“你一個女的，怎麼會對政治這麼感興趣，受誰影響？”“國保”這樣評價郭泉：“其實郭泉人不壞，就是他不知哪根筋擰上了……”“國保”這樣教訓唐小昭：

“你呢，是個很感性的人，有時候會衝動，也沒看清楚憲章是什麼，就簽名了……”“你這樣做是很幼稚的，簽個名就能改變什麼嗎？一點用處都沒有，只會給自己帶來麻煩！看來你在政治上還不成熟。”“像你這種單純衝動的人根本就不瞭解他，你是被他們利用了……”“你看，外媒是在利用你！你被人利用了都不知道！”對年過六旬的王荔蕪，警察毫無來由惡狠狠地破口大罵：“傻逼！”“瞧你那德行，那麼大歲數了。”“不跟你說了，你這個人太偏激，將來你一定會後悔的，我把話放在這兒。你們這些人……”

何楊在審訊中聽到一連串的羞辱和諷刺：“這麼個大男人，還靠老婆和父母養著，你要臉不要臉……”“你說說你為家庭做過什麼貢獻……”“你就是蟲子，寄生蟲、社會渣滓……”“我見到你們這種人就煩，一天到晚牛逼烘烘的，覺得自己是個人物，在這裡，你就是一堆臭狗屎……”“以後無論什麼人進來，你都

得站起來，說領導好，不讓你坐不許坐。聽見沒有？”陳家坪也記述了兩名協管非常囂張，張口就罵一位學生家長是“娘兒們”。

敵對分子：新賤民

從這些細節，一方面我們看到中共的“國安”、“國保”和“公安”雖然還繼續保留了他們土匪、流氓和痞子的原生態，但他們也花了精力和財力，在系統地運用現代心理學升級他們的恐嚇和威脅手段，尤其是用一系列精心設計的小動作來炫耀他們的權力、建立控制服從關係、擊垮你的自尊、消滅你的自信，讓你感覺到無價值、無力量和無意義。另一方面，他們系統地在政治身分上製造出一個賤民階層，對這麼一些另類的、受侮辱與受迫害的人，就只配接受無產階級專政，而無人民民主權利。

徐友漁注意到：“上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國有一個規定或慣例，每臨逢年過節或者有什麼國家大事，警察（在農村則是黨的書記、民兵隊長或其他顯示‘專政力量’的人物）就會把他們所管轄地區的‘五類分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召集起來訓話，告誡他們‘只許規規矩矩，不准亂說亂動’，‘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頭是厲害的’，‘別妄想在節慶的日子搞鬼！’現在，警察居然把早就過時並且廢棄了的作法——特定日子對‘壞蛋’和‘危險分子’打招呼、發警告——又用到知識分子身上。”這個邊緣化的特殊階層的界定和孤立是由政府創造“印記”、“標籤”、“分類”來製造的。這一個“賤民階級”可以包納“天安門母親”、“六四難屬”、“持不同政見者”、“異議分子”（見丁子霖、蔣培坤）、“敏感人物”、“台灣特務”、“崇洋媚外臭賣國賊”、“階級敵人”、“劉曉波那個圈子”、“漢奸走狗”、“里通外國的漢奸”、“反革命”、“上訪人員”等等。

何培蓉（珍珠）觀察到，“只要說是敵特，那就幾乎被剝奪

了做人的權利。”滕彪也印證了這一敵人與朋友的革命首要問題：“你擁護政府嗎？”，“你擁護共產黨嗎？”，“擁護，咱們還能談，不擁護，就是敵我矛盾。”“這下子變成敵我矛盾了！馬勒戈壁的！這下子不用講法律了！你他媽的也出不去了！你們這幫漢奸走狗！反革命！吃共產黨的，拿共產黨的，還不念共產黨的好！天天罵共產黨，你們是什麼東西！”“這是敵我矛盾，你懂嗎？對敵人甚麼樣對你甚什麼樣！就像對法輪功那樣！”“現在這個是敵我矛盾，我們就打你罵你了，你去告吧，告到公安部也沒用！”何楊也記錄了國保的敵情意識：“人民民主專政就是專門對付你這種人的……”“誰和人民為敵，誰就是我們的敵人……”“對敵人我們絕不會心慈手軟……”

絕不心慈手軟包括活埋和人間蒸發。國保們威脅滕彪說：“跟他這種人廢什麼話呀，打死挖個坑埋了算了，正好我們這兒有地方埋！”“你以為你失蹤了你家人能找得到你嗎？你說，北京沒了你一個人能有什麼影響嗎？”何楊也記住了印象深刻的一句話：“在中國，顏色革命一百年、二百年也成功不了，即使真要成功了，在成功之前，我也要把你們這些人全幹掉！”

難怪劉沙沙不無擔心“現在警察把我抓來沒人知道，說句難聽話，麻袋一裝，扔進長江，警方一點風險都沒有。她在南京走丟了，誰管得著？誰有證據？讓你死都不知道怎麼死的。直接毀屍滅跡。皮諾切特時代失蹤的上千人屍骨何存？我這樣的小螞蟻，只是歷史溝壑裡微不足道的一具屍骨，千萬分之一，默默無聞，滄海一沙，民主的分母而已，被殺如草不聞聲。”

地盤化：黑幫國家

“跟他廢什麼話呀，打死挖個坑埋了算了！”滕彪認為應該推薦這句話成為 2011 年年度警察金句。余杰在他的《中國教父習

近平》一書中，也多次提到他遭受類似威脅：“我們半個小時之內就可以挖個坑，把你活埋掉，全世界不會有人知道。”而這句話在不同的地方多次出現，說明它絕不是個別國保或公安的一時狂妄之語，而一定是某位高層（極有可能就是“政法沙皇”周永康）內部講話的精神（中共 X 號“挖坑埋掉”文件一定會被發掘出來）。它的出現，標誌著“法治國家”口號的全面失效。中共黨國全面墮落為一個黑幫國家，公安、國保和國安儼然就是黑社會老大，協警和保安就是痞子和走狗，從上倒下遵循的都是同一個黑社會行為模式。

在黑社會老大當道的黑幫國家下，中國完全地盤化。古川不僅挨打，“倒地國保”還誣賴古川打他，並威脅說，只要他還住在海淀，就會再找他麻煩。古川說：“我會記下你的警號。”他回答：“警號牌我撕下來給你，你敢怎麼樣。”他能如此囂張，因為這是派出所，是他們的“地盤”。當這幫惡警闖入滕彪家中，他斥責他們：“你身分不明，隨便闖入別人家，還讓主人迴避，違法不說，基本人情都沒了！”而他得到的回答是：“想明白點，少跟我講法律。這是什麼地方？這是共產黨的地盤兒！”警察們對他進行人身傷害後，還指著他鼻子破口大罵，揚言：“這是什麼地方？就打你了，你能怎麼著？”滕彪很“清楚他們不是說著玩兒的，只感覺自己像個小螞蟻，隨時可以被任何一個警察隨便踩死，不留一點兒痕跡。”

“國保”對何楊也毫不掩飾，告訴他在他們的地盤上，“在這兒別跟我講人權，這兒沒有人權。碾死你就跟碾死個臭蟲……”“告訴你，到了這裡，想當人容易，想變鬼也容易……”山東臨沂當地的警察對試圖探望陳光誠的一行人明說：“這是我們的地盤，不跟你講道理！”所以，在共產黨的地盤上，我們可以看到“一輛黑色捷達，沒有車牌，”“一路逆行”的依維柯，“無牌照的別克商務車”，“無牌照的黑色桑塔納”，“一輛黑色別克車”

無法無天、為非作歹。

那些專制體制、鎮壓機器、恐怖卡特爾的代理人，“他們根本沒有把國家的法律、規定放在眼裡。”徐友漁寫道：“我發覺，與當代中國普遍的社會風氣相適應，中國警察身上的痞子氣很重，與雨果在《悲慘世界》中塑造的警察典型——威嚴的沙威先生大不一樣，他們不是法律——哪怕是壓迫者的法律——的化身，而更像無賴，毫不自信、自重，甚至不在自己的壓制對象面前掩飾低下的慾望和行為，既貪便宜，又色厲內荏。”

他們的無賴在記者雨聲的經歷中活脫脫地躍然紙上：在被打得“鼻血稠稠地糊滿了嘴和下巴，一條長鼻涕緩慢地垂落下來”，吐的口痰都是鮮紅的，雨聲勇敢地笑笑，說：“你們繼續打嘛，肯定能打到我怕的。”一個打手聽到他說的話，高聲反駁：“誰打你了？這是什麼地方，你不要胡說。”雨聲說：“你們執法犯法，把我打成這樣，我要投訴，我要求驗傷，否則什麼話都不回答！”運動褲黑大漢說：“你瘋了？胡說什麼呢，誰打你了？”雨聲四處看：“這裡有監控嗎？你們連打我都不敢承認了？”另一個傢伙說：“你今天喝了多少酒？還沒醒呢！沒人打你。”再一個說：“你妨礙執法！我們有兩個同事被你打傷了，去醫院驗傷了。跟你打牌的那兩個人很配合，什麼事沒有。”迷迷糊糊中雨聲仍在嘟囔：“我要投訴。我要驗傷。”另一人大喝：“你還驗傷？我們兩個同事，一個胳膊骨折，一個小拇指斷裂，就憑這個，就夠刑拘你！”再一人說：“和你打牌的兩個人都承認了，沒有警察打人，只有你抗拒執法——材料都在這裡。”

在王荔蕪敘述中出現的派出所副所長王冰說：“我認為社會上只有三種人：警察、老百姓、壞人。”這裡他說的“社會”當然是針對“官府”而言。警察作為深入社會的國家利器，它行使保護和鎮壓的雙重功能，而在這種雙重功能之間要迅速轉換角色，正如何楊所說，“他們翻臉比翻書快。人面背後，藏著隨時會跳

出來的惡魔”。而這種快速變化完全是由官府的一元利益所決定的。所以，順民才是良民，而有權利意識的現代公民就必然被歸類於“壞人”。中國政治的悲劇就變得格外令人傷心：邪惡之徒掌握權柄，良善義人招來苦難。

反抗的藝術和成效

政治的悲劇和反抗是一種雞和蛋的關係。《遭遇警察》說到底就是一部描述迫害與反抗的個人記憶。面對專制者的暴虐和五花八門的“微侵”，我們也看到每一位作者和他們生活依託的群體進行的英勇抵抗和發明了各種“反抗的小動作”。每一位讀過本書或讀了我的評論後再去讀書的讀者都會被作者筆下的黑色幽默打動。當我飽含淚花時，不時會忍俊不禁，擊掌拍案叫絕。他們的高尚品行、博愛寬容、樂觀理想、敏銳觀察和分析、具有創造力的抗爭方式，都會成為中國民主運動史上傳唱世代的佳話。但這並不能讓我們迴避一個悲劇性的問題：如果 22 位作者中，有至少五人現在在國外，四人被判刑（而且許志永的刑期是四年），三、四人淡出公共視線（至少是“不談國事”），其他的七、八人繼續處於被監視、被限制和隨時可能在“敏感時節”被喝茶、被旅遊的狀態。那麼，除了他們的經歷已形成文字出書、而且還翻譯成英文（我相信將來還會有其他外文版）外，我們還能發掘出什麼有價值的經驗和教訓呢？

要回答我的問題，我必須明確，書中的作者並未形成一個組織，他們的文章也是從不同的視角、不同的政治理念出發的，所以，我的討論主要著眼書中反映出的一種總體傾向，並非適合於每一位作者和每一篇文章。但我把本書看作 21 世紀中國“維權運動”和與此交織的“《零八憲章》運動”和“新公民運動”的總體實踐。我們有必要與這些運動的領軍人物（思想和行動兩個方面），例如，

我高度尊重的劉曉波、許志永、滕彪和書的兩位編者，展開一場思想交流。

我的閱讀體會讓我強烈地感到，本書反映的維權運動有幾個根本前提：（1）個人主義的政治效能。毫無疑問，民主體制和民主社會是以自由主義為基礎的，而自由主義又是建立在個人主義基礎之上的。隨著經濟發展、生活水平提高、教育普及、全球化擴張，人們的個人意識、權利意識和參與意識都會強化，而且還會在人群里相互傳染，這就為公民社會奠定了基礎，也為個人能力提供了平台。（2）人性論和人性的向善傾向。當然每一個個體的改變還必須對人性抱有樂觀信心。不僅我們自己會提升道德修養，恪守“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金律，而且基於其他人也會一心向善的前提。（3）啟蒙的必要和樂觀效果。如果許多人作惡，那是蒙昧未開化的結果。如果我們做好啟蒙，尤其以身作則，即便書中的惡警也會冰心解凍，棄惡從善。（4）國家和社會的二元互動存在，因而公共輿論和“圍觀”會產生政治和政策效果。如果社會發生了根本變動，或者說，隨著“新公民”的產生和公民社會的建立，民主國家的建立也就如瓜熟蒂落。（5）中國現行根本體制的合法性。因為有對人性、個人、公民社會和國家 - 社會互動的信心，所以，“我們沒有敵人”。這種“無敵觀”在劉曉波和許志永的論述中表現得尤為突出鮮明。

許志永在他的文章裡寫道：

躺在黑色的鋪板上，心中豁然光明，終於懂了為什麼恐懼，因為面對不公平，心中有時懷有敵意和怨恨，因為愛不夠博大和純粹。記住，要愛每一個人，每一個人都值得愛。

是的，我們從事的是良心的事業，預審交流中我常常提到這一點。我們不對任何人懷有敵意，我們只想為公平正義和社會進步做點什麼。我們確實有遠大的理想，為著一個美好的社會，這個理想如此遙遠，以至於令我們幾代先輩們感到絕望。但是我們

的理想和我們此生世俗的利益確實沒有關係，我們不是為了金錢和權力，我們只是為了理想。

我相信每一個讀者對許志永的高潔、大愛、理想和奉獻都會肅然起敬。要做到這一點，沒有靈性，沒有點聖徒的素質，是難以企及的。許志永把牢獄當作了他的修身場，所以他寫道：“接下來是一個平靜的周末，想好了未來幾年的獄中生活，要寫的書的名字《靈性的成長》。漫長的人類文明史是靈性成長之路，靈性成長靠科學進步、經濟發展、教育啟蒙、法制完善和宗教道路。至於個人，靈性成長主要靠三個方面：服務——這一生為社會做出了多大貢獻，幫助了多少人；承擔——為社會進步和他人幸福承擔了多少代價，苦難、殘疾等都是為正常人承擔；放下——在多大程度上放下了自我。”在他身邊和中國的許多人，也跟隨了這條靈性的路，例如，唐小昭以“上帝保佑我們，阿門！”來結束她的文章，吳華英“默默地向上帝禱告”，陳家坪悟到“只有靠我們的心靈”。已皈依基督的李昕艾更是明確寫道：“有一種信仰，它勝過世間一切力量，那就是主耶穌；有一種堅持，它勝過世間一切恐懼與威嚇，那就是追求公義與真理。不義的必堅立不住，作惡的必被剪除。”所以，中國有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例如佛教、道教、回教和法輪功等）的復興。

問題是，從個人到國家，或從聖賢個人到良治國家的邏輯發展是否可以走通。至少自孔子提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後的兩千多年，這條道路就被兩千年專制體制證明是死胡同。正是這樣的思路，我們看到，一方面中國的知識精英和公民領袖在抱怨中國人還是生活在中世紀的落後的臣民，但另一方面，這些試圖引領中國人擺脫人類歷史上第一大極權專制的精英們，要么回歸到了古希臘時代的倫理道德思想，要么回到了造就耶穌救世主的羅馬帝國世紀。從理性的時代再要回到信仰的時代，似乎不應該是許多社運和民運領袖的明確目標。這些要做聖人的公民運

動領袖當然不屑一顧馬基雅維利的論述。正是馬基雅維利在《君主論》一書中將道德和政治區分開來，將利益和權力在政治理論和實踐中凸現出來。後來的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的又一位創始人霍布斯在《利維坦》一書中系統揭示了主權、主權者、國家作為權力猛獸“利維坦”的本質。這些才是近代西方政治的起點。

基於人性、個人主義、性善論基礎上的中國公民運動和民主運動，尤其是以“愛”和“修齊”為核心的圈子，其道德高度令人敬仰。但它們也不可避免地製造出“個人聖化、集體殉葬”，或者說“聖人一串，集體命運不得改善”的悖論。這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道德主義和宗教色彩的社會改造運動突出了一個“愛”，忘掉了一大堆“I”：Interest（利益）、Incentive（動力）、Institution（制度）、Ideology（意識形態）。許志永和他的所有追隨者有這樣的資格說，“我們的理想和我們此生世俗的利益確實沒有關係，我們不是為了金錢和權力，我們只是為了理想。”但他無法否認，他所承擔的加害都是因為“世俗的利益”、“金錢和權力”之故。顯然他不會認為共產黨是因為“理想”而與他和他的事業發生衝突。同樣，他也不可能期盼中國人會被他的“理想”而動員起來，甘願坐牢、平和地拉垮專制大廈。如果中國的民主政治精英們無法向私營企業家、工人、農民和年輕人解釋清楚民主政治給他們帶來的機會、利益、個人和家庭生活的改善，自由的擴張，尊嚴的獲得和維護，等等具體好處，那麼，中國的民主精英只會是那麼孤立，即便進入監牢，也會更快地被遺忘。

其次，一個不以利益為驅動、不以明確的根本政治制度翻轉為目的社會或政治運動，難免不墮入道德主義的自戀和對他人的不寬容和不接納。我們看到了許多社運人物或民運人物相互盯住對方的道德污點，熱衷於首先改造人性和人品（這也是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災難的終極根源：認為打造出純粹的、無私的“新人”是共產主義烏托邦的前提），而忽略了對首要的制度敵人——

共產黨極權專制體制的批判，也忽略了對民主化、民主革命根本政策、戰略、策略和組織構架的辯論和完善。一群自封的聖人形成了中國社會和政治民主運動內部的自殘、公開的相互攻訐是導致中國民主化無望的一個重要原因。而一群自私自利的人可以創造出一個公共平台來追求民主公共產品，從而最優化個人利益，這是西方民主演進的主要經驗。公域與私域、個人靈性進化和社會整體改進、政治與道德都必須有相對獨立的發展。正如律師、記者和行為藝術家都可以從公民運動和維權運動中獲得名聲資源、提升品牌效應、帶來更多金錢回報，所以他們站出來了。中國今天需要有職業的“政治企業家”，以執掌政權為目的，以摧毀黨國機器和它豢養的一大批政工幹部為代價，為法學院畢業生、政治學畢業生、公共行政人才、政治新聞評論人和競選義工等製造成千上萬的就業機會，來動員人力和物力資源，與共產黨展開較量。

第三，“自戀”和“無敵”的政治社會運動試圖宣示自己政治上的“貞操”，不斷與“其他異議人士”劃清界限：“傳統異議分子”，“海外民運”、“法輪功”，“閒得蛋痛”搞出“茉莉花”事件的“海外那幫人”，等等。唐小昭的心理頗具有代表性：

“如果讓我給幾千個簽名者分類的話，我會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知名群體’，有一定知名度，也就有了影響力，官方會比較緊張；第二類是‘被侵權群體’，如拆遷戶、下崗工人、失地農民等，合法權益受到直接侵犯，情緒不穩定，容易出事，官方也很緊張；第三類就是我這樣的‘普通群體’，既沒啥影響力，也沒有直接利益被侵害，情緒比較穩定，在官方那裡從無‘前’，相對來說最不受重視。”我想，《零八憲章》運動既未宣誓要暴力推翻政權，其主要領導人劉曉波也公開宣稱“我沒有敵人！”，後來對劉曉波 11 年的惡判出乎許多人（可能包括劉曉波本人）的預料。再後來，艾未未既未在《零八憲章》上簽名，又未組織團體拿出憲章來對抗中共，還是受到出人意料的“惡搞”。許志永其實吸收了

劉曉波的教訓，低調搞他的“新公民運動”，淡化了政治色彩，但還是被利維坦的惡爪抓牢投監。其實，面對一個全權的專制體制，每一個中國人離政治迫害和被關進勞改營、監牢都是等距離的。甚至迫害者本人，像薄熙來、周永康、令計劃等等，都說明了這一點：中國人無不是機會均等的體制受害者。習近平的父親屢遭迫害、監禁甚至差點被處死，其實也在提醒他記住中共體制的險惡，“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如果我們任何人還抱著僥倖心理，覺得還有許多“敏感人物”構成了一道厚厚的保護我們自己的牆，我們可以幸運脫敏，那我們就沒有從《遭遇警察》一書中讀出真諦。

我們共同的敵人

中共統治的傳家之寶是毛澤東解決了共產革命的首要問題：“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今天，京城又有一批在歐美鍍過金的“政治哲學家”把德國法西斯思想家卡爾·施密特的著作大量譯成中文，送到習近平的案台前，不斷提醒他，政治就是“分清敵友”。但在《遭遇警察》一書中，幾位作者似乎認為這樣的劃分是多餘的。他們經常將“國家的代理人”和“國家制度”本身區分開來，所以想通過個人道德魅力去感化國家代理人，包括最殘酷的警察、國保、國安。連法學博士滕彪教授都會說：“我對祖國如此熱愛，怎麼可能去煽動別人推翻國家政權？我專門研究法律，代理過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案件，我很清楚我的文章不可能構成犯罪。”這裡，他顯然把“祖國”和“國家政權”混淆了。

由於不分敵友、混淆祖國和國家，書中的許多例子呈現出一種“發嗲撒嬌、打情罵俏”似的反抗：一廂情願的無辜的好人感到委屈、受傷害和不被理解。劉沙沙的話說明了這一點：“你想人家是朋友，人家想你是犯人。你想的是交流，人家想的是審問。

我本將心做明月，誰知明月照汗水溝。”當然我不想對此過度解讀，因為作為一個堅決支持和聲援郭泉組黨的劉沙沙，她完全會清楚“共產黨反動派”（劉沙沙語）的本質。這些做法可能就是一種“合理的反抗藝術”。但它帶來的一個後果是，國保會有選擇性地過度解讀這種政治正確，一是用來離異分化維權人士，再就是尋找共同點，建立感情，發展“線人”。至少三分之一的文章都提到“合作的機會”和“高回報”。也有作者做了保證、妥協，如約寫了匯報，“每天用電子郵件向他們匯報行蹤”，或承諾未來會“保持聯繫、配合溝通”。一個實際效果就是，維權和民運圈子里人們互相猜疑誰是“特務”、“釣魚黨”。有著這樣的疑霧罩身，難怪維權或民主運動至今都難以整合、吸引民眾和精英普遍參與。

僅僅從人性論和性善論出發，我們無法解決書中呈現出的許多悖論。例如，為何劉曉波、許志永、浦志強、滕彪等等出現得越來越多，而國保、政保、文保、國安、協警、保安、黑保安卻也越來越多，而且愈加殘忍？顯然，問題不在人性的自然改進，而是專制制度使然。又例如，為何書中的作者可以對施害者顯示大愛寬容，而對受害的民眾卻又掩飾不住苛刻挑剔、甚至厭惡的心態？我們把下面兩段文字放在一起讀，就會看到這種矛盾。

滕彪寫道：

在裡邊呆的時間越長，我對這個制度就越憎恨，同時對這個制度的執行者就越同情。一些人失去自由是為了爭取自己的自由，同時也是為了那些剝奪他們自由的人的自由。哈維爾講過這樣的話：極權制度下，沒有人僅僅是受害者，而不同時是（或多或少的）同謀。換言之，也沒有一個施害者不同時是受害者。比如，面前這些只能機械地執行命令而沒有能力分辨善惡的人，他們一定有各自的難處、尷尬和痛苦。

慕容雪村寫道：

廈門大學前校長、《資本論》的譯者王亞南先生曾經講過一

句話：前現代社會由三種人構成，騙子、傻子和啞巴。我想他一定忽略了第四種人，幫凶。在一個不正常的社會，幫凶就是所謂的“群眾基礎”，他們人數極多，所以每個人都不需要負太大的責任，也沒人需要懺悔，在多年之後，大多數人都可以為自己辯護，說他們受了愚弄，也屬於受害者。這話不能算錯，但還應看到，正是因為有他們的援手，罪惡才得以實現。

嚴格說來，這兩段話都沒有錯。但如果我們無法分清矛盾的主次關係，把愛心和憎恨、同情和厭惡加全平均，放在敵友雙方，那我們就忘記了一個根本問題：專制制度是我們共同的敵人。而專制制度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它如霍布斯所描述的，是“人造的人”：它的製造者和構成者都是人。之所以不問世事的愚民、服從和擁護政權的順民或臣民無法順暢地隨著教育發展轉變為積極參與、試圖行使權利和制約政府的公民，是因為專制體系、專制權力和它的代理人不斷施暴、阻止的結果。而要最大限度地優化控制效率，中國並非真是“警察無處不在的警察國家”，絕大多數地區（尤其是農村和內地）是警力不足，所以中國政府實施的是“選擇性目標定位跟蹤”。這些在敏感地區、敏感部門和知名度較高的領軍人物會被多條線（國安、國保、總參等等）、多班人馬二十四小時侍候。毛的政治運動動員型的全權主義是要用十個指頭控制十億人，今天的“維穩體制”支撐的“和諧社會”是用國家的十個指頭（黨、政、軍、國安、公安、武警、單位、工、青、婦等）來緊緊抓牢十萬人。人盯人、軟硬兼施把這批人搞定，其他人也就群龍無首了。公民運動、民主運動等集體行動也就無從談起。相對於真正受苦的中國普通民眾（尤其是“上訪族”）來說，這批人還可以“被喝茶”、“被喝咖啡”、“被旅遊”、“被住賓館”，這些都是大眾無法奢望的。而且這批人還能寫，把痛苦的經歷傳播、放大。對部分讀者和聽眾來說，他們會被激怒而拋棄這個體制。但更多的人要么慶幸自己處境安全優裕而謹小慎微，要么幸災樂

禍達到病態的滿足（Schadenfreude 現象）甚至對政權感恩。難怪，滕彪“在樓下掙扎狂喊了三分鐘，卻沒有一個人敢出來看一看。”華澤、慕容雪村一行、何培蓉也有同樣的遭遇。如果我們知道央視至少半打的美女主播沿著周永康、令計劃等構成的升職器攀緣，我們也就不難設想，多少人會為華澤淨身出戶離開央視而竊喜。

政治哲學家徐友漁在書中寫道：

警察背後是整個現代化國家的強大暴力，面對警察，任何妥協、退讓，甚至屈服都是可以理解的，沒有哪一種服從是恥辱，但是警察的橫行不法卻是國家的恥辱、民族的恥辱。所有被警察侵害的中國人，都是在為自己的權利，為國家的尊嚴，為民族的體面鬥爭。

我認同這段話，它說出了單個警察和國家暴力的不可分割，也說出了書中所有受害者心中承受的恐懼、屈辱和絕望以及肉體遭到的摧殘。即便我們有必要檢討中國民主化過程的得失，探索更有效的組織和戰略，沒有任何人有權利要求他們做得更多、更好。與其苛求維權運動做得更多，不如感謝它為我們積累了無數經驗教訓，證偽了許多中國轉型的岔路。或者我們可以說，維權運動的這些事例告訴了我們中國民主轉型的必要條件，但還必須加上其他許多必要條件才能構成充要條件。我們可以想像，中共政權的崩潰可能不在於我們做得多好，更多取決於它幹得多壞、多惡。即便如此，所有的作者和他們所有的努力也都是添壓在專制體制上的一根根稻草，是歷史合力的一部分。

華澤寫道：“沒有人可以要挾我，暴力不能，利益不能、甚至親情也不能。不要以為柔弱就沒有力量，不要以為渺小就沒有尊嚴。弱者和強者之間的差別不在力量的強弱，而在信念的堅定。”何培蓉也寫道：

甘地說：“如果我們能發展意志力，我們就會發現我們不再需要武裝力量了。”對我來說，如果不能和那群有恃無恐，受有

關部門指使肆意施暴的人鬥狠，那就只剩示弱了：如果那些人舉起棍子，那便把頭湊過去接；那些人打我的左臉，還需要把右臉伸過去。無論如何，我想我會展示自己，不計一切代價見到陳光誠先生的決心。我將以自己的行為告訴這些流氓暴民，打人這種恐嚇的手段沒有用。

老子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不對人性失去信心，我將以人性的善呼喚善。

我相信中國公民社會力量逐漸崛起，圍觀正在改變中國。也許我們還需要一點運氣。

慕容雪村也寫道：

如果你生活在東師古，陳光誠離你很近。即使你不在東師古，陳光誠也離你很近。他的遭遇就是每個人的遭遇，他的命運就是每個人的命運。一人不自由，則人人不自由。你可以不關心陳光誠，但應該明白：當他的自由被隨意剝奪，你的自由也將岌岌可危。

我曾經在網上讀到一段話：在中國變成一個更好的國家之前，有漫長的道路要走，這條路注定不會平坦，如果注定要有人流血，請從我開始；如果注定有人要承受損失，也請從我開始。如果我流血別人就可以不流血，我願意流血至死；如果我損失別人就可以不損失，我願意損失殆盡。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們的信念、意志、無畏、獻身就在動搖、削弱和最終摧毀寡頭集團的權力意志，把專制機器逼上了一條犯錯、作惡的自毀之路。

但是，當下的現實是，十多年維權抗爭後中國人仍然還在喪失更多的權利和自由。這就在無情地提醒我們每一個期盼中國民主的人，我們前面的景象絕非捧著茉莉、玫瑰散步在浪漫的甜愛路上。再次回到但丁：如果說我們已經進入地獄，我們還必須穿過煉獄，才能進到民主的樂園。在煉獄裡生存下來再走出來，不僅需要運

氣，更需要勇氣和智慧。如果這種走出不僅僅局限於個人出走歐美，而是中國人的集體拯救，那我們需要的就不僅是個人層面的東西，更重要的是組織智慧。

1.4 “狗腿子”政權的成型 (2013.08.10)

在一個“人民共和國”，2013年前後發生了一些大事件。對此，政權不同的處理手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不僅挑戰人們的理性，更挑戰人們的常識。

視草民為芻狗

首先來看看“視草民為芻狗”的例子：

1. 2013年5月3日，安徽廬江籍女子袁利亞（22歲）在北京京溫商城墜亡。該事件疑團重重，北京公安似乎有所遮掩，引發老鄉民工遊行示威討真相。儘管人們猜疑京溫商城老闆涉案，後來公安結論是，袁女“自主跳樓”，商城賠償死者家屬40萬元了結。一條人命，一個花季少女由40萬買定，只因她是一個“安徽小保姆”、“打工妹”。

2. 2013年6月9日，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妻弟劉暉被控以工程承包為藉口，詐騙300萬人民幣，被判11年監禁。且不說這一案子本身就是對劉曉波家屬劉霞的政治報復，即便商務糾紛涉及300萬，量刑上法庭也是有意突破上線。

3. 2013年7月女歌手吳虹飛發了一條微博，調侃“我想炸的地方有北京人才交流中心的居委會，還有建委……”。吳虹飛被警方刑事拘留，面臨5年以下徒刑（後來得助於強大輿論壓力，在行政拘留10天后吳虹飛獲釋）。網上討論立即炸鍋，人們普遍懷疑，這是當局對又一個不聽話的歌手的藉機打壓。中國眾多的維權人士經常面臨國保的威脅，“我們可以活埋你這樣的異議人士兩百人。”而這個恐怖威脅出自中央政法委最高領導周永康之口，自然國保們便擁有了上方寶劍，濫施生殺予奪的大權。

嚴刑不上大夫

再來看看“嚴刑不上大夫”的例子：

1. 2013年2月，軍旅紅歌王李雙江之子李天一涉嫌輪姦被刑事拘留。北京海淀分局接到一女事主報警稱，她在酒吧內與李某等人喝酒後，被帶至一賓館內遭五人輪姦。現在該事件已進入法律程序，結果還難以預料。但權力和關係網運作的初步結果已顯端倪：官方媒體上儘量避免“輪姦”一詞，而代以“輪流發生性關係”，以規避法律（輪姦可適用死刑）的懲處。

2. 2013年7月，北京市法院對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受賄、濫用職權案做出宣判，對劉以受賄罪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以濫用職權罪判處有期徒刑10年；數罪併罰，決定執行死刑，緩期兩年執行。這樣的“數罪併罰”，恐怕也只有部級高官才能享有的特權。在判決書裡，劉志軍受賄的金額是6460餘萬元，這也是一個極大縮水的數字。如果網上爆出劉的名下共有374套房產、總值達8億屬實，如果劉利用職權接受丁書苗安排的《紅樓夢》連續劇多位演員性賄賂屬實，劉志軍本應在生死輪迴中走了幾圈了。

官民兩重天

類似上述荒唐的怪現狀，我們還可以信手拈來：湖北年輕女子鄧玉嬌受到三位地方官員的性侵做出正當防衛，最後卻被判處犯有“過失殺人罪”，而性侵者卻未被起訴。重慶貪官雷政富利用職權強占民女，而權力的犧牲品趙紅霞卻被起訴，被控以“陰道勒索罪”，後被判兩年、緩刑兩年。在 2013 年審理的薄熙來案涉及的罪名多達四類、貪腐的款項上億、涉及的命案也不只一兩起。但既然犯有謀殺罪的谷開來都領得免死牌，薄熙來自然也不會命斷黃泉。我們這裡在意的不是有多少人要死，而是如果中共把死刑作為行政的一個重要手段，而且處死的中國人每年可高達 5 千，甚至在嚴打期間還會過萬，占了全球死刑的 80%，那麼，這些被處死的中國人多數必定是無權、無勢、無錢的替死鬼。他們是被政治暴力機器獻上維穩的祭台的。

現今中國的厲法待民、特權護官，與毛、鄧時代的“無產階級專政”還略有區別。1952 年毛政權判處高幹劉青山、張子善死刑；1986 年，上海市委書記胡立教和宣傳部副部長陳其五的兒子胡曉陽、陈小蒙因強姦罪和流氓罪被處死，都顯示出政權試圖自我約束權勢集團成員。但今天的政權，一方面以驚人的速度成功地造就出一個寡頭權勢集團，另一方面，又製造出了一個龐大的底層社會，並通過經濟上的掠奪、刑法上的懲處把他們逼進“流氓無產者”的死角。政權的功能已轉換為“專政無產階級”。

中國的百姓顯然已經意識到一個新型的等級社會已經成型。網絡上流傳了一個對“官員、富人、百姓”不同身分和不同權利描述的帖子：“同样是说话：官员叫精神，富人叫名言，百姓叫屁话；同样是要求：官员叫意见，富人叫提案，百姓叫牢骚；同样是赚钱，官员是创业、富人属开发、百姓叫投机；同样是喝酒：官员叫应酬，富人叫品尝，百姓叫酗酒；同样是写字：官员叫题词，富人叫书法，百姓叫涂鸦；同样是出国：官员叫考察，富人叫旅游，

百姓叫偷渡；同样是弹弓，官员叫射击，富人叫玩具，百姓叫凶器；同样是泡妞：官员叫失足，富人叫包养，百姓叫嫖娼；同样犯错误，官员叫失误、富人是缺点、百姓叫犯罪。”中國已是一個“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十足荒唐社會。

惡霸和惡政

在“文革”期間，毛為了反襯自己暴政的仁慈，開動宣傳機器炮製出“南霸天”、“黃世仁”、“胡漢三”、“劉文彩”、“金老歪”等一系列惡霸形象。這些惡霸掠人妻女、招妓納妾、霸占民宅、搶奪良田、魚肉百姓、還要“吃人奶”。他們都豢養著一幫“狗腿子”，為自己大打出手衝頭陣、為自己吹喇叭、抬轎子。

如果我們要想清楚地解讀我們目睹的中華大地當今之怪現狀，如果我們要明白為什麼一少部分官員 - 財閥已形成權勢集團，並成為享有特權、超越於法律之上的人上人，而絕大多數人卻在這一歷史性的權力、財富高度積累過程中不斷被剝奪、被侮辱、被迫害，我們不得不接受這一結論：以“維穩”為執政核心的中共政權已經成為了一個“狗腿子”政府。

“狗腿子”的最重要特徵就是恃強凌弱、為虎作倀。它的官員隊伍勢必如“狗腿子老四”桀犬吠堯，對主子施盡吮癰舐痔之能，就必然對百姓羊狠狼貪、巧取豪奪。它的御用文人班子也趨炎附勢，與魔鬼簽約，典當出良心和高貴，積極擔當起文化劊子手的角色，指鹿為馬，散布思想妖孽，欺世盜名。那些鼓吹“強勢政府”、潑汙“公民社會”的學者，無視政治學的經典問題“誰來監管監管者？”（*Quis custodiet ipsos custodes*），其實販賣的就是一個“狗腿子”政府：一個管理黨國最高利益，尤其是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員特權利益的共同委員會罷了。

1.5 槍桿子、刀把子和筆桿子 (2014.08.21)

“吃人”是中國當代政治的顯著特色。一方面，作為世界上和世界歷史上最龐大的帝國，這個赤色利維坦每天都必須消耗天量的政治輸入，包括吞噬各種民脂民膏，甚至活鮮的生命。另一方面，這個怪物又時常出現陣發性瘋狂，撕啃咬嚼自己的肢体而自殘。近日來，中共權力進一步走向法西斯專制，對人民的鎮壓愈發瘋狂，同時，它又開始了黨內大清洗，以周永康、李東生、王立軍為代表的政法系統遭整肅，以徐才厚、谷俊山為代表的軍頭也被拿下，以央視為重點的媒體也被衝擊。原來共同對付百姓的槍桿子、刀把子和筆桿子出現內訌，其後果和影響值得關注。

中國政治三大板塊

中國政治治理體系由三大控制板塊構成：黨軍、政法系統和宣傳機器（類似於奧威爾在《1989》裡所說的“和平部”、“愛情部”和“真理部”）。以“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為理論基礎建立的黨軍成為治理的核心，屠殺定義了中共政權的根本特性：“政權即鎮壓之權”（該語出自毛的接棒人、副統帥、軍頭林彪之口）。

且不論“文革十年”和以前的年代，從1989年拉薩、北京屠城，到1999年鎮壓法輪功，再到2008年彈壓西藏和2009年血洗新疆，該政權的屠殺功能都未休停過。

但每時每刻的統治畢竟不能全靠槍砲、坦克來完成，所以共產黨江山的一半命運就託付給了公安系統，尤其在老百姓反抗頻率升高、反抗樣式多元化、搗亂小動作（搞笑、惡搞、行為藝術等）層出不窮的情況下，倚重特務而構建的維穩體系就尤顯重要。在“和諧社會”的幌子下，“政法沙皇”周永康為強化警察國家不惜血本和大開邪門。正是在他如日中天的日子裡，“維穩”費用超過了國防軍費。它揭示的本質是，中共政權以人民為最大的敵人，開始了一場執政寡頭針對民眾的內戰。

在中共尚未奪得政權之際，它就精通思想工作，發明了“洗腦”和洗腦術（西方第一部關於“洗腦”的著作因為韓戰美軍俘虜的經歷而產生），通過靈魂裡的革命，來調動人們的主觀能動性，並以此控制軍隊，奪取政權，並建立了一套極權體系。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大背景下，中共意識到，治理一個教育程度、權利意識和外界知識都日漸提升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國，有必要運用現代傳媒來控制信息的內容和流通、規儀和塑造民眾的認知、甚至批量定制生產出政權希望民眾消化的“事實”，讓大眾像愛麗絲一樣跟隨著撲簌迷離的兔子，掉進一個虛幻的仙境裡（用中國特色的新語來說就是“中國夢”）。

中共權力術從毫無遮掩的粗糙的暴力構建的兵營國家，在二十世紀末進化到了重點控制、有選擇性打擊的警察國家，最後到二十一世紀，又進一步配以福柯所揭示的“控制身體的權力”，包括思想內容、思維方式和思維過程，一個“全方位監視”的監獄國家已經誕生。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喬治·奧威爾的“老大哥政權”和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在當經中共政權下達到極致完美的統一。毫不奇怪，當“槍桿子”、“刀把子”和“筆

桿子”結成三位一體、並行不悖時，他們對人民就有極強的控制力，這就是中共暴政穩固的根源。

三項專政工具內訌

但另外兩種局面也可能產生：在同一個專制中心下面，這三項專政工具可能產生內訌。例如，在毛的時期，所謂的解放後和“三反五反”勝利後，軍頭和軍人大批充實到公安政法系統。羅瑞卿擔任公安部長、組建“公安部隊”，肩負的就是“國家安危，公安系於一半”的重托。但我們知道，後來羅瑞卿被整，被逼得跳樓自殺，腿斷鮮血直流之時還被裝進籬筐抬到北京工人體育場接受萬人批鬥。群眾造反砸爛公檢法，軍隊接管公檢法。與此同時，文人筆桿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和“梁效”之流用筆作刀槍殺人。“十大元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最後無不遭殃受苦。

或者，第二種局面會產生：中共專制內在的凝聚力喪失，出現明暗兩套政權指揮系統，產生兩個陣營動用錢桿子、刀把子和筆桿子互相廝殺的局面。鄧小平去見馬克思後，“六四”屠城有功的楊家將（楊尚昆和楊白冰）被曾慶紅的政治運作排擠出局，政法系統利用反法輪功事件和維穩為藉口迅速擴權斂財。在爭奪接班過程中，薄熙來試圖利用媒體先聲奪人。中國當下已經出現至少兩大意識形態、軍隊勢力、政法系統和宣傳班子的對壘。所以京城風雲變化莫測，血雨腥風若隱若現。以致，權力已經登峰造極的習近平還不得不擔憂自己的身家性命，提出與腐敗鬥爭、打大老虎時，把“個人生死，個人毀譽”置之度外。

政治不文明

中共聲稱要建設“政治文明”。何為“政治文明”？其實，

它的底線和目的就是：政治不再殺人。從毛落得最後家破人亡，到朱鎔基要“準備一百口棺材”（99口為貪官、一口為自己而備）去闖“地雷陣”，再到溫家寶的“赴湯蹈火與準備棺材的決心”，最後到習近平大談“生死觀”，無不成為中共所謂政治文明的諷刺性腳註。奢談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不如大家獲得身家性命自信。

槍桿子、刀把子、筆桿子，件件要命。邪道路、惡制度、混理論，何來自信。當兵變或民變成為未來政治的高機率選項時，對於被綁架進中國政治野蠻搏殺的部分官員和民眾可以有一些樂觀，坐觀“惡人自有惡人磨”的歷史大戲，但也不要忘記當下的緊急要務是要為自家找到保命之道。

第二章：最後的分贓



2.1 十八大前的信息危機 (2012.09.11)

題旨：信息基礎設施的破壞和信息阻塞、汙染是中共政權在十八大前面臨的全局性危機。它使得中國政府和民眾都喪失了理性決策的基礎，生活在不確定性和焦慮之中。中國未來的走向也因此充滿著變數。

集體行動的困境

中國共產黨作為世界第一大政黨，依仗世界最大的暴力機器，對任何反對力量都有不可低估的威懾力。在這種情形下，要克服經濟學家奧爾森指出的“集體行動的邏輯”帶來的困擾，中國的民主化力量任重道遠。但這並非意味著中國共產黨可以維持千年王國，因為“做免費搭車人”和忽略“公共產品”的悖論同樣地困擾著中共。

我曾經把 CPC 做過如下詮釋：第一個 C 代表“腐敗”，第二個 C 代表“犯罪”，中間的 P 代表“汙染”。薄熙來、王立軍、谷開來事件經典地反映出十八大前，腐敗和犯罪已經深深地侵蝕到中共領導的高層。當上上下下的官員都被末日心態所驅使，拚

命地撈財和搶權，共產黨內為黨國分憂解難的焦裕祿似的官員愈發成為珍稀物種。社會公共產品自然無人照料。現在，社會治安惡化，食品安全不保，教育質量滑坡，生態環境汙染，諸多問題交叉感染。這恐怕是中國社會大變革的根本動因。

治理的中樞神經：信息溝通

提供和維護公共產品是政府的最根本職能。但信息的危機是當前中共面臨的最大的公共產品危機。所謂信息的危機，不僅是指當下流言、謊言盛行，偽假信息充斥；官媒、官方話語公信力喪失殆盡。而更為主要的是，信息的儲存記憶設施遭到破壞（例如，屏蔽“六四”、趙紫陽、劉曉波等歷史事件、人物和不斷在黑名單上添加的敏感詞），信息喪失歷史的連貫性。同時，信息系統與全球信息割裂開來（例如，構建“防火牆”和驅逐“谷歌”在大陸的搜尋服務），走向自我封閉，信息又喪失普世價值。加上政府花上巨資打造“大外宣”計劃、培育“網絡評論員”（俗稱“五毛黨”），中國信息體系裡建立有一個龐大的信息汙染源。喪失全面性、開放性和準確性，作為公共空間的信息基礎設施遭到了根本破壞。

半個世紀以前，多媒體和互聯網還未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有遠見的政治學家卡爾·多伊奇已經寫出了《政府的神經：政治溝通和控制的各種模式》的名著。多伊奇認為，政治溝通的渠道被堵塞或破壞，必然給決策帶來負面影響，從而導致駕控的危機，最終出現政治體系衰敗和崩潰。信息基礎機構的受損不僅增加獲得信息的成本，同時降低信息的質量，還會增加決策失誤和風險，讓整個政治體系和社會充滿不確定性和焦慮感。

當權者公信力喪失

今天的中國社會上至黨政領導、下至普通百姓都成為了信息危機的犧牲品，生活在不定和焦慮之中。例如，主管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李克強副總理曾經告訴美國官員，他根本不相信提供給他的經濟統計數據。在 2013 年審理谷開來的案子時，老百姓不相信出庭的是谷開來本人。在重慶警方宣稱成功擊斃逃犯周克華後，網上立即盛傳“死去的‘周克華’其實是便衣警察。”

在十八大召開之前，圍繞著人事變動、接班奪權，更是流言四起，真假難辨。有傳言：重慶、四川警方在美領館就王立軍對峙；薄熙來獲軍中和武警支持，北京出現軍事政變。早些時候又有傳言，賈慶林的公子在北京車禍喪命；近來海外媒體證實是令計劃公子架“法拉利”飛車出事，讓老子的官運折戟。

2012 年秋天離十八大召開不遠，中共既定的接班人習近平十多天來在重大外交場合屢屢缺席，引得海內外疑竇叢生，讓京城變得更加詭異、中南海紅牆更加神秘。而官方發言人故作淡定，要大家不要過多解讀，反而讓外界猜疑是否習近平“背部受傷”，或“背部受槍襲”，或習近平心髒病發作，接班安排出現意外，人事配置亂了套，等等。

日常生活決策需要信息

從老百姓的角度看，在失去鐵飯碗和被拋進市場後，他們必須獲得、分析各類信息，幫助每天的生活決策。例如，存錢還是炒股，購外匯還是買黃金，買房還是買車，進城還是移民，等等。由於信息不通暢，中國的百姓經常做出非理性選擇，喪失利益最大化。比如，老人群體存錢養老防病，但他們不知道銀行的實際利率長期以來都低於通貨膨脹率，所以銀行里的存款實際上在急

劇縮水。又比如，許多在紐約證交所和納斯達克上市的企業家並不知道他們在美國的承銷商犯有欺詐前科，中國的股民也不知道許多民營企業向美國提供的是虛假資產和財務報告，結果，一旦美方揭露出這些問題，在美上市的中國概念股紛紛被拋售、做空，光是 2011 年一年就有 20 多家公司被迫退市。其中問題的核心是，中美社會、經濟信息互流不能全面暢通（“防火牆”當然難咎其責），導致交易成本上升，最終市場失靈，傷害經濟民生。

制度封閉和潰敗

也許有人會說，上述問題只是老百姓不知情，領導人知道內幕，甚至享有“信息不對稱”的特權，讓官員處於優勢、百姓處於劣勢。其實不然。對於任何政治體系來說，最重要的信息系統是它的反饋系統。如果領導人在維穩的思維定勢下，拚命打壓上訪人群，箝制媒體自由，屏蔽微博公眾心聲，同時只是一味依賴自身的特務系統收集情報，他們獲得的信息數量會減少，質量會下降。結果導致制度記憶的喪失，想像力和判斷力的喪失，因此失去對危機的預估、判斷和應對的能力。

奧爾森在他的遺著《權力與繁榮：突破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專制政體》中指出，信息的漏失和扭曲是蘇聯龐大官僚體制潰敗的重要因素。共產主義體系的一個特徵是，地方官僚和部門官僚結成了橫向和縱向兩大利益集團，合謀對上隱瞞和扭曲信息，結果，最高決策層經常是在無知的帷幕後面發號施令。

在 2012 年關乎中國命運的關鍵時刻，面對信息危機，人們難免不擔心：盲人瞎馬十八大，崛起中國一現花？

2.2 中共十八大的責任 (2012.09.28)

2012年秋，中國上上下下都在焦慮中等待十八大的召開。地方領導現在是人心惶惶，幾乎無心幹事。黨政各部門基本處於癱瘓狀態。“等十八大以後再說”已成口頭禪。現在即便請客吃飯，也會聽到這樣的回答。

權力遊戲中的焦慮

顯然，中共十八大的召開不只是要解決請客吃飯的問題，最不该是華筵又開，讓一批垂涎已久的餓狼代替撐腸拄肚的老狼。在既得利益集團人人思安維穩、草民百姓大多思變圖強的大環境下，十八大也難以僅僅是走過場，把權力從“第四代”領導傳給“第五代”，而又期盼中國政治還會周而復始地從“第五代”走向“第六代”，直至永遠，保證中共成為壟斷霸主地位的“東方不敗”。十八大的一個重要責任是要讓中共藉機檢討、承諾和踐行它的政黨責任，從而使中國人民可以生活在“免於恐懼的自由”之中。

“薄-谷-王”事件宣告了“建設依法治國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徹底失敗，暴露出中共黨政領導基本上行使著沒有責任的權力。

一個在英國有著深厚而廣泛的關係網的前政府官員、商人尼爾·海伍德可以在“社會主義的中國”被毒害而死，並以過度酗酒定案、草草送往火化；一個直轄市的副市長兼公安局局長的王立軍被他的書記、政治局委員薄熙來摑嘴、打臉；一群一群的美女主播和演員被書記染指糟蹋，或由“紅頂商人”徐明之流進貢給官員；面對這一切，中國的民眾還能有安全感嗎？他們還有自信和能力保護自己的妻室女兒嗎？

政壇江湖化

恰如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與罰》中揭示的，所謂高智商犯罪人的心理是，他們認為世界分為“平常人”和“不平常人”兩類：前者不得不在服從管制下生活；後者卻可以像拿破崙，隨意超越常理，違背道德法律、作姦犯科，有權作“亂法的立法者”。當一個執政黨認定自己為“東方不敗”時，薄熙來把自己定位為江湖上的“任我行”，而一幫動輒煽智叟耳光的昔日紅衛兵就成了“左冷殘”。相形之下，有點悲憫心腸的溫總理就成了一個“老頑童”，而最大的勝家卻是忍得人間第一恥辱、自宮而得權力秘籍的“岳不群”。近年來重慶所發生的行行種種事件揭示出，中國政壇已經完成了全面的江湖化。

在正常的政治生活中，沒有權力，就沒有責任；反之亦然。英國不成文憲法中所謂的“英王永不犯錯”就是建立在“英王統而不治”的前提下的。而首相大權在手又是由“個人責任制”、“部門責任制”和“內閣集體責任制”來配套的。但在“人民共和國”，執掌權力的寡頭集團經常是不用負責的。一個執政黨必須尊重人民的利益，必須回應民眾的呼聲。但如果一個政黨既鎮壓了反對黨，廢棄了選舉，又把媒體變成了喉舌，同時還箝制公共輿論、以言治罪，“人民當家作主”就必然成了幌子。記得曾在蘇州參觀調

研，市政府大樓的正前門赫然矗立著“為人民服務”的五個大字，後門的牌子寫著“實事求是”。陪同的一位當地官員解讀道：為人民服務走前門，實事求是還得靠關係、走後門。

十八大的期盼

在十八大召開之際，三項具體的制度安排，對執政黨的責任會產生不同的影響。第一，政治局常委會的設置規模是大一點，還是小一點。有學者盛讚“九龍治水”的好處。從利益均霑的分贓角度來看，它確實有好處，但卻無助於明晰責任和提高效率。所以，從常委九人制縮到七人制、甚至五人制的發展趨勢不失為一個小小的進步。第二，決策程序是多數表決制，還是一致表決制。在改革的初期，改革基本上還是雙贏博弈，共識容易形成，一致表決也易推行。但隨著利益集團的形成和穩固，一致表決給保守的權勢集團一票否決的權力，從而產生政府不作為。多數表決製成為突破僵局的必然措施。第三，交接班是全面交接，還是部分交接。定期的接班制產生的背景就是要完成權力的順利交接，而“扶上馬送一程”將會延續責任模糊的狀態，拖延中國的社會進步。現在中國的百姓基本上對貪官多拿一點、多貪一點已習以為常。他們的基本期盼是，當官的喝足貪飽後，至少應該干點好事。如果這樣的底線還置之不顧，在與民爭利上政府亂作為，在為民謀利上政府不作為，兩相映襯，勢必加劇民眾的相對被剝奪感和對政府的離異，刺激更多民變發生。

正值中共十八大即將召開之際，中共權貴新階級有必要反省一下自己的一系列責任：（1）對自己和家庭要擔當起責任，只有做好“修身齊家”，才能“治國平天下”。“偉大的革命家”毛澤東恐怕也不願留下自己的未亡人作為“反革命集團”的首領而深陷囹圄、最後上吊自殺。聰明過人的薄熙來目睹自己妻離子散，

也會追悔莫及，羨慕隱居鄉里、粗茶淡飯的神仙日子。（2）對民眾負責，不做獨夫民賊。（3）對歷史負責，不要讓自己的名字寫進昏君和庸君的行列。（4）對天地良心負責，免受天譴和後人詬罵。中國古老智慧“不是不報，時間未到”時常在歷史上得到印證。

警惕管他媽主義

今天，在九千六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不乏為個人的完和、家庭的尊嚴、人民的自由、國家的民主和天下太平而思而為的人群。但可悲的是，權力最高層推行“皇上英明、奴才有罪”的慣例，除了做些姿態，通常把寒門出生的官員（從胡長清到成克傑，再從陳希同到王立軍）送上權力的祭壇外，即便蠹國害民、罪不容誅，也從未嘗試過自責下野（袁世凱和蔣介石至少還做過秀）、以謝天下。小吏們（例如李貞、王立軍之流）為了完成從奴才到主子的突變，通過魚肉人民、買官賣官，試圖在權力的跑步機上實現跨越，最後卻成為政治絞肉機的犧牲品。而甘願充當看客的知識界更多是被犬儒主義所籠罩。留下無數老百姓只好奉行“管他媽主義”。

孩童時曾聽過姜昆講相聲，說國外有個“加拿大”，中國有“拿大家”和“大家拿”。目睹官員的普遍腐敗和民眾的痞子化現象，現在我明白了，這個相聲是在拿一個沒有責任的國家和民族開涮。

2.3 王立軍案引爆中共權力鬥爭

(2012.02.10)

從北京到四川、再到重慶，2012 年年初正在上演一場充滿刀光劍影的政治大戲。無論對身臨其境的中國民眾來說，還是對隔岸觀火的海外評論人而言，由重慶市副市長、前公安局局長王立軍引爆的權力爭鬥顯得非常戲劇化，撲朔迷離、雌雄難辨。

劇情複雜的根源

問題的複雜化由下面幾個因素糾結而成：

1. 時間。該事件發生在新年後、18 大權力交接班之前，尤其是在習近平 2012 年 2 月 14 號訪美前一周。

2. 地點。身為副市長兼公安局局長的王立軍曾經叱吒風雲，是個熱可炙手的人物。但與老闆薄熙來生出齟齬，導致他政壇失寵。一個有“打黑英雄”之稱的蒙古漢子被削權分派主管文教衛生，令人難堪，但頂多也只是一個地方人事變動。而王立軍急投美國設在成都的總領館，重慶警方幾十輛警車（還有裝甲車）跨省追捕到四川境內，然後包圍總領館。一下子造出了驚動北京、捲入美國，中央不得不插手的驚天事件。從重慶到成都、再到北京，

從重慶到北京、再到華盛頓，兩個三合會攪到一起，地方人事變動變成全國權力爭鬥和國際事件。

3. 人物。王立軍背後是薄熙來，薄熙來劍拔弩張直指溫家寶、習近平和汪洋。而如果薄熙來能對習近平的接班攪局，最直接受到威脅的恐怕又是李克強。如果中共允許薄熙來用非常規的方式變更 17 大的安排，那中共官場派系、代際維持的政治平衡將一去不復返。胡錦濤和江澤民及所有政治老人的未來將充滿不確定性，較大的可能是兇多吉少。

4. 評論。對於王立軍事件以及它牽扯到的更大的 18 大交接班和習近平的地位鞏固與否，海內外政治評論員都有許多誤判、誤讀，把北京和重慶的政治遊戲搞得更是雲遮霧罩。

在 17 大以後，我們已經聽到或看到以下一些列誤判：

1. “中共權力的交接已經完全制度化，實現了黨內的一項重要民主。”薄熙來的出奇制勝的打算和下面必將出現的人頭落地和深陷囹圄，證明黨內權力的交接班仍然是充滿血雨腥風的非制度化過程。

2. “胡錦濤領導的團派是中國權力場的最有實力的派系。李克強和汪洋都是團派的人物。”該判斷低估了習近平的派係人脈資源，誇大了習與李、汪的分歧，因而沒法預估他們聯手製薄的政治變化。

3. “胡溫借刀殺人，想用整肅王立軍達到敲山震虎的目的，把薄熙來從十八大的政治軍常委名單上拿下來。”這裡的誤判在於沒有看到胡錦濤一直在利用薄熙來的“新左”對抗黨內的政治改革“救黨派”，也沒有看清，現在的王立軍事件和中央直接插手已經不是僅僅對薄熙來敲山震虎了，而是最後攤牌。

4. “王立軍事件會負面影響習近平的訪美行程，增加了十八大交接班的變數，十八大布局亂套。”這恐怕是最離譜的判斷，下面將論述一個核心觀點：王立軍事件將保證習近平訪美沒有“民

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過多干擾，為他的訪美取得成功掃除障礙，從而保證習近平能藉訪美行程來樹立自己的外交形象和國際威望，以便在十八大全面順利接班。

各派政治臉譜

要認清北京的權力爭鬥，我們必須搞清各派的政治臉譜。當然我們難以用京劇的生、旦、淨、醜來把各路人物臉譜化，但基本可以說，胡錦濤是站在“中左”的位置，他的更左面站有“新左”、“毛左”的薄熙來；他的右邊站著“中右”的“政改派”溫家寶。十七大以後，胡錦濤不得不接受習近平搶在李克強前面的接班安排，但為了不讓自己“跛鴨主席”的權力急劇縮水、接班人習近平立即做大，胡錦濤樂於給薄熙來一定的空間，從左翼牽扯習近平，同時強化自己的中左地位。

薄熙來不僅僅滿足於被利用，他要在胡錦濤給出的空間下，利用毛澤東的政治資源，把左的旗幟舉得更高，利用民粹主義，增加自己進入政治局常委的砝碼。應該說，薄熙來在一段時間裡已經達到目的。但他不按常規出牌得分的做法，更加刺激了他政治梟雄的本性。後來他給人的印像是志在奪得政法委書記的職務。“新左派”也有人在“烏有之鄉”等網刊上造勢，想把他推上總理、甚至總書記的位置。薄的存在和野心直接挑戰了習近平，同時危急了李克強。

作為等待接班的習近平處於一個非常尷尬的地位。他如果鋒芒畢露，勢必招致胡錦濤的惡意和他人的嫉妒；但如果四平八穩，又會給人留下平庸無能的印象，遭人輕視。許多人根本沒有意識到，習近平在 17 大上的“黑馬效應”是他長期經營的結果。只有他才占據和積累了中共權力網絡體系裡最強的“中心性”。他出生於國家領導人家庭（可以歸為“太子黨”），畢業於清華大學（可

以劃歸“清華幫”），早年在軍委給秘書長耿飴擔任三年的秘書，並有將軍級別軍旅歌唱家彭麗媛為妻（可以想見他和軍隊的緊密關係），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任書記（和沿海省份，尤其是“上海幫”又有緣份）。據說，他在福州的提升直接與團派的胡耀邦和當時的福建省委書記項南也分不開。他的父親習仲勛早年在廣東與任仲夷一道倡導改革開放、建立特區，以後又為胡耀邦和趙紫陽仗義執言，所以習家在胡、趙舊部（包括溫家寶）那裡都有好的口碑。可以說，從權力網絡資源的角度來看，習近平最好地整合了中共派係政治板塊，他的權力指數是最高的。不僅如此，在中共內部，他提出了要把“浙江經驗”（也就是民營經濟為主導的市場經濟）上升到決策層面，並在上海任期內推動學習“浙江模式”。可以說，習近平又是最能代表中國未來走向的新一代領導人。

習近平想把中國帶入的政治、經濟走向顯然不同於薄熙來。這也是薄的“新左派”難以得到普遍認同的原因。他們誤讀了中國的大的社會走向，想走回頭路，結果把自己逼上絕路。王立軍的毀滅只是薄熙來倒下的前奏。顯而易見，如果沒有胡、溫在後面支持、或至少默許，這樣大的舉動是不可能發生的。

變臉和真人不露相

薄熙來遭遇到了胡、溫 and 習、李（克強）、汪（洋）的聯手反擊。溫家寶的政改呼喊和他與汪洋近來的改革言論，讓人不難理解他們的選擇。讓外界最琢磨不透的是胡錦濤。可以想像，隨著胡即將完成任期、交出權力，薄熙來的價值也就變成了負數。面對共同對手，習、李精誠團結恐怕是促使胡錦濤最終放棄薄熙來的主要原因。而為了保證習近平下周訪美成功，也許現在就放火燒洞、熏出王立軍，是時機上的最佳選擇。

與某些評論家的看法恰恰相反，習近平訪美不能平淡無奇、

毫無建樹。訪美成功是他建立大國領袖形象、從而順利接班的最後一道功課。習近平的訪美重要性可以和 1979 鄧小平年訪美會晤卡特和 1985 年戈爾巴喬夫會見裡根相提並論。他們的共同目的是要解除美國的疑慮、建立大國和領袖之間的信任，從而開啟兩國關係新紀元。

可以想像，以薄熙來為旗手的“新左派”所作所為，要么讓習近平過多顧慮這些壓力，表現得僵化和保守；要么，他的務實和靈活在美國贏得好感後，回到國內會面臨“漢奸”和“賣國賊”的指控。這兩項選擇都可能葬送習近平在 18 大上的全面順利接班，尤其是軍委主席的交接。所以，習近平在訪美之前，務必讓薄熙來和“新左派”銷聲。王立軍“造訪”成都美領館，會讓習近平訪美期間費些口舌解釋。但一個“唱紅打黑”的“新左”骨幹最後把自己詛咒痛罵過的“美帝”作為避難所，將會導致薄熙來和他的追隨者在政治上全面崩盤。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中國改革政治的最大悲劇在於改革派成為學生民主運動的最大輸家。幾乎面臨同樣的十字路口，2012 年初春這幾天中共黨內改革派可能已經擺脫了這種被動局面。如果富蘭克林·羅斯福在天有眼，他也許會說：現今中國政治大戲的幕後推手既有獅子的膽量，又有狐狸的狡猾：前者為政，後者禦敵。

2.4 “重慶三部曲”何時樂休舞止？ (2013.02.21)

2012 年的薄熙來事件產生的影響會非常大，因為它是一個類似好萊塢大片的卻又真實的故事。權力、金錢、美女，貪汙、腐化、姦淫、背叛、謀殺，慾望、野心、撒謊，交織在一起，演出了一場群魔亂舞的大戲。其間，既有京劇的各色面目，更有川劇的急劇變臉。戲台場景從天朝京城轉換到“袍哥”傳統浸淫的陪都，從帝都倫敦牽扯到柬埔寨的首府金邊，從學術重鎮哈佛又回到海濱之城大連。難怪《紐約時報》、《金融時報》等西方各大媒體在過去的一年時間裡，隔三岔五總歸有頭版的長篇報導。《金融時報》在去年夏天還推出《薄熙來醜聞：震驚中國的權力、死亡和政治內幕》英文電子書。至於港台和海外出版的中文獵奇類著作更是數不勝數。

重慶火鍋和康師傅

圍繞“重慶事件”（為方便起見，作為薄熙來、王立軍、谷開來刑事犯罪集團以及相關事件的總稱），谷、王已經過堂，並被判以重刑。現在整整一年過去，薄熙來卻還未受審。據海外媒

體報導，近來，薄熙來拒絕合作，甚至採取絕食，以死相爭。所以，薄熙來案件的審理陷入麻煩。現在還有幾個問題值得密切關注。

第一，重慶王立軍、谷開來、薄熙來三部曲何時終了？中共審判完薄熙來，是否就意味著三部曲的曲終舞散？

王立軍和谷開來過堂下牢算是乾淨利落。谷開來的庭審只花了一天，即便據說薄谷開來還手持新加坡護照，她被判了個死緩，也沒有引起新加坡政府挺身而出，提供任何領事服務。但到了薄熙來，胡溫任期的燙山芋有可能到了他們兩位三月成為甩手掌櫃後，也難以有個清晰下落。今年年初，全球媒體獲得消息，對薄的“世紀審判”將在貴陽開庭。儘管各路媒體（包括官方的新華社）飛降貴陽，結果被告知絕無此事，鬧了一場新聞烏龍。

世人皆知，王立軍和薄熙來事件涉及到很大的政治企圖。海外媒體已經報導，王立軍不僅掌握有谷開來殺人的證據，據說還有薄熙來奪宮篡權的證據。所以它還涉及到更高層。周永康與薄、王事件聯繫非同尋常，就在薄熙來被免職的一周前，周永康高調走訪人大重慶代表團，對重慶取得的成績給予肯定。再說，薄熙來不給公安部通個氣，隨意免去王立軍重慶市公安局長的職務，恐怕是因為有中央政法委書記撐腰的緣故吧。所以，重慶火鍋一鍋端，人們難免不問：是否還會牽出“康師傅”麵條？

然而，儘管周永康已被免去政法委書記的職務，他的權力濫用也讓政法委被降級，近期的政治發展似乎絕沒有“宜將乘勇追窮寇”的勢頭，倒顯現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端倪。薄熙來的得力干將、市長黃奇帆居然一帆風順，就地再次當選為重慶市長，不能不讓外面的觀察者稱奇。

左、右衝突

第二，國內的新、老左派是否還在藉毛屍、薄案來為已被歷

史證明失敗的毛專制主義和共產專制主義還魂？

薄熙來事件引發了中國社會和思想界左、右兩翼的巨大衝突。新左派的人現在是根本不相信他們的“薄帥哥”有任何的犯法行為。他們認為像薄熙來這麼絕頂聰明的人物，根本不可能犯如此低級的錯誤。他們甚至認為谷開來受審的是個替身。這些新左派借釣魚島事件等，舉行的遊行、力挺薄熙來和重慶模式。現在還有人要搞“營救薄熙來國際大聯盟”想把薄熙來撈出來。此人在全國人大即將在北京召開前夕，向吳邦國發出呼籲：“立刻恢復薄熙來同志的人大代表資格，恢復薄熙來同志作為人大代表所應享有的全部政治權力。”也有人向海外的政評人士發出電子郵件，勸告不要再碰薄熙來事件。從新左派代表人物吳法天朝陽公園被圍攻，到韓德強打人事件等，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社會左右兩翼展開的路線和意識形態的爭鬥。薄熙來事件使之更加激烈。新左派的人物還在集聚、反撲，在海南還組織了遊行示威。至於他們是否能翻案，目前還並無定論。

值得評論的是，毛的意識形態和共產專制的體系在過去的六十多年中始終是“霸權體系”，但新老毛左們卻裝出一副“被迫害”的可憐相，似乎他們成為了弱勢群體。這群人從來不尊重多元價值觀、社會多元利益，更不支持和允許多元意見表達、從而形成公共輿論，把專制的政權轉型為顧及和回應公共輿論的民主政權。但他們卻在“多元”和“民意”的幌子下，為比當今中共“維穩派”更為反動的薄熙來抬轎跑腿。儘管程序公正一旦確立，就可以利益天下蒼生，但我們從來不曾聽見他們用過“多元”和“民意”來為劉曉波、陳西、郭泉說過半句話。其實，當今中國祇是一個“被撕裂的社會”，根本言不上“多元社會”。薄熙來一派和現今當政者的區分只是一根藤上的兩個瓜，而不是由獨立個性和自主性的多元共存。

五十步笑一百步

第三，眾所周知，在2012年三月全國人大重慶團的記者招待會上，對於兒子在國外讀書的資金問題，薄熙來一字一句地說：“全額獎學金！”在薄熙來被免職後，他的兒子薄瓜瓜在海外發表聲明，說他在哈羅公學、牛津大學以及哈佛大學就讀所花費的學費及一切生活支出均來自於“獎學金”以及他母親多年來從事律師工作和寫作所得的“積蓄”。去年國慶前後，薄瓜瓜又再發聲明，說，“我所認識的父親信念正直、忠於職守。”他無法相信對他父親的指控。在越來越多的事實真相面前，這父子倆的信譽蕩然無存。

但奇怪的是，海內外還有許多的人認定薄熙來是“務實”、“親民”和“繼往開來”的領袖型人物。這從某個角度折射出民間對胡溫“忽悠”、“做戲”十年的反感。對老百姓來說，“做點實事”總比不作為要好。所以，民間對薄熙來的好感又在警示即將接班的新領導班子必須要有開拓、有作為，才能驅散薄熙來“重慶模式”的幽靈。

第四，中國共產黨聲稱在過去的一二十年已經建成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國家。但是，薄、谷、王事件基本上讓這麼一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變成了一個笑話。尤其我們看到，最高人民檢察院首席法醫王雪梅在博客上表示：根據她的分析，海伍德的死亡可能不是氰化鉀造成，懷疑有其他的因素。《紐約時報》報導了相關內容。在這樣的情況下，司法的公正性不免受到質疑。許多人在薄熙來如日中天的時候對他肉麻地吹捧，在他倒台後又立即投井下石。對薄熙來的重慶模式，我從未說過好話，但現在我倒要說，“法治”原則應該公平得適用於他，其中包括“法律的正當程序”。

圍繞薄熙來審判，一個大問題是如何把政治問題和司法問題相對地區分開來。薄的新左“粉絲們”堅持聲稱對薄的處理是政治計謀。政治問題刑事化確實是中共常用的一個手段，據說在江

澤民時期得以推廣。同時，薄的又一批支持者，尤其是那些“紅二代”們頻繁遊說，堅決阻止對薄下重手。他們試圖通過政治關係、政治運作，來消解掉薄該負的刑事責任。如果谷開來被判死緩、王立軍得了15年，就現有的披露來看，薄熙來也不該少於十年。即便薄“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下”度過十年牢獄生涯，與胡長清、成克傑這些已成死鬼的“老虎”比，也算是念及紅色後代、太子黨，中共領導顯示出“洪恩浩蕩”了。

當然，作為一個有鴻鵠之志的政治領導來說，不管我們喜不喜歡他的政見，他都有議政、問鼎政權的權利。如果這被看成政治野心，從而成為悲劇開始的緣由，薄熙來確實也是個冤大頭。當然，如果我們問問薄熙來，一旦大權在手，他是否會對政敵更仁慈、更寬厚一些，他恐怕只會有過之而不及。這才是薄熙來的悲劇，也是他為之服務半個多世紀的中共政權體系的悲劇。

真正的出路

最後，最重要的在於，人們看到薄熙來事件暴露出中共內部深層的黑暗和彌散開的腐敗，中共體制如何與薄熙來切割開來，恐怕並非容易。人們不禁要問：中南海除了門前的獅子是乾淨的以外，還有誰是清白無辜的？如果沒有人是清白的，為什麼單單抓住和揪出薄熙來？這種情況下，中國的老百姓不免質疑整個執法和體系的正義性和公正性。法律不應該成為派系權力鬥爭的附庸；反腐也不應該成為“釣魚式執法”來打擊異己、忽悠百姓。

最近，網上有報導說：韓國強打老人的兩個耳光和薄熙來打王立軍的耳光，可謂“兩記耳光震神州”，應該把中國人給打醒了。中國人（包括領導人）都必須明白：只有獲得了民主和法治制度的保障，從而獲得免於恐懼的自由，中國人才能徹底擺脫“重慶三部曲”的陰影。

2.5 薄家悲劇與中共的“魔戒” (2013.09.07)

“重慶三部曲”從王立軍出逃，到谷開來領死（緩兩年），再到2013年八月底五日連續審判薄熙來，讓世人不斷看到老底掀翻，家醜外揚。從本質上來說，薄 - 谷 - 王事件就是兩樁家務事：薄家的家務事和中共的家務事。

薄、谷、王事件是兩樁家務事

先說說薄家的家務事。拋開所有的價值判斷，薄熙來被押上審判台，讓薄家三代、薄熙來家三口的悲劇成了個大圓滿。像許多中共領導一樣，薄家的老爺子薄一波算得上是中共奪權的功臣，所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權重位高。不幸的是，“文革”剛一開始，薄一波就被劃為“61人叛徒集團”成員之一，遭受牢獄之災長達12年之久。他的家人也受牽連，妻子胡明被迫害身亡、三個兒子也鋃鐺入獄，兒子薄熙來少年時代就進監獄，被囚禁五年。半個世紀後，薄家最有出息的兒子、官階高至政治局委員、並有望問鼎大位的薄熙來轟然倒下，成為了被告押上審判台。一個昔日享盡榮華富貴的三口之家落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夫妻反目，

親朋投石。即便亡命天涯的寶貝兒子薄瓜瓜入讀哥倫比亞法學院，但也並未完全免於司法的追咎。薄家兄弟姐妹也被牽連進去，受到不同程度上的衝擊。

平心而論，以薄、谷夫婦的背景、智力、能力和魅力，他們在任何一個社會都會獲得家庭成功。但也許只有在中國這樣的社會，他們才會落得今天的悲慘處境。此處並不是要說，薄、谷二人遭到了天大的冤枉，而是說，第一，在一個健全的民主、法治社會，制度絕不會鼓勵、放任他們走這麼遠，最後再算總帳；第二，如果中國政治能夠擺脫元老指認接班人、採納選舉制，薄熙來完全可以發揮自己的特長（打造形象、掌控媒體的能力）在民主體系下來尋求更大的政治成功，而不必被體制和意識形態所逼迫，走上毛左派的邪路；第三，即便已經進入法律程序，在民主法治的司法體系下，薄熙來也會少受身心雙重折磨，在強大壓力下“被詢問了數百次、並且暈倒了 27 次”；未來也只有在民選政治中薄熙來才有可能東山再起、求得新的政治定位。

但作為“紅二代”、“太子黨”和“黨組織的人”，薄熙來恐怕並未意識到他的命運其實是一個高機率事件。他有自責個人性格缺陷，似乎相信真是“性格決定命運”，而沒有認清在特定社會和政治制度環境下的個人選擇起了更大的作用。以至，所謂的“薄熙來庭上翻供”既未指控逆向淘汰、逼良為娼的中共體制，把中共厚黑的權力運作體系押上歷史的審判台；也未牽連當今在任的任何高官。儘管薄熙來的一些追隨者還繼續一廂情願地為他的庭上表演溢美，做著鹹魚翻身的白日夢，薄熙來本人卻沒有抽刀斷臂、投奔梁山、登高而呼的意願和勇氣。他和他的家人盤算的恐怕還是相信黨組織、等待類似薄一波最終被平反昭雪的一天。

中共打造出一顆“至尊魔戒”

其實，即便薄熙來和他的追隨者心想事成，薄熙來最終成了“毛澤東”，毛的命運與當今薄熙來的命運又有何實質差別呢？毛背叛了結髮妻子楊開慧，讓她死在軍閥手中；把與自己共走長征的戰友賀子珍打入精神病院；最後又無力保護江青，“毛主席的一條走狗”落得與谷開來一樣的命運，被判死緩，最終上吊自殺結束了淒涼的晚年餘生。毛也讓自己的子女流浪街頭，一個生死不詳、一個變成精神病人，在動盪年代僥倖存生的長子毛岸英又在朝鮮戰場上為金家賣命而一去不返。毛與賀子珍和江青所生的兩個女兒在“文革”後也受到牽連、歷盡人間冷暖。所以有人稱毛澤東為“害盡了身邊所有親人的毛毛蟲”。儘管毛的屍體還躺在冰冷的水晶棺裡，他還像“老大哥”一樣從天安門城樓監視每一個路人，但他作為二十世紀“三大惡魔”、與希特勒、斯大林並列，已成國際世界史學界的定論。他的惡名將詛咒他的後人，而一個現事實似的孫子更使世人對此確信不疑。

從毛家悲劇，走到鄧家悲劇（三起三落的鄧小平害得長子終身癱瘓），再進到今天薄家悲劇，都是共產黨的家務事。它們都看起來真像是共產黨“紅寶書”講述的黨史，一部《魔戒三部曲》：“黑暗之王”中共打造出一顆“至尊魔戒”一黨國至高無上的權力，一個血紅色政權。握有它，黨國可以統治其他 19 顆魔戒：三顆給了黨國的精靈毛澤東、鄧小平和江澤民，九顆給了最終都將退出歷史舞台的肉體凡身的“九常委”、另外七顆給了七個小矮人。在爭奪至尊魔戒的歷史長河中，他們個個都像史麥戈（Smeagol）變得邪惡起來，相互廝殺，以謀取絕對的生殺大權。而一旦大權在手，他們又被這個權力的魔戒所詛咒和荼毒，墮落扭曲，永遠生活在仇視和恐懼的雙重人格中。

習近平繼承一顆魔戒

英國作家托爾金的《魔戒》寫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背景下。目睹指環王們為了獨裁的至尊權力，相互施展同樣的邪惡手段，紛爭不已，完成相互自戕，又還塗炭無辜生靈，托爾金呼籲人類集體覺醒，為了挽救人類文明，自願放棄魔戒，為人類和後代立功。二戰後，德國人上上下下集體懺悔，放棄納粹主義，擁抱民主；日本接受和平憲法，永遠放棄用戰爭手段解決外交爭端，都可以在托爾金的政治比喻中找到對應。

今天，習近平登上中共權力最高位，繼承的又何嘗不是一枚魔戒？在他與薄熙來暗裡和公開的爭權奪位的過程中，不少善良的人們期盼他能成為一個好人“佛羅多”，主動開啟政改，限制無限權力，把中共專制體制的魔戒永遠扔進末日火山中。正像獲得魔戒後最終捨不得割棄它的佛羅多，習近平在執政後日益顯露出，他頂不住魔戒的誘惑，直指自己是至尊權力的主人。習近平在生死之淵前面臨兩個抉擇：是做人有所不為，有所保守，有所畏懼，埋葬中共至尊魔戒，放棄絕對的權力，遠離絕對的腐敗，順應眾意，接受善友，帶領中土人民登上民主高峰，邁進自由樂土？還是沿著“毛”、“鄧”路徑，安於人格分離，邁出最後的一步，把自己的人生複製成毛和薄的拷貝？

附錄 2.1:

薄熙來事件令中國歷史朝著好的方向邁出了一小步
(2012.10.01)

法廣主持人流芳專訪

流芳：最近一段時間來，備受關注的中共前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一案引發的各種猜測，終於隨著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決定而煙消雲散。政治局通過有關報告，決定開除薄熙來黨籍及公職，移送司法機關處理。遲遲未予公布的中共十八大的會期也終於敲定：十八大將於11月8日在北京舉行。如何看待薄熙來一案？薄熙來一案將在中共歷史上產生何種影響？此一案件的處理決定是否意味著以習近平為代表的中共新一代領導人將可以順利接班？我們在今天的本節目中，請紐約城市大學教授夏明先生來談談他的看法。

流芳：薄熙來一案是否可以簡單地解讀為一場政治較量的結果？為什麼有觀點認為：此案超越了黨內派別之爭？

夏明：我認為薄熙來事件裡面涉及到黨內的派別之爭、人事鬥爭，尤其涉及到十八大的人事安排。但是，我覺得薄熙來事件同時也顯示出中國出現了兩個不同方向的鬥爭。一個是薄熙來打

造的“重慶模式”，用來抵抗、甚至想代替在沿海出現的“浙江模式”、或是廣東正在打造的“廣東模式”。我覺得這是兩條道路、兩條不同的政治、社會、經濟發展方向。因此，薄熙來事件反映出更為廣泛的政治、社會與經濟背景。

流芳：薄熙來一案發生在中共即將進行權力交接的關鍵時刻，那麼，對薄熙來的處理是否關係著十八大的格局？此一案件的處理決定公布後，有評論指：這是胡溫陣營的勝利，您是否認同這種觀點？

夏明：薄熙來事件首先關係到十八大的布局。因為我們都知道，薄熙來本身進入常委會的呼聲非常高。過去的一年、王立軍事件之前，基本上可以看到薄熙來已經穩操勝券。但是，王立軍事件打亂了薄熙來的整個棋盤和夢想。胡溫在王立軍和薄熙來事件的處理中是聯手的。但除此之外，習近平以及黨內一些已經退休的老人也捲入了其中。因此，從薄熙來一案的處理中，可以看到中國後面一個強大的政治機器進行了非常快速的運作。所以反映出很多的權力和派系鬥爭的結果。

流芳：習近平能否得以順利接班？

夏明：習近平接班的大事已成定局有兩個標誌點：一個是在十七大，他當時以高票當選為政治局常委。十七大的結果實際是各派派系運作、妥協，最後達成平衡的一個交易。習近平能夠在派系鬥爭中勝出，顯示他在派系的資源中就已勝過李克強和薄熙來。較量後，薄熙來基本在派系上認輸了。但是，薄熙來認為利用自己的人脈資源及人格魅力，如果能夠打造出一個中國未來的政治、經濟前景，也就是他在打造“重慶模式”，手段則是“唱紅打黑”。他覺得如果這套新的政治、經濟綱領能夠得到中國老百姓的支持，他尤其期盼中國的民粹主義、新左派思潮能夠對他形成政治支持、形成廣泛的政治動員，他希望通過這種方式最終取代習近平。但是，王立軍事件爆發後，徹底宣判了薄熙來的失敗。應該說，從去年

習近平被任命為軍委主席之後，基本上中共黨內也都認識到習近平會穩定接班。薄熙來通過王立軍事件的出局，令習近平的接班變得更為順利。

流芳：薄熙來事件將對中國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夏明：薄熙來事件產生的影響會非常大。因為圍繞此一事件有幾個問題。第一，重慶王立軍、谷開來、薄熙來三部曲何時終了？中共是否決定現在審判或公審薄熙來？這就意味著三部曲的曲終舞散。我覺得未必。因為這裡面還有很多疑問。因為涉及到王立軍和薄熙來事件，裡面有很大的政治企圖，還涉及到更高層。例如，眾所周知：周永康與薄王事件聯繫非常緊密。所以三部曲下面引向何方，周永康究竟扮演了什麼角色，這些目前均未終了。

第二，薄熙來事件引發了中國左、右兩翼的巨大衝突，自由派與新左派。左派這邊現在是根本不相信薄熙來有任何的犯法行為，他們認為這麼聰明的人物根本不可能犯這樣低級的錯誤。甚至認為谷開來受審的是個替身。這通過左派舉行的遊行、釣魚島事件、包括韓德強打人事件等體現出來。我們可以看出左右兩翼在中國社會展開的路線和意識形態的爭鬥。顯然薄熙來事件使之更加激烈。

第三，中國共產黨認為在過去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打造社會主義的法制國家，但是，我認為，薄、谷、王事件基本上讓社會主義法制國家變成一個笑話。尤其我們看到，最高人民檢察院首席法醫王雪梅在博客上表示：根據她的分析，海伍德的死亡可能不是氰化鉀造成，懷疑有其他的因素。《紐約時報》報導了相關內容。這樣的情況下，司法的公正性不免受到質疑。

第四，最重要的在於，人們看到薄熙來事件暴露出中共內部的黑暗和腐敗。人們不禁要問：中南海除了漢白玉的獅子是白色的以外，還有誰是清白的？如果沒有人是清白的，為什麼單單抓住薄熙來？這種情況下，中國的老百姓不免質疑整個執法和體系

的正義性和公正性。最近，網上有報導說：韓國強打老人的兩個耳光和薄熙來打王立軍的耳光，應該把中國人給打醒了。

流芳：從整個事件的處理看，此一案件有沒有正面意義，是否意味著避免了中國回歸極左路線？

夏明：當然。我在王立軍、薄熙來事件以前一直在批評重慶模式，我認為重慶模式有一種返祖現象，想從毛澤東的武庫中找出一種靈感，把中國人重新引回延安的窯洞。這完全是歷史的倒退。想毀滅中國目前正在進行的逐漸市場化、全球化、自由化的努力。因此，薄熙來的倒台應該算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進步，較量中也彰顯了中國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公共輿論、他們在微博、網絡上形成的活躍的群體以及產生的社會影響和壓力，儘管他們無法直接參與權力鬥爭。所以應該說中國的歷史朝著好的方向邁出了一小步。在這個過程中，也彰顯了中國成千上萬的希望中國變得更民主、更自由的這樣一批人的作用。

流芳：薄熙來事件是否將為中國的政治改革帶來契機？

夏明：這裡面最根本的就是要看習近平、李克強的新班子是否有勇氣、智慧和遠見。目前這個球顯然已踢到中南海的院子裡。下面就要看習、李上台後如何踢這個球。他們需要有勇氣面對這麼多困難。胡錦濤留下的是一個沒有什麼果子可摘的爛攤子，他們必需辛苦地耕耘獲得收穫。因此，這樣的情況下，習、李面臨巨大的挑戰。我認為其中最大的挑戰就是：所有這些退休的共產黨的大佬級人物 -- 包括江澤民和胡錦濤 -- 他們在多大程度上不願意放權、不願讓新的領導放開手腳地去進行真正的變革，多大程度上他們繼續形成利益集團，在後面繼續阻礙中國真正的進步。我對習近平、李克強抱有某種樂觀的期盼，當然還要看他們在未來的半年、一年內採取什麼政策、作出什麼姿態。中國人曾對胡溫當時的新政抱有很多的希望，但事實證明：胡溫十年的治理，最後從胡溫新政走向了胡溫折騰。所以我們不知道，現在的中國

領導人在現成的體制下，是否可能走出這一步。對於整個大的體制，我還是悲觀的。因此，儘管我抱有一定的信心，但對根本的制度和體制大的革新和變革卻又不報任何希望。

附錄 2.2:

薄熙來抵抗調查中共該如何破局

(2013.02.22)

澳廣《時事追蹤》專訪吳音採訪

英國《每日電訊報》星期四（2月21日）援引一個匿名消息來源報導說，目前遭到關押的中共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固執地抵抗官方的調查，之前盛傳1月底對他進行的審判至少會推遲到4月份，而且中共當局是否會冒險讓薄熙來公開受審目前還不清楚。

報導說，上述消息是從一個接近薄熙來的消息來源獲得的，這個消息來源由於薄熙來案件的極度敏感性而不願意透露自己的姓名。

儘管消息來源難以證實，但是美國紐約城市大學政治系教授夏明在接受澳廣記者吳音採訪時認為，薄熙來至少要到4月份才能受審的說法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他分析說，薄熙來的審判目前面臨三大障礙：第一，薄熙來本人對調查和取證的抵抗；第二，“太子黨”和“紅二代”正在中共中央裡游說，希望能讓薄熙來逃脫法律的制裁；第三，追隨薄熙來的新、老左派就這個問題向黨中央施壓發難。這三個因素綜合在一起，導致審判薄熙來的時間久久定不下來。

香港媒體及中國一些左派網站曝出，中共當局派人與獄中薄熙來談判不暢，薄熙來表示只接受政治審判，拒不接受貪汙等定罪。夏明教授認為，薄熙來可能是看到了之前對他妻子谷開來以及下屬王立軍的審判，都是避重就輕，沒有從重量刑，再加上他有信心，自己的政治根基和“紅二代”朋友在獄外的斡旋，一定會讓他性命無虞。在這樣的情況下，他才下定決心抵抗到底。

夏明教授說，這樣的情況讓中共高層面臨尷尬。一方面薄熙來刑事犯罪，貪汙腐化，濫用職權的做法已經被媒體揭露出來，不處理不足以服民意。另一方面薄熙來堅稱自己受到的刑事指控是出於政治因素的驅動，並要求通過辯論的方式跟其他領導人對質。如果薄熙來登上法庭接受公開審理，如果他開口以自己的政治實力和他掌握的證據挑戰當權的領導人，那麼中共統治、尤其是剛上台的新領導班子必將受到巨大打擊。如果對他祕密審判，支持他的左派的不滿也可能給社會動盪埋下隱患。不管哪一種情況，都是中共領導人不希望看到的。

夏明教授說，在目前的情況下，對薄熙來的審理越拖越容易出現變數，中共應該藉此機會進行改革，將政治衝突正常化，刑事司法透明化，放棄將反腐作為權力鬥爭的工具，而對刑事犯罪的官員一視同仁，繩之以法。只有這樣，薄熙來才喊不起冤，中國也才能進入民主法制的軌道。

附錄 2.3

專家評十八大前夕官報編輯批評胡溫事出有因

(2012.09.06)

澳廣《時事追蹤》樊慧強採訪

法新社報導，中國共產黨機關報《學習時報》副編審鄧聿文寫了一篇批評即將卸任的胡錦濤領導班子文章，指責他們在政治改革上沒有太多進展。

在中共十八大領導階層換屆的敏感時刻，為什麼共產黨黨校機關報會發表這樣的文章，其意圖何在？美國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系的夏明教授在接受澳廣記者樊慧強的採訪時分析了其中的緣由。

背景

夏明教授說，這篇文章的發表解讀了一個很重要的信息。習近平現在作為中共中央常務書記處書記，同時又兼任中共中央黨校的校長。他認為，這個背景顯示了在目前交接班的過程中，習近平下面的班底，尤其是在中共中央黨校內的系統，有人在討論到底怎樣評價胡溫留下的政治資產。與此同時，他們希望為習近平接班，一方面找到一個能夠樹立他自己的威信，開創他的新時代的一個契機；另一方面，施放一些政治氣球，或者說為習近平今後執政做一些政治試探。

夏明教授說，他們把一些言論先拋出來，一方面為十八大進行的重大決策做準備，另一方面是想找出有可能激發起中國人想像力的一些新的政策，或者新的舉措。

黨校刊物的文章稱，在胡錦濤與溫家寶執政 10 年時間裡“製

造的問題比他們獲得的成就還要多”。文章認為，胡溫對於民主的推動軟弱無力。文章指出，“民主的本質是限制政府的權力，這就是中國急需民主的最重要理由。”那麼這是否意味著習近平上台之後會大搞民主改革呢？

胡溫為繼任者種下社會動亂和矛盾的禍根

夏明教授從兩個方面談了他對胡溫執政十年的評價。他說，從經濟上中國上了一個台階，城市里中產階級以上的人，特別是跟黨政系統掛鉤的，有特權的官員的生活得到極大的提升。但是，夏教授說，從政治方面看中國確實出現了倒退。

他說，在經濟上，胡溫在享受中國二十多年經濟改革的成果，他們是收穫者。但是由於他們沒有耕耘，正因為他們沒有耕耘，他們就不可能給下面的繼任者留下收穫的機會。相反，他們種下了許多社會動亂和矛盾衝突的禍根。

中共的高層無意推起政改

夏明教授說，從目前來看中共的高層基本上是沒有意願來推動中國的政治改革。

他說，現在中國官方是在打造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這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是要根據中國的國情，也就是說要打造一個沒有選舉的民主。夏教授說，沒有選舉就沒有責任，那麼沒有政治責任就不可能有政治民主。

新領導難以克服既得利益集團的阻力

夏明教授說，目前來看，習近平很難克服中國的既得利益集

團形成的整個政治格局。如果習近平真得要推動中國的政體改革的話，那麼這個既得利益集團就是他要克服的最大一個挑戰。另外，目前中國政壇實行的這種集體領導也不會幫助習近平克服這個既得利益集團形成的阻力。

因此，夏教授說，從意願和能力兩方面來看，中國未來要進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基本上是非常渺茫的。

《學習時報》的文章點出中國大陸面臨的 10 個問題，認為問題原因在缺乏政治改革，且可能造成民眾不滿，包括經濟結構重整停滯，收入不平等與汙染。

夏明教授說，歷屆中國領導人的換屆都會有一種撥亂反正的做法。總是會把前面的問題擺出來，這樣對接任者來說，可以把責任理清，另外接任者如果要進行一些改革也會師出有名。

共產黨的權力過於集中是眾多社會問題的根源

不過，夏教授說，目前他們不僅是要分清責任，恐怕是因為中國已經到了火燒眉毛的程度了。無論從經濟、社會來看，它的各種矛盾在加深。還有貪汙腐化長期得不到任何有效的控制，相反是越演越烈。

他說，中國共產黨的權力非常集中，而且他們沒有任何政治責任感。從橫向看，又沒有司法和立法對它的監督，也沒有輿論對它的監督。而從縱向來看，又沒有老百姓通過投票對它有罷免的監督權力。同時，中國對國際社會的任何批評基本上是置若罔聞。它覺得它強大了，財大氣粗，可以忽略國際的壓力和國際的輿論。這樣，共產黨的權力成了貪腐根源，成為貧富差距的根源。現在富的人基本都是靠權力的點金術幫忙，也就是權力成了第一生產力了，成為官員發財致富，撈取財富的一個根本手段。

這個權力是不負責任的權力

另外，這種貪腐，這種貧富差距，加上政府沒有政治責任，在財政上沒有約束，所以導致中國政府濫發貨幣，通過貶值的方式，把老百姓的存在銀行里的存款基本上都掏空了，這就一定會引發老百姓的恐慌和官民之間的衝突。

夏明教授認為所有這些因素都可以歸結到，中國政府沒有受到任何的民主監督和製約，所以他認為，無論從貪腐、政府的效能，還是老百姓的不滿，尤其是社會公正受到破壞，都可以歸結為這個權力是不負責任的權力，不受監督的一個權力，也就是根本就沒有民主基礎的權力。

《學習時報》的文章稱，從整體來說，執政黨，與政府，主要是地方政府，沒有適應新媒體帶來的改變，並仍以比較傳統的手段與方法去應對，處理要求更多權利的呼聲。

夏明教授覺得出現上述原因是體制造成的。

權勢階層的世紀末心態也在阻礙中國的進步

目前中國最上層的領導還是“文革”一代的人，但是從部長或部長以下的人都是從七七，七八年恢復高考選拔的這批人才。他說，從他們的資歷和知識結構來說，他們應該是有能力，並能夠比較好地跟新媒體或老百姓，或者跟現代理念去打交道的。

那麼為什麼這一批人還會採用他們前一批或更老的一批人同樣的方式來對待民眾，對民主和自由，採取同樣抵制、敵視和打壓的方式呢？夏教授說，根本的原因不在於他們的知識結構和他們的眼界，以及他們的教育程度，而是在於他們目前所處的權力結構讓他們可以無法無天，可以用權力來為自己謀利。

他說，當這些新人進入到政府體制後，看到上面的人也是毫

無民主意識地在行使權力，同時可以用權力為自己貪腐，中飽私囊。下面的這些領導人，基本上也是喪失了政治責任和政治道德，也在中飽私囊。所有這些形成了上上下下都是只顧自己的利益，而不顧國家利益和民族的利益，尤其是民眾的利益。

夏明教授說，在這種情況下，當老百姓需要保護自己的權益，捍衛自己的利益時，比如涉及到房屋搬遷、土地開發、醫保以及銀行存款等利益時，這些政府就變得非常的窮凶極惡，去跟老百姓爭利。所以，夏明教授認為，這裡面的問題不在於到底是上層的問題還是下層的問題，他覺得最根本的問題還在於大家都有一種世紀末的心態，現在該撈的就撈，不撈就沒有機會了，同時一個根本的原因還是政治的大結構使得所有的人都採取同樣的一種心態和同樣一種行為模式。所以夏明教授認為，最根本的原因還是權力及目前的運作機制出了問題。

第三章：老路、邪路和新路



3.1 中國民主化的瓶頸 (2012.10.12)

在海外有幸享受央視的國際頻道，觀看了《民主之瀾》的歷史電視連續劇。從中共與民盟合作，共同對付蔣家的“一黨獨裁”，我們看到中共在把民主當旗幟時，民主理論運用得相當熟練。早在1945年，毛澤東在《答路透社記者甘貝爾問》時，代表中共界定了“自由民主的中國”的內涵。他說道：“‘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見《毛澤東文集》第四卷，第27頁）

搶占民主政治制高點

今天晃眼六十甲子已過幾載，“自由民主的中國”卻仍是中共進京趕考未完成的考題。在經歷了波浪式的起起伏伏後，中國的政治發展而今似乎又要邁步從頭越，因為，我們已聽到了來自民間的強勁的民主呼喊，而以專政為榮的執政黨似乎也正在搶占

民主政治的制高點。

在十八大召開、領導交接班前夕，附屬於黨報的《人民論壇》雜誌近來發表了國防大學教授公方彬的《新政治觀：創新點與突破口》一文。該文似乎有許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例如，作者說，現今“政治體制改革未能跟上時代的要求，”“要實現馬克思主義的第三次飛躍，保證中華民族崛起於世界，保證社會主義煥發青春和活力，出路在民主政治，支點在確立新政治觀。”作者明確把“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等同起來。

作者在解釋為何中國沒有邁出民主政治的步伐時，確實費盡了心思，但也深藏玄機。首先作者解釋道，政治體制改革遲遲未上路，既非由於“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也不是“緣於執政黨出現精神懈怠，缺少必要的勇氣和改革熱情。”作者寫道：“對於一個沒有自己利益且由先進分子組成的政黨，其存在的理由和強大號召力就來自反對國民黨不民主，取得勝利也是因為堅持了民主。”弦外之音是，中共“由先進分子組成”，“沒有自己利益”，所以“既得利益集團”無從談起。而且，中共“存在的理由”和強大的根源來自於反專制、爭民主。中共成了民主的先鋒隊。

民主化的困境

那麼，中國民主化的困境又因何而起呢？該作者給出了這樣的答案：“我們因民主而產生和發展，卻又因民主建設滯後導致矛盾叢生，為什麼？不是懼怕民主，而是很大程度上緣於理論準備不足。沒有科學理論作指導，就不能保證正確的改革路徑。經濟體制改革做錯了可以再選擇，政治體制改革或民主政治走錯了路幾乎沒有補救的可能。”所以，作者想告訴國人，“當前理論準備不足”，“政治體制改革或民主政治”會走錯路，而且，一旦走上錯路，“幾乎沒有補救的可能”。那麼，選擇就很清楚了：

民主政治還只能停留在“理論探索和準備”階段，中國人還只能“務虛”，不能務實。民主實踐的大門還不能開啟。

兩個排除、一個警告，作者在中國政治面臨突變的關鍵時刻，給出了一個非常保守的藥方。且不說“民主政治走錯了路”，將民主政治分為“對”、“錯”兩條路，本身就有問題。其目的是來混淆“民主”和“專制”對、錯兩條路。如再說“民主政治走錯了路幾乎沒有補救的可能”，就更是把對專制政治“補救改錯”的民主政治說成前途未卜，而否認了民主政治作為開放的體系，有通過言論自由、定期選舉、權力制衡、利益集團和政黨多元競爭來不斷糾錯改正的能力。

如果作者要說“當前理論準備不足”，“重點在於尚未確立起現代政治觀或曰新政治觀，”也並非全無道理。中國民主化的最大理論挑戰在於，中共的統治集團不斷從毛澤東曾經搶占過的理論制高點上退卻，最後龜縮到“三個有機統一”、“四項基本原則”和“五個不搞”的教條裡。這是執政黨在民主政治上表現出的最大的理論貧困。

例如，當中共的官方御用文人把中國的民主建設概括為“人民當家作主、堅持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三者的有機和諧統一時，他們根本沒有意識到，他們在堅守一個“三元悖論”：如果黨的領導成為一項憲法賦予給中共的“特權”，它首先就破壞了“依法治國”，因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沒有任何人和機構可以超越於法律之上。如果中共統治中國人民是一項特權，人民也就不可能當家作主。其實，“四項基本原則”和“五個不搞”都是在保證中共統治的特權不受認可、刷新和程序論證的。它們都是在用歷史的邏輯來論證，“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一次成功可以否決世世代代的“選票箱裡出政權”。中共領導層，尤其從鄧小平到胡錦濤和吳邦國，沒有一點點民主和法治意識，他們的民主理論準備不足，昭然若揭。

理論不足？民眾素質太低？

但是否整個中國也是民主理論準備不足呢？首先，在黨內，我們可以看到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的理論準備。在趙紫陽任總書記時中共十三大的《政治報告》就明確提出了“黨政分開”、“政企分開”、“權力下放”、“建立社會協商機制”等措施。儘管鄧小平在“六·四”鎮壓後還說過，該《政治報告》一個字不能動，但事實上整個報告被束之高閣。記得我在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讀研究生時，現今的中共書記處書記王滬寧還是復旦的一個年輕教師。他和我的導師分別承擔了十三大報告分報告《黨政分開》和《權力下放》的寫作，我也有幸參與其中。王滬寧的經歷也算是四分之一世紀前的理論準備吧！

更大的理論突破還來自於擔任國務院總理和中共總書記長達十年之久的趙紫陽。在他因拒絕對學生和市民開槍而被軟禁期間，這位前中共領導人經過認真閱讀思考，演變成為了一個民主主義者，支持議會民主和多黨競爭。對於中國政治前景，他曾無不擔憂地說過：“中國現在不培植反對黨，中共一旦垮了，國內會大亂的。如果開放黨禁，有強大反對黨起來，共產黨下，反對黨上去，局面還能維持。”（見：杜導正，《趙紫陽還說過什麼？》，第175-178）由此可見，中共前領導人已經在民主理論上有了突破。

在民間，對民主理論和轉型理論的研究更是碩果累累。劉曉波的《零八憲章》運動是一個典範。蔡定劍、李凡、曹思源、王力雄、榮敬本、胡星斗等學者也都有諸多理論貢獻。再說，民主思想源遠流長持續幾千年，1991年後全球一大半的國家和人群都選擇了民主體制作為根本的治理方式，民主的車輪無須我們再發明。就在2012年一年裡，香港的晨鍾書局就連續推出三本論述中國民主和民主化的專著：王天成的《大轉型：中國民主化戰略研究框架》、張博樹的《中國憲政改革可行性研究報告》和我的《政

治維納斯：從一無所有到中國民主》。

所以，中國民主化的瓶頸，既非是老百姓的文化素質和教育程度過低造成的（對此蔡定劍有實證分析，並因此被趕出人大辦公廳），也非理論準備不足造成的。它是由中國共產黨蛻變為一個既得利益集團後拒絕接受民主理論、堅決阻止人民實踐民主而造成的。如果中共在未執政前把民主作為攻蔣之矛，在統治六十多年後又把它作為防民之盾，而從未真正把它交給人民踐行，政治改革就必然淪為“政治忽悠”。中共十八大即將召開，我們必須仔細聽其言，觀其行。

3.2 再思政改新加坡模式 ——論學習新加坡經驗之一 (2012.11.02)

1992 年春天，鄧小平的“南巡”講話結束了“六·四”屠殺後中國死寂保守的政、經局面，開啟了新的一輪改革開放。鄧小平在巡視南方各地，尤其是深圳特區的途中，鼓勵“廣東二十年趕上亞洲‘四小龍’，不僅經濟要上去，社會秩序、社會風氣也要搞好，兩個文明建設都要超過他們，這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同時他還明確指出，“新加坡的社會秩序算是好的，他們管得嚴，我們應當借鑑他們的經驗，而且比他們管得更好。”他希望中國能在內地再造幾個新加坡，再造幾個香港。

整整二十年過去了，廣東未能完成任務，趕上“四小龍”。更令人沮喪的是，不僅內地未能再造幾個香港，而香港反倒越來越內地化，日漸失去原有的法治環境和自由創新活力。香港的民眾為此怨聲載道，走上街頭捍衛香港的獨特地位。

再次炒熱新加坡

今天正值中共十八大召開之際，有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即

將掌權的新的領導班子有心再度學習新加坡模式，為中國變革找出條活路。例如，習近平掌握下的中央黨校刊物《學習時報》發表署名文章，《新加坡建設服務型政府的經驗》，介紹新加坡執政黨政改經驗。海外媒體更直接猜測，2010年夏天習近平與李光耀在北戴河會面，同年十一月他又訪問新加坡，隨後又有劉亞洲率團考察該國為下一步改革建言，諸多事件表明，十八大後新加坡模式或將成為中共的學習對象。

如果說，二十年前，一位老人為中國指出了一條路，今天它又回到了原點，這樣的循環往復是值得解讀的。首先，它說明第一輪學習新加坡基本上失敗了。其次，它也說明，所謂的“北京共識”和“中國模式”正在被悄悄地放棄，或至少被冷淡。最後它還說明，過去強調所謂具有“中國特色”的“內源型發展”模式可能會再度搖擺到“外向型發展”模式，一個陶醉於“千年盛世”的自大國家又會再度強調它的開放心態和學習能力。

但“學習新加坡”二十年後老調重彈更多地提出了許多問題。首先，學習新加坡的目標定位是什麼？鄧和習二十年相隔的學習新加坡熱是否有相同的目標定位？第二，為什麼第一輪模仿未能成功？失敗的原因在哪裡？第三，從李光耀到李顯龍，新加坡模式是否還是凝固不變的？如果新加坡模式在過去二十年有了許多自我調適，原因何在？對中國的模仿又有何影響？最後，新加坡模式的精髓是什麼？它的弊端有何在？中國如何避免拾人牙慧？

這裡我們集中在前兩個問題上，後面兩個問題下兩篇再論。

向新加坡學什麼？

二十年前，鄧小平的目標定位鎖定在經濟發展、社會秩序和社會風氣三個主要方面。而這三個方面又緊緊服務於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在鄧小平的號召後，江澤民訪問了新加坡，向李光耀和

其他領導人討教新加坡成功的秘訣，尤其它是如何成功地樹立外國投資者的信心，吸引外資的。李瑞環在天津任職期間就表現出對新加坡的興趣。北京市的副市長徐惟誠也造訪新加坡，考察它的“精神文明建設”。蘇州和天津都相應建立了與新加坡合作的工業園區，以作試驗田來引進新加坡經驗。

毫無疑問，在過去的二十年裡，中國實現了“經濟增長”，人均國民總產值翻了三番多，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經濟的“增長”並未完全轉換為“發展”，例如，生態環境的破壞、貧富分化的加劇、家庭消費和農村消費在總體消費中的比例下降，等等，反映出民眾生活質量的下降。社會秩序和社會風氣惡化更是不爭的事實。這些問題帶來了社會總體的失序和危機，並引發了中國共產黨面臨的空前的合法性危機。面對嚴峻的挑戰，新任的中共領導人更把新加坡模式具體到人民行動黨是如何長期保持其執政地位的。直白說來，今天的領導人要學的是如何建立經濟繁榮下的彈性專制體系。迄今為止，還看不出兩輪模仿有什麼質的差別。

李光耀在他的兩卷回憶錄中寫道，“無論是公共秩序、個人安全或是經濟和社會的進步和繁榮，都不是從天而降的，這一切都是一個誠實和有效率的政府專心致志，孜孜不倦的努力所換來的成果。”在他看來，新加坡模式成功的祕密在於維持一個廉潔的官僚體制、一個高效能的政府和維護基本的社會公正。而中國第一輪模仿失敗正是從官員貪腐成風、官僚體制不廉潔開始的。由此，權貴既得利益集團形成，忽略百姓民生和社會公正，引發民怨和群體性事件。上下矛盾夾擊，政府效能成為犧牲品。一個腐敗無能的政府面對沸騰的民怨只好越來越倚重暴力來維穩了。中共的治理體系因此墮入了惡性循環。

中共如何能跳出治理的惡道？不斷重複“堅持黨的領導”和“加強執政黨的地位”並非解救之道，而只是反映出掌權者的貪瞋執

著。受著執著之心的驅使，執政的共產黨難免不強化攫取和控制的手法，加害獨裁和專制於民眾之身。相反，世界民主化進程表明，一個能收回攫取之鐵手、成全民眾自治和自由的政權反而能收復人心、得天下。新加坡又是一個好例子，可以啟發和幫助中共悟得“捨得”之道。要完全明白其中緣由，且聽下回分解。

3.3 新加坡模式和中國的轉基因政改 ——論學習新加坡經驗之二 (2012.11.09)

新加坡的上上下下已經習慣接受自己的國家是世界地圖上的“一個小紅點”。中國的上上下下也因此誤以為，學習新加坡模式是一件簡單容易的事。在許多中國人看來，由於同文同種，新加坡就是大陸、台灣和香港之外的第四個中國。其實，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比中國更誤解“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李光耀先生了。

新加坡的大前提

在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眼裡，他認同自己是東南亞人，是新加坡人，但不是中國人。在談到中國時，李光耀如是說：“當然我們要說友誼。我們講相近的文化，但其實我們的文化不同。我們更西方化。”（《硬道理》Hard Truths，第 258 頁）他又說：“我們是華人嗎？從族裔上來說，是的。我們能夠和中國人坐下來，真正感到我們是他們的一部分嗎？不可能。就因為你講中文？不。存在你的腦子裡的各項大前提就不同。”（同上，第 332 頁）

那麼，李光耀所說的“大前提”又是哪些呢？為什麼李光耀

和新加坡人會形成與中國人不同的“大前提”呢？這就是李光耀要說的不同的經歷、不同的立場和不同的世界觀。

具體說來，李光耀的世界觀和他作為“國父”想塑造出的新加坡人世界觀受到了下列思想淵源的影響：中華的儒家傳統和西方的理性主義，英國的紳士道和日本的武士道，第三世界的民族主義和英國工黨費邊社會主義，美國國際關係理論中的現實主義和日本經濟發展提供的發展型國家理論。經歷了多種文化模式、多種政治治理、多種政治和經濟發展階段的李光耀，根植於達爾文的社會進化論，並摻雜了進化論生物學，發展出一套獨特的思維模式。新加坡的國家利益、東南亞整合提供的東盟政治平台、中國提供的現實利益機會、美國的國防軍事保護，讓新加坡既反共、又親華，既靠美、又反美，既崇日、又恨日，既內心懼怕馬來西亞和印尼、又口頭上蔑視他們。總之，新加坡對所有曾經哺乳過它的國家都有一種俄狄浦斯情結，但它卻又始終從未放棄開放心態、國際主義和全球主義的價值觀。

李光耀非常清楚，新加坡的體制源於英國。他說，“我們從英國人制定的憲法出發，並作了許多必要的修訂，以適應我們自己。我們保留了主要特點，第一，官僚、議會和政治領導的分離。第二，每五年自由投票。所以無論任何政黨上台，它都有一個繼續運作的制度。”（*Hard Truths*，第49頁）也正因為如此，李光耀允許定期選舉的存在，承認反對黨的合法性，倡導非暴力手段推進政治演進，並願意接受自己的黨派下台、交權給獲得人民信任的反對黨。而所有這些，都是中國共產黨無法接受的。

橘越淮而為枳

如果中共真想要學習新加坡，就必須先弄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道理，以及基因的分裂和病變可能帶來“播下龍種，

收穫跳蚤”的悲劇。有一位基因生物學家曾向我解釋過細胞的癌變，把它描述為基因的信息傳遞失控導致裂變出的細胞失控和無序生長。其實，蘇聯和中國推行的馬克思 - 列寧 - 斯大林主義就是社會主義運動癌變的結果。癌變發生時期是十九世紀第一和第二國際內部的分裂。本來社會主義是倡導社會公平和合作、民主和工人自治的。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聖西門、歐文和傅立葉等人主張通過教育和公社實驗來轉變各階級進入社會主義。到了十九世紀後期，“費邊社”在英國成立，蕭伯納等著名知識分子加入，後來演變成工黨；德國的拉塞爾等人組成社會工人黨，後來演變為社會民主黨。他們匯聚形成西歐 20 世紀的社會民主黨思潮，主張通過非暴力的議會選舉道路來奪取政權、實現社會主義。

與社會民主黨的所謂“修正主義”爭鋒相對，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和“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等概念，演繹出反民主的共產主義思潮。到了列寧時期，“無產階級專政”繼續演變成為“無產階級先鋒隊”代表人民行使的“共產黨專政”。社會主義到了中國，又繼續演變成以農民為社會基礎的共產黨專政。現在，執政的共產黨已經基本與自己工農的階級基礎脫鉤，成了一個自為和自私的逐利集團和權貴新階級。當它的所謂合法性完全是由“階級鬥爭”和“暴力專政”來支撐時，非暴力革命的道路被堵死，暴力革命成為政治演進唯一的選擇。

新加坡的大課

正如李光耀在總結民主的優點時說：“它的最大的吸引人的地方是，你可以不用暴力更換政府。在中國，最大的弊端是你只能通過起義來更換政權。這裡，如果我們已不適合掌權，我們可以被選掉。”（Hard Truths, 第 54 頁）所以，中共要想走上新加坡模式，就必須認清李光耀曾追隨的費邊社會主義和毛澤東的農

民共產黨專政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分道揚鑣。但中國的官方學者認識不到這一點，卻以為新加坡模式就是把“舊鞋縫縫補補再撐撐大”，穿起來還更舒服。中共也可以照搬。

儘管李光耀堅持“別無選擇”的政治說教（西方國家稱之為TINA理論：There is no alternative），他維持一黨獨大的手段也不乏厚黑的地方，但他主要還是通過網羅天下英才、壟斷創新能力和提供最佳政策選擇來縮小反對黨的生存空間。在政治鬥爭層面上，他還基本能恪守“我活你也活”的政治倫理。但今天中共維持其執政地位的做法根本是倚重暴力，維繫一個“劣幣驅逐良幣”的逆向淘汰機制，通過剝奪生命和自由來絞殺異議政治精英，通過壟斷媒體來阻止政策方案的辯論和選擇，從而自圓其說：“只有共產黨，才有新中國”。

由此可見，新加坡國家雖小，卻給中共上了一堂深刻的大課。中共要避免新一輪的“學習新加坡”二十年後又成為笑柄，就必須痛下決心，刮骨療毒，把癌變基因徹底剝離。而這個癌變基因就是“階級鬥爭理論”和由此衍生出的暴力統治。一旦擁抱暴力，中國共產黨就必然不斷地製造恐懼、培育仇視，然後再用謊言來使之合理化。現在中共的十八大提出了要繼續和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建立社會對話機制和協商民主制度。它的政改要真有前途，就不得不是一項轉基因政治工程。

3.4 “天下為私”還是“天下為公”？ ——論學習新加坡經驗之三 (2012.11.17)

中國領導人熱衷於新加坡經驗。但他們必需認清，新加坡的經驗可分為四類：第一，新加坡的成功和鄰國（中國包括在內）的失敗為同一硬幣的兩面。也可以說，“中國不發達，是因為新加坡發達；新加坡發達，是因為中國不發達。”舉例來說，新加坡之所以可以從中國引得大量的人才和資金，正是因為中國法制、廉政、選才用才和教育落後的結果。尤其是八九年北京“六·四”屠城後，20年里新加坡乘機撈了一把。第二，新加坡的思維誤區和失敗的教訓。例如，新加坡重城建發展、輕文物保護，用在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國顯然會是一場文化災難。好在新加坡的古蹟本來價值不高、數量不多。但當下北京城市景觀越來越像新加坡，就不能不引人深思。第三，新加坡鮮明的成功經驗。例如，在前面兩篇文章中都已論述的官員廉潔、政府效能，政治憲政繼承英美體系、社會價值保守儒家，經濟發展擁抱全球化，等等。

家族世襲還是精英循環？

本篇要著重論述第四類經驗：法規、制度和精神融為一體的

全息經驗。如果想模仿和移植此類經驗，就必須認清制度表面價值和它下面蘊含的精神構成一個整體系統。奉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實用主義和拿來主義的簡單方法，勢必導致東施效顰的尷尬。在新加坡經驗裡，這類容易麻痺、誘惑和誤導模仿者的例子有不少。例如，中共“太子黨”在十八大上高調接班，容易被人們拿它與李光耀與李顯龍父子間的權力繼承進行比對。中共政權從毛鄧、江李（二位都還算有高幹的“紅色血統”）經平民出生的胡溫，最後轉手到“太子黨”（習近平和輔佐他的張德江、俞正聲和王岐山都是代表）。在有的中國人看來，這一權力轉移，難道不就是從李光耀退居二線後，經過吳作棟中轉，然後完璧歸趙，大權回到李顯龍嗎？新加坡模式似乎給十八大的“太子黨”接班提供了一個方便的佐證，也強化了中共學習新加坡的動力。

李光耀的政治思維里有明確的“賢人政治”和“英才治國”的觀點。但是，李光耀在多個場合明確表示，他無意在新加坡建立“李氏王朝”。他毫不掩飾地說到自己的兒子、現任總理李顯龍：

“我們早就知道，他有絕頂天賦。他獲得了我們夫妻雙方 DNA 的最佳組合。”（《硬道理》，第 419 頁）他還如數家珍，談到了兒子在語言、數學、音樂等方面的特長，他的豐富政、經、軍的經歷和聰明的頭腦：“你給我拿出一個能做好所有這些的人來！如果我不是總理，他自己會更早成功。我一直這樣說。”（《硬道理》第 429 頁）

李光耀信奉一套“生物基因的進化”理論，堅信“資質來自遺傳”，似乎在為“太子黨”繼承父業、執掌國家大權辯護。李光耀在他的《回憶錄，1965-2000》（第 159 頁）中寫道：“一個人性格習性的塑造，近 80% 是先天遺傳的，大約 20% 則取決於後天的栽培。”他還寫道，“孩子的能力介於雙親之間，少數會超越或不及他們的父母，因此，大學畢業的男性娶教育水平較低的女性，等於沒有充分製造讓孩子能夠升上大學的條件。我呼籲他

們娶教育程度相當的女性為妻，也鼓勵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生育兩個或更多子女。”

龍生龍，鳳生鳳？

在這種理論的指導下，李光耀的《硬道理》（Hard Truths）透露他還觀察到中共的領導人經過幾個世紀的“選擇性的培育”，受到琴棋書畫各種教育。他說，“注意觀察（中國的）領導人，觀察他們的子女，他們與誰嫁娶。他們已經出類拔萃，正在造就一群新精英。”（第 192 頁）他還說：“如果你像我一樣地觀察，江澤民的兒子，李鵬的兒子，我最近剛遇到的朱鎔基的兒子，都是頂級的。”“就像每一個社會，最後都如此，這是一個自然過程。”（第 196 頁）

我們可以與李光耀進行如下辯論：究竟是素質能力帶來權力地位，還是權力地位造就素質能力？前一個“自然過程”和後一個“社會過程”究竟孰對孰錯？“天性”（Nature）和“培養”（Nurture）是否是 80% 對 20% 的關係？等等。李光耀喜歡向人們提醒，婚戀時不要忘記費邊社會主義者蕭伯納的告誡：如果一個天才作家娶了一個漂亮的舞女，生下的孩子承繼了父親的長相和母親的智商，那將是何等的災難。但他卻忘掉了，蕭伯納的名著《窈窕淑女》講的卻是一個教授如何把一個倫敦底層的賣花女教育成一位淑女，並最終向她求愛，喜結良緣的故事。顯而易見，李光耀信奉的遺傳生物學和優生學即便在蕭伯納看來也是有問題的。到了八十年代後，李光耀信奉的經典孟德爾遺傳學更進一步遭遇“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的挑戰。表觀遺傳學認為，人們是歷史的產物，父母及上輩個人生活方式和社會大環境對基因選擇和轉化施加著極大的影響。素質能力與權力地位的關係顯然不是單向而是動態互應的。

李光耀複雜甚至相互矛盾的多重思想是以實用主義統領起來的。辨析、總結和討論他的思想體系及其缺陷，無非是要去蕪存菁，幫助人們學得新加坡發展模式的精義。古人說。唯有上智與下愚而不移。智者李光耀一旦接受一種理論，就很難放棄它，去重新接受一個新理論。他的基因遺傳學的社會學解讀既無科學論證，也無歷史根據。李光耀再用它們去間接論證權力父子相傳的合理性，就更破壞了現代民主政治的前提。但是我們不能因此否認，李光耀以他的言行向所有的國家提出了一項寶貴的忠告：選拔英才、培養貴族，這才是現代治理之道。

我們相信李光耀的判斷，李顯龍以自身的本事，可以在任何體制下獲得成功。但很難說，李顯龍從劍橋到哈佛的教育，以及李光耀本人精心的培育只起到了 20% 的作用。即便只有 20%，在現代社會的競爭環境下，往往毫釐之差決定勝負，社會條件對個人成功的製約也是不可估量的。所以，任何公平的社會體制，都應該像一個慈父給每一個兒女精心的培育和平等的機會。與世界各國相比，新加坡在教育上已經做得非常好。就李光耀家庭來說，他和妻子也做得很卓越，李顯龍就是“三代造就貴族”的最好例證。

歷史只有一項選項？

無可否認，李家為新加坡貢獻了治國良才。但他的兒子是否就是人民“唯一的選擇”，這一結論還需要有競爭性的民主選舉來提供合法性論證。不幸的是，李光耀在賦權人民、提升自由上存在有不足，給新加坡和全世界的批評者提供了更多的想像和發揮的空間，直接對李顯龍的能力和法統提出懷疑。可見，在現代社會，精英治國的合法性不在於精英能力本身，而來自於自由選舉這個程序，由此而產生出非世襲精英，以及伴生的人民的心悅誠服。

就像接班人的選擇，同樣道理，政策選擇、制度選擇也並非只是“獨此一家、別無分店”。西方學界所說的“TINA (There is no alternative) 政治”實質上是專制政治製造的“自我實現的預言”，在科學主義、歷史決定論和自然法則等掩蓋下，它以一種邏輯循環的手法為自身尋求合法性，剝奪了公民通過自主參與、對不確定的未來進行多元選擇的自由和權利。這樣私心的存在揭示了新加坡的政治缺陷。中共在政治繼承上搞內定接班、等額選舉，在指導思想上不搞思想多元，在政黨制度上反對多黨競爭，在發展道路上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是唯一的正確道路”，也陷入了同樣的怪圈。

但更令人擔憂的是，中國和新加坡由於不同原因而結成了“抵制西方價值觀”的共同聯盟，中、新兩國互相學習的過程就極有可能偏離其取長補短、見賢思齊的根本宗旨，而淪為兩國相互鬥狠、壯膽的心理機制，面對西方國家，反倒強化各自的保守政策。我們都知道，當阿 Q 和王胡不明善惡美丑時，他們會以羨慕的眼光看待對方的蝨子，並以在自己身上找到了更多的蝨子為榮耀。這可能是中國學習新加坡的最大副作用。

3.5 “弱主惡政” 與民主轉型 (2012.11.22)

中共十八大終於落下帷幕，習、李開始全面接班。海內外期盼政改又開始升溫。新人入閣，給一點“蜜月期”並不為過。再說，即便習、李還未有實質性的言論和作為可以激活我們的樂觀想像，“疑點利益”的原則也該適用於他們。我們大可不必幽暗心理太重，現在就急下斷言，所謂十八大談論的政改必將演成《等待戈多》式的荒誕劇。但剛經歷過“高期盼、大失望”的胡、溫十年，從“胡溫新政”落得個“弱主惡政”，大家有點提防和心理準備也可避免被再次忽悠。所以我們有必要問一個問題：習、李之下，中國人能否過上不僅有飯吃、有衣穿，還要有精神自由和政治民主的好日子？

強人下的開明專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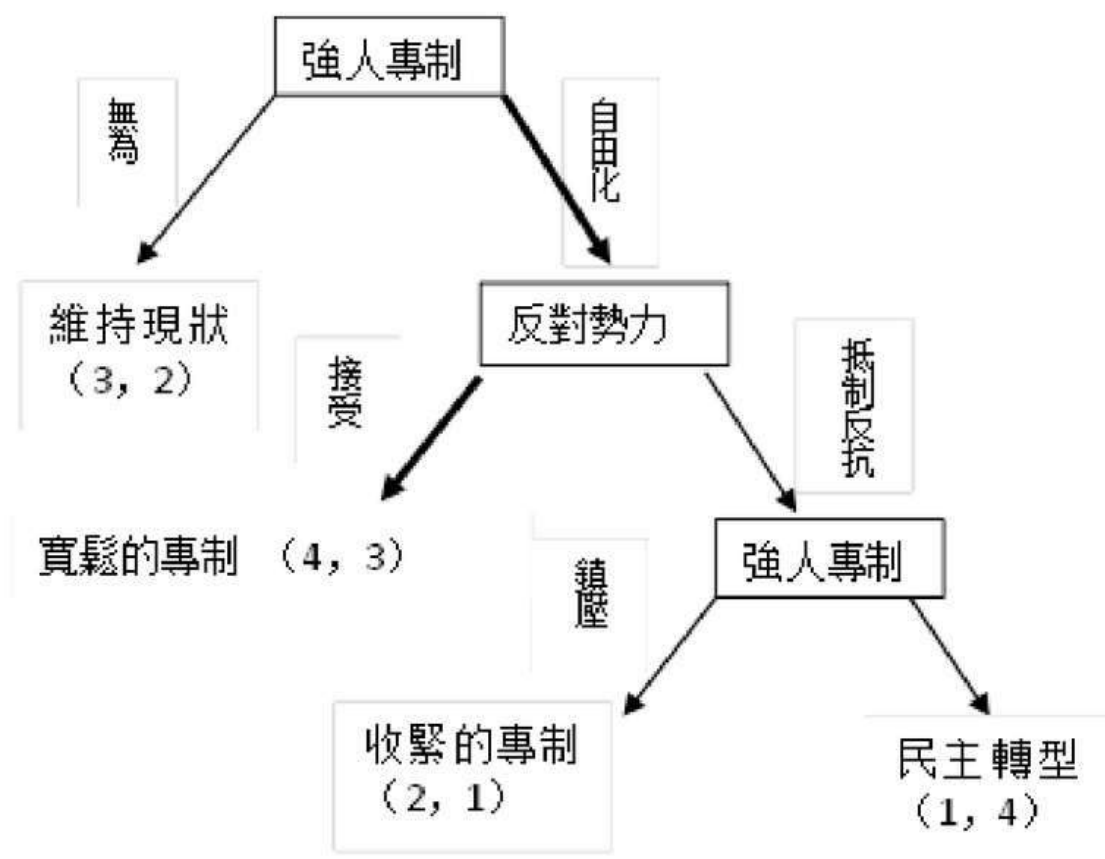
胡、溫的“弱主惡政”的局面與鄧小平強人下的“開明專制”（所謂“硬國家、軟經濟”）形成一對矛盾。其實，運用理性選擇的理論，我們很容易解釋這一矛盾，同時還能證明，未來習、李任期，出現反民主的專制傾向不能排除；在完全的理性原則支配下，

要指望專制者主動進行民主轉型也幾乎是與虎謀皮。

民主轉型的博弈第一種可能發生在強人專制政權下。以鄧小平時期為例，博弈雙方是“強人政權”和“弱勢反對勢力”。從一個有自信的政治強人視角來看，為了持續統治下去，適度的自由化並不會導致翻船，適當給人民鬆綁會一舉兩得。“寬鬆的專制”局面就會隨之出現。對鄧小平來說，選項的優先秩序是“寬鬆的專制”（改革的八十年代和“南巡”後的中國）優於“維持現狀”（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國），優於“收緊的專制”（八九鎮壓後到 92 “南巡”的中國），優於“民主轉型”。四項選擇分別可以用 $4>3>2>1$ 來表示利益優化的多寡。不難理解，我們看到鄧小平治理的目標定位是“寬鬆的專制”，他的“改革開放”和“南巡”都服務於這樣的目標。

從“弱勢反對勢力”的角度來看，選項的優先秩序應該是：“民主轉型”優於“寬鬆的專制”，優於“維持現狀”，優於“收緊的專制”。也可以用數字來表示： $4>3>2>1$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下面的選項圖表 1（每項選擇後面的第一個數字是政權的選擇，第二個是反對勢力的選擇）。其中“寬鬆的專制”是雙方都願接受的主導型策略。

從專制強人的角度來看，如果政權本身有足夠的自信認定反對力量沒有能力藉機推動民主轉型，它就會推行有限的自由化，所以會出現朝野雙方共贏的“寬鬆的專制”局面。例如，儘管 1979 年前後有“民主牆”運動，以後在八十年代不斷出現學潮，鄧小平都還能支持胡（耀邦）、趙（紫陽）改革。直至發展到“八九民運”，鄧小平才最終下定決心用“鐵血”政策來彈壓反對派，回歸到“收緊的專制”，並為此付出代價，在國內外喪失聲望。



圖表 1：專制強人掌控下的博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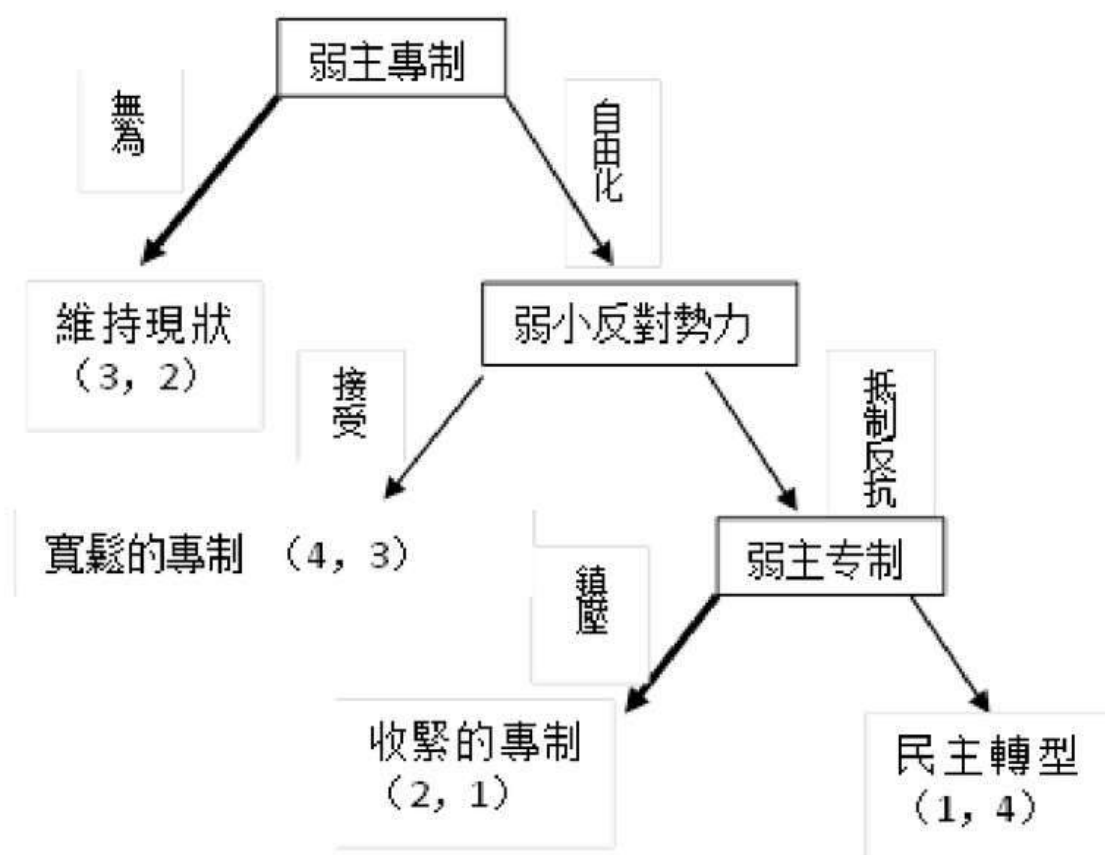
弱主收網緊網

江澤民即位後享受了“殺掉 20 萬，穩定 20 年”的好處，可以逐漸把中國從“收緊的專制”向“寬鬆的專制”調試。但“法輪功”趁此時機，試圖碰撞底線，把政權往更寬鬆的方向推一步，結果引起江澤民收網緊網。因為過去三十年間，中國民間力量始終處於微弱狀態，未能滋養出強勁的反對勢力，所以，中國的專制主義面對民間的抵抗和沈寂，可以在“放”和“收”之間運作自如，中國社會也在“亂”和“死”之間徘徊。

隨著“強人政治”進入到“弱主政治”（比如說從鄧小平演進到胡錦濤），由於反對力量的強弱不同，弱主的博弈戰略可能分兩套：第一，在反對勢力弱小的情況下，弱主的選項優先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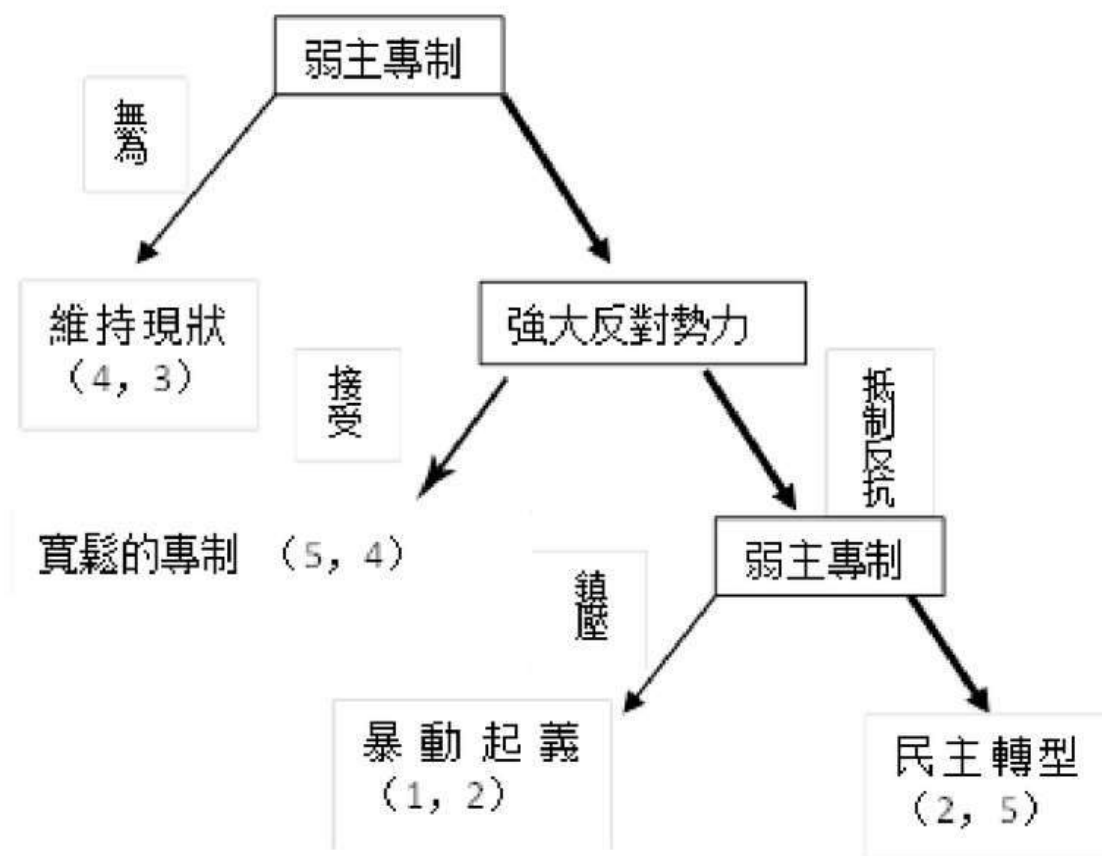
以及弱勢反對派的選擇同上述“強人專制”下的博弈基本相似（見圖表 2）。弱主可能進行部分的自由化，但反對勢力可能想往前走得更遠，弱主擔心失控，可能反而會放棄部分自由化，龜縮到“收緊的專制”選項上去，以避免喪失政權。這解釋了為什麼胡溫起初擺出了“新政”的架勢，但很快擔心失控翻船（尤其是劉曉波的《零八憲章》後），走到“維穩為上”，反而強化了專制政治。

第二，如果反對勢力強大，則可能出現另外一種局面，那就是強大的反對派可以抵制回覆到收緊的專制方向，組織抵抗和民主革命，提升“收緊的專制”必須付出的高昂代價（例如，喪失聲望和生命）。民主轉型順利，可以避免暴動起義、朝野雙方網破魚死的破壞性結局。在這樣的前提下，弱主的選項秩序是（> 大於）：“寬鬆的專制”（5）> “維持現狀”（4）> “收緊的專制”（3）> “民主轉型”（2）> “暴動起義”（1）。而反對派的選項



圖表 2：弱主專制下與弱小反對派的博弈

優先秩序則為：“民主轉型”（5）>“寬鬆的專制”（4）>“維持現狀”（3）>“暴動起義”（2）>“收緊的專制”（1）。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下列圖表 3。其中“民主轉型”成為朝野雙方都願意接受的方案，以避免“暴動起義”帶來的玉石俱焚的局面。



圖表 3：弱主專制下與強大反對派的博弈

在圖 3 的情況下，弱主清楚地知道，面對強大的反對勢力，任何自由化的讓步都可能出現不可收拾的失控局面，最後走向民主轉型。作為理性決策，弱主不可能推行自由化，而最可能的主導策略是維持現狀。這也就是中國在胡、溫主政期間的不作為的局面。對於新接班的的習近平來說，他可以得過且過，繼續“抱著定時炸彈玩擊鼓傳花”的遊戲。他也可以加大維穩力度，增加對社會的鎮壓，走向“收緊的專制”。對於這種可能，已有有識之士警告國人提防“法西斯主義”傾向。

如果習近平不作為，並不能因此可以減少民變的發生，他極有可能最終淪為“蘇哈托第二”、“薩達姆第二”或“穆巴拉克第二”。如果他尋求反動，刺激矛盾，激發革命，他可能落得“齊奧塞斯庫第二”或“卡扎菲第二”的結局。但歷史也給了習近平一個成為偉人的機會：如果他有勇氣、遠見、責任和智慧，順應民主潮流，避免塗炭生靈，成全中國民主化轉型，他就一定能超越蔣經國，成為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偉人，甚至兩千年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偉人。

如何破局？

如何破局開啟政治改革的進程？這是當下中國思想界論辯的大問題。著名歷史學家吳思先生提出了“特赦交易”的觀點，試圖通過大赦、特赦貪官來獲得他們在政治體制改革上的中立，從而減少改革阻力，最終實現民主轉型。正如我所論述的三種情況所示，這一建議過於依賴理性。如果有理性的專制者看到最終的結局是專制崩潰，由他親手加上最後一根稻草的可能性小於“一條黑路走到底”。首先，我們必須明白，大赦的實行主體是誰。如果是由現存掌權者（既得利益集團）來考慮和實施大赦，那麼，對貪官來說，繼續維護現政權的穩固就是永久的大赦。所以，政改不可能出現。如果要由反對派單獨或與既得利益集團交易來實施大赦，那麼，大赦就只能是政治變革的內容和結果，而不會成為它的前提。

那麼，最終啟動政治改革的前提條件是什麼呢？其實是不斷成長的強大的反對勢力。中國有沒有反對勢力？反對勢力的力量有多大？李凡在他的《當代中國的自由民權運動》（台灣巨流出版社 2011 年版）一書中計算，中國已有三億（20%）的“積極的公民社會人口”。仔細分析，維權運動、地下教會、法輪功、訪

民團體等都游離出了共產專制體系。《零八憲章》運動、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和組織、維權律師等都明確提出了要推動共產黨政權解體、國家民主轉型。西藏、新疆、台灣和香港也是反對力量的大本營。又據李凡的估算，在未來的十年間，中國逃離國家控制和依附地位的公民社會人口可達到總人口的 40%。可以說，靜悄悄的公民革命正在把中國推向巨變的臨界點。而臨界點的突破，民主轉型的發生往往會以各種意外事件為導火線的。

意外和犯錯的價值

非理性因素引發民主化，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在清朝末年，國人很難預料到四川的“保路運動”和武昌的士兵譁變會牽發清朝的垮台和促成民國的建立。1989 年的中國民主運動也是由胡耀邦的突然去世和北大學生絕食掀起的。波蘭的團結工會之所以通過大選獲得政權，是因為執政的統一工人黨高估自己的實力，以為可以掌控選舉，結果在 100 席的參議院選舉中只獲得一席，團結工會獲得 99 席，而且還贏得開放選舉的 35% 眾議院議席的全部席位。近來的中東“茉莉花革命”更是以突尼斯一小販自焚和“維基解密”的一條突尼斯總統海外存款的消息引起的。

今天的中國，鄧玉嬌事件、烏坎事件、啟東和什邡等事件，王立軍出逃、薄熙來受審，香港遊行，釣魚島衝突，接班問題上的中共內訌，藏人的頻繁自焚，新疆維族人反抗，都可能引發中國社會巨變。現在每年以十幾萬次頻率發生的群體性事件也在向朝野雙方提醒，暴動起義可能成為中國不可避免的未來選項。毛澤東在論述革命時說過一句有點道理的話，“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民主革命也不是訂餐吃飯，沒法計劃安排周全。世界民主史既顯示出民主化的全球趨勢，又顯示出民主路徑的多樣化。中國民主化的動力和突破口恐怕也只會來源於社會結構性張力壓力不均、

社會矛盾衝突失控、經濟危機加劇以及權勢集團內鬥或決策失誤等非理性因素。

民主化過程和道路很難用理性原則來預設和執行。但理性的準備並非毫無價值。其實，加強反對派精英的溝通和對話，培育反對運動人員中的互信和社會資本，增進反對派精英的團結和整合，建立起有效的反對黨，恐怕是中國民主轉型能夠在理性的指引下推進的最重要保障。也只有建立起一個有效的和有合法性的反對黨，反對派才有資格代表民眾決定是否、如何與執政集團談判“大赦交易”。

期盼“青天明君”橫空出世，給我們帶來有自由、有尊嚴的生活，恐怕最終又會落得竹籃打水——場空。相反，如果中國人民繼續推動公民社會的成長，拋棄恐懼，排除私心，雲集聚合成為反對黨，就可以掌握歷史的主動權，有能力抵制中共繼續走專制老路，提防它走新法西斯主義的邪路，強迫它走上自由民主的正路。

3.6 中共將走什麼路？ (2013年11月)

革命後時代的中國政治基本上還處於宮廷政治的層面，所以，權力繼承的最後贏家都有一個共同點：忍而不露，或者說都是能否定自我的忍功大師和機會主義的權術家。在民主的選舉制下，權力繼承前，參與較量的各方都已經拿出了系統的政綱來動員和贏得選民。在中國寡頭選拔制下，新的領導人只能在大權在握的情況下才能露出真本性，拿出系統的政綱和未來藍圖。由此，每一屆中共黨代會的三中全會往往成為新一代領導人集體政治亮相（新當選後有第一次形體亮相）的重要場合。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習近平扮演普京式政治強人，親任“國安會”主任，進一步集大權於一身。

中共高層神經分裂症

中國正在經歷一場意識形態上的大論戰。中國的政治生態被“左”、“右”兩股力量拉扯。這種社會和政治的兩極化趨勢，一方面，是由當今的執政集團及其施行的各種政策造成的；另一方面，在全面接班後的八個月時間裡，習、李試圖左右逢源，給

左右之爭火上加油，更加劇了社會矛盾衝突。在中國面臨大變革的關鍵時刻，習、李吹響的是不定的號角。面對中間地帶的急劇流失，習、李試圖走的維持現狀的所謂“中道”，必然帶來英國前首相撒切爾所描述的情形：你試圖在路中間行走，結果你冒著被左、右兩道快速奔馳的車流撞上的風險。

習、李令人捉摸不定的執政路徑反映出了中共最高層深度的神經分裂症。我們知道，人們的行為是受意識支配的；而產生意志的意識是由生命經歷的重大事件來塑造的。可以說，在習、李和他們的同事中，他們的意識和分析框架立足於兩大支點：“文革十年”和“改革十年”。前者讓中國人經歷了煉獄般的磨難，促成從領導到百姓上上下下形成了“改革、開放”共識。不可否認，“改革十年”是對“文革十年”的否定和對“文革”後中國集體受傷的診療。但習近平和他領導的黨中央不這樣看。無論是所謂的“六十年一條紅線”，還是“不能用一個三十年否認另一個三十年”，反映出的都是一個意識形態分裂症病人的深度問題。

找到習李班子施政的坐標系

習近平和他的班底對“文革”並無刻骨的仇恨，其實很容易理解。當今的領導人基本上都是在“文革”中練出了兔子般的敏感、狐狸般的狡猾和毒蛇般的殘忍。他們善於察言觀色、隱忍克制、投入所好、逢場作戲，時刻帶著假面具，永遠用雙重思維來看待分析問題。不為行動、思想中自我矛盾而臉紅是他們為人為官的最大本事。“文革”對他們來說，永遠是塑造他們人生和世界觀的大課堂。與此相比，至少鄧小平、朱鎔基等領導人還能從“文革”中回憶起親身經歷的痛楚，痛下決心不讓它再來。而習、李一代，留在他們記憶中的恐怕更多的是青春騷動叛逆期的瘋狂，從而養成了施虐—被施虐的雙重快感。

習、李都經歷過、甚至參與過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思想啟蒙、經濟開放和政治改革的黃金十年。據說，在習近平還遠在福建任地方官員時，他總會在周末搭乘福州軍區飛往北京的軍用機，溜回北京，與京城的改革青年們混跡一起，吸收變動時期的新思想，領略大變革時期的激動。習近平還得到去“西天取經”的機會，在美國的愛荷華州住訪過一段時間。很難想像這些經歷不給他帶來深度的思考。舉一個小小的例子，王滬寧在八十年代中期也在愛荷華遊學半年。習、王關係非同一般，王滬寧成為習的替身，陪同彭麗媛外出參加重要活動，不能不說與這些相同的“洋插隊”經歷有關。

中國八十年代的改革十年，在十三大政治報告中達到了頂點。李克強在北大的老師龔祥瑞和在復旦大學任教的王滬寧都不同程度地捲入到十三大報告的起草工作。從他們的著述可以看出，李克強和王滬寧的思想模式都打上了八十年代的烙印。但更重要的是，他們可能都從趙紫陽的失勢中得出了更多的負面教訓，那就是：寧左勿右。據此，我們可以找到習、李班子施政的坐標系：“文革”是X軸，確定了他們可以走多左（低），“十三大政治報告”是Y軸，決定了他們的政策可能走多高。

“邪途老路” VS 十三大基點

從目前中國的政治形勢來看，意識形態領域思想妖孽盛行，專制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大漢族主義、民粹主義、軍國主義、階級鬥爭觀念、仇外心理都很有市場，甚至大行其道。與“改革”的前奏“真理標準討論”相比較，上層建築領域已經墜落到一九七九年以前的水平。對十八屆三中全會來說，這是不祥之兆。在思想觀念大倒退的情況下，我們很難期盼政治和經濟改革能有所突破。

但另一方面，中共能夠找到的最具有合法性的政治經濟改革的藍圖非十三大政治報告莫屬。這是“文革十年”和“改革十年”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通過黨內外上下討論在黨內產生的思想結晶。即便在“八九”屠殺後，鄧小平也堅持，“十三大政治報告一個字也不能改”。如果說鄧小平有什麼政治遺產或鄧小平理論，其核心內容當屬趙紫陽代表中共在十三大上做的政治報告。中外的學者和評論家一致認為，該報告體現的主題思想是“新權威主義”，亦即專制權力下的市場經濟，或者叫“硬國家、軟經濟”。但它也提出了“黨政分開”、“權力下放”、“建立社會協商對話機制”、完善若干民主制度和加強人大建設等多項政治改革目標，試圖為未來中國民主化發展做出鋪墊。

民間曾經流傳，在經過“頂層設計”後，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推出全面的政治、經濟改革方案，結果卻令人失望。

中共建政後走過兩條路徑：以“文革”為典型的左傾階級鬥爭之路和八十年代以“改革”為主體的自由化道路。前者已被證明是一條走不通的邪路，後者卻是被保守勢力堵塞而導致半途而廢的希望之路。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後，我們可以細心觀察，看中共是會走上“邪途老路”，還是會重新踏上十三大的基點，更上一層台階，讓中國有機會邁上通向民主轉型的大路。

附錄 3.1:

西方多黨制與中國一黨執政

(2013.06.16)

澳廣《時事追蹤》樊慧強採訪

中國學者，春秋綜合研究院研究員宋魯鄭在中國共產黨黨刊發表文章《中西制度博弈：行百里者半九十》，讚揚了中國的一黨執政，抨擊了西方的多黨民主選舉制度。

夏明教授說，這次十八大的轉型並不是平穩的，而是充滿血雨腥風的。

宋魯鄭認為，東西方雖然都是從全國選拔人才，但西方卻不能從全國的層面使用人才，政治人才隨政黨共進退。他認為，中國的一黨執政可以非常有效地保持政治獨立性，則完全不存在西方的體制性弊端。

宋魯鄭認為，中國改革開放 30 餘年使中國成功從終身製、個人領導決策演變為任期制和集體領導決策，而胡錦濤的裸退完善了中國的權力交接制度。

這名學者對習近平執掌中國的 10 年表示樂觀並預測在這夢想成真的最後一段征程，中國能跨過“中等收入陷阱”，人均 GDP 將超過 1 萬美元，並躍居全球第一大經濟體。

美國紐約城市大學政治系的夏明教授對宋魯鄭的觀點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宋魯鄭在人才使用方面的說法完全顛倒了事實。宋魯鄭的理論是多黨執政是浪費資源，因為只有一個黨的人才能夠在台上執政，而到任期滿了之後一定會下來。而中國的人才可以連續地在不同的崗位，不受任期的限制地發揮他們的優勢，因而提高了人才使用的效率。夏明教授則認為，中國的一黨執政

導致這個執政的梯隊沒有動力去改變其執政的質量和效率。它壟斷了中國各種政治、社會和經濟資源來進行治理的時候，這種資源的使用是非常浪費的。這就出現了中國軍費年年無限增加，維穩費用超過了軍費，另外貪腐盛行，公務員的工資永遠控制不住，行政經費，政府稅收超過了國民經濟的發展水平。夏教授認為，這都是一黨執政下，行政效率無法得到提高的一個根本表現。

他說，相反在兩黨制的情況下，任何一個反對黨的資源占有都是比執政黨要少的多。如果反對黨要把執政黨推翻，以便取而代之的話，它一定會在資源更少的情況下向選民推銷它的一套新的政治決策和方略。而這種政治決策和方略不僅在質量上和吸引力上會超出政府的，而且在資源使用的效率上也會超過現在的執政黨。

夏明教授說，中國十八大的權力交替並不是像宋魯鄭所說的實現了和平傳承，他覺得宋魯鄭所得出的這一結論是錯誤的，是不符合事實的。另外，他認為宋魯鄭有關中國的制度避免了政治強人和個人獨裁的出現是個過早的結論。夏教授說，這次十八大的轉型並不是平穩的，而是充滿血雨腥風的。他說，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挑戰中共十七大的布局，而十七大的布局又挑戰了十六大的布局。當時，胡錦濤培養的接班人李克強被習近平所取代。夏教授說，薄熙來用重慶的模式來挑戰習近平的接班，後來演繹到重慶從王立軍到薄熙來，到谷開來一系列的謀殺、竊聽、叛逃等，掀起了中國政壇非常大的一個醜聞。他還舉例說了有關令計劃的宮廷政變。夏明教授說，所有這一切都表明十八大的接班是非常驚險的。他說所謂的權力的和平傳承完全忽略了十八大之前爆發出所有的政治醜聞和驚險的故事。

另外，夏明教授說，在胡錦濤執政期間，中國人大的權力急劇萎縮，政府的權力被逐漸地削弱，因此黨的權力大幅提升，逐漸走向集中。中國在過去十幾年裡出現的矛盾就是黨權過於集中，

以黨代政，黨政不分所致。他說，今天習近平在繼續進行權力的集中。夏教授說，自習近平今年3月上台以來，他以反革命罪行所抓捕的人已經超過了胡溫時期的總和。他認為現在說，中國模式避免了政治強人和個人獨裁的出現，還為時過早。夏明教授說，從某種總程度講，習近平的做法其實已經出現了走向個人獨裁苗頭。

夏明教授還舉例說明，中國在十年內人均GDP翻一番是實現不了的。

第四章：習近平剖析



4.1 習近平的權力基礎

(2012.11.25)

出乎意料中的“黑馬”

五年前(2007年)的十月，十七屆一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圍繞李克強、習近平能否入常的問題，美國《自由亞洲》電台的一位記者採訪了我。由於李克強與胡錦濤早在團中央就結下的關係，當時受到胡的力挺，被普遍視為“王儲”和“太子”。在預測李和習近平都會進入政治局和常委會後，我認為習更可能會成為搶頭標的“黑馬”。兩天後，常委會名單揭曉，習近平名列榜首，成為下一代中共接班人。今天，十八大已落幕十來天，習近平順利地全面接班，成為中共黨、軍最高領導人。明年春季，拿下國家主席的位置也沒有任何懸念。黨、政、軍三位一體的大權轉移過程將畫上一個句號。

從社會網絡分析理論來看，習近平的穎出是必然的。在中共的領導人選拔體系裡，中共中央委員會是選拔團。裡面的權力板塊形成的權力格局決定了未來接班人的權力基礎。當中國的強人政治逐漸向弱主政治過渡時，一人占據頂端、一言九鼎的等級金字塔決策模式演化到了權力核心為主導的網絡化結構和磨合決策

模式。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習近平在有許多小集團（或派系）組成的權力網絡中，占位得當，不僅成為連接各個小集團的橋樑型人物（也是網絡分析所說的“結構性橋樑”），而且，積聚了最高的中心性，理所當然為選拔團所青睞。

具體說來，習近平享有一些先天的優勢。例如，他是“太子黨”中的佼佼者；同樣托父之福，他與胡耀邦、趙紫陽派係都維持有良好的人脈關係。作為清華的畢業生和博士，容易被作為工程師治國核心的“清華幫”所接納。他也享有許多地利：例如，沿海大省（從廣東、福建到浙江、上海，再到河北）或因他父親早期建特區的關係，或他自己的工作經歷，都會把他視為寵兒。“上海幫”對習的接納尤其重要。最後，作為政治局常委裡唯一一位真正穿過軍裝的，而且還有軍旅引以為豪的軍級“唱紅”歌唱家為妻（很長一段時間，習近平是被人們以“彭麗媛的老公”而記住的），軍隊自然把習近平看作自家人。

縱覽中央委員會的重量級板塊：“太子黨”、“上海幫”、軍隊、“省級利益集團”，胡、趙期間培植的勢力和“清華幫”，習近平獨占鰲頭，就再也自然不過了。

預估型民主

如果單純把習近平的接班歸於人脈關係也太簡單化。事實上，中國政府儘管非民主選舉的，對公共輿論經常置之不顧，甚至踐踏，但它的運作也並非完全不考慮中國的未來進步和中國人的普遍期盼。因此，有人把它誇大為“中國民主”，也有人更進一步稱之為“預估型民主”，也就是說，中國政府還具有前瞻性和先導性。未來對它還有一定的約束力。

習近平的穎出反映出了“預估型民主”的一個實踐。據說，在提出常委會名單前，中共在高層搞了一個摸底。在這項“官意”

調查中，習近平名列前茅。作為弱主的胡錦濤沒有企圖、恐怕也沒有實力輕易忽視這一現實，所以並未硬撐李克強。

在競爭十八大政治局和常委職務的所謂“四大天王”（李克強、習近平、李源潮和薄熙來）中，習近平的政策取向最大程度地反映了中國政治經濟的未來景象。他作為一個有著工商管理碩士和博士學位的官員，長期在沿海工作，熟悉中國最有活力的地區和接觸到了最有成長可能的經濟部門。在浙江任書記期間，他倡導把“浙江模式”提升到決策層次。我們知道，所謂的“浙江模式”就是以民營經濟為主體的、自發的“溫州模式”。它體現的是政府尊重、扶持和管理市場，而不是擾亂、壓抑和掠奪市場。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他轉任上海市委書記後，他還帶領上海黨政代表團到浙江去學習“浙江模式”。

如果我們意識到，五年前薄熙來在重慶高調推出“重慶模式”，試圖復興毛主義和“文革”的許多做法，而且在重慶帶來普遍的“國進民退”，中共選擇了習近平就是一個歷史進步。薄熙來的最終倒台也說明中國歷史還在艱苦努力地向前走。中國的普遍民意還是願意選擇繼續改革開放，而不是封閉的公有製占主導的社會經濟體制。從這一意義上來說，習近平的權力基礎又是建立在他過去推動“浙江模式”的業績之上的。

派系爭鬥和沉默的大多數

顯然，中國政治的動力機制主要來自於派系競爭和平衡，同時也有眾意的影響。派係政治產生的最為常見的行為模式是“權力均衡”，例如人們曾經津津樂道的“團派”、“太子黨”、“上海幫”和“新左派”之間的恩恩怨怨。然而，一旦核心明晰，權力均衡就會很快被“跟風”所替代。原來腳踏幾隻船的人，現在也會跳上勝家的彩車。

可以說，習近平被任命為常委、書記處常務書記和國家副主席後，勝局已奠定。但引起權力均衡向“跟風”轉變的拐點是一年前他被任命為軍委副主席。這與胡錦濤擔任總書記時還是軍委副主席相比，是一個很大的突破。尤其習近平是真正穿過軍裝、八十年代早期在軍委工作過三年的，這可以堵住“扶上馬、送一程”的陳規，為習近平一步到位、全面接班鋪平了道路。胡錦濤的全面“裸退”一方面反映了胡錦濤在長期的黨性教育下培養出的顧全大局觀的一點殘存，同時，也是中國急劇變化的時局產生的壓力的結果。

對薄熙來來說，在十七大上派系爭鬥敗局已定，唯一能讓他最後一搏的機會來自比“模式”孰優孰劣之爭。薄熙來估計，他的“新左派”導向加上民粹主義的作風可以挾民意為自己博得上位。但在中國跟他跑的實際上是聲音大、人數少的一撥。他的倒台應念了一句老話：人在做，天在看；舉頭三尺有神靈。當然，中國程默的大多數，儘管不能投票參與，但他們的民意還是能在網絡和微博上流傳，製造出公共輿論。習近平未來執政的合法性有賴於“沉默的大多數”的繼續支持。現在他們還繼續被排擠在權力精英壟斷的牌局外。如何通過賦予選票、人大民選等方式把他們納入制度內，恐怕是習近平執政的歷史挑戰。這也是中共黨國可能找到有序民主化的唯一途徑。

意志決定行動

習近平接手的攤子是好日子已經過完的政權。他的前任留下了難下的一盤殘局。下面如何走出活棋，全有賴於來自新的領導層和民間的政治意志。在2012年11月15日與新當選常委共同會見媒體的見面會上，習近平發表了一個簡短講話。他在裡面提出了一個“新三民主義”：“與人民心心相印、與人民同甘共苦、

與人民團結奮鬥。” 他所提到的民族的偉大復興、國家的繁榮富強和人民的美好生活，都是不錯的施政目標。但是，如果中國人不僅僅只滿足於溫飽，而是嚮往有自由、有民主、有精神提升和道德升華的生活；那麼，習近平就不應該忽略兩年前他曾提出的“權為民所賦，權為民所用”的允諾。對民主、自由、免於恐懼、法治、憲政和尊嚴的忽略，是否是在傳達一個明確的信號，中國未來政治還將繼續沿著“溫飽政治”、“維穩政治”的軌道上走老路。對此，我們還必須繼續觀察，同時還必須保持高度的警惕。

如果中國的領導層能夠立志讓人民多一點自由和尊嚴、少一點奴役和恐懼，讓政府多一點效能和服務、少一點掠奪和貪腐，中國人才會真正有機會實現生命的意義，中國也才能在世界上贏得更多的尊重、減少鄰國的猜疑和離異。對習近平來說，這不是一個利益的選擇，而是一個道德的選擇。它不僅關乎億萬中國人民的福祉，也關乎習近平自己的未來生命：生理和政治雙重意義上而言的。

4.2 習 - 李元年 (2013.01.06)

如果繼續翻中共的老黃曆，2012年是“毛歷63年”。細細分來，它又是“胡 - 溫末年”，同時掀開了“習 - 李元年”。盤點過去一年，我想套用央視的話，問一聲：“你幸福嗎？”

民生危機

既然“以民為本”，就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庶民說起。俗話說，民以食為天。百姓被告知，他們食用的果凍、酸奶、冰淇淋、糖果、火腿腸、醬牛肉等，都含有食用明膠。它的來源或是添加工業明膠，或由舊皮鞋、皮帶熬製。隨後，白酒“塑化劑”事件又被曝光。對百姓來說，飯桌上小酒一尊、花生米一碟，賽過活神仙的享受也變得提心吊膽。除了食品安全，“毒膠囊”事件又帶來藥品安全的問題。國人心理底線不斷受到挑戰。

對廣大股民來說，2012年中國證券市場再受重創。滬綜指盤創出年內新低，全年漲幅僅為0.80%。儘管中國經濟據說在全球是“一枝獨秀”，而股指卻跌回十年前的水平。股市為掌權者和國企起著“圈錢運動”的功能。堅韌不拔的中國股民大多血本無歸，

變成真正的“屁民”。

在夜郎國的畢節，十一月間，從9歲到13歲年紀不等的五名流浪兒童鑽進一個垃圾箱過夜，他們生起火盆取暖，結果全部中毒窒息而死。後來畢節市採取果斷措施，在當地的垃圾桶上印上：“嚴禁人畜入內，違者責任自負”。在皇城根下，今夏北京遭遇暴雨，約190萬人人人口受災，官方報導，至少79人遇難。借北京奧運全面改造的城建，其中敗絮暴露無遺。

再說雪域西藏，今年一年至少就有83人自焚(截至12月9日)。但這一震撼世界的大事件居然被徹底漠視。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發布的“2012年中國少數民族十大新聞”包括“國家積極推進民族團結進步創建活動進社區、進國企”、“民族語文輔助翻譯軟件填補相關領域空白”、“國務院出台意見促進貴州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等等，但根本未提自焚事件。總之，從皇城根下的北京居民到夜郎國的流浪孩童，從商海的股民到雪域高原的藏民，都在過去的一年受到傷害。

官不聊生？

百姓固然可憐，但真正身敗名裂、摔得最慘的還要說薄熙來。薄熙來出生太子黨，受教於北大和翰林院社科院，一表人才，風流倜儻，得巴蜀望京城，有引領中華的鴻鵠之志，可惜落得個階下囚的下場。政敵們不僅要斷掉他的政治生涯，還要毀掉他的道德形象。據報導，11月中旬因腦幹出血，他被緊急送往解放軍301醫院。夫人谷開來獲特批，在6名武警的看押下，從服刑監獄去醫院搶救室探望。谷開來掩面抽泣。更慘的是父母的最愛薄瓜瓜遠在天邊。薄落得了一家三口、天各一方的淒涼處境。唯一為他公開說點好話的反倒是他的原配夫人。

與薄熙來形影相吊、同病相恨的當然是王立軍。看著他如總

統般威風，站在高台上、直升機旁享受權力自淫的快感時，真不敢想像他今日的落魄，從蒙古草原的一條狼變成被烹殺的一條走狗。同樣地，劉志軍、李春城等一批落馬高官在過年之際恐怕最羨慕昔日他們鄙視的“屁民”了。至少他們還可以享受老婆、孩子、熱炕頭，稀飯、花生、二鍋頭。

但並非保住了權力、至今還高高在上的官員就一定幸福。令計劃就遇上了一個大災年。儘管他的花心兒子做了花下鬼，也不算太虧，但搭進一雙花季少女，搞得一死一殘，這樣的良心債還是要老子來扛的。令計劃為了官運，捨掉了給兒子料理後事的儀式，但最終卻被看作連人性都沒有，丟官更快。他的醜聞又讓他的老闆胡總在權力的黃昏時節周密安排卻全盤皆輸。據報導，十八大閉幕時，胡在座位上最後時刻臉上飽經滄桑、表情淒涼，甚至可以看到眼淚在眼眶中打轉。身邊周遭的人都已離去，他卻一直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沒動。有人說他在等一個人。但這個人（日本評論員說，按理該是習近平）沒有出現。胡總因此獲得“2012 流淚哥”的最後榮譽。

但最會流淚的中共領導是溫家寶。如果像有人說的，以前的流淚都是“影帝的表演”，2012 年一定會讓溫總暗地裡傷心、真心地落淚。世界輿論的領軍報紙《紐約時報》連續三次、頭版頭條、三頁整版深挖溫氏家族通過平安保險公司斂財 20 多億美元，不僅讓這位竭力塑造清廉形象的平民總理牌坊被砸，也讓這位孝子無法制止自己終生為人師表的老母的聲譽被汙。

高處不勝寒

鐵打的黨國，流水的官。胡 - 溫黯然淡出政壇，習、李“閃亮”登場。後面二位當是中國當下最幸福的。如果你這樣想，你就錯了，也會更加不幸福了。還未掌握大權，習近平就遇到薄熙來叫板。

薄剛剛靜音，彭博新聞社又爆出習家斂財聚富的驚聞。低調的李克強也被海外抓了把柄，有思想庫拿他的弟弟做文章，暗示國家菸草專賣局副局長李克明利用裙帶關係。真是朝中無人莫做官，朝中有人難做官。難怪習近平會在夏天有十多天的神隱。據說是習撿擔子不想乾了。

“莫言老師你幸福嗎？”在瑞典有聽眾向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發出這問題。聽到這個問題，莫言反問他“是不是央視的”。他是這樣回答這個問題的：“起碼今天很幸福”。我們可以理解，莫言的幸福是那麼的短暫和有限，因為諾貝爾獎給他帶來了從未遭遇過的狂轟濫炸似的批評。當一個七尺漢子、另一位藝術家在冰天雪地裡裸體向他奔來，呼喊著抗議，即便認為自己的創作“是一種赤身裸體的狀態”的莫言，也一定會不爽。

為什麼號稱“千年盛世”的今日中國，從前朝元老到當今聖上，從達官富人到草民百姓，從邊疆“蠻夷”到“皇城子民”，從流浪兒到桂冠作家，似乎都生活在鬱悶之中？為什麼如此之多的政治、社會、經濟精英人物最後落得身敗名裂？歷史學家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一書中試圖解答同樣的疑惑。面對明朝後期這樣一個“大失敗的總記錄”，黃仁宇的答案是：“制度已至山窮水盡，上至天子，下至庶民，無不成為犧牲品而遭殃受禍。”

習、李當從歷史中得點教訓，立志避免成為當今制度的犧牲品。否則，繼續翻著“毛氏老紅歷”，行使著封建王權，總歸難逃歷史的結局：習以為常，李代桃僵；死留餘辜，王皮兩張。那時，人們又要問：你們幸福嗎？

4.3 習近平的憲法政變 (2013.12.09)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布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是一個黨國做的並不需要人們相信的政治廣告，是一個不必推銷產品的行銷藝術，是一個以黨國寡頭的視角觀之，完全無視民主參與的“頂層設計”。作為一個根本就不接受民主選舉的政黨，中共在制度和程序意義上來說就不可能有對人民的政治責任。那麼，這個所謂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宣言書”、“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藍圖”，在毫無問責機制的情況下，就只能是一個獨裁腐敗政黨為自己立的德政牌坊，一個做着千年王國美夢的寡頭們在民主浪潮高漲的形勢下作出的詭辯，一個內心處於極度恐懼、時刻擔心政權崩潰的不義之人的相互壯膽。

在蘇聯崩潰之前，西方的政治學家是這樣概括歐美的憲政實質的：在美國，人民的自由是所有那些憲法沒有明確禁止的；在法國，人民的自由是所有那些憲法明示的；在蘇聯，即便憲法上的自由也只是作為擺設，並非真要让人民行使的；在意大利，人民的自由正是要做哪些法律禁止的，因為所有政府禁止的都無從落實、卻又有利可圖，所以有“黑手黨”。那麼在盛世的中國，憲政的實質就是：所有給執政當局的特權都是會無不用其所極，

而給人民的許願只是掛在驢子面前的那根紅蘿蔔，永遠都在前面引誘你做大頭夢。

《決定》全面顛覆“八二憲法”

正是基於這樣的政治背景，越來越少的中國人為《決定》的“十全大補湯”而歡呼雀躍，而越來越多的人卻對習近平獨攬大權憂心忡忡。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設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無論從設立的目的和方式來看，都是一場“憲法政變”，它全面顛覆了中共自己確立的“82 憲法”。

在飽受“文革”苦難、又經歷華國鋒無力開啟新局面的猶豫後，中國勉強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82 憲法”起到了總結過去的治理缺失、開創民主法治新局面的橋樑作用。應該說，在中共制定的四部憲法中，現在還在使用的“82 憲法”是較好的一部。但如果從現代民主的高度來看，對這部將“四項基本原則”寫入前言的憲法，也不必期望太高；反過來它也說明，如果中共連自己制定的最低憲制底線都無法遵守，可見該黨的法治意識是多麼貧乏。

馬克思主義的政體思想受到巴黎公社的影響，所以後來建立的共產主義政權無不以委員會制來確立基本政體。在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成為“根本政治制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它行使“修憲”、“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國家機構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的權力（第 62 條）。國務院作為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是最高國家行政機關”。至於說國家主席，憲法並未明確定位為“國家元首”，他只是在人大行使權力時，形式象徵性的職位。如果我們用“議會制”和“總統制”來比較，中國的政體更接近議會制，而不是總統制。

學普金滑向終身製

但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中共完全繞過人大程序，由黨代會包辦改變了國家機構的設置，建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和“國家安全委員會”。而且，“國家安全委員會”作為“國家安全體制和國家安全戰略”的核心機構，由國家主席擔任該委員會的主任職務，不僅加劇了原來總書記兼任國家主席帶來的黨政不分的弊端，而且還進一步削弱了人大和總理的權力地位，把內政外交、文化經濟的大權統統集中到了國家主席手中。因為我們知道，所謂“安全”的概念已經涵蓋國家安全、人類安全和經濟安全等諸多“新安全”領域。正如中共明確宣示的，“總攬全局、協調各方”，也就是身兼總書記、黨和國家兩個軍委主席、國家主席、國安委主任的習近平大權獨攬，而政府、人大、政協、工青婦組織和社會團體都成為被協調的一方。這樣的機構變更，遠遠要大於普金在議會制和總統制之間玩把戲，不能不說是一場“憲法政變”。

如果我們來觀察中共六十年一貫的體制，其實只有毛、鄧、習三代；也只有他們三人是自己把皇冠戴在頭上的，而其他的領導人，比如華國鋒只是毛的指定兒皇帝，江澤民和胡錦濤也是鄧留下的一對政治雙胞胎，相互牽制來做“總設計師”的兩任“總工程師”。更讓人吃驚的是，習近平的制度權力遠遠超過毛和鄧。被斥為“個人專權獨斷”的毛只是黨和黨的軍委的主席，在黨內，還有總書記（鄧小平）主持常務工作；政府由總理周恩來打理。當時總理的職務有多重要，可以從以下一條歷史資料來說明：在1949年時，中共曾考慮過由宋慶齡擔任國家主席、而由毛擔任總理。在八十年代，總理趙紫陽的權力與總書記胡耀邦相比也不遜色，以至趙並不情願離開總理職位去擔任總書記。而鄧在78年復出後不僅從未擔任過黨的主席、總書記，也未擔任過國家主席、總理

和委員長等職務，只是擔任黨和國家的軍委主席。有必要指出，毛和鄧其實都實行的是終生制，我們可以設想，如果習近平有與毛、鄧比個高下的心氣，他下一步的險招就是學普金，給自己終身制。

中國的寡頭化和法西斯化

“憲法政變”並不全都是壞事。1958年法國在奠邊府失敗後又面臨阿爾及利亞危機，軍隊時刻準備接管巴黎，發動軍事政變。法國二戰中反法西斯的英雄戴高樂受命於危難之中，終結了第四共和國的議會制，修憲創建第五共和國，建立了超級總統制。通過這一憲法變革，戴高樂一手收拾了蠢蠢欲動想奪權的共產黨，一手挽救了自由民主，也為二戰後的法國復興和繁榮奠定了制度基礎。

但大權集中的習近平不會成為戴高樂，卻更可能成為另兩個搞憲法政變的獨裁者：德國的希特勒或日本的東條英機。為什麼習近平的憲法政變有如此的危險性，可能把中國引向全面的寡頭化和法西斯化？這主要由現今的中共意識形態、領導人的意志和他們的素質所決定的。現今中國的意識形態大辯論絕然不同於七十年代末期的“真理標準大討論”。當時是思想解放和文化啟蒙；今天是左傾僵化保守勢力抬頭，宣傳機器用蒙昧主義、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來抵制啟蒙、反對普世價值、壓制民主自由。領導人也絕沒有讓人民自由生活在民主體制下的政治意志。習的“兩個一百年”把建設民主中國放在了未來兩、三代領導人的時間表上，也就是在他的任期內全面抵制民主化。沒有人會相信一個把兌現時間放在他死後的承諾人。

更讓人不安的是，從王立軍、劉志軍、薄熙來和周永康等人身上，我們看到了當今中共領導人是一群沒有道德底線的不義之人。他們像是一群蝗蟲，把過去改革取得的進步，尤其是八十年

代在胡 - 趙治理下取得的政治和社會進步，把法制、人大建設（包括評議、信訪、司法監督等制度）都可以頃刻間糟蹋得幹乾淨淨。現在，他們又在拋棄公民社會、憲政和普世價值。從吳邦國的“五個不搞”到習近平的“七個不講”，再到今天的政黨違憲，踢開人大制度和政府職權，大搞個人專權、黨國暴政，一個邪惡的紅太陽帝國已經誕生。

4.4 習近平的權術秘籍 (2014.01.08)

導讀

從“導師”到“總設計師”，從“總工程師”到“頂層設計師”，其中發展的內在邏輯實質是什麼？中共最高領導在殘忍的權力鬥爭中，為了獲得、鞏固和維護自己的權力核心地位，運用左右兩手，把左、右派玩弄於自己的掌股之間，讓雙方互鬥，通過用“左”反“右”、或用“右”反“左”的不間斷政治清洗，使“左”、“右”兩派都處於永遠的恐懼狀態和對最高領導的感恩狀態，來營造個人的權力安全堡壘。占據政治權力蹺蹺板的中軸，掌控左右兩翼、任憑他們平衡博弈，就是習近平的權術秘籍。

興風作浪者穩坐釣魚台

在中共大位上登台亮相一年的時間裡，習近平左右開弓、左右逢源、忽左忽右、寧左勿右，讓國內官民和國內外觀察家感到撲簌迷離。其實靜靜觀察和思考，不難發現，六十多年中共權力學從毛鄧江胡再到今天習以為常，都是一脈相承、一以貫之。這

裡涉及的根本問題就是“核心”。

毛把自己封為“導師”、“舵手”和“紅太陽”。鄧自認為“總設計師”，並給自己配備了兩位保證蕭規曹隨、繼續貫徹鄧路線的“總工程師”。在習近平一身兼任黨政軍最高職務，並像集郵一般占據“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組長職務後，我們可以預計，他很快又會執掌“國家安全委員會”，成為中共的“頂層設計師”。

從“導師”到“總設計師”，從“總工程師”到“頂層設計師”，其中發展的內在邏輯實質是什麼？首先，它不是政策的改進。其次，它也不是體現的黨國舉國體制的優越性。其實質是，中共最高領導在殘忍的權力鬥爭中，為了獲得、鞏固和維護自己的權力核心地位，運用左右兩手，把左、右派玩弄於自己的掌股之間，讓雙方互鬥，通過用“左”反“右”、或用“右”反“左”的不間斷政治清洗，使“左”、“右”兩派都處於永遠的恐懼狀態和對最高領導的感恩狀態，來營造個人的權力安全堡壘。人們都知道，暴風眼經常是最安全的。中共最高領導慣於在自己身邊製造狂風暴雨，自己卻穩坐釣魚台、避風中南海。

毛鄧習通玩“左”、“右”

在中共政治裡，“左”和“右”的區分經常並不以意識形態或代表的階級、階層利益為根據，而是相對於“核心”而言的。當毛突然腦袋發熱，刮起“共產風”、提出“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和“大躍進”時，任何反對他的主張的人就自然成為“右派”。當毛需要收拾他自己弄出的爛攤子時，他又會提出“積極穩妥”、“整改提高”、“戒驕戒躁”，請出被他貶職或迫害過的領導人，然後把“極左分子”送上犧牲的祭壇。林彪是被毛用在“左翼”來攻擊彭德懷、鄧小平和劉少奇等人的。但一旦林與毛翻臉，毛又用極左的江青（和她的“四人幫”）來清理和替代林彪勢力。為此，

毛又發起“批林批孔運動”，把林作為保守、復辟的右派來鞭打。

鄧核心同樣手拿兩個殺手鐮：“堅持改革開放”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他會時常用前者敲打胡喬木和鄧力群兩個所謂的“左王”，同時給箝制自己權力的陳雲提個醒兒。他又會用後者拿下胡耀邦和趙紫陽兩任中共總書記。以後，鄧還會對李鵬左敲、江澤民右打。鄧自己則穩坐在政治權力蹺蹺板的中間，靜觀左右起伏升降。

占據政治權力蹺蹺板的中軸，掌控左右兩翼、任憑他們平衡博弈，就是習近平的權術秘籍。早在胡錦濤時期，習被立為享受王儲地位的接班人，而他的右翼又有“親民”、“自由派”的溫家寶，留給薄熙來的政治空間就只能在左派政治裡了。其實，胡錦濤已經非常“左”了，薄熙來踏上更左的步子，難免不在與習的爭鬥中自掘墳墓。薄的清除，讓習露出容易被“左派”（毛左和新左）攻擊的軟肋，也容易成為自由派反左的靶子。這就有了習向“網絡大V”和“反動知識分子”宣戰下手的動力。“幸災樂禍”的國民性讓自由派從薄的倒台中看到了習近平改革的新希望，讓左派保守勢力從反普世價值中看到了習近平堅守紅色理念的老傳統。正是在這種大眾天真的政治期盼中，習近平右手“反對走老路”，左手反對“走邪路”，自己成為不偏不倚、不左不右的“正確道路”的正統和旗手、縱橫捭闔權力格局的核心。

習近平成朱元璋第二

習近平是明洪武太祖朱元璋廢相後又一位“乾綱獨攬”的專權者。中國歷史自秦漢以來基本遵循“宰相制”，天子皇帝和宰相形成君相權力分開、輔佐、制約的關係。郭成康教授在《十八世紀的中國政治》（2001年台灣昭明版，第22頁）一書中寫道：明太祖“徹底廢棄分寄大權於丞相的漢唐舊制，而代之以全新的

君臣權力劃分的準則：皇帝兼昔日君相二任於一身，獨攬國家一切權力，親理天下軍政事務；大小臣工俯首聽命。”“這一套‘上下相維、大小相制’的君臣權力配置構架，其精髓一言以蔽之曰‘事皆朝廷總之’，或曰‘乾綱獨攬’。”在 18 屆三中全會上基本廢棄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以後，總理的權力上交給國家主席。習近平成為朱元璋第二。

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格局下，習近平占據核心地位，使得六十年的中共統治定制成型。概而言之，它有幾個支柱：（1）對官員和部門的根本權力控制遵循“放風箏政治”，也就是永遠牽著線，只是一鬆一緊來穩定和控制。（2）對經濟管制施行“鳥籠經濟”，亦即，中國的市場經濟永遠是國家資本主義，對市場的控制只是籠子的大小而已。（3）在法律控制上搞“法網恢恢、疏而不漏”，亦即，在“外松內緊”的精神指導下，建立全息、全方位控制體系。（4）對社會團體和非政府組織玩“束鹿政策”。在習近平政治起家的河北正定縣東面五十英里有一個“束鹿縣”（今天的辛集市），曾有一批美國政治學家在那兒蹲點（王紹光也參與到了他的導師的項目），出版了一本英文專著，以“束鹿”為書名。他們揭示出，中國政府對地方和社會的控制就像是把一個鹿拴住一根柱子上，給它留下吃草的空間，但絕不給敞放的自由。中共的非政府組織有“GONGO”（政府指導下的 NGO）之稱，可見一斑。（5）在信息網絡控制上建“防火長城”和“天網”。（6）“天羅地網攀染栽誣”的特務政治。與明太祖的司禮監下轄東西廠和內行廠相比，今日中國的特務網有過之而無不及：在“國安會”下有“政法委”，又轄國安部、公安部（政保、國保、文保），還有中紀委、總參情報機構，以及他們安插在所有政府和經文教部門的臥底。

對這一套精細的網絡控制，中共的頂層設計師和他的師爺們可能頗為得意，所以他們有“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

其實，這些無非都是專制史上刨出的舊貨而已。以明朝的專制君主朱元璋相比，我們可以說，習近平完生了七百年。如果我們發現這套頂層設計還有中共智囊王滬寧從西洋專制史中挖據的功勞，那麼與輔佐歐洲君主終結封建制、建立絕對中央集權制的馬基雅維利和霍布斯相比，我們還可以說，王滬寧也晚生了五、六百年。

4.5 習大大、習澤東和習特勒 (2014.11.08)

習近平的執政，或者說中共的治理遭遇的最大挑戰是無所不在卻又無影無踪的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在這個多中心、開放的網絡平台，共產黨傳統的一元垂直控制變得乏力，單向性的洗腦進入邊際效應遞減的階段。中共官方也不得不承認，共產黨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遭到挑戰。為此，中共開展了整治網絡、淨化網絡、打壓大V、充實“五毛”、升級“防火牆”等各種措施來弘揚“正能量”，消滅“負能量”。網絡上流行的習近平眾多綽號，從一個角度反映出所謂“正、負能量”的碰撞，成為中國官方打造合法性和民間解構它的合法性的政治博弈。

“習大大”和“彭媽媽”

綽號可以有褒貶。習近平身邊似乎有專業形象設計團隊為他打造一個親民、有魅力和有魄力的領袖形象。當然也不否認，民間、甚至知識分子中也出現了對習近平的期望。所以出現了“平平”、“第一球迷”、“習總”等暱稱。官方也接受了它們。但最走紅的還是“習大大”。據說在陝西方言裡，人們尊稱自己的父親或

父輩的男性為“大大”，對“大大”的妻子也稱為“麻麻”或“媽媽”。所以，中國網絡上流行著“習大大”和“彭媽媽”的暱稱。中國社會的流行語是“吸大麻”。

“習大大”從何而來？2012年11月21日，在中共十八大習近平升任總書記不久，在新浪網微博上出現了一個“學習粉絲團”，開始發布有關習近平出訪和家庭生活的圖片和消息。因為這些消息準確、及時，圖片罕見，顯示出該微博不同一般的信息渠道。例如，習近平“南巡”時，“學習粉絲團”發布消息，稱此行既未通知央視和《人民日報》，以致央視的官方微博也感嘆，“學習粉絲團”發布的消息“比我們快，比我們近”。

國內、外媒體（例如《南方周末》和《華盛頓郵報》等）有解讀說，“學習粉絲團”沒有官方背景，是來自草根的運作。根據註冊信息，該微博是由陝西一位女性創立。又有說一位來自四川巴中的名叫“張洪銘”的“打工仔”在江蘇註冊的帳號。但據大陸媒體專家分析，這個微博“來頭不小，背景很大”，微博寫作“比較專業”，“像是一位新聞記者的水平”，博主“絕非等閒之輩”，甚至是“通天人物”。一位精通北京官場生態環境的政治分析家告訴筆者，他認為“學習粉絲團”最有可能是由習近平的女兒習澤明或他的侄甥輩所為。

“慶豐帝”和“毛近平”

由於網絡的開放性，更多的綽號來自民間，有時就不是那麼親暱了。因為有習近平提出的“鞋子合不合腳只有自己知道，所以外國對中國不要指手畫腳”，有人贈給他“鞋哥”的綽號。因為有了習近平到北京的慶豐包子店去吃平民套餐，所以有“慶豐帝”、“習包子”的叫法。針對習近平到底是要走回頭路擁抱毛澤東，還是堅持改革開放追隨鄧小平，又出現了“習近平”對“習

進東”的爭論和分歧。當然，人們不要以為“習近平”就少些危險，畢竟鄧小平的最大政治遺產是1989年在拉薩和北京的屠城。

顯而易見，“習進東”、“毛進平”和“習澤東”的綽號來自中國意識形態光譜偏右翼的政治力量。習近平提出“兩個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倡導所謂“延安精神”，到古田去朝拜，發布毛版的論文藝工作的講話等等，暴露出習近平的政治思維在毛時代成長定型而不得突破。無論他怎麼掩飾，無論他的團隊如何設計，習近平下意識的反應，例如在墨西哥的“吃飽飯沒事幹”的即興講話，和他對普金的真心溢美，都顯示他逃不出毛的窠臼。朝野內外的改革力量、自由知識分子群體有理由擔心毛澤東返魂。余杰在《中國教父習近平》一書中一針見血地指出，習近平“在肉身上是習仲勛的兒子，在精神上是毛澤東的兒子”。

具有創意、同時又可以被左右接受的綽號是“習特勒”(Xitler)。它反映了網絡上中西文化的完美結合。在希臘文裡，希特勒的拼法就是Xitler。據作者考證，最早在2010年海外“萬維讀者”的“天下論壇”由名為“回眸一笑”的提交者首創。在2012年3月15日，“和訊”發表一個帖子：“魔獸世界，習特勒上台”。到了2013年和2014年，這一綽號開始風行，尤其在推特上，幾個著名的流亡海外和監視居住在京的異議人士使用的頻率特別高。中英兩個版本同時在網絡上傳播。

在法西斯思想垃圾堆尋寶

習、希相通，一脈相承。在中共打造的核心價值觀裡，我們都可以看到，習近平和他的所謂的智囊病急亂投醫，試圖在法西斯的思想垃圾堆裡找到靈感。最明顯的例證是法西斯思想家卡爾·施密特在京城走紅，用來論證元首體制、獨裁論、敵人意識、緊急狀態法、緊急權力的合法性，同時詆毀自由民主、憲政民主、民

主義會制的價值。其實，施密特的法西斯思想早已被歷史所證偽。二戰中民主國家應運而生的領導人羅斯福、丘吉爾和戴高樂並非如施密特所說，沒有決斷、決策能力。施密特鍾情的所謂的“有決斷能力的領袖”希特勒、墨索里尼之流無不最終被摧毀，走上斷頭台。二戰後德國、法國和日本的制憲，都在制度上矯正了“魏瑪憲法”的制度病，亦即“議會制”加上“多黨制”造成的議會多數難出、政府不穩、政策乏力的弊端。戰後德、法、日三國經歷的經濟奇蹟歷史已經證明，施密特的詛咒已被成熟民主國家破除。但習近平這位具有清華法學博士頭銜的元首和輔佐他的曾是復旦國際政治教授的王滬寧卻都枉然不知。

總結起來，習近平的一大堆綽號意味著什麼？首先，“習大大”這一暱稱反映出，習近平本人、他的家人和身邊的人，包括太子黨這個群體想要的是一個清宮戲中的皇阿爸。讓人值得深思的是，2014年教師節習近平來到北京師範大學與教師座談，一位教師請求是否可以稱習為“習大大”。習的回答是“Yes”。這讓人們聯想，留學哈佛的千金習澤明呼喊爹爹時得到的爽快回應。在所謂的“民意分量背後”，其實揭示的是中國人深層次的家族政治和家天下。

《時代》周刊把他定位為“習皇帝”不是沒有道理。其次，習近平作為一個沒有理論根基、沒有意識形態完整體系的機會主義者，關心的是自己和他代表的黨的權力，而不是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和歷史發展，因此他會雜糅人類歷史上最黑暗和殘暴的權力術。對他來說，不僅毛和鄧的三十年可以打通，毛主義、鄧學說、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希特勒的納粹主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東條英機的軍國主義都可以雜交生良種。這是習近平最大的破壞力所在，值得人們警惕。

附录 4.1:

本性難移、惡習不改

——為余杰《中國教父習近平》序

早在三十多年前，就有學術高人告誡我做中國政治學學問的護身之法：可以談具體問題，甚至可以籠統地批判官僚體制，但不要觸及黨、軍隊、情報安全機構和具體領導人。最大的忌諱是：絕不點名批評最高領導人。

從文學領域走進社會政治評論的作家余杰少了這些羈絆，以極大的勇氣破除心獄、蔑視成規，完成“中共惡人三部曲”：《中國影帝溫家寶》、《河蟹大帝胡錦濤》和《中國教父習近平》。如果說，前面兩部傳記是在胡溫執政行將結束時完成的，所以多少有點蓋棺定論的總結意味，但這部新著《中國教父習近平》在習李全面執政的一年內面市，則帶有更多的政治預言色彩。儘管對習近平我們還必須抱著發展的眼光，但豐富的文學和社會學想像力使得作家余杰已經能夠見微見著，入木三分地刻畫出習近平和他執政的本質。對許多盼望中共主動改革、鐘情習李新政的良善中國人來說，余杰的這部著作無疑是一副清醒劑。

認清中共本性，放棄對習幻想，這恐怕是余杰在本書中給讀者最大的告誡。從習近平還在浙江和上海做書記時，我就開始關注習近平的言行、政策和升遷軌跡，並發表了不少文字和採訪。我很高興地看到，我與余杰有許多共識和共鳴。尤其讓我感到高興的是，在習近平全面執政僅僅一年的時間裡，余杰就完成了一部翔實的習近平政治評傳。所以我很樂意受友之邀，把我的一些觀察與讀者分享，以此表達我對余杰新作的支持、欣賞和推薦。

“黑馬” 習近平

2007 年圍繞李克強、習進平能否入常的問題，在李克強受到胡錦濤力挺、被普遍視為“王儲”和“太子”的背景，我認為習更可能會成為搶頭標的“黑馬”。今天，習近平已經順利地全面接班，成為中共黨、政、軍最高領導人，大權轉移過程也劃上了一個完滿的句號。

從社會網絡分析理論來看，習近平的穎出是必然的。在中共的領導人選拔體系裡，中共中央委員會是選拔團。裡面的權力板塊形成的權力格局決定了未來接班人的權力基礎。當中國的強人政治逐漸向弱主政治過渡時，一人占據頂端、一言九鼎的等級金字塔決策模式演化到了權力核心為主導的網絡化結構和磨合決策模式。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習近平在有許多小集團（或派系）組成的權力網絡中，占位得當，不僅成為連接各個小集團的橋樑型人物（也是網絡分析所說的“結構性橋樑”），而且，積聚了最高的中心性，理所當然為選拔團所青睞。

具體說來，習近平享有一些先天的優勢。例如，他是“太子黨”中的佼佼者；同樣托父之福，他與胡耀邦、趙紫陽派係都維持有良好的人脈關係。作為清華的畢業生和“博士”，容易被作為工程師治國核心的“清華幫”所接納。他也享有許多地利：例如，沿海大省（從廣東、福建到浙江、上海，再到河北）或因他父親早期建特區的關係，或他自己的工作經歷，都會把他視為寵兒。“上海幫”對習的接納尤其重要。最後，作為政治局常委裡唯一一位真正穿過軍裝的，而且還有軍旅引以為豪的軍級“唱紅”歌唱家為妻（很長一段時間，習近平是被人們以“彭麗媛的老公”而記住的），軍隊自然把習近平看作自家人。縱覽中央委員會的重量級板塊：“太子黨”、“上海幫”、軍隊、“省級利益集團”，胡、趙期間培植的勢力和“清華幫”，習近平獨占鰲頭，就再也

自然不過了。

以“黑馬”身分衝進並主宰中南海的習近平，讓許多人在他身上投射出主觀願許。一個重要的期盼是，他能成為一個開明、樸實的改革領導人，開創一代民主新風，完成中國民主轉型。這或許是習近平軟實力的巨大蓄水池。但我們很快看到圖窮匕首見，習近平上台伊始即拔刀亮劍，倒行逆施。

“弱主惡政”

中共十八大落下帷幕、習李開始全面接班後，海內外期盼政改的熱情再度升溫。剛經歷過“高期盼、大失望”的胡、溫十年，中國再次進入《等待戈多》式的荒誕劇角色中。從“胡溫新政”落得個“弱主惡政”。胡、溫的“弱主惡政”的局面與鄧小平強人下的“開明專制”（所謂“硬國家、軟經濟”）形成一對矛盾。其實，運用理性選擇的理論，我們很容易解釋這一矛盾，民主轉型的博弈第一種可能發生在強人專制政權下。以鄧小平時期為例，博弈雙方是“強人政權”和“弱勢反對勢力”。從一個有自信的政治強人視角來看，為了持續統治下去，適度的自由化並不會導致翻船，適當給人民鬆綁會一舉兩得。“寬鬆的專制”局面就會隨之出現。

隨著“強人政治”進入到“弱主政治”（比如說從鄧小平演進到胡錦濤），由於反對力量的強大，弱主可能試圖進行部分的自由化，但反對勢力可能想往前走得更遠，弱主擔心失控，可能反而會放棄部分自由化，龜縮到“收緊的專制”，以避免喪失政權。這解釋了為什麼胡溫起初擺出了“新政”的架勢，但很快擔心失控翻船（尤其是劉曉波的《零八憲章》後），走到“維穩為上”，反而強化了專制政治。

同樣的道理，未來習、李任期，反民主的專制傾向不可能成

為主色調。在完全的理性原則支配下，要指望一對已為強弩之末的專制者主動進行民主轉型幾乎是與虎謀皮。期盼“青天明君”橫空出世，給中國人帶來有自由、有尊嚴的生活，恐怕最終又會落得竹籃打水——一場空。

歷史給了習近平一個成為偉人的機會：如果他有勇氣、遠見、責任和智慧，順應民主潮流，避免塗炭生靈，成全中國民主化轉型，他就一定能超越蔣經國，成為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偉人，甚至兩千年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偉人。或者，他也可以得過且過，繼續“抱著定時炸彈玩擊鼓傳花”的遊戲。如果習近平不作為，並不能因此可以減少民變的發生，他極有可能最終淪為“蘇哈托第二”、“薩達姆第二”或“穆巴拉克第二”。當然，他也可以加大維穩力度，增加對社會的鎮壓，走向“收緊的專制”。這種“法西斯主義”傾向似乎愈發清楚地成為習近平執政主旋律。但這並非是沒有風險的選擇。今天中國的形勢已經出現風雲變幻。仔細分析，維權運動、地下教會、法輪功、訪民團體等都游離出了共產專制體系。《零八憲章》運動、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和組織、維權律師等都明確提出了要推動共產黨政權解體、國家民主轉型。西藏、新疆、台灣和香港也是反對力量的大本營。如果習近平尋求反動，刺激矛盾，激發革命，他極有可能落得“齊奧塞斯庫第二”或“卡扎菲第二”的結局。

習近平的意識形態分裂

中國正在經歷一場意識形態上的大論戰。中國的政治生態被“左”、“右”兩股力量拉扯。這種社會和政治的兩極化趨勢，一方面，是由當今的執政集團及其施行的各種政策造成的；另一方面，在全面接班後的一年時間裡，習、李試圖左右逢源，給左右之爭火上加油，更加劇了社會矛盾衝突。在中國面臨大變革的

關鍵時刻，習、李吹響的是不定的號角。

習、李令人捉摸不定的執政路徑反映出了中共最高層深度的神經分裂症。我們知道，人們的行為是受意識支配的；而產生意志的意識是由生命經歷的重大事件來塑造的。可以說，在習、李和他們的同事中，他們的意識和分析框架立足於兩大支點：“文革十年”和“改革十年”。前者讓中國人經歷了煉獄般的磨難，促成從領導到百姓上上下下形成了“改革、開放”共識。不可否認，“改革十年”是對“文革十年”的否定和對“文革”後中國集體受傷的診療。但習近平和他領導的黨中央不這樣看。無論是所謂的“六十年一條紅線”，還是“不能用一個三十年否認另一個三十年”，反映出的都是一個意識形態分裂症病人的深度問題。

習近平和他的班底對“文革”並無刻骨的仇恨，其實很容易理解。當今的領導人基本上都是在“文革”中練就出了兔子般的敏感、狐狸般的狡猾和毒蛇般的殘忍。他們善於察言觀色、隱忍克制、投人所好、逢場作戲，時刻帶著假面具，永遠用雙重思維來看待分析問題。不為行動、思想中自我矛盾而臉紅是他們為人為官的最大本事。“文革”對他們來說，永遠是塑造他們人生和世界觀的大課堂。與此相比，至少鄧小平、朱鎔基等領導人還能從“文革”中回憶起親生經歷的痛楚，痛下決心不讓它再來。而習、李一代，留在他們記憶中的恐怕更多的是青春騷動叛逆期的瘋狂，從而養成了施虐 - 被施虐的雙重快感。

從目前中國的政治形勢來看，意識形態領域思想妖孽盛行，專制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大漢族主義、民粹主義、軍國主義、階級鬥爭觀念、仇外心理都很有市場，甚至大行其道。與“改革”的前奏“真理標準討論”相比較，上層建築領域已經墜到 1979 年以前的水平。在思想觀念大倒退的情況下，我們很難期盼政治和經濟改革能有所突破。

習近平的憲法政變

正是基於這樣的政治背景，越來越少的中國人為十八屆三中全會和它的《決定》而歡呼雀躍，而越來越多的人卻對習近平獨攬大權憂心忡忡。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設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無論從設立的目的和方式來看，都是一場“憲法政變”，它全面顛覆了中共自己確立的“82 憲法”。中共完全繞過人大程序，由黨代會包辦改變了國家機構的設置，建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和“國家安全委員會”。而且，“國家安全委員會”作為“國家安全體制和國家安全戰略”的核心機構，由國家主席擔任該委員會的主任職務，不僅加劇了原來總書記兼任國家主席帶來的黨政不分的弊端，而且還進一步削弱了人大和總理的權力地位，把內政外交、文化經濟的大權統統集中到了國家主席手中。因為我們知道，所謂“安全”的概念已經涵蓋國家安全、人類安全和經濟安全等諸多“新安全”領域。正如中共明確宣示的，“總攬全局、協調各方”，也就是身兼總書記、黨和國家兩個軍委主席、國家主席、國安委主任的習近平大權獨攬，而政府、人大、政協、工青婦組織和社會團體都成為被協調的一方。這樣的機構變更，遠遠要大於普金在議會制和總統制之間玩把戲，不能不說是一場“憲法政變”。

大權集中的習近平有可能成效法另兩個搞憲法政變的獨裁者：德國的希特勒或日本的東條英機。為什麼習近平的憲法政變有如此的危險性，可能把中國引向全面的寡頭化和法西斯化？這主要由現今的中共意識形態、領導人的意志和他們的素質所決定的。現今中國的意識形態大辯論絕然不同於七十年代末期的“真理標準大討論”。當時是思想解放和文化啟蒙；今天是左傾僵化保守勢力抬頭，宣傳機器用蒙昧主義、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來抵制啟蒙、反對普世價值、壓制民主自由。領導人也絕沒有讓人民自由生活

在民主體制下的政治意志。習的“兩個一百年”把建設民主中國放在了未來兩、三代領導人的時間表上，也就是在他的任期內全面抵制民主化。沒有人會相信一個把兌現時間定在他死後的承諾人。

更讓人不安的是，從王立軍、劉志軍、薄熙來和周永康等人身上，我們看到了當今中共領導人是一群沒有道德底線的不義之人。他們像是一群蝗蟲，把過去改革取得的進步，尤其是八十年代在胡 - 趙治理下取得的政治和社會進步，把法制、人大建設（包括評議、信訪、司法監督等制度）都可以頃刻間糟蹋得幹乾淨淨。現在，他們又在拋棄公民社會、憲政和普世價值。從吳邦國的“五個不搞”到習近平的“七個不講”，再到今天的政黨違憲，踢開人大制度和政府職權，大搞個人專權、黨國暴政，中共黨國已經成為了一個邪惡的帝國。

習近平的權術秘籍

在中共大位上登台亮相一年的時間裡，習近平左右開弓、左右逢源、忽左忽右、寧左勿右，讓國內官民和國內外觀察家感到撲簌迷離。其實靜靜觀察和思考，不難發現，六十多年中共權力學從毛鄧江胡再到今天習以為常，都是一脈相承、一以貫之。這裡涉及的根本問題就是“核心”。其實質是，中共最高領導在殘忍的權力鬥爭中，為了獲得、鞏固和維護自己的權力核心地位，運用左右兩手，把左、右派玩弄於自己的掌股之間，讓雙方互鬥，通過用“左”反“右”、或用“右”反“左”的不間斷政治清洗，使“左”、“右”兩派都處於永遠的恐懼狀態和對最高領導的感恩狀態，來營造個人的權力安全堡壘。人們都知道，暴風眼經常是最安全的。中共最高領導慣於在自己身邊製造狂風暴雨，自己卻穩坐釣魚台、避風中南海。

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格局下，習近平占據核心地位，使得六十年的中共統治定製成型。習近平是明洪武太祖朱元璋廢相後又一位“乾綱獨攬”的專權者。中國歷史自秦漢以來基本遵循“宰相制”，天子皇帝和宰相形成君相權力分開、輔佐、制約的關係。到了明太祖，“皇帝兼昔日君相二任於一身，獨攬國家一切權力，親理天下軍政事務；大小臣工俯首聽命。”這一套權力配置構架，其精髓是“事皆朝廷總之”，“乾綱獨攬。”在18屆三中全會上基本廢棄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以後，總理的權力上交給國家主席。習近平成為朱元璋第二。

總之，從鄧小平的“小康社會”，到胡溫的“和諧社會”再到習近平的“中國夢”，無非都是一個痴迷暴力權力、踐踏人權民權的黨國玩的政治忽悠。余杰會在他的新著中會詳細為你指點迷津，從而認清識別癡人說夢、避免再次聽信夢話。只有告別對黨國的期盼，我們才能明白中國諸多問題的總根源就在黨國身上，才能為中國找到真正的出路。當然，我們也應有足夠的樂觀，不要忘記，儘管中共本性難移，儘管近平惡習不改，中國古人的智慧還有另一面：“江山易改”。

第五章：最後的謊言



5.1 誰來為你作證？

(2013.05.09)

“紅”變“黑”

“紅十字會”在國際社會擁有最高的公信力，以至國際戰爭中交戰的雙方都會達成共識，接受和保護戰場上的紅十字會成員。但在2013年四月20號四川雅安蘆山地震後，中國紅十字會卻成為過街老鼠。僅僅收到14萬元捐款（同時李連杰的壹基金收到捐款2240萬，全部為人民幣，下同）不說，它在微博上的募捐動員還收到上百頁的“滾”字回應。截至五月7日，中国红十字会系统共接收社会捐赠款物7.7亿元，其中中国红十字总会接收捐赠款物1.5亿元。蘆山地震後中國紅十字會收到的捐款数量和速度远远无法和2008年的四川地震相比。截止2011年2月，该会累计收到用于2008年四川地震的国内外捐赠款物合计42.97亿元。可以說，當下中國紅十字會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公信力危機。

為什麼全球最有公信力的品牌在中國卻信譽掃地？有人說這是郭美美造的孽。不可否認，這有一定關聯。2011年夏年僅20的郭美美以實名論證註冊的“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身分”在微博上晒富，爆出自己住豪宅、駕名車、挎名包，並坐商務艙

天馬行空般逍遙自在。網民以此為線索，挖出“中國商業系統紅十字會”與“中國紅十字會”的關係和商業運作，並帶出“男友”、“乾爹”等越洗越臟、越抹越黑的醜聞。

後來，中國紅十字會撤銷了中國商業系統紅十字會，試圖撇開與郭美美的干係。但不管怎樣，中國紅十字會的金字招牌變成了厚黑招牌。人們開始切割與它的關係。在雅安地震後，一些基金會想要募到捐，不得不打出“與紅十字會無關”的告示。壹基金在網頁上與中國紅十字會進行了切割，但細心的中國網民還是在基金會的英文網頁上發現它與中國紅十字會在體制上的關聯和資金發放上的合作關係。壹基金成為大眾的質疑對象。當然，否認與中國紅十字會的關係、強調自身的獨立地位成為李連杰處理危機的策略。讓人大感意外的是，中國紅十字會常務副會長趙白鴿也來救火，發出聲明：“現在壹基金已經完全從紅十字會獨立出去，二者沒有任何關係，壹基金下撥善款不用經過紅十字會。”中國紅十字會成為慈善業的有毒負資產，由此可見一斑。最後挺身而出，力贊紅十字會的就剩下《環球時報》了。這難免不讓人感到“猩猩惜猩猩”的淒涼。

沒有“中立”，哪來可信？

但把郭美美作為替罪羊來為中國紅十字會頂罪，卻有商、周亡於妲己、褒姒的“紅顏禍水”之嫌。中國紅十字會自身的問題成堆：干預國際救援組織對台灣“9.21”震災的援助，在汶川地震中以天文數字定價帳篷，挪用汶川地震捐款，各級分會貪汙浪費醜聞不斷，官員安插家人領乾薪（例如四川省委副書記李春城把妻子安在成都紅十字會高位上），等等。所有這些問題日積月累最後壓垮了紅十字會的聲譽脊梁。

那麼，產生這些問題的根源又是什麼呢？為什麼在西方可以祛

魔的十字架卻成為中國不義之人逐利的護生符？簡單說來是因為中共的社會管理體制對公民社會抱著懷疑的態度，結果把所有重要的 NGO（非政府組織）變成了 GONGO（government organized NGO），或譯為“公狗”——“公權力的走狗”。中國紅十字會既不受國際紅十字會的領導監督，又與中共政權融為一體。在一段時間裡，紅十字會可以給政府塗上一層仁慈的色彩，而政府也可以給紅十字會帶來方便，二者可以互為利用。但隨著政府貪腐不斷、合法性缺失，紅十字會與政府的瓜葛和共同分贓的做法就成為公眾質疑的根據，而紅十字會內部任何醜聞都會引發民眾對它的討伐。中國大陸權力合法論證的邏輯鏈條開始斷裂：原本政府需要 NGO 來裱糊門面，結果所有的重要 NGO 無法擺脫利益衝突，喪失了獨立性和公信力。一旦政府、企事業單位、民間組織都成為了綁在一起的螞蚱，結成一個利益共同體，後兩者的任何錯失就自然成為政府危機的根源。

為什麼中國大陸政府要把所有說話有客觀公正性的個人和組織腐蝕、收買和圈養，全部納入黨國的利益共同體之中？當所有可能為你說話的機構全面喪失中立性和公信力後，輪到你成為歷史的被告時，誰來為你作證？

5.2 綁架中國的“寡頭轉型” (2013.03.08)

“轉型”在中國是一個敏感詞，因為它通常和“民主”結合在一起。其實，中國政治的冷酷現實是，“民主轉型”步履維艱；相反，中共的領導層在過去的二十多年裡已把中國推向了另一個轉型：通向寡頭制的“寡頭轉型”。

紅色寡頭制

政治學之父亞里斯多德在兩千多年前就做了明確界定：所謂寡頭制，是由少數人統治、僅為少數人私利服務的非自然的、不義的政體。它與由多數人治理、並為多數人服務的民主共和政體迥然不同。由於寡頭們可以利用國家政權任意瓜分財富，到了某一階段，財富的高度集中於寡頭之手又反過來支撐和強化寡頭制。所以，現代政治學家在談論“寡頭制”時，不僅針對少數人的自肥政體，而且也強調權力的高度集中和財富的高度集中形成的同構互助現象。

美國西北大學政治學教授杰弗裡·溫特爾斯（Jeffrey A. Winters）在新近出版的《寡頭制》一書中寫道：寡頭制是一種有

一小部分富人占有物質資源，並因此獲得權力損害大多數人利益的政治過程和政治安排。它關心的核心問題是如何應對來自民眾的政治挑戰、捍衛財富高度集中。

如果我們看一看中共“兩會”集聚的人群和他們討論的議題，就可以清楚地認清中共“寡頭制”的實質。2013年兩會共有83名億萬級富翁參會。他們的平均資產約為33.5億美元，與美國眾議院以及內閣最富有的83人平均資產相比，後者僅為5640萬美元。今天，鄧小平、葉劍英、王震、江澤民、李鵬、曾慶紅、胡錦濤、溫家寶、賈慶林、周永康、戴相龍、王岐山和習近平等家族，都已經成為擁有上億資產的豪門。最近發布的胡潤全球富豪榜顯示，中國十億美元富豪數量達到212人，超越美國的211人，成為全球富豪最多的地方。而近年來中國的學術機構和學者都有研究調查證實，90%以上的億萬富豪來至高乾子弟。難怪，路透社的《中國關係網》（China Connected）研究報告宣稱：中共領導的社會資本從家庭開始：一是“太子黨”，二是“金女婿”。

從“新階級”到統治寡頭

仔細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政體從一個所謂的“人人平等”的“社會主義”國家轉型為貧富差距已居世界前列的寡頭制，整個過程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新階級”的形成。正如南斯拉夫前領導人吉拉斯（Djilas）在《新階級》一書中揭露的，所有的共產黨以建立無階級社會為口號領導的革命，在奪取政權後，造就出了以共產黨高級領導人和官僚幹部組成的又一個特權階級。該書在1963年就已翻譯成中文並由世界知識出版社內部發行出版，但五十年來，始終還是中國的禁書。一方面，它的出版反映出毛在“文革”前對幹部官僚化和特權化的警覺，實質上配合了毛後來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半個世紀的查禁又說

明該書直接而又深刻地揭露出中共政權的實質和演變。吉拉斯寫道：“新階級的核心和基礎是在黨和黨的領導階層以及國家的政治機構中創造出來的。一度曾經是生機勃勃、組織嚴密和充滿首創精神的黨正在消失，而逐漸轉變為這個新階級的傳統式的寡頭統治，所以它不可避免地要吸收那些一心希望加入新階級的人，壓制那些具有任何理想的人。”

第二階段，權力成為“點金術”完成“權錢聯姻”。無論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經濟“改革開放”過程，還是九十年代後二十年的經濟貨幣化、金融化和全球化過程，政治權力都占據了制高點。在攫取全民資產時，自然享有“近水樓台先得月”的便利。但有一點區別還是很重要的：八十年代政權在工農業流通和生產領域與人民分享部分機會，以至民間財富成長很快。但在過去的二十年裡，大型國營企業和權貴家族基本上壟斷了金融、保險、房地產、電腦、通訊、能源、外匯、信息、電影和電視等新興產業，以至權貴和平民在機會和財富上面的鴻溝越來越大。教育負擔讓越來越多的平民子弟只能對著名牌大學望牆興嘆；“考公務員熱”凸顯“權力成為第一生產力”的怪象；高級領導子女“紈袴子弟化”已成中國社會道德之癌，等等，都無不反映出寡頭制的最終確立。

圍繞定量的判斷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政府和社會爆發了大衝突。自七十年代中國的基尼係數低於 0.2 到九十年代惡化到 0.3，再到 2008 年的 0.49，量化地勾勒出中國寡頭化的進程。匪夷所思的是，在 2008 年後，官方停止發布基尼係數。中國政治的常識告訴我們，沒消息就是壞消息，有消息常是假消息。在 2012 年年底，西南財經大學的經濟學家發布的研究報告顯示，基尼係數在中國已高達 0.61。針對這一數據，沈寂五年的國家統計局一下子發布連年的數據變化，宣稱中國的基尼係數連續走低，2012 年已回落到 0.474，試圖掩蓋中國社會發展真相。

第三階段，全面維護寡頭權力和財富的集中和安全成為國家，

尤其是軍隊、警察、武警和國安等暴力機器的核心工作。“維穩”體制的形成和強化不僅表現在國家暴力機器對民眾的肆意欺凌和傷害，對權利的剝奪和侵犯，“權力的技術”還表現在對統計數字的控制和捏造，對民眾心智的鈍化，把民眾訓化為“幸福的奴隸”。中國共產黨一方面剝奪民眾的選舉權，另一方面又買官賣官。上一代的中共領導通過權力把子女送上“撈金的特快”，現在又在後面使力，用金錢來收買，從而自己的子女登上權力的高台。江澤民的兒子江綿恆從網通老總變為中科院的領導，胡錦濤的兒子胡海峰從總裁職位退下變成清華高官，李鵬的兒子李小鵬從華能國際董事長的位置跳到山西省長的官位，無不顯示出中共豪門過去依靠權力的世襲現在又有金錢做幕後推手了。

寡頭綁架民主轉型

如果說，“八九民運”時的中國社會還沒有出現財富的壟斷和集中，中國還有可能順利進入民主轉型，那今天這種可能就已經變得更加虛無縹緲了。由於財富的集聚以及由此產生的貧富差距，再過若干年，當今中國的寡頭們就會放心大膽地採納選舉政治了。因為“一人一票”的政治平等可以由權力資源分配不均輕易地扭曲，中國當今的暴力寡頭（黨魁和軍頭們在拉薩戒嚴、“六四屠城”和新疆鎮壓中都不再講理，而只用暴力）也會用選舉做幌子，來操縱和運作類似印尼和菲律賓的“伊斯蘭蘇丹式政權”的寡頭制。

耶魯法學院教授、以“虎媽”著名的蔡愛眉在《世界著火了》一書犯下了一個重要錯誤，她把“民主制”和“寡頭制”混為一談，把“寡頭轉型”誤認為“民主轉型”，從而否定自由民主轉型在第三世界國家的價值和意義。在這樣的理論和概念的混亂背景下，一方面，中共的御用文人用第三世界國家民主轉型失敗後出現的“寡頭制”來否定民主轉型在當下中國的價值；另一方面，中共

政權又在急劇地推動寡頭轉型，以捍衛和鞏固他們對權力和財富的雙重壟斷。

不幸的是，寡頭化傾向在歐美和日本都有抬頭。過去三十年“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全球化進程拉大了社會各階層和世界各國之間的貧富差距。但歐美的進步勢力已經出現聚合和反擊。“占領華爾街”運動和以此推動的“占領全球運動”，奧巴馬的兩次當選，美國“茶黨”運動的興起，共和黨候選人羅姆尼的慘敗，都反映出“99%”對“1 %”的反抗。“茉莉花革命”實質上也是在金融風暴後中東國家的普通民眾對寡頭制的反叛。但更不幸的是，當中國的權勢階級已經成為成為全球反動的寡頭化的主要推動力時，中國的“99%”卻沒有覺悟，未能清醒地認識到“寡頭制”的威脅。

“快速轉型”已經是中國過去二十年不爭的事實。問題的實質是，這種轉型是通向“民主制”還是“寡頭制”。顯然，在中共權勢集團的主宰下，中國已經踏上了、並基本完成了“寡頭轉型”。如果中國人民還不能幡然醒悟，如果中國的民主進步力量還無法聚集起來，抵制寡頭制，推動民主制，中國人民最終只會被永遠禁錮在通往奴役的道路上。我們留給我們後人的“中國夢”恐怕就只能是讓他們永遠做夢而已！

5.3 四川：從豪邁再回悲壯 (2013.05.11)

2008 年的汶川大地震整整三年後，四川省省委書記、人大常委會主任劉奇葆在國防大學發表了一篇演講，總結四川汶川地震後的重建工作，題目是《四川從悲壯走向豪邁》。四川提出了“三年基本恢復、五年發展振興、十年全面小康”的災後重建總體目標。對重建工作的成就，劉奇葆做了這樣的評價：“震後四川依然美麗，震後四川更加安全。”他告訴我們：“災區老百姓流傳的一句話，現在災區最漂亮的是民居，最安全的是學校，最現代的是醫院，最滿意的是百姓。”總而言之，“過去兩年多，四川從悲壯走向豪邁；展望未來，天府大地正與祖國一道，大踏步地走向美好明天。”

照著劉奇葆的路徑圖，此時此刻當是四川慶祝完成“五年發展振興”的時候。可惜天公不作美，2013 年雅安蘆山大地震再次讓具有“天府之國”美譽的四川滿目瘡痍。因為五年時間裡發生的兩次大地震都在龍門山地帶，震中相差不到一百公里，對比兩次震災情況和救災工作，可以幫助我們瞭解和認清中國治理體系存在的痼疾。

民眾對救災的評價

首先，我們需要知道四川震區的老百姓對汶川大地震中政府工作的真實評價。為此，在 2010-2011 元旦、春節期間，我完成了一項災區的問卷調查。根據收集到的幾千個電話號碼，該項調查向失去孩子的父母徵集意見，涉及 34 項內容。在撥打上千個電話號碼後，272 位家長接收電話，33 位拒絕或未完成採訪，我共收集到 239 份有效問卷。下面我與讀者分享我的部分研究成果。

問題之一：“你認為政府救災行動總的來說是：A. 很讓人滿意；B. 基本滿意；C. 不滿意；D. 很糟糕。” 答案選項是：A，2.6%（6 人）；B，46.3%（105 人）；C，41.4%（94 人）；D，9.7%（22 人）。有 12 人未回答。在所有選項中，負面評價（C 和 D 相加為 51.1%）超過正面評價（48.9%）。值得注意的是，帶有強烈意向的兩個極端，負面評價“很糟糕”是正面評價“很讓人滿意”的三倍多。

問題之二：“你認為你娃兒所在學校的救災行動總的來說是：A. 很讓人滿意；B. 基本滿意；C. 不滿意；D. 很糟糕。” 答案選項是：A，1.3%（3 人）；B，17.3%（39 人）；C，41.3%（93 人）；D，40%（90 人）；還有 14 人未回答。負面評價（81.3%）遠遠超過正面評價（18.7%）。如果我們意識到國家和政府辦學的基本事實，對這一問題的負面評價也是對政府的不信任表現。

問題之三：“在你的孩子被垮塌校舍傷害後，你覺得事情的主要原因是：A. 完全是天災造成的；B. 主要是天災造成的，但也有人禍因素；C. 完全是地方官員和承包商的腐敗造成的；D. 不曉得。” 答案選項是：A，6.98%（15 人）；B，45.12%（97 人）；C，46.98%（101 人）；D，1 人；24 人未回答；還有一人選了 B、C 兩項。也就是說，90% 以上的父母認為學校校舍垮塌存在人禍和腐敗因素。這與中國政府堅持的“自然災害破壞力不可抗拒說”

截然不同。

問題之四：“有家長和媒體報導反應，垮塌的學校校舍存在‘豆腐渣工程’。你的看法如何：A.基本同意；B.完全同意；C.不同意。”答案選項是：A，17.37%（37人）；B，71.83%（153人）；C，10.33%（22人），有26人未回答。儘管中國政府否認災區校舍垮塌與“豆腐渣工程”有關，但近90%的受訪父母不同意政府的結論。

問題之五：“通過這次災難，你對黨中央持何種看法？A.更加信任；B.更加不信任；C.沒有變化。”答案選項是：A，80.6%（170人）；B，7.1%（15人）；C，12.3%（26人）；28人未回答。

問題之六：“通過這次災難，你對當地政府持何種看法？A.更加信任；B.更加不信任；C.沒有變化。”答案選項是：A，0.5%（1人）；B，88.5%（185人）；C，11%（23人）；30人未回答。

上述兩個問題必須放在一起考量分析，我們才能看到它們反映出的深層次信息。首先，少部分家長對黨中央產生不信任是一個事實。其次，黨中央的合法性得到更多的認同。最後，地方政府遭遇嚴重的信任危機。如果我們考慮進中央強大的宣傳攻勢、百姓對“反黨”指控的深層恐懼和中國是一黨執政的單一制國家，問題六暴露出的治理危機也實際上威脅著中共的合法性。

政治豆腐渣

從劉奇葆的官方評價到失去子女的父母們的評價，我們看到了對救災工作兩種完全不同的態度。對於這種分歧，中國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並未因此而認真傾聽這個受災最深重的人群，去直面他們提出的問題。相反，政府採取欺騙和打壓的方式試圖掩蓋問題。劉奇葆的“口號政治”、胡誇作風成了他升遷的敲門磚，為此他入主政治局、升任中宣部部長。原四川省常務副省長魏宏

也因震災而官運亨通。他在掩蓋學生死亡人數、否認“豆腐渣工程”的存在、打壓民間自發的真相調查等許多不光彩的活動中擔起了馬前卒的角色。不難預料，他成為現今主持四川工作的省長。

中共官員上上下下肆無忌憚地掩蓋五年前的汶川地震真相，拒絕直面“豆腐渣工程”和牽扯到的腐敗問題，不僅是因為這些問題的深究會“拔出蘿蔔帶出泥”，引發中國政壇的地震，而且還因為他們抱著一個僥倖心理。汶川地震後，有中國科學家斷言，汶川地震千年一遇，未來百年之內四川不會遭遇大震。四川的官員們似乎可以繼續貪腐、繼續建造劣質工程，而不會暴露。他們似乎相信，打壓艾未未、艾曉明等民間人士，關押黃琦、譚作人等就可以繼續為官作惡。

既然貪官們的這些所作所為是天誅地滅的，山崩地裂發出怒吼似乎又理所當然。劉奇葆和魏宏們萬萬沒有預計到天怒會來得如此之快。雅安地震暴露出汶川地震就看到的同樣的問題。儘管在2008年雅安地區就是災區，也經歷了“人間奇蹟”的重建，但學校垮塌依然，災民貧窮依舊。正是因為這樣，現在的雅安救災更強化了“黨國軍”三位一體主導的“中國特色救災模式”：封鎖信息，弘揚主旋律，變救災為“維穩”，打壓公民社會，等等。國際救援組織和公民自願組織都被拒絕進入。暗箱操作比五年前更勝一籌。

我們又會聽到“偉大的地震、勝利的地震”之類的慶功言語，我們還會看到“感恩黨、感恩祖國、感恩社會”的教育活動。但我也同樣堅信，如果我們能親自深入災區，傾聽災民的聲音，我們會有不同的結論。其實，四川災民的處境依舊悲壯，並非如宣傳部長劉奇葆要我們相信的那麼豪邁。

5.4 中共的意識形態癲癇病 (2013.06.07)

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是以販賣進一個西方理念起家的。馬克思的人類社會改造計劃沒有在西方的主流價值體系中找到中心位置，卻在他所鄙視的“東方亞細亞”社會中找到了試驗田。無論是典型的中國東方社會形態，還是半東方的俄羅斯，還是天主教占據多數的法國和意大利，都成為了遠較西方新教文明更為適合共產黨生存的土壤。但二戰後，西方國家的左翼知識分子在經歷了“粉紅十年”後，認識到共產主義是一個“失敗了的上帝”，開始拋棄它。赫魯曉夫揭露出斯大林的暴行後，蘇聯共產主義信仰崩潰，龐大帝國開始了瓦解，直到戈爾巴喬夫時代徹底坍塌。共產主義在歐洲實踐以失敗而告終，給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敲響了喪鐘。而中共的最終徹底失敗也是會以意識形態的死亡為標誌的。

中共意識形態的退化

中國對馬克思主義接受經過了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三層汙染，起始就帶有從近、現代文明的中心地帶向邊緣地帶退化和庸俗化的特徵。但因為這種退化是以暗合中國歷史專制主義傳統為

核心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又獲取了強烈的本土適應力。不過，與傳統的東方專制主義相比較，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還有一個只是當代極權主義政權才有的特徵，即對心智的暴政和對思想的控制。實施這一目標的精神改造又叫“洗腦”，或叫“對心智的強姦”。

中國共產黨引進了辯證唯物主義，其實玩的是用“極端主義”和“虛無主義”雙重手法來詆毀和消解中、西方的精神遺產（尤其是心智至上的哲學觀和各種宗教學說），建立自己的詭辯話語體系。它又繼承了歷史唯物主義，建立了一套虛假的歷史進化階段論，用歷史決定論來代替人們的自由意志和自由選擇，把共產主義作為最高價值強加給民眾。毛澤東的“老三篇”（《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把他的追隨者轉化成了精神奴隸；他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又把知識分子馴化成幫助他洗腦的工具。這種做法在共產黨奪權後繼續演繹：前者有“學雷鋒”、“學大慶、學大寨”等運動，後者有“三反五反”、“反右”和“文革”。通過當代的“焚書坑儒”、愚民政策和個人崇拜，毛把馬恩列斯主義打造成世俗化的神學教條，而自己則裝扮成他們在中國的先知和救主。在匱乏和恐懼雙重壓力下，絕大多數中國人民接受了毛的烏托邦似的意識形態，直到上帝之手結束了毛的性命後，才敢發出對毛主義的懷疑。

神經中樞受損退化後的癲癇症

無論毛主義有何等的瘋狂和荒謬，至少有幾點是可以肯定的：第一，毛還是有信念的，他似乎也試圖實踐他的信念，但他沒有找到合適的方法。第二，毛對中國和中國人的現實有深切的瞭解，所以他還能建立自己的超凡魅力來動員民眾。第三，儘管毛犧牲了以千萬計的中國人，毛也不惜犧牲自己的家人來實現他的理想。第四，毛對全球權力格局和走向有敏銳的直覺，所以他的意識形

態既激發了中國人自己抵禦外辱的想像力，也曾激勵了無數第三世界國家反對帝國主義。如果說毛是一個精力體力、想像力、抽象能力和超凡魅力都過人的激進主義惡魔，那他的後繼者則是一批沒有想像力、沒有人格魅力、沒有宏大理想的平庸的黨國政工幹部。他們永遠不會步入毛時代“恰像颱風掃寰宇”的激進的烏托邦主義，他們染上的意識形態病症只能是神經中樞受損退化後出現的癲癇症。

毛澤東緊抓意志把中國人誘入瘋癲狀態去奔共產主義烏托邦。矮小的鄧小平則像張愛玲教導出的女人，從腸胃入手征服了中國人。在“求溫飽、奔小康”的肚皮政治下，鄧卻也未忘一個大志：等中國人解決了吃飯問題後，再推行民主選舉。江澤民似乎也認同這一思路。所以，從鄧首肯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到江推出的“三個代表理論”有著邏輯的聯繫。但到了2004年，所謂的“胡溫新政”提出“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問題是，這兩項口號不是“胡、溫”力求進取而踐行的完美標準和追求的宏大目標，前者成了“胡、溫新政”自我認證的商標品牌，後者成了中國人現狀的“客觀描述”。從“胡、溫”到“習、李”，他們打造出了“大國崛起”、“和諧社會”和“千年盛世”的表象世界，然後，再動員舉國體制把這一華麗的表象世界植入中國人的意識之中，並讓每一個中國人接受它為中國的客觀現實。

僅僅從政治理論層面，我們可以看到中共意識形態工程的幾個特徵：第一，新意識形態是以“訓誡”的形式出現的。他們只是中共政治化妝師扳著指頭來昭示天下的，所以我們看到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兩條腿走路”、“三個自信”、“四項基本原則”、“五個不搞”、“七個不講”、“八榮八恥”、“三個絕不允許”、“四個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等等。

“宇宙真理論”挑戰“普世價值”

第二，意識形態新戒律既不需要前提，也不需要內在邏輯；既不留下討論、異議的空間，更不允許反對的聲音和多元選擇。比如說，中共最高智囊王滬寧把美國民主思想家杜威的“鞋子夾不夾腳、夾在何處，只有自己知道最清楚”的個人自由主義原理，運用到中國國家主義的外交，宣稱“道路合不合適，只有我們自己知道，外國不能指手畫腳”；同時否認個人自由選擇可以同時適用於個人和國家的關係、國與國的關係。再比如，中共又一高級智囊俞可平提出“三個和諧統一”，宣稱“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核心，卻無法認識到，賦予中共一黨永久獨享執政特權就已經割裂了執政黨與人民的選舉紐帶，破壞了法治精神（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的正當程序，等等）。最為可笑的是，中共一手否認“普世價值”，另一手卻捧出“宇宙真理論”，聲稱中國堅持的“主義”就是“宇宙精神”。

第三，中國社會科學界全方位緊急跟進，與黨國宣傳機器一體化，以至中國思想界妖孽盛行、妄語充斥。近來出現的“新四論”（楊曉青的“憲政屬資論”、劉亞洲“黨性神性論”、《解放軍報》的“宇宙真理論”、劉小楓認毛為父的“新國父論”）就是典型例證。我所認識的一位復旦教授蘇長和還做了“將西方民主知識從普世降為地方級別”的工作，完全無視在上世紀的民主第三波後，全球絕大多數國家和絕大多數人口都選擇生活在了他所說的“地方級別知識”下了。

當中國的學者甘心被一個慣於迫害文人、扭曲知識的政權御用、並引以為榮時，他們似乎忘記了“存在即合理”的現狀還有一個原始含義：國家的理性（raison d'être 和 reason of state）。如果他們甘願放棄理性，熱衷於仰賴國家機器來放大他們的意見和

支持他們的結論時，知識精英也加入了發羊癲瘋的幹部官僚隊伍。

法國政治哲學家福柯曾說過：“沒有任何東西比一個漠視真理的政權更不穩定；沒有任何東西比一個聲稱能界定真理的政體更加危險。”

5.5 人大制度：政治花瓶？政治曇花？ (2014.09.12)

中國人大制度建立已整六十年。在中共奪取政權之前，人民代表大會就被確立為建設中國新民主主義的核心機構。檢審該制度在一個甲子時間裡的興衰起伏，就像是查看中國民主化進程的政治溫度計。

未兌現的承諾

2014年九月，習近平發表了《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六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宣稱：“在中國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人民在人類政治制度史上的偉大創造。”他還說：“60年的實踐充分證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符合中國國情和實際、體現社會主義國家性質、保證人民當家作主、保障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好制度。”

對習的這篇重要講話，我們可以一分為二地做個分析。首先，我們可以達成一個共識：中國人大制度在建設中國民主和推動憲政的過程中已經和繼續將發揮重要作用。但是，當下人大制度的全面式微卻是不爭的事實。

74年前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就承諾：“中國現在可以採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省人民代表大會、縣人民代表大會、區人民代表大會直到鄉人民代表大會的系統，並由各級代表大會選舉政府。但必須實行無男女、信仰、財產、教育等差別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選舉制。”但中共建政兩年後，劉少奇就指出“普遍、平等、直接無記名投票”已經成為“老口號”，過去用來“反對蔣介石的獨裁政權”有“進步意義”，但在新政權下則不適合，“主要是勞動人民還不識字、過去沒有選舉的經驗，他們對於選舉的關心和積極性暫時也還不充分。”

進入21世紀，在習的講話中，仍然沒有實現普選的承諾。在講話第一句，習認定間接推選的第一屆人大是由“普選”產生，否定了一個根本的事實：二戰後至今，世界上只有兩個國家從未進行過全國普選，中國和沙特阿拉伯。儘管朝鮮和越南這樣的國家操控選舉，保證黨提的候選人100%當選，它們的最高議會也是全國直選的。習近平唯一一次提到“民主選舉”，也是在肯定現階段的人大選舉：縣鄉直選、以上人大由下一級人大間接選舉。與今年剛舉行的印度大選相比，那裡8億多選民、5億5千多萬人投票，在中共領導人眼中，中國國情之差、民眾素質之低，由此可見一斑。

人大的小陽春

鄧小平對人大工作的推動主要來源於他分權和放權的改革，和由此產生的對人大工作的尊重和人大領導的不干預。發揮人大積極作用、發揮中央和地方兩頭積極性，成為全國人大系統制度化和權力擴張的上方寶劍。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人大從“大牌子、老頭子、空架子”的“兩手會議”（舉舉手、拍拍手）和“橡皮圖章”逐漸鋼印化，在反映民意、監督行政司法和反腐上發揮

了積極作用。“跑小步、不停步”的漸進增量改革和“磨合”擴權方式，幫助人大積累發展出一套制度和方式，推動了中國邁向民主憲政的進步。例如，1990年代的“評議制度”、“司法檢查”和“個案檢查”、人大信訪、走訪選民工作等等，都是探索中國特色民主化道路的各種嘗試。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在1989年民主運動期間，全國人大在京部分常委發起簽名運動，試圖通過召開人大特別會議來解決京城危機。在宣布戒嚴前，人大法工委還通過回覆的方式，支持湖南省人大罷免副省長楊匯泉。在外出訪的委員長萬里也做出姿態，希望通過人大程序解決國內危機。而當時人大內部的當家人正是常務副委員長習仲勛，也就是習近平的父親。

彭真、萬里、李鵬、喬石和他們的副手陳丕顯、習仲勛、田紀雲（在李鵬和喬石兩屆任內）結成的“黃金搭檔”給人大系統加上了脊梁骨。但不幸的是，2003年，“兩國”（吳邦國和王兆國）治人大，中國人大走上了十年衰敗路。

為“錢袋子”服務的“清談館”

吳邦國自廢人大武功的大舉措是把黃菊和他在上海摸索出的由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總方針帶到了中央。人大成為幾乎與政府、政協、工青婦組織並列的被協調方，所謂“最高權力機構”大打折扣。王兆國上任伊始，就把中國最有成就的人大研究專家蔡定劍趕出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因為蔡定劍寫過《中國選舉狀況的報告》，系統批判了阻撓推行普選的“公民素質論”，引來王兆國一番教訓：“吃體制的飯，不能說反體制的話。”結果硬是敲掉了蔡定劍的副局級金飯碗，而且還不許他回到北大。

隨後，一系列保守措施出台，原來的改革探索被叫停。評議制度、個案檢查、司法檢查、代表走訪選民基本上廢棄了。人大

信訪劃歸政府統一的“大信訪”體制。在新公布的《監督法》裡，監督權只給了人大常委會，人大和普通代表並未被授權監督政府。地方民主創新實驗全面萎縮和中斷，例如“海選”和“民主懇談”等。所以，面對中國民眾呼喚更多自由和民主時，人大不是缺位（例如烏坎事件），就是充當殺手。例如，在2011年“獨立候選人”現象產生後，全國人大法工委首先斷定，獨立候選人“沒有法律依據”。在2014年香港爭取特首普選時，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張榮順到香港宣讀反對普選的指示。

而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已經知道，根據彭博新聞社報導，全國人大70名最富有代表2011年的財富淨值，超過美國國會全部535名議員、美國總統及其內閣成員、9名最高法院大法官財富淨值的總和。全國人大已成中國“富翁俱樂部”（他們許多擁有外國國籍），各級人大也成官商和官黑勾結的場所。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習近平堅決反對“政治制度上的‘飛來峰’”。其實，中國人大制度又何嘗不是巴黎公社加上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制度“飛來峰”？在裡面坐著的代表又何嘗不是外國的不明飛行物？

難怪，上海絕望的訪民會在人大會場前舉起“淫大呆婊”的牌子。人大是否該受如此奚落，當然還有討論的空間。但毫無疑問，習近平的講話和他依賴特別委員會治國的“超級國家主席制”，只會使人大制度更進一步歸位到“橡皮圖章”。

5.6 習式反腐為何注定失敗？

(2014.09.08)

我樂觀習近平掀起的反腐打虎運動，也不會成人之惡、促其失敗。但縱觀共產黨反腐歷史和基於政治學理分析，習式反腐注定只會是忙跑愚人差。腐敗、獨裁和虛偽（主要寄生在黨國、官僚和軍警三大體系裡）是共產黨壓在中國人身上的三座大山，光靠愚公移山的精神，甚至愚公移山的行動，恐怕都會只是揚湯止沸。

習近平和黨國一體

首先，為什麼對習式反腐我們應該樂觀其成？這裡的我們當然是特指所有對黨國體制已經放棄的人群。作為深受黨國荼毒或認清黨國邪惡的人們，看到昔日的作惡者最後在古稀之年深陷自己曾經精心打造的囹圄，給家人帶來災禍和給後人留下罵名，不能不說是一絲安慰，畢竟天地良心之間還有質樸的公理在做工。俗話說得好：“惡人自有惡人磨”。對所有還有一點人性的黨國官員來說，這也是一個警醒。“文革”時期留給我的一個正面小遺產是《小兵張嘎》裡的一句話：“別看今天鬧得歡，當心將來拉清單。”

但我們是否有理由為習式反腐歡呼站台，甚至感情投射，幻想習近平在下很大的一盤棋，反腐只是第一步，他在謀劃中國的民主轉型？當然，習近平身邊有許多形象設計師和公關專家，他們刻意在海內外媒體上塑造習式神話和習式家庭神話。為此，也有一大堆“粉絲”雲集。但這些都改變不了一個根本事實：習近平和黨國體制不可分割。猶如一個人不可能提著自己的頭髮想要離開大地，習近平不可能通過反腐升華共產黨，帶來中國的憲政轉變。原因其實很簡單。

我們熟知的奧爾森和他的著作《集體行動的邏輯》發現了一條真理：面對公共產品，個人的理性選擇是“搭便車”，而不是參加集體行動，犧牲個人利益，去爭取、擴大和維護公共產品。環境質量、草場維護、海洋保護、教育品質、社會治安、民主憲政等等都是例子，凸顯需求大於供給、“免費搭車人”多於貢獻者的矛盾。人們已經習慣於用這一理論來解釋中國民主化的困境。比如，人們願意起哄，製造每年十幾萬、甚至可能二十萬的群體性事件，但卻少見社會運動領袖的批量產生。人們樂於發牢騷，但很少人願意參與進民主運動。共產黨“槍打出頭鳥”的策略更是加重了參與者、尤其是領導者的風險，滋生了更多的烏合之眾。所以，許多人對中國實現民主化非常悲觀。

專制體制下唯一的愛國者

但很少有人會認識到，共產黨政權早已經陷入了更大的集體行動的困境。中共從八十年代就談起了“三信危機”，今天少有人會相信，八千萬中共黨員是為著共產主義信念而入黨的。為了增加入黨的吸引力，黨票成為了升官發財的通行證已是不爭的事實。而升官、發財的同步化是黨國動員黨員幹部、調動個人積極性的微觀制度設計。“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悶聲發大財”、

“腐敗是改革的潤滑劑”說的都是同樣的道理。設想一下，如果周永康沒有把央視變成自己后宮的便利，滿足自己“百雞王”的慾望，他會賣命打造維穩體制？設想，如果徐才厚、令計劃、曹建明之流沒有到京郊祕密會所花天酒地的犒勞，他們會為周永康抬轎？設想，如果不是薄熙來向一幫新左派文人發射銀彈和肉彈，他們會趨之若鶩，把重慶山城當作革命聖地？

賦予共產黨人“俱樂部優惠”這一制度設計解決了招募共產黨人、高舉意識形態大旗的微觀動力，但卻產生了另外一個問題：結構性和彌散性的腐敗。每一個共產黨官員小至比芝麻還小的副股級幹部，都可能成為魚肉人民、貪汙驚人的碩鼠。從每一個官員角度來看，我自己偷一點、貪一點，實在無損於黨國的大家當。

“偉光正”黨的執政合法性和長治久安又不會因為我一個人的貪腐而損害半分。所以，從個人動力機制來看，中共反腐宏觀政策無法結合個人的利益，真正為黨國分憂解難的人越來越少。不幸的是，在專制體制下，唯一的愛國者就是專制者本人。所以集所有黨政軍內外大權於一身的習近平就成了中國唯一的“愛黨國男兒”。他的反腐動力機制來自最上層，所以他用集權、控制、恐嚇、威懾的專制權力方式來拍蒼蠅、打老虎，從而幻想避免亡黨亡國的命運。而其他各級官員都在搭習近平的免費車、吃共產黨的免費午餐。

中美反腐體制差異

如果我們對比一下民主體制下的反腐機制，道理就變得更清楚了。民主體制下仍然有腐敗，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但因為一方面，在民主體制下要當選要職，必須獲得上萬（例如美國一個地方議員）或幾百萬（例如美國參議院議員）選區多數的支持，行賄腐敗選民變得不可能，所以政客必須關注提供公共產品、獲

得絕大多數人的擁護。即便這個政客獲得了多數支持，但不投他／她票的選民還是數以萬計、甚至百萬計。也就是說，他／她時刻都處在上萬雙眼睛的監督下。更何況還有專職挑刺的反對黨和專業扒糞的新聞媒體，反腐就有了微觀制度基礎。

在 1994 年我還在研究生院學習期間，美國政壇發生了一起貪污醜聞。當時眾議院掌握撥款大權的籌款委員會主席丹·羅斯坦克沃斯基（Daniel David "Dan" Rostenkowski）被控在任職的二十多年裡共濫用 50 萬美元公款，中飽私囊或恩惠親信，罪名多達 17 條。後來他有兩項罪名成立，主要是動用公款送禮，被囚禁 17 個月。在世界上最富的國家、發生在掌管錢袋子大權的官員腐敗與中國的縣級官員相比，也顯得非常寒酸和無辜。2014 年在我居住的島上，國會議員、眾議院財政委員會成員邁克爾·格林（Michael Grimm）被控隱瞞他在當選前合夥開辦的飯店收入，三年共計一百萬美元，沒有繳納有關稅收，遭到聯邦調查局調查並被聯邦法庭起訴。在法庭還未判決前，格林就被迫辭職下台。有罪已定，但是否會被監禁還很難說。但即便退一萬步說，三年一百萬收入逃稅，也不會超過 30 萬。對於任何一個中共官員來說，如此小題大做，真是匪夷所思。今天我們談論的中共腐敗案，動則上億，甚至幾十億。

但中美反腐的差異反映出民主和專制兩種體制的反腐制度設計。中國政府可以搞轟轟烈烈的反腐風暴，但不可能在源頭上、在搖籃中就遏制腐敗。而要真正給反腐敗宏觀政策配以微觀制度基礎和個人監督，選舉和選民，反對黨和獨立媒體都是不可缺少的。這就是為什麼習式派系鬥爭型反腐注定會失敗。所謂反腐成功後的民主轉型就更無從談起了。

在《日瓦戈醫生》的電影裡劫持日瓦戈的紅軍就是否讓日瓦戈回家，司令和政委展開了一場爭辯。司令出於人道同意放人，政委為了革命堅持要留下他。司令發火威脅要槍斃政委，政委說：

“你可以槍斃我，但你永遠槍斃不了黨。”在《1984》一書裡，奧威爾同樣論述到：“黨並不在乎延續它的血脈，而只在乎延續它自身。誰掌握權力不重要，只要等級結構體制永遠不變。”如果我們期盼在黨體制下，個人可以取代黨，就會犯下薄熙來那樣的錯誤。

附錄 5.1： 溫資曝光引發政治後果不可預測 澳大利亞廣播公司樊慧強採訪 (2012 年 10 月 29 日)

美國《紐約時報》披露，中國總理溫家寶的家人在其任總理期間積累了至少 27 億美元的個人財富。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系的夏明教授認為《紐約時報》的這篇報導是非常重量級的，是具有爆炸性意義的。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家人請律師發聲明、反駁家族擁有這筆祕密財產的報導。

溫家寶目前仍然是一個民意較高的領導人。這一消息，毫無疑問，會對溫家寶本人造成很大壓力。

雖然薄熙來因腐敗以及其他罪名被清除出中共和人大，但是很難讓公眾相信，中共領導人打算清除腐敗。因此，有專家認為，中共新領導人要想改變社會看法，就必須採取行動。如不改革甚至會導致官民矛盾加劇和社會問題惡化，最終導致社會動盪。

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系的夏明教授在接受澳廣記者樊慧強的採訪時分析了《紐約時報》這篇報導有多大的可信度，以及會對

中國造成什麼樣的影響談論了他的看法。

他認為這是一篇非常重量級的，具有爆炸性意義的新聞，並說溫家寶要澄清這一報導的做法也是非常不尋常的。夏教授說，另外這篇報導針對的是中國形象最好的，而且具有改革意識的領導人來發起的，因此引起的政治後果是不可預測的。

夏明教授說《紐約時報》跟中國有很多的關係，它要考慮它在中國市場的情況，其中包括它今年推出的中文版，夏教授認為，如果《紐約時報》對這篇報導沒有 90% 以上的把握的話它是不會發表的。他說，顯然這篇報導經過了非常嚴格的審稿，一定是他們上上下下都已經達成了共識，他們有一定的事實根據了，能夠把握得準，所以才發表出來的。

夏明教授認為《紐約時報》掌握了非常詳實的根據。他說溫家寶家人的回應基本上也沒有就報導提及的 27 億美元的財產進行詳細的辯解，而只是說，主要都是他家人的，與溫家寶本人沒有關係。

夏明教授說，就目前中國的情況來看，你要是不辯護，別人會覺得你有問題。你一辯護，甚至出示各種正規的文件，但是老百姓也會說，現在什麼東西不可造假，所以夏教授認為這篇報導使溫家寶陷入一個非常困難的處境。

他說，近期西方對 3 個人比較重視，今年以來《紐約時報》爆料了很多薄熙來的事情。在上半年，薄熙來和王立軍案件基本上是《紐約時報》關注的中心。日前，彭博新聞社拋出了習近平家族財產的報導。現在《紐約時報》又拋出有關溫家寶的報導。有關溫家寶的這篇報導是在中共 18 大召開不到 10 天的時間發表的。顯然這篇報導具有很大的政治效應。

夏明教授認為，諸如薄王事件的報導，西方媒體一定得到了中國內部提供的許多信息材料。同樣的，現在有關習近平和溫家寶的報導，也一定得到了中國內部非常高層，非常權威的信息來源。

他認為現在西方的媒體已經成為中國權力鬥爭的延續，並成為 18 大權力鬥爭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夏明教授說，西方媒體有它自己的考慮，只要你們能爆出真實的材料的話，經過它自己的研究、審查和評估，認為確實是可靠的話，它不管你是左、中、右，它都會爆炸性地刊登出來。他說，這樣做一方面會影響中國左、中、右的權力鬥爭。另一方面，當你把左、中、右的醜聞都爆出來的話，他覺得最根本的就是會對中國共產黨黨國的體制形成一個更大的殺傷力。因此他說，西方的媒體不是要去幫助哪一個派系在這次 18 大的權力鬥爭中獲得某種勝利，而是從根本上削弱中國黨國的合法性。

夏明教授說，新的領導班子剛上台之後，顯然老百姓會對他們抱有希望。如果習近平能夠得到老百姓的希望和信任，同時自己能夠採取切實的措施，來真正推動中國的反腐、民主化、保護中國老百姓的人權、消除中國老百姓的恐懼，如果他能真正在這方面採取切實的措施的話，顯然新的領導班子的合法性會得到加強。但是夏教授說，他現在還不能確定新領導班子會朝那個方向走。

夏明教授說，中國幾代老領導人還在後面起著很大的作用，因此，習近平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夠擺脫一層層黨國元老的控制，而這些黨國元老在多大程度上想把習近平利用起來，作為保護他們既得利益的一個工具，他覺得這對習近平的挑戰是非常大的。

附錄 5.2:

在“法廣”四談腐敗和反腐： 記者流芳採訪

訪談一：中共的反腐沒有超出利益集團模式，是權力和派系鬥爭的工具（2013.12.09）

最近數天來，有關“中共中央政治局前常委、政法委書記周永康被抓”的消息廣為流傳。儘管此一消息尚未得到中共官方證實，卻成為關注中國政壇各方人士熱議的話題。中共新領導人習近平在一年前接任總書記之初，就高調力推整風和反腐，自提出“蒼蠅、老虎一起抓”的主張以來，更引發各方猜測。真正的大老虎究竟是誰？是打一隻大老虎以儆效尤？還是下定決心打垮所有的大老虎、完善打擊權力高層腐敗的目標？對此，美國紐約城市大學教授夏明先生接受了本台的採訪。

法廣：薄熙來倒台以來，外界始終關注著周永康的動向，一直在猜測他何時落網？周永康的倒台有著怎樣的特殊意義？

夏明：周永康的事件因為牽涉到兩大事件，一個是薄熙來事件裡面的政治動機，尤其是薄熙來受到周永康的支持，想打亂當時中共政治局的安排，就是由習近平擔任總書記、李克強擔任總理的這樣一個安排；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周永康想和薄熙來結成政治聯盟、獲得最高權力；第二個，我認為處理周永康的重大意義是，他不僅在政治局常委的位置上，從中國的反腐看，基本上是殺雞給猴看，基本不會觸及最高領導人。在中國，做為中國共產黨集體領導的這樣一個體系，政治局常委的位置就屬於最高領導人的位置。如果處理周永康，顯然就表明在中國的政治發展上，具有較大的政治意義。尤其周永康在任政治局常委的時候是中共

政法委書記，而中共政法委在過去十幾年建立的高度的維穩體系對人權極度的踐踏，對中國老百姓製造了許多的悲劇。因此我覺得：觸及到周永康，也是在質問整個維穩體系。

法廣：周永康是不是北京政府準備打擊的大老虎？將他扳倒後，反腐鬥爭有否可能暫告一段落？

夏明：應該這樣來看：因為周永康過去的任職是在石油系統、石油部，後來到四川、四川省委書記，然後到公安部，隨後又進入政治局常委。目前情況看，他原來工作的地方，他的主要助手和他提拔的親信，現在都一一得到了清洗和抓捕。我們看到，整個石油系統和四川省省長和副書記都已被抓起來了。所有這些人被抓步驟是非常明顯的。全在走向周永康最後收網。我相信收網工作已經進行了。為什麼現在謠言四起而中共一直沒有正式表態？我覺得它的處理方法可能有點像林彪事件。林彪事件發生一年後才給全國通報。當然這次不可能等待一年。我相信現在的謠言都是有真實的資料和信息來源的，應該說它們是可靠的。中共至今沒有證實，是他們在一層層地往下傳達。它要通過黨內的內部信息往下走。因此我覺得周永康的倒台應該是非常確定的。

但是另一方面，周永康到底牽涉到的上邊的人究竟是誰？現在猜測當中的有兩個人：一個是江澤民，一個是曾慶紅。那麼這兩個人會不會受到觸及？我認為是不會的。因為江澤民和曾慶紅是習近平強有力的支持者。習近平在上海做市委書記的時候，做為一匹黑馬，通到了政治局常委裡邊，地位超過了李克強。其中最後的運作，儘管其中有許多因素，卻不缺上海幫的因素。曾慶紅和江澤民都是在幫助習近平獲得大位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中共的反腐沒有超出利益集團的模式，反腐最後成為權利鬥爭、派系鬥爭的工具。因此我認為習近平恐怕會到此為止。

法廣：近天有消息披露，周永康涉嫌謀殺，包括涉嫌企圖謀殺習近平，並參與了多宗大型腐敗案件，這些消息如果屬實，那

麼將是中共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件大案。這是不是一樁孤立的案件？扳倒周永康，是否意味著習近平完全掌控局面，他的地位是否更穩？

夏明：顯然，如果習近平不扳倒已經形成政治聯盟、阻止其接班的薄熙來和周永康，如果這樣的事他無法搞定，他就無法樹立權威，也就沒有辦法穩固政權。從目前看，習近平做到了這一點，顯然是穩固了他的政權。

至於這個事件是否是孤立事件，我認為這絕非孤立事件。因為我們看到中共歷史上搞暗殺的事件（是存在的）。例如林彪事件。其實林彪事件裡面就參與了很多暗殺。“五七一工程”計劃就是想利用軍隊暗殺毛。幾年前也有報導披露山東濟南人大常委會主任段義和暗殺情婦的消息。在中國，僱凶殺人、暗殺自己的妻子的情況，官方都有報導。例如，河南省副省長呂德彬僱凶殺妻。周永康作為政法界最高的頭目、有人稱之為“貝利亞”，我們看到像王立軍這樣的爪牙，公安系統的惡人、他們不僅可以殺人，還可以殺外國一些有地位的商人。還有薄熙來事件中，海伍德被谷開來毒死，也受到公安系統人員的幫助。所以這樣的政治謀殺，在中國現在恐怕不再是孤立現象，而是成為中國上層人物進行權力鬥爭的一個選項。

法廣：中國官場的貪腐現像有否可能通過本次反腐倡廉得到較大的改觀？

夏明：不可能的。中國目前面臨兩個問題。正像陳雲過去說過的：中國如果不反腐，要亡國；如果去認真地反腐，就要亡黨。所以中國沒辦法將黨和國割離開來。中國整個的體系就是黨國體系。所以它不可能在反腐的過程中，削弱黨的利益。中國共產黨現在成了一個分贓利益集團。在沒有意識形態的情況下，它們要形成一個利益聯盟。要相互支撐、相互壯膽。能夠支撐下去。沒有其他任何的因素，唯有權力和權力資源，權力這個點金術帶來

分贓的機會。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中國共產黨目前完全是反對民主的，而民主的基本意義，就是老百姓保護自己的利益、能夠守住自己的財產、能夠有機會自己發財致富。但是中國共產黨反民主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要將中國老百姓的財富全部收羅在自己手中。剝奪人民、讓自己過上奢華、腐敗，超過世界任何人的寡頭生活。這樣的情況下，我覺得中國共產黨的“得”就是中國人民的“失”。如果要讓人民“得”，它就要限制自身的權力，尤其要剝奪自身的特權。我覺得根據共產黨目前的意識形態，它的結構和目前的整個心態和這群人的基本素質來看，我覺得基本是完全不可能的。

還有我們看到，目前中國共產黨的反腐，基本上是它要控制起來，根本目的不是要徹底除掉腐敗這個癌症或者進行大的手術切割，其實是用政治上的派系鬥爭來打壓另一派，同時忽悠中國的老百姓，因為有很多老百姓經過宣傳，就會對這個政權繼續抱希望走下去，正像有些人說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在玩擊鼓傳花的遊戲，做為習近平來說，他能夠繼續把這個遊戲玩下去，就是他的成功。因此他對反腐根本沒有誠意。也就是說，他的反腐沒有為民主服務的目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看到像許志永等上百位要求官員公布財產、能夠倡導反腐的這些人通通被抓了起來。而且他們的律師也被抓了起來。這其中就暴露了他們反腐的實質。

訪談二：反腐的一個最根本的手段，在於制止自身腐敗 (2013.02.05)

中共 18 大確立的新一代領導人習近平將於三月份正式接班。在其領導地位確立後，習近平高調反腐。1 月 22 日，習近平在談到反腐問題時指出：打擊腐敗要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不管涉及到誰，都要一查到底。這番表態引發廣泛關注。尤其其中的“老虎”引發各種猜測，這究竟指的是誰？中共反腐鬥爭一

而再、再而三地進行了多年，但腐敗現象不僅沒有杜絕，反而愈顯嚴重的趨勢。

本次的反腐鬥爭中，矛頭真的能夠指向身居高位的大老虎嗎？中共黨內的腐敗現象真的能夠通過蒼蠅、老虎一起打的方式得到清除嗎？習近平所希望的“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門保護主義、本位主義，絕不允許“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願望是否真的能夠實現？對此，美國紐約城市大學教授夏明先生接受了本台採訪。

法廣：習近平近日再次提出反腐倡廉的話題，這與過去中共高層一貫提出的反腐倡廉的主張有什麼區別？

夏明：基本上沒有什麼區別。一般而言，在中國，經過這種接班的權力傳遞模式，他如果要握住手中的權力、要把位子坐穩，則首先要立威。在這種情況下、在中國目前腐敗猖獗的情況下，立威最好的方式可能就是通過反腐，從而改善老百姓與政府之間的關係，獲得某種民間的聲望。這是當權者基本一樣的套路。

法廣：其實，長期以來，反腐鬥爭始終在中共黨內進行，可是，腐敗現象不僅沒有被徹底剷除，卻大有不斷滋生、且越來越盛之勢。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麼？

夏明：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於中國共產黨對於權力的無限壟斷，同時對老百姓的民主監督和權利不斷地躲避，制止老百姓利用媒體、新聞和司法體制對它進行監督。所有這些制度性的權力結構和它政治性的做法都使得中國共產黨、它所製造的黨國無法受到真正的監控。也就是說，它沒辦法把掌權者關到籠子裡，沒法使權力在陽光下運行。這是腐敗無法根除的根本原因。

法廣：關於蒼蠅、老虎一起打的提法，也引發了諸多猜測，其中最受到關注的，當然不是蒼蠅，而是老虎，是大老虎。這次的運動真的能夠毫不留情地觸及到最高層嗎？

夏明：這裡面涉及到的一個最根本問題，就像陳雲、鄧小平

當時提出：如果要反腐，如果要去救國，就會亡黨；如果不要亡黨、就會亡國。所以目前，對習近平而言，他所面臨的一個根本的矛盾衝突，還是一樣的經典的黨和國的矛盾問題。是要整治黨、挽救黨，傷害國家的利益？還是救國？把黨的許多有毒的資產剝離掉，甚至黨的本身就應該改弦更張？習近平目前還沒有拿出一個明確措施。而且他也面臨沒有作出明確的方向性舉措的大挑戰。從根本上看，中國今天的體制基本受到權貴階層的綁架和壟斷。這樣的情況下，要打蒼蠅是很容易的。因為往往可以通過打蒼蠅成為培養政治忠誠、撤換基層幹部的手段和方法。所以，無論在任何情況下，上層領導都希望通過打蒼蠅的方式來更替他所不喜歡的人，做為派系鬥爭的工具和手段。同時加強基層或地方的幹部對上級的政治忠誠。

但是涉及到老虎，我們都知道，目前西方媒體揭出許多涉及到老虎的大案。顯然，我們看到：習近平家族涉及上億美元資產的財產由彭博通訊社在去年進行了報導。我們也看到《紐約時報》連續三篇的長篇報導，涉及到溫家寶家族。涉及到 20 多億美元。這些都是大老虎。

另外，現在擺在習近平眼前的，就是薄熙來案。薄熙來案涉及腐敗、權力的濫用、甚至刑事犯罪等等，十分驚人。這個怎麼處理？現在有種種議論，據傳，有些高層、甚至有現任政治局委員也在被調查中。因此，我對在習近平今年三月份才能獲得國家主席的職位之前，能在多大程度上放開手腳去做存有疑問。第二，利益集團在多大程度上不對習近平進行強烈反彈？而習近平面對強烈反彈，又能夠有自主性去推動反腐？我對此同樣表示懷疑。所以，關鍵還是要看三月份的人大之後，在黨政軍大權都穩固下來以後，在未來的一、二年內，習近平是否會有大的舉措，把中國的政治往前有實質上的推進。

要看其打老虎能否從自身開始。反腐的一個最根本的手段，

不是在於制止別人的腐敗、而是在於制止自己。絕不給自己以腐敗的機會和手段。就是說，要杜絕每一個個人腐敗的機會和特權。

法廣：有人認為，習近平上台後大吹廉政清風，這點無可厚非。但一些在體制上的問題卻不是喊喊就可解決的。您怎麼看待這一問題？

夏明：習近平的許多做法實際上是對的。就是說，他在工作作風上的改進、在親民方面的改進、儘量做到少擾民、儘量拉近與老百姓的距離。另外，在工作作風上，他和李克強儘量做到少念稿、去除會議上的官風、說實話、幹實事，這都是政治家所應該做的。目前，習近平與老百姓之間有一個蜜月期。這個蜜月期很短暫。如果他能夠利用好這個蜜月期的話，便可作出許多大的變革。就像華國鋒，儘管他是一個比較弱的領導人，他卻在毛澤東死後、粉碎“四人幫”以後，利用蜜月期作出了一些大的動作，包括否定“文革”、平反冤假錯案。後來鄧小平在返回政壇後，利用他的蜜月期，急劇轉型中國的政治、經濟。從計劃經濟飛向市場經濟，改革開放、建特區、根本否定了過去左的意識形態。

今天，習近平會在多大程度上將蜜月期用得像華國鋒和鄧小平一樣，作出大的突破？第一，我們要等待，看習近平下一步如何運作；第二，我們也要看到：中國的老百姓、民間力量、各派政治力量、基本上的運作。像《南周》事件，都反映出中國的民間在不斷地給新政府、給習李班子施加許多壓力。如果社會壓力的增加，爆發出不斷有社會抗爭和社會運動，我想這會是把習近平往社會改革的方向、往民主化的方向推一步的關鍵力量。

法廣：您對未來十年中國的走向是否持樂觀態度？

夏明：應從兩個角度來看未來中國的走向。一是中國的社會發展現在有很多問題，不僅僅是體制問題，也不僅僅是中國共產黨的問題；有中國社會文化、甚至老百姓的許多問題。有中國思想的問題：愚昧、封閉、民族化情緒等等。但是，分成兩個層面看，

如果看到中國民間的不斷覺醒、社會運動進行的不斷嘗試，屢戰屢敗、屢敗了再繼續出發、繼續征戰。尤其是 18 大以後，尤其是過去一年，在經歷了薄熙來、王立軍事件後，經歷了令計劃事件後，中國的知識界和民間有了一個很大的覺醒。從這個角度看，不管是中國執政當局、中國共產黨應對這個潮流、還是去推動這個潮流，還是適應這個潮流、與歷史共進步，無論怎樣選擇，中國社會都會繼續往前推進。因此，中國的進步是一個不可避免的社會潮流。我對這點非常樂觀。

但是另一方面令我感到悲觀的是，中國共產黨至今沒有表現出能夠乘著歷史潮流，將中國推向偉大中華民族的復興、同時融入到亞洲的共同體的復興、融入到全球的社區，尤其是民主化浪潮的復興中去。目前而言，中國共產黨無論從意識形態上、政策上都在抵制，甚至還擺出一幅挑戰全球的趨勢，甚至想改變、逆轉全球的民主發展趨勢。從這種情況而言，我持有悲觀情緒，我認為：中國共產黨基本上綁架了中國人民，可能會給中國未來發展、甚至給中國人民的根本福祉帶來災難。

訪談三：要反腐，就要進行制度性的反腐 (2014.04.15)

中國的貪腐問題困擾著歷代執政者。貪官橫行、腐敗叢生，雖然當局展開反貪、打貪的運動始終沒有停歇，官場的貪腐現象卻不僅屢禁不絕，還大有日益嚴重之勢。新一代領導人習近平掌權以來，再次發動大規模地反腐。中共十八大以來，相繼有十幾名副部級以上高官落馬。反腐的利劍不僅指向地方官員、也指向了軍方的貪腐分子。最近一段時間，不斷傳出軍方高官因貪腐問題被關押的消息。習近平反腐利劍指向軍方寓意何在？觸動軍中巨大的利益鏈條，將會產生怎樣的效應？對此，美國紐約城市大學教授夏明先生接受了我們的採訪。

法廣：最近，繼傳出前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因貪腐問題被

關押的消息之後，官方媒體又正式公布瞭解放軍總後勤部原副部長谷俊山因涉嫌貪汙、受賄、濫用職權等罪名而受到公訴的消息。我們都知道，軍隊是個特殊敏感的區域。今次習近平將反腐的利劍直指軍方高層寓意何在？

夏明：我覺得習近平正在打造一個新的體制。我把它叫做一種國家安全體制。他是想建立一個安全國家。中國以前的做法是依靠軍隊，後來我們看到周永康下面，又加強武警、國安、公安和特務政治。現在習近平是打算把它統管起來，建立國家安全制度。我覺得國家安全制度本身的建立，意味著一種更大的集權，同時也意味著國家安全制度對原來的軍方體系和軍方的權力是一種更高的約束。所以習近平的很多做法，應該說是觸動了軍方的一些權力和利益。另一方面我們知道，軍方一些高官和太子黨關係比較緊密，因為“文革”期間許多高乾子弟都進入到軍隊裡面，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看到，習近平為了穩固自己的權力採取清洗，尤其他在接班的過程中遇到了薄熙來的挑戰，而薄熙來背後是有軍方勢力的支持的。

現在出現的新四人幫，包括徐才厚，顯示軍隊裡面有一部分力量與太子黨有關，而且是與薄熙來這部分人脈關係有關。所以我覺得對習近平來說，第二個考慮，恐怕他是想加強對軍隊的控制。所以我們看到最近國內的報刊，有十幾個各大軍區的各種高級官員紛紛寫忠誠信，堅決支持習近平的領導。第三，我覺得軍隊在過去十幾年的軍備擴散，使得軍隊的腐敗很大程度是與軍備採購有關的，而中國過去十幾年、其實將近二十年中，軍備增加的數目是以兩位數在增長。已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軍備開支的國家。這一點有很多腐敗的漏洞。所以習近平上台以後，這種腐敗在全國處於這麼一種狀態，軍方也是他不得不整治的一個地方。所以這三點因素可以說明為什麼習近平在軍方進行反腐。

法廣：為什麼谷俊山一案的調查歷時兩年才予正式起訴？

夏明：谷俊山原來是屬於後勤部的，和後勤裝備是有關係的。他牽扯的利益很多、錢是很大的。軍方的錢是很多的。這裡邊涉及到很多的高級官員，尤其是太子黨。而且它涉及到很多國營企業的軍事方面的企業。這裡邊觸動的利益就非常人。谷俊山貪腐不會一個人把錢用掉，他一定把錢輸送到上邊很多地方。谷俊山往上邊輸送，顯然和中央軍委、和其他許多政府的重要部門、包括跟財政、預算有關的。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要動軍委方面的人物，一方面軍隊裡面本身就有特權，比較難以動他們的奶酪。另一方面，因為徐才厚、谷俊山這邊，他們涉及到更大的問題就是，周永康、薄熙來整個大的政治格局的變動。這種情況下的處理就非常的複雜。

法廣：展開反腐，就要面對利益集團的重重阻力。北京政府會否因此遭到反彈？

夏明：對習近平來說，他知道會遇到很多阻力。如果他要靠現成的體系和結構，恐怕不僅反腐沒法進行下去，沒法成功，他還可能成為反彈的犧牲品。所以他在制度上、權力上，集中就搞得比較明顯。習近平現在已經基本拋開了總理的職位、在建立他的集權；拋開了人大的系統、就是它對國家主席的控制，國家主席本是一個虛位的設置，現在習近平則把它打造成一個實權的職位。這樣就踢開了人大系統。甚至我們看到：他把共產黨的決策機構也變更了。原來是九龍治水、各人分管一個部門，相互之間尊重各自在這個部門的權力和地位；現在習近平一個人身兼幾個重要委員會主任的職務。他把原來政治局常委裡邊的分工給打破了。又一次完全把權力集中到自己手中。依靠國家安全委員會、依靠總書記的職務、又有中共中央書記處，再用國家主席的頭銜在國際上享受更高的地位。兩個軍委主席，他把他用起來，習近平雖然遇到一些阻力，但他利用非常集權的方式想打破這種阻力。但這裡邊有一個很危險的東西在於，我們不知道習近平破除了黨、

政、人大這些原有的系統，也就是說，在習近平進行了一場憲法政變以後，他到底要幹什麼。

當然我們看到，他現在反腐確確實實反得很厲害。圍繞周永康案我們看到，全國上千上千的人受到了衝擊；而且在很多縣一級的很多領導都波及得很大，習王體系在反腐方面確實比前幾屆要做得深刻得多。但是我們不知道下一步他到底要往什麼方向走。有兩種可能：一是成為獨裁者，我們可以從目前的情況看出一些苗頭。包括他對公民社會的反對、對普世價值的挑戰、對像許志永這邊和他的成員的一系列的審判，包括對網絡大 V 的一系列的絞殺。這裡邊指明了習近平很有可能走向一個非常危險的法西斯方向。另一方面，習近平有沒有可能成為中國的蔣經國？這還有待觀察。但是，我覺得他成為第二種可能的機會比較小。因為我覺得考慮他自己的個人意識和素質，以及他周圍一些人的遠見及理論素質，進入第一種的可能性比較大。

法廣：在沒有開啟政治體制改革的前提下進行的反腐鬥爭，能否取得徹底勝利？

夏明：從目前來說，這種反腐鬥爭就沒有進行實實在在真正的反腐。要反腐，就要進行制度性的反腐。只要有腐敗，都應該去反。進行制度性的反腐，就會從防止腐敗上下功夫。現在第一，他沒有從防止腐敗上去下功夫，也就是他沒有防止公權的濫用權力、政府官員是無法無天、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他沒有在預防的問題上做到切實的工作，沒有進行憲政上的改革。相反，他對憲政的破壞，給自己的權力更大。這樣就造成未來腐敗的機會就更多。另一方面，他不是制度上的反腐，而是派系上的反腐。當然從目前看，習近平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迎合了中國目前總體情緒和發展需要，他反腐的方向是主要指向中國勢力比較保守的這一派的。所以我們看到：無論從薄熙來、周永康、還是徐才厚，他們都屬於比較偏左的、毛主義、左翼的官僚集團。他對往右的，

比如像溫家寶家族有很多指控、很多問題，他往右的方向，目前基本沒有太多下手。

現在國內外也有傳言，習近平反腐要指向大老虎、老老虎，現在是在調查李鵬的家族，李鵬這邊也很緊張。所以我們看到，他的箭頭的指向，裡邊有暗合老百姓的需求。尤其我們看到，周永康的維穩體系、政法系統，帶來了很多冤假錯案，在過去二十年，給中國人民帶來非常多的災難。另外像李鵬家族，李鵬對電力的壟斷，和他的家族在“六四”後的發跡，對“六四”欠下的血債，我相信很多老百姓內心都是喜歡這樣做的。所以我覺得習近平是有可能想暗合老百姓的期盼的。

訪談 4：習近平的反腐恐不會觸及政權的統治寡頭形成的權力經濟學 (2015.02.17)

習近平掌權兩年來，在“蒼蠅老虎一起打”的反腐運動中，的確揪出了幾隻位高權重的大老虎。然而，轟轟烈烈的反腐運動卻經常受到“選擇性反腐”的非議。尤其是反腐風潮至今沒有觸及“紅二代”的現實，更加成為廣受關注的焦點之一。最近，具有“紅二代”背景的中國民生銀行曝出總裁毛曉峰案，該行最大股東 - 安邦公司與民生銀行的密切關係也遭媒體曝光。隨後，安邦公司各實際控制人或董事一一撇清與公司的關係，否認自己與公司的任何瓜葛。相關人士紛紛退場，這是否意味著反腐風暴將要波及掌握中國經濟命脈的數百個紅色家族？我們請美國紐約城市大學教授夏明先生來談談看法。

法廣：輿論曝光安邦公司與民生銀行的關係後，相關的太子黨們各有說詞，極力撇清與公司的關係。您怎樣解讀此一現象？

夏明：我覺得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習近平有著反腐的大的口號。當然他是想去救黨、救國。但是在反腐的大的口號下面，就引發了中國官場的相互投毒。也就是大家都想把對方推出去，作為反

腐的祭品。然後第一保住自己的地位，同時能夠擴張自己的利益。

所以我覺得從民生銀行和安邦保險他們之間的關係來看，更大地本質不是一個反腐的運動，更大地本質是在反腐運動的大背景下的推動下，激發了中國官場的內鬥和相互的權力的重組和陷害。這裡面有兩個因素更加劇了這種權力的鬥爭。一個因素就是中國的經濟現在在走下行。也就是中國的資源在出現逐漸的匱乏，匱乏逐漸加劇的情況下，所有這些玩劫取財富和權力遊戲的人就感覺到更緊迫、爭奪強度就更增加。第二個因素就是時間因素。今天在中國玩政治、經濟遊戲的人，他們到底還有多少時間可以讓他們這樣去玩這個遊戲？我想這個時間的預期在急劇地縮短。也就是說，他們這些人相信，他們不可能照這個遊戲繼續去玩到十年、或者二十年、甚至三十年。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是稀缺資源不斷地加劇、資源的減少；另一個是時間的預期不斷地縮短。這兩個就加劇了中國目前統治寡頭階層之間的內訌和內鬥。

而內鬥的深的層次主要是有三條線：一個是具有官僚背景的官僚資本。而官僚資本分成兩個部分：一部分是老的、中國紅色江山革命的後代，也就是“紅二代”。另外一部分，就是“改革開放”以後，通過自己的知識、或者上大學，又紅又專、鄧小平提倡的幹部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了，這批人上去的。這批人上去，既沒有走長征、也沒有贏戰爭，他們上去主要是通過黨的外圍系統、主要是團的組織系統，所以這批人不是“紅二代”、而是“官二代”。這就是改革開放三十年，在江澤民和胡錦濤下面，一大批這些“官二代”得到極大的好處。而“官二代”這批人的貪婪和不擇手段，那種暴發戶式的瘋狂心態又超過了“紅二代”。而很多“紅二代”有這種意識形態的束縛，很多還是處於清貧狀態。這樣的情況下，“官二代”和“紅二代”就發生很大衝突。現在官僚資本的兩個集團，其實他們想劫取的是中國民間的社會在過去三十年創造的財富。這裡面涉及民營的企業、民營資本與官僚資本的較量。這樣我們

看到的是這三者之間的混戰。

法廣：您認為，習近平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魄力將反腐矛頭指向“紅二代”和權貴集團？

夏明：我認為習近平不可能拉著自己的頭髮脫離地球。我認為，習近平，第一是不會對自己的家族開刀的。第二，對他工作的兩個大的省份 - 浙江和福建，他也不會願意去挖掘那邊的、尤其涉及到上層的問題。如果他設置這兩個禁區的話，那麼我認為他在反腐問題上有自己的軟肋。如果有軟肋，他就一定會整合他的權力的基礎；根據現在的做法看，習近平的權力基礎主要在“紅二代”這邊。“紅二代”現在已經進行了分裂和清洗。薄熙來派已經被趕出局了，或者是薄熙來的一些親人、家屬，我相信現在也會跟習近平這邊進行某種繳械、投降。所以我覺得中國目前，習近平恐怕是依賴紅二代的權力基礎。然後對其他的、他認為會壞他江山、亡他政權的這些人、尤其他們積累財富的速度甚至超過自己積累財富的速度的那些人開刀，因為畢竟習近平他們這些“紅二代”很多還是從當官的官場這樣去做的。而很多“官二代”就是從父母的權力直接兌現、馬上就變成經濟利益。所以他們斂財的速度就非常快。而且“官二代”這些人，他們進入許多新興行業跟“紅二代”進行的傳統產業就有些不一樣。“紅二代”進行的產業畢竟還是以實體經濟為基礎的比較多。或者進入後來的地產開發、房屋建築。但是“官二代”進入的行業，很多就是銀行、保險、金融、外匯管理，還有就是目前涉及的電信、手機、廣播電視、娛樂、文藝界等等。所以這裡邊我認為，你注意習近平的話，邊恐主要針對官二代這邊他做的文章就會更多。所以我覺得他的反腐恐怕不會走到觸及到中國政權的統治寡頭形成的權力經濟學，用權力帶來他的經濟、財富的利益。這點他根本不會觸及。也就是說，他的反腐也就不是觸及寡頭政治權力竊得政權的問題，而只是防止某些人，不要他們把財富都貪光了，讓自己沒辦法用

這個財富來自己享受，同時用這個財富來解決中國的矛盾和問題。

法廣：您是否認為中共展開的反腐鬥爭會長期地進行下去？
今後的反腐鬥爭將以怎樣的形式出現？2015年的反腐鬥爭有可能出現怎樣的看點？

夏明：中共的反腐會不會長期地進行下去，主要由兩個因素來決定。一個是習近平和王岐山的主觀因素，他們是不是把他們認為的對政權、對政體安全的威脅都已經清除掉了。我相信至少目前來看，他們認為還沒有清除掉。因為他們還在說，有更大的老虎要打；到底誰是更大的老虎？現在還沒有最後揭幕，所以我們也不知道。所以從他們的主觀的角度來認為，反腐還沒有完結。從另外方面，從他們客觀的角度，他們即使想完結，但有一個“樹欲靜而風不止”的效應。也就是說，他們觸動的這些集團、這些利益，一定會反撲。也就是說在習近平和王岐山之外，有許多權力的板塊，既掌握了政治權力、又有經濟實力的。這些板塊不僅集聚在北京、而且集聚在中國許多的大城市裡邊。從上海到廣東、深圳和香港，都是有中國的權力板塊集聚的。

所有這些權力板塊顯然對習近平現在的做法，第一是擔憂，擔心火燒到自己身上。第二是有一種恐慌，擔心習近平這樣搞，最後加劇共產黨內鬥，加劇習近平逼迫官僚的話，不僅帶來民反，最後還會有官反。所以這些官員現在出現一種緊張、消極或者是敵對、抵制的情緒、甚至趕快脫離官場。要么進入商海、要么逃到國外、這些都會引起中國整個官僚體制的崩潰。所以我相信現在中國有許多習近平權力遊戲的看客，他們不僅有看的資格，而且有點戲、評戲的權利。這些積累下來的、前任的從鄧小平到江澤民到胡錦濤，三任積累下來的元老，元老級的人物、政治局常委級的人物，也都有一、二十人。他們形成的圈子，對習近平形成某種權力的制約和威脅。我相信他們在內部，相互之間私下有通風，有碰頭、有他們的以各種名義開的各種的會，對習近平有某種影響。這就

是習近平擔心的“妄議中央”。所以我相信，習近平的反腐到底能進行多久，更大的程度上還在於他的對手多大程度上還會繼續反彈，而不停止。多大程度上他認為他的中央還在被妄議，他沒有安全感；這兩個我覺得在主觀和客觀上決定了現在進行的反腐，至少在目前看來，我覺得還沒有盡頭。

第六章：血淚的反抗

共 黨!

——中共最後的分贓



V.S.

iPhone



Liabhi

6.1 大衛的抗爭

(2013.02.01)

如果說過去的二十世紀是“政治革命的世紀”，我們身處其中的二十一世紀更會是“社會運動的世紀”。不是說，革命失去了其推動社會進步的功效，而是隨著全球化的日益深化，在全球公民社會日漸成熟的背景下，現代技術的多功能運用降低了反抗的門檻，同時也提高了鎮壓的代價。社會運動在許多情況下可以完成過去非要由革命才能完成的歷史使命。甘地曾說過：急躁也是一種暴力。因此，學習社會運動的經驗，挖掘社會運動的內涵，提升抗爭的想像力和增加反抗的有效性，是在我們急於跳入革命階段前必須完成的家庭課業。

反抗的想像力

面對社會不公和政治強權，積極的和消極的抵抗可以以任何方式進行。2010年兩位人權活動家史蒂夫·克羅肖（Steve Crawshaw）和約翰·傑克遜（John Jackson）出版了一本書：《反抗的小動作：如何讓勇氣、堅韌和創見改變世界》（Small Acts of Resistance: How Courage, Tenacity, and Ingenuity Can Change the

World)。書中講述了許多成功的抗爭例子：共產黨統治下的波蘭，人民在官方晚間新聞播出時段(相當於央視“新聞聯播”)集體散步，甚至把電視放在推車裡，拒絕洗腦。在烏拉圭軍政府下，人民在足球大賽起立唱國歌時消極抵制，只有當唱到“讓獨裁者發抖!”時全都提高嗓門。書中還提到中國人的勇氣和智慧：軟禁中的趙紫陽在幾位好友的幫助下偷錄自述，並帶到香港出版成書：《改革歷程》，引起轟動。有人因此說，趙紫陽死後對中共政權的威脅比活著時還大。當然，網上流傳甚廣的“草泥馬大戰河蟹”也成了經典案例。

其實，專制暴政並非像它的打手和化妝師呈現出的那麼牢固和自信。只要每一個公民有捍衛自己權利和尊嚴的勇氣(受到苛政傷害的絕不是“一小撮”，也不只是“知識分子”，更不只是“境外勢力”)，每個公民有同情他人和助弱抗暴的擔當(你如果不制止罪惡發生在他人身上，罪惡終歸會找到你或你家人頭上)，每個公民有祛除“狗心”和同心協力的團結精神(不要以為你撿到了一根骨頭就可以躲得遠遠地享用終身)，每個公民有出頭擔當領袖的遠見或皈依追隨領袖集團的放下(社會運動的領袖是一個流動的、集團性概念，你可以在不同的時間、地點和場合同時做領袖和追隨者)，社會運動就會產生足夠的效力，把專制政權拉跨。

智者的武器

在蘇聯時代，最有名的消極抵抗是：“你假裝在付我工資，我也假裝在幹活。”今天，中國的情形是，“你假裝在統治，我們也假裝在服從。”不錯，中共鐵板一塊地控制著公共行政，但公共輿論已逐漸滑落出中共宣傳機器的掌心。感謝農民通過群體性事件的不斷抗爭，國家政權已通過放棄農業稅的方式實際上從

農村撤退。感謝上訪群體“秋菊打官司”的堅韌不拔，勞改、勞教制度正在坍塌。感謝“法輪功”成員們的“死纏爛打”，中共官僚（尤其是那些參與宗教迫害的）每每踏上美國國土都會膽顫心驚。尤其要感謝中國藝術家和知識界運用網絡社交媒體這個“智者的武器”來對抗政權的惡政、惡法，從而消解專制政權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中共政權已成全球最大的“惡搞”對象。上個世紀八十到九十年代，崔健的搖滾樂歌曲《一無所有》、《最後一槍》和紅布條蒙眼的《新長征》音樂會充滿了挑戰強權的勇氣和智慧。近年來，艾未未的“草泥馬擋中央”、“一虎八奶”、江南風格的“騎草泥馬”等創作，韓寒被封殺的“襠中央有槍”的雜誌封面，全國民間或網上不斷推陳出新的“民謠”（胡星斗教授做了很多的收集和推廣工作），標誌性建築的另類解釋（從“鳥巢”、“大褲衩”到中南海門前、大會堂後面的“蛋”），網上如春筍般湧出的“官員性愛視頻”，整體上形成了蔑視濫用的公權力和腐敗的公務員的“惡搞運動”。政府控制公共輿論能力的被顛覆為街頭社會運動，諸如“茉莉花革命”和“同城聚會、共同‘飯醉’”，做好了心理準備。

有理想的群體和有勇氣的個人都可能創造和實踐出有效的抗爭方式。中國八十年代的愛國學生採用幾千人同時到政治中心絕食的方式來推動“反腐敗、爭民主”的努力，讓無數的人們心靈震撼至今。已成國家和民族脊梁的這一代人，有歷史的感召去引領80後的新生代，去挑戰80歲老人統治中國的理念和模式。89民運總歸會是未來中國民主運動的靈感源泉。

彈弓革命

面對世界上最強大的對內鎮壓的暴力機器，一個個人難免

不產生無力感，懷疑自己的政治效能。結束羅馬帝國“用刀劍統治”而開啟了“博愛新紀元”的《聖經》給我們講述了一個令人振奮的古老故事：非利士人征戰以色列人，領軍非利士營的是一個叫“歌利亞”的巨人。《舊約·撒母耳記》描述他“身高六肘零一虎口；頭戴鋼盔。身穿鎧甲，甲重五千舍客勒；腿上有銅護膝，兩肩之中背負銅戟；槍桿粗如織布的機軸，鋼槍頭重六百舍客勒。有一個拿盾牌的人在他面前走。”面對討戰，以色列領軍掃羅和士兵“就驚慌，極其害怕”，四十日無人敢站出來迎戰。掃羅有個臣僕叫大衛，是個放羊人的最小兒子，去到戰場送食物，見到這般情形，要求去與歌利亞戰鬥。他對掃羅說：“你僕人為父親放羊，有時來了獅子，從群中銜一隻羊羔去。我就追趕它，擊打它，將羊羔從它口中救出來。它起來要害我，我就揪著它的鬍子，將它打死。”得到許可，大衛既不帶銅盔、也不穿鎧甲，“他手中拿杖，又在溪中挑選了五塊光滑石頭，放在袋裡，就是牧羊人帶的囊裡；手中拿著甩石的機弦，去迎接那非利士人。”

《聖經》繼續寫道：“非利士人起身，迎著大衛前來。大衛急忙迎著非利士人，往戰場上跑去。大衛用手從囊中掏出一塊石子來，用機弦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額，石子進入額內，他就仆倒，面伏於地。這樣，大衛用機弦甩石，勝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衛手中卻沒有刀。”就這樣，基督教所頌揚的大衛的功業由“彈弓革命”成全。一個勇敢機智的孩童手發彈弓可以擊倒武裝到牙齒的巨人！

成功固然值得慶賀，但失敗一定是成功的前奏。2013年春節前有幸傾聽中國當代最偉大的反叛詩人黃翔朗讀他四十五年前寫下的《野獸》，領悟到了應該以何種心境去面對失敗。年已古稀的詩人、中國的海涅咆哮道：

“我是一隻被追捕的野獸
我是一隻剛捕獲的野獸

我是被野獸踐踏的野獸
我是踐踏野獸的野獸。
一個時代撲倒我
斜乜著眼睛
把腳踏在我的鼻樑架上
撕著、咬著、啃著
直啃到僅僅剩下我的骨頭
即使我只僅僅剩下一根骨頭
我也要哽住一個可憎時代的咽喉。”

6.2 自曝、自虐、自殘和自焚 (2013.01.27)

中國現階段製造社會不公的速度超過了奇蹟般的經濟成長，恐怕已是不爭的事實。不然，2012年新上任的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就不會高調發揮歷史學專業培訓的特長，告誡各級領導認真領會托克維爾《舊制度與法國大革命》一書的精神了。各種匪夷所思、挑戰人類良知的怪現狀已成媒體的老生常談，以至人們的同情心不斷透支，心腸要么開始硬化，要么乾脆自閉起來，眼不見，心不煩。面對邊際效應遞減，那我們就切換到新的話題，即：中國人應對不公正的訴求方式。

荒誕的反擊

申訴、遞狀子和盼青天老爺是傳統的喊冤方法；上訪、信訪、找領導和靠組織是共產黨的解決矛盾辦法。傳統和正統訴求方式的存在和運作，一方面有賴於老百姓對官和官府的信心，另一方面又必須要有官員的同情心。當今中國一黨遮天、政法委操縱公、檢、法、司法一條龍辦案，維穩體制徹底彰顯官府同情心愈發稀薄，又回到“有理無錢莫進來”的“舊社會”。在經歷截訪、黑監獄、

勞教甚至“被精神病”和“被自殺”後，愈來愈多的冤民對政府秉持公正、匡扶正義的承諾喪失信心。求人不如求己，自救成為當今中國大陸最新的討個說法的手段。

首先，有許多人開始自曝自裸，擺出一副“你不要臉、我不要皮”的架勢，在網絡上爭得眼球，把性騷擾、偷情、通姦和淫亂全都晒出來，不惜壞自己的名聲來報仇，搞個網破魚死，實現自己的目的。2012年年底，具有博士學位和教授頭銜的知識女性常燕在網上拋出《編譯局故事》，以她和她的上司、中央編譯局局長衣俊卿一年之間17次開房雲雨之事為主題，把胡錦濤“馬克思主義工程”滋養的一群衣冠禽獸拔個精光，讓“三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始作俑者不僅顏面丟盡，也弄掉烏紗帽。

據說常、衣絞殺是因為“洗衣粉”過多（衣俊卿在網上還有過上百人的“洗（喜）衣粉吧”），以至“一俊卿”無法關愛滋潤眾多粉絲，導致后宮起火。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王立軍夜投美領館，爆料薄熙來、谷開來驚天殺人、腐敗黑幕，也是君君臣臣、妻妾妾內訌引起。一個作為高知、一個作為高官，如此絕望和驚恐，真正反映出在當今中國維護個人尊嚴、權利、甚至生命的困難程度。

跪求青天

不難理解，自虐開始成為維權和申訴手段，人們不惜犧牲自己的尊嚴來維護尊嚴。2011年年底，為了要求關閉校園附近污染嚴重的小鋼廠，湖北長江大學數十名教授和研究生先後到荊州市的區、市兩級政府門前下跪請願。2012年福建省壽寧縣原信訪局長柳乃華為了女兒在男友家墜樓身亡之事，下跪上訪，對信訪制度作了絕佳的評註。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教授劉景一代理海南三

亞市一農場經營權案子，上告無門，維權無望，2013年一月帶領83名職工到三亞市信訪局門前跪訪。該教授在他的博客中寫道：“現實既如此，跪都跪了，爬算什麼！？爬吧！”同樣是一群“有身分”的大學教師，2013年一月底在青島大學，百名教師不堪忍受黑物業、假警察的傷害，到市府廣場集體下跪，跪求書記為2800名教師仗言。山東大學教授孫文廣為此寫道：“古人有云，‘人在屋簷下，怎能不低頭’。目前的大陸屋簷太低，低了頭不行，只得下跪了。”在堂堂的“人民共和國”，“主人”給“公僕”下跪，損害的又豈止是人民的尊嚴，恐怕更多的還是黨國“大國盛世”的顏面。

人無骨肉恩

對平民百姓來說，自虐恐怕還嫌身分不夠，於是又有人開始自殘，不惜以犧牲自己的身體來討回公道。隨著春節來臨，民工一年辛苦盼來帶上錢、回家過年的幸福，卻又經常遭遇工頭和老闆拖欠工資。2013年春節前，都是為討薪，大連一女子爬上高壓電線塔，鄭州和青島各有一男民工爬上塔吊吊臂，蘇州一農民工爬上東吳塔，廈門龍巖一男子爬上90多米高的煙囪，幸虧他們都得到了解救。但山東慶雲縣一河南籍民工爬上30米塔吊後墜落身亡，廣州有一討薪男子跑到辦公室引爆炸藥，致1死7傷。

2012年12月，深圳一男子在地鐵站裡揮鐵鎚自殘，要找記者“申冤”，直至電視台記者趕到、通過做工作和同意接受採訪，自殘行為才停止。同時，武漢農民楊從德為了捍衛自己承包的果園，拒絕土地被強徵，點汽油瓶爆炸自殘。2013年一月中旬，揚州菸草專賣局稽查大隊聯合工商、公安等部門一起執法，查處無證賣菸的店鋪。有個無證煙販被查獲，結果他揮刀自殘，砍自己的頭和手。又有最新爆料，在薄熙來、王立軍主導的重慶“唱紅打黑”運動中，民營企業家龔剛模在打黑基地“鐵山坪”“被吊了8天8夜，

大小便失禁”；同案的第二被告樊奇杭不堪折磨，曾兩次撞牆自殺，咬下舌尖自殘，但仍未逃脫被執行死刑的厄運。

民不畏死

最後又有人採取自焚，捨身取義，以犧牲生命來捍衛道義。光是藏區，2012年一年就有80多藏人自焚。如果從2009年2月算起截至2013年一月，自焚事件已高達百起。2010年，成都拆遷戶唐福珍在房頂上自焚後墜樓死亡。隨後，湖南株洲、湘潭，江西撫州市宜黃縣，北京通州、海淀和朝陽區，江蘇鹽城和重慶發生多起拆遷引發的自焚。2012年年底，海南臨高縣30歲青年曾海鵬點燃身上的汽油，抱住拆遷隊隊長試圖同歸於盡。2013年第一周，河南省洛陽市洛龍區關林鎮練莊村一天內發生了兩起因強拆引發的自焚案件。2013年一月底在山東省人大會議開幕式結束後，濟寧市汶上縣上訪3年的拆遷戶檀曙光在會議大廳中突然自焚。他家的房子3年前被政府強拆後，多次進京上訪未果。2012年6月，他與父親到北京上訪時曾喝毒藥自殺。當地政府官員曾聲言，除非有命案才會考慮給他們家解決問題。

面對上述一些列的自辱、自殘和自毀，我們不得不說，中國社會患上了集體的精神病症。因為所有矛盾的對立方都牽涉的是公權力，中國社會病的政治結構性根源暴露無遺了。當今中國，黨國控制了整個公共行政系統，官僚機構成為不義的製造者。民眾的絕望和自毀由此而生。但這種絕望和自毀似乎又不是完全放棄，因為所有的犧牲者所做的一切，似乎都還在向沉默的看客發出最後的呼救。絕望中的一絲希望來自於，黨國已經無法一手控制公共輿論了。人在幹，天在看。集體良心的復甦和勇氣的增生恐怕會源於此。屆時，反抗又需要新的智慧來升級了。

6.3 雪域血紅自由火 (2012.02.04)

從 2009 年 2 月至 2012 年 2 月 4 日在的三年時間裡，中國境內已發生了 20 起藏人自焚事件。在 2012 年的前五個星期之內，就集中發生了 7 起。他們都是藏傳佛教的僧人、僧尼或前僧人。最近在甘孜色達縣自焚的三人中據說也有牧民。在我們的記憶裡，恐怕還找不到一個可比的例子，有其他任何一個國家或任何一個教派在短短的時間裡發生了如此密集的自焚事件。而且，沒有任何跡象表明，自焚事件背後的訴求已經得到中國政府的及時回應和滿意的解決。也沒有任何理由相信，它們的終極根源也已消弭。所以，面對如此性命關天的大事件，我們必須緊急關注，並努力找到解決辦法。而不幸的是，當西方主要國家都深陷全球經濟危機之中時，西藏自焚事件未能得到足夠的關注。這種忽略讓中國政府可以完全逃避國際輿論的監督，從而漠視自焚者、死亡者和他們生活其中並為之代言的社區的訴求，使得人間悲劇繼續發生。

在 1998 年，現任藏人行政中央的首席部長洛桑森格博士曾對筆者講到：我們藏區沒有石油，連空氣都稀薄，我們只有喇嘛。所以，西方世界對我們漠不關心。今天，一個又一個的男女僧侶在雪域高原燃燒，他們應當給我們帶來震撼。在人性的根本層面，

這種震撼產生的關注應該遠遠高於緊吸全球人類眼球的石油，因為，石油的燃燒驅動的是我們的轎車、我們的經濟；而生命的燃燒，尤其是那些“生如秋葉之靜美，死如夏花之絢爛”的僧尼的燃燒，燒灼的當是我們的良心、驅動的應該是人類社會的進步。為此，我想討論和闡明下列幾個議題：藏人自焚的國際、國內大背景是什麼？藏人自焚傳達的訴求和訊息是什麼？是什麼複雜的原因造成了藏人，尤其是僧侶的頻繁自焚？在佛教和藏傳佛教裡，暴力、自殺和自焚與佛法教導有何關係？最後，解決自焚的關鍵在哪裡？

西藏和藏人的危機

西藏雪域高原，藏人的鮮血在燃燒！藏人的生命在抗爭！這是因為，西藏，這塊土地養育的人民，和他們賴以生存的文化、宗教、民族特性和生活方式都面臨著滅頂之災。

西藏高原惡劣而獨特的地緣、氣候和農牧環境造就了藏人的獨特生活方式。以其獨特的生活方式，尤其是虔誠的佛教信仰，藏人成為世界屋脊的最好守望者。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當全球的大多數國家和民族都獲得了歷史發展的新機遇時，早已皈依佛教、放棄武功的藏人卻被迫去面對世界上最大的毀佛政黨和無神論武裝起來的軍事暴力機器。據達賴喇嘛在回憶錄中的描述，1955年毛澤東見了達賴喇嘛，說：“宗教是毒藥。首先僧尼守戒不結婚，它減少人口。第二，它忽視物質進步。”獨立學者李江琳的研究揭示，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期，中共軍隊一直不停地對藏區（西藏自治區和四川、青海等地的藏人居住區）進行“祕密戰爭”。而後，所謂“平叛”的軍事長官變成了當地的行政領導，從西藏建制初期就實行了“軍區”和“工委”兩塊牌子、一套班子的模式。六十年來中國政府在藏區實行著“軍政府”控制的歷史。官方有意掩蓋或淡化“文革”中藏區遭受到劫難。

與官方的歷史敘述恰恰相反，在《殺劫》一書中，藏人澤仁多杰和唯色父女用圖片和文字記錄再現了“文革”中西藏文化和人民遭遇的浩劫。唯色寫道：“一九五〇年，毛澤東派遣軍隊進入西藏，從此軍隊成為掌控西藏的唯一力量。即使在中共總結的‘十年浩劫’時期，軍隊仍然牢牢地掌控著整個西藏。”對西藏的“軍事管制”“從未有過任何放鬆，”存在至今。過去五年，“軍管”還得到了更加系統的強化，甚至廣泛深入到了藏區鄉村，直接控制寺廟和抓捕僧侶。

在1979年中共實施“改革開放”戰略後，次年三月中共中央召開了“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五月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和書記處書記、副總理萬里率領中央工作組到西藏各地考察和指導工作。隨著平反大量的“冤假錯案”、調整極左的政策、中央加大對西藏的財政支助和經濟投入、重建宗教寺廟和恢復宗教生活、開始與流亡海外的達賴喇嘛代表接觸和允許部分流亡藏人返鄉探親，西藏在八十年代初進入了較為平穩的發展階段。期間，在尋求西方的技術和資金的支持發展經濟的過程中，中國政府對國際社會做出了某種讓步，因此，進步向上是主流。藏區的形勢也反映了中國改革的整個大趨勢。但在八十年代末期，尤其從1987到1989年，中國政治的自由化顯露出局限性，它和中國民眾（包括藏民族）的上升期盼（尤其是在民權和自由領域裡的）發生衝突。從內地沿海（例如合肥、北京和上海的學潮）到雪域高原都出現了和平遊行示威。中共內部權力鬥爭加劇，改革派（或叫自由派）逐漸失勢於強硬派（或叫保守派）。中共的政策逐漸趨於強硬和保守。在加強控制、打壓異議人士的總方針下，北京對漢人相對要耐心和克制一點；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心態、對“國外敵對勢力”的臆想、大漢族主義的影響都使得中共領導層更輕易地把少數民族問題上升到“領土和主權完整”、“國家安全”的層面，針對藏人動輒使用軍隊、武警來暴力彈壓。所以，在中

國改革開放的八十年代，開槍鎮壓和平示威、造成流血事件首先在1987年和1989年發生於西藏。1989年三月的拉薩軍事戒嚴（長達14個月）是由時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的胡錦濤直接決策實施的。以後在1994年召開了第三次“西藏工作會議”，對藏工作繼續強調控制和鎮壓。中共統戰部在1996年發布通告，禁止懸掛達賴喇嘛的畫像。到2008年西藏再度出現大規模遊行示威。在長達25年的時間裡，中共都採取了軍事暴力和廣泛鎮壓來處理藏區冒出來的抗議事件。但軍事鎮壓的效果愈來愈差，治理藏區的成本愈來愈高，藏民的不滿和反抗都在加速產生。以至在過去的五年中，藏區抗議活動從未停息，甚至很快地蔓延到漢藏交界區、內地城市（例如西安和成都）。而且，危機還在不斷升級。從中國政府角度來看，它陷入了“以暴維穩、越壓越亂”的惡性循環。

有必要指出，藏人面臨的災難源頭集中表現在以“械心”聞名的“技術官僚治國”的治理體系。其中尤以後來從西藏回到北京、再升任總書記的胡錦濤，和從四川省委書記升任政治局常委、主管政法工作的周永康為典型代表。胡錦濤頭戴鋼盔在拉薩街頭親自坐鎮並參與89鎮壓的報導在海外已經流傳甚廣。他對宗教、文化事務的僵化和鐵腕控制已無需多寫。但周永康需要提一筆。作家茉莉寫道：“在四川藏區迫害西藏人，周永康也是‘有口皆碑’的。2001年夏天，四川省色達五明佛學院的幾千名藏人和華人僧尼遭到鎮壓，他們的住宅被強行拆除，在被驅逐之前，當局要求喇嘛在聲討達賴喇嘛的聲明上簽字。穿著破爛袈裟的喇嘛和尼姑被迫到處流浪，這成了周永康的‘治藏政績’之一。”她還寫道：2000年3月，剛上任兩個月的周永康在和四川農民人大代表見面時說，“他視察了四川藏區甘孜地區，不明白四川藏民為何不顧今生只顧來世。他反對西藏人捐獻給寺廟”，還說，“西方也有宗教信仰，但他們哪有把錢都送到教堂去？”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精神層面的滿足對藏人如此重要，將藏

人和佛教三寶（佛、法、寺）割裂開來，也就在文化意義和生命本質上消滅了藏人。如果“以食為天”、“信奉吃教”的漢人能夠反思一下，某一天，突然成吉思汗的一位後人（大多數該是穆斯林）又重新入主中原，新的統治者將豬肉從漢人生活中剝奪，漢人的文化認同又將在何處存在？我們必須明白，“三寶”提供的精神層面上的價值是任何寶貴的美味都無法替代的。顯然，對藏人來說，讓他們忘記來世、只顧今生，就必然剝奪他們的根本，完全在無神論和唯物主義指導下的現代化就會成為“西藏的腫瘤”。如果藏人沒有掌控和決定自己民族命運的自治權和自決權，西藏繼續缺乏內生性的、有機的發展動力，就難以擺脫被“天葬”的命運。（見王力雄的《天葬》一書）胡錦濤和周永康表現出對宗教和精神信仰的徹底無知，以此想要來為西藏危機找到出路，必然是沒有希望的。而如果以軍事暴力機器去推行這樣的“大現代化”，它引起的就不僅僅是宗教不自由、人權沒尊重的問題，而是整個西藏和全體藏民族的危機。

達賴喇嘛領導的流亡藏人

1959年達賴喇嘛出走是中共試圖在西藏推行第一次“一國兩制”的失敗，也是產生以後西藏問題的一個重要根源。產生這一結果的原因是，達賴喇嘛不只是帶走了自己的家人，而且藏區的四大教派和苯教的高僧領袖也全部逃離，帶走了西藏的靈魂。從此，喜馬拉雅山兩麓的藏人過上了“靈”與“土”分離的生活：逃離家園、暫居佛土的藏人獲得了精神的自由家園，但卻失去了祖國故土；留守家園的藏民卻難以在精神上自由歸家。王力雄觀察到：“當北京把人權等同於‘生存權’，把‘經濟發展’當作民族政策時，儘管生存指標和經濟指標取得了相當進步，面對的卻是更多不滿。物非心，物也不一定買得到心。”對藏人來說，心的家園在西藏以外，

“達賴喇嘛如同父母，甚至高於父母。”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藏人在藏區境內自焚，境外的藏人也有自焚（例如在新德里和尼泊爾），因為山麓兩邊的藏人渴望在藏土重歸一家已經近六十年了。

不僅藏傳佛教的最高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流亡海外，而且中共認定和培養了十幾年的大寶法王十七世也在千禧年之夜逃離西藏，居留在達蘭薩拉。可以說，今天中共控制下的藏區除了有大片的土地和六百萬藏人外，藏民族真正的“軟實力”是在海外。首先，達賴喇嘛是藏文化的品牌和名片。在全球國際舞台上，達賴喇嘛的被識別率恐怕是和世界第一軍事強國的美國總統奧巴馬不分高低的。而他的受歡迎程度在西方甚至超過他們自己的天主教教皇。王力雄曾寫道：“由於達賴喇嘛是西藏流亡者幾乎獨一無二的象徵，所以在某種程度上，西藏問題的國際化，實際上就是達賴喇嘛的國際化過程。”（《天葬》第465頁）

其次，隨著佛法在漢地遭到大規模毀壞和汙染，流亡藏人和他們飄散在全球各地的僧團成了那爛陀佛教傳承的守護者和純潔性的捍衛者。在流亡政府的所在地達蘭薩拉和南印度等地建立了佛教的研究、譯經和辯經中心，全球各地都建有弘揚佛教中心。西方的後現代主義和向神秘主義的回歸同藏傳佛教的全球化相互擁抱、融合。中共逼走達賴喇嘛，萬萬不曾料到佛教透過達賴喇嘛在西方日常生活層面產生如此廣泛深刻的影響，這也是不幸事件中的萬幸。未來也會證明，當中國漢地要重新回歸正教，擺脫社會道德淪喪，清除現今內地佛門庸俗之風，未受汙染而還在佛陀故鄉不斷升華的藏傳佛教又會成為中華道德復興的源泉。

第三，流亡藏人社區推行的政府民主化和世俗化的政策已經取得顯著成就。身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最年輕的國家領導人”達賴喇嘛在北京參加過人大會議。到了印度訪問，總理尼赫魯陪同他參觀了印度的議會。兩個不同的議會比較，讓達賴喇嘛認定民主的優越性。1959年開始流亡生涯後，達賴喇嘛就提

出了建立“政教結合的民主政府”並在此年建立“西藏人民議會”，議員由選舉產生。在1961年流亡政府公布的《憲法草案（討論稿）》中，提出了一條規定，“根據憲法和議會的章程”，如有需要可“罷免達賴喇嘛”。儘管這一條文當時遇到僧俗的抵制情緒而未被採納，但可以看到，達賴喇嘛在流亡建政之初就有意識地推動“民主化”和“世俗化”。2001年以後，首席部長（噶倫）也由流亡藏人直接選舉產生。達賴喇嘛逐漸放棄對議會和政府的干預權，處於半退休狀態。2011年他又宣布在政治上完全退休。

第四，新的政府內閣班子全面反映了全球化、年輕化、多元化和世俗化的特徵。在2011年的大選中當選首席部長的洛桑森格，任職時年僅45歲。他是在印度德里大學和美國哈佛大學受到精英法律教育，並拿到法學博士學位的。六位內閣成員平均年齡也只有40-50歲，最年輕的衛生部長只有38歲。其中有兩位女性（46歲的外交和新聞部長，48歲的內政部長），兩位從北美返回，全部是受到印度和北美優秀教育的俗人。這樣的內閣班子和議會、政府行政人員基本上都是在海外出生的第二代藏人，同時還反映出流亡社區藏人的對本民族盡責盡義務的獻身精神。

第五，全球化的援藏國際公民社會已經形成，並對藏人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尤其是近年來，達賴喇嘛對中國政府的信心愈來愈低，但卻在他身邊吸引和匯聚了愈來愈多的海內外華人。例如2011和2012年歲末年初，達賴喇嘛在印度佛教聖地菩提迦耶舉行的時輪金剛大灌頂法會就吸引了上千的大陸漢人。他對華人民眾的信心越來越高，因為他們中的許多人已經意識到，中華民族的道德復興和民主化進程都可以與西藏民族的自我拯救和自由解放形成良性互動。

僧人自殺自焚的根源

可以說，中國政府近 25 年來倒行逆施的對藏強暴政策與流亡藏人社區的加速世俗化和民主化形成強烈對比，把藏人群體靈與肉、精神家園與祖國故土、上師與信眾更加撕裂開來，造成一種更隱蔽的事實上的種族滅絕。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折磨（親情上的或精神上的）成為每一個藏人生活的常態。在佛教教導中，佛祖創建佛教首先是針對“生苦、老苦、病苦、死苦”（“四苦”）的，對僧眾來說，它是能除一切苦的善法。《法句經》明確教導：“一切眾生恐懼死亡”，“一切眾生珍惜生命，以身作則將心比心，自不殺生莫教他殺。”因此，佛教根本宗旨是戒殺，在小乘佛教裡並明確反對自殺。那為什麼在藏區出家為僧為尼的佛門弟子，卻成為連續自焚的主體呢？是什麼原因讓皈依佛法並以此普度眾人出苦厄（死苦也在其中）的僧侶把死亡當成了一種手段呢？如果死亡變成了一種手段，那麼它服務的更高的價值又是什麼？是什麼因素造成這更高的價值受到威脅，僧人必須以死相爭相護呢？

我們來分析一下 2012 年 1 月 8 日在青海果洛州達日縣縣城自焚的索巴仁波切（Rinpoche，即漢語的“活佛”）的遺囑。年僅 42 歲的索巴仁波切身穿黃色袈裟、點燃汽油自焚。在犧牲前，留下了錄音遺囑，他說道：

我的犧牲不是為了顯示自己有多麼偉大，我誠心誠意地懺悔所犯三昧耶戒以及一切罪業，特別是金剛密乘的誓言戒——不允許對自身的虐待和犧牲，我在此虔誠懺悔。

並且我發願，希望遍法界的一切眾生，乃至如蟲子等一切微小眾生，臨終時未有恐懼，不受痛苦，往生無量光佛的身邊，獲得圓滿正等正覺的果位。因此我願供養自己的壽命和身體。也為了人天導師尊者達賴喇嘛丹增嘉措為主的所有高僧大德長久住世，而把我的壽命、身體化作曼札供奉給他們。

我做出這一行為，絕無貪圖名譽、恭敬、愛戴等自私自利的心態，而是清淨的，虔誠的，如佛陀當年捨身飼虎一般，其他犧牲的藏人同胞也是如我一般，為了真理和自由而捨生取義。

呀！諸多的金剛道友和各地的信徒們，大家要團結一致，同心協力，為雪域藏人未來的自由，為藏地真正成為我們自己的家園，為這樣的曙光，大家要團結一致，為了這個共同目標而奮鬥，這也是所有獻出寶貴生命的英雄們的心願，因此無利益的一切行徑必須要放棄，比如那些為了爭奪草山而自相爭鬥等。

最後，國內外的所有法友們，請你們不要難過，請你們為善知識們祈禱，乃至菩提間我們未有離別。依怙我的老人們和百姓們也請如是發願，無論快樂與痛苦、好與壞、喜與悲，我們都要依靠上師三寶，除了三寶再沒有依靠處，請你們不要忘記，扎西德勒！

從上面摘取出的遺囑中，我們可以看到下面幾層意思：第一，索巴仁波切認真遵循了《中陰救度法》教導的死亡前的準備，避免產生貪念、嗔怒和畏懼，做到心不散亂；同時觀想上師，向上師祈請。第二，索巴仁波切坦誠對自身的虐待和犧牲是破戒，因而發出懺悔。第三，索巴仁波切對上師達賴喇嘛尊者和一切眾生，尤其是藏人同胞發出善念，祝願前者長壽、後者和平自由。第四，索巴仁波切對在他之前“所有獻出寶貴生命的英雄們”祈禱發願，因為根據《中陰救度法》，在四十九天之內，祈禱善願可以幫助亡者順利轉到下一世。第五，索巴仁波切明確指出“三寶”（佛，上師；法，教義；僧，僧眾和寺廟）是藏人的“依靠”，此外別無他法。第六，索巴仁波切明示，他的自焚是“為了真理和自由而捨生取義”，此外別無他求私慾。這裡的大義是維護佛法的純潔和永存，而雪域藏人的自由又是佛法得以維護的前提。第七，索巴仁波切引用佛陀捨身救虎的例子，來證明為了實踐、印證和捍衛佛法的根本慈悲，肉身是可以捨去的。第八，“此處無聲勝有聲”的是，

遺囑沒有一句提及中國政府、軍隊入侵寺廟、鎮壓僧人等。

從上面的遺囑我們可以看到，自焚的僧人明知他們已經破戒，但仍然赴湯蹈火，對藏人來說，他們的選擇已經不可能在好與壞之間進行了，卻只能在懷和更壞之間選擇。那麼，對索巴仁波切和其他犧牲的僧侶來說，他們自焚這一“壞的選擇”又是在避免哪一種“更壞的選擇”呢？前者是僧人個人的自身虐待，後者卻是“三寶”的毀滅和雪域藏人未來的毀滅。

那麼，有什麼理由說“三寶”在雪域高原正在被毀滅呢？概而言之有下面三點：第一：中國推行的無神論和唯物論的意識形態在系統地摧毀和破壞中國和西藏的信仰體系。江澤民對“法輪功”的強暴鎮壓、對地下教會的騷擾打擊、對所謂“邪教”的“黑社會化”處理方式、對藏人和維族人的濫殺都是最明顯的例證。2012年農曆新年西藏黨委開展的“百萬領袖像”（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進村進寺、落實寺廟“九有”工作會議（即：有四位領袖像、有國旗、有道路、有水、有電、有廣播電視、有電影、有書屋、有《人民日報》和《西藏日報》），與此同時又嚴厲禁止出現達賴喇嘛的畫像，就是在意識形態的最高層面對藏人的信仰進行侮辱和圍剿。

第二，中國政府插手靈童轉世、以舞弊方式內定靈童，強迫僧侶和信眾背棄和侮辱自己的上師，也是毀滅藏傳佛教的根本教義，破壞它的獨立和純潔。原歷代班禪喇嘛駐錫地西藏日喀則市札什倫布寺的主持、曾擔任尋找第十一世班禪喇嘛轉世靈童委員會負責人的恰扎強巴赤列仁波切被中國政府以洩密罪判刑入獄6年，後死於非命（據身邊人說是被毒死的）。青海塔爾寺前住持、中國佛教協會前副主席阿嘉活佛逃離大陸後披露，中共在選定西藏宗教領袖班禪喇嘛轉世的金瓶掣籤儀式中作弊，在一個裝寫有候選人姓名的象牙籤的錦套中塞了棉花，讓這個候選人的籤高出一截，因此才順利的選中了內定的候選人。中國政府把被達賴喇

嘛認定為十一世班禪喇嘛轉世靈童的格頓確吉尼瑪監管了起來，至今生死不明，成為世界上最小的政治犯。現在中國政府又在準備在未來達賴喇嘛的轉世上做文章。

第三，正如約瑟夫·列文森在《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一書的結語中，談到共產黨政權與傳統宗教的關係時寫的，表面上看來，一些寺廟和聖物還保留了下來，但他們發揮的功能就是不要宗教發揮功能。他寫道：“‘宗教器物 and 宗教人物都只是留著來被觀看的’。‘不許觸摸偶像’非常形像地延伸到‘不許滋養敬拜者’。‘不許觸摸偶像’似乎是革命中破壞偶像的延續，而不是它的反動。”換而言之，儘管我們也看到中國政府恢復和修建了部分寺廟，但由於政府派幾千工作組進駐寺廟，用政治學習和宣傳代替佛法研修教導，並任意驅逐不配合的僧侶，動員僧眾批判和詆毀自己的上師（例如，除達賴喇嘛之外，還有十七世大寶法王、塔爾寺前主持阿嘉活佛等），實質上是不讓僧眾敬拜自己的上師，不讓上師加持自己的信眾。如果出家為僧者無法弘揚佛法、普渡眾生，如果信眾無法皈依上師、獲得教導，藏傳佛教就無從談起了。如果僧團想做出任何政府不許可的事，政府動輒派軍隊圍攻、入侵寺院。肉體上的摧殘已廣為人知，但對於自焚的僧俗人來說，心靈的痛苦遠遠超過了肉體的痛苦，所以，自焚這一摧殘自我的行為才會為藏人平靜地接受。

自焚事件的價值判斷

如果我們在上述的背景下來理解自焚行為，我們可以看到自焚展示的四個層面：第一，自焚是一種最高形式的、不傷害危及他人的抗議。它的抗議對象就是六十年來中共在西藏的失敗統治和近期的暴力鎮壓升級。第二，僧人自焚是一種殉道。它是用點燃身體來頌揚佛法的偉大和維護它的尊嚴。第三，從個人層面來

看，舍生取義的僧人在自焚中脫離今生苦難、獲得了圓滿。第四，從僧人的自焚我們也可以看到，在經歷肉體和靈魂的雙重折磨中，只有獲得了圓滿頓悟的英雄才能超越肉身的痛苦，同時在經歷精神痛苦的折磨後能升華涅槃，讓生命能量燃燒、綻放出不朽的火花。對於千百萬藏人來說，他們的光明將普照雪域高原。

這裡涉及一個倫理問題：自焚是否是破壞性的暴力？從個人主義的倫理觀來看，個人的自由包括對自己身體處置的自由（例如隱私、安樂死和自殺等）。但個人的自由又要受責任和義務的限制。個人的自殺可能對自殺者家屬和孩童產生不利影響。但對出家人來說，這一家庭責任幾乎不存在。但佛教教義裡有學者解讀出自殺在一定的情況下是允許的，尤其是獲得開悟的僧侶。例如，學者們在討論，佛陀涅槃是否是一種自殺，佛陀捨身救虎是否也是一種自殘，等等。在巴利文的《相應部》（又稱《雜尼迦耶》）經書中提到僧人錢那（Channa）的“自殺是無可指責的”。印度哲學家拉達克里希南（S.Radhakrishnan）在《東方宗教和西方思想》一書中寫道：“佛陀譴責自殺，但也有特殊例外：哦，舍利佛，任何人捨棄自己的身體，換上另一個，我都認為是該受責備的。但沙門錢那的自殺是不應當受責備的。如果犧牲肉身是出於強大的內在信念、它的維持已不能帶來任何益處、或者是為社會做出更高的公益，那就是可褒嘉的。”當然，有學者持異議，認為佛陀並非在“接受”、更非在“鼓勵”自殺，而只是在除去某種自殺的惡意解讀和加在亡者身上的指責。但又有學者明確指出，《妙法蓮華經》（又名《法華經》）中的“藥王菩薩本事品”中有“自燃身”來“以身供佛”和後來“燃臂供養”的論述，而且認為這是“於諸施中、最尊最上”：

作是供養已，從三昧起，而自念言，我雖以神力供養於佛，不如以身供養，即服諸香，栴檀、薰陸、兜樓婆、畢力迦、沈水、膠香，又飲瞻卜諸華香油，滿千二百歲已，香油塗身，於日月淨

明德佛前，以天寶衣而自纏身，灌諸香油，以神通力願、而自燃身，光明遍照八十億恒河沙世界。其中諸佛、同時贊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是真精進，是真法供養如來。若以華、香、瓔珞、燒香、末香、塗香、天繒、幡蓋、及海彼岸栴檀之香、如是等種種諸物供養，所不能及，假使國城、妻子、布施，亦所不及。善男子，是真第一之施，於諸施中、最尊最上，以法供養諸如來故。作是語已，而各默然。其身火燃、千二百歲，過是已後，其身乃盡。一切眾生喜見菩薩、作如是法供養已，命終之後，復生日月淨明德佛國中，於淨德王家、結跏趺坐，忽然化生。即為其父而說偈言：

大王今當知，我經行彼處，
即時得一切，現諸身三昧，
勤行大精進，舍所愛之身，
供養於世尊、為求無上慧。

若有發心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能燃手指、乃至足一指、供養佛塔，勝以國城妻子、及三千大千國土山林河池、諸珍寶物、而供養者。

由於《法華經》在北傳佛教中廣為流傳，所以，我們在大乘佛教國家才看到僧人自焚的行為。除去藏區外，“文革”期間西安法門寺的良卿法師為了保護佛門的寶物，就自焚以死去阻擋當時的“革命小將”搞打砸搶。1963年越南佛教徒在越戰期間也出現釋廣德法師自焚的事情。所以，自殺自焚與佛教並非完全不容，對捨身取義的殉道和抗議行動，尤其是供養佛法，並不存在道義上的汙點。死亡者也不因此而名譽受汙。

與自焚相關聯的另一個話題是，佛門弟子是否完全不能捲入暴力。在林照真的《喇嘛殺人：西藏抗暴四十年》一書中，就詳細記述了許多誓不殺生的喇嘛為了挽救西藏，脫下袈裟、變成戰士的歷史故事。學愚所著的《佛教、暴力與民族主義：抗日戰爭

時期的中國佛教》一書，則記載了漢地的僧伽大眾拿起武器，加入抗日大軍的英勇歷史。所以，廣義上的暴力，狹義上的自焚都可以因為行動者心發正願，為了社會大眾的福祉，或者為了捍衛三寶，或者為了供養佛陀，都可以被接受，甚至成為英雄義舉。正如我的詩人朋友辰岸（也是一位在美國專攻佛教的宗教學博士）在《自殺者說》一詩中寫道的：

“英雄末路
是為那未盡的壯志
聖徒殉道
是為那神聖的呼喚……
擁抱生命者豪邁
擁抱死亡者悲壯
不一樣的勇氣、
不一樣的喜樂。”

中國政府的官方宣傳機器完全不顧國家結構性暴力迫害、軍隊武警在僧伽寺廟屠殺和平的僧侶、政府沒有誠意回應和解決西藏人民的宗教和文化訴求，並由此而造成的藏民族反抗，而是把問題的根源歸罪於死亡者、其他受害者和海外的達賴喇嘛和藏人行政中央。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現代藏學研究教授羅伯特·巴納特的研究表明，在 2008 年以來的抗議運動爆發之前的五年，四川甘孜和阿壩兩州的維穩開支就已急劇上升。事實上，維穩費用的飄升反映的是中共把強力鎮壓作為瞭解決西藏問題的基本政策。而大規模抗議的出現和年輕人成為抗議的主體，則反映出大棒政策的失敗。但今天的中共政府不斷在經濟上收綱、政治上加壓，而且以共產專制主義和種族主義的雙重壓迫來對待藏人，境內境外藏民族的聯合反抗就只會升級。正如達賴喇嘛在許多場合已經講到的，他對中共領導和中國政府已經不抱信心。可以肯定的是，胡

錦濤和周永康打造和維持的對藏控制體制和政策在十八大他們任期結束時是難以改變的。現在也難以判斷，十八大上來的新領導人是否有政治遠見、魄力和智慧，與達賴喇嘛一道真誠合作，解決藏民族的訴求，化解藏漢民族的緊張關係。恐怕，藏民族和漢民族都共同面臨著一個更為艱鉅的挑戰，那就是只有在與共產黨爭自由的民主化運動中，漢藏兩族才能獲得自由解放，從而共建兩民族的合作、和平的良性互動。所以，能夠在短期內終止自焚行為的可能性存在於藏漢民族同心攜手、發動國際社會力量，運用各種方式向中國政府施壓。從長期來看，藏漢民族必須相互支持對方的自由民主事業，終止共產黨的統治，給所有在中國境內生活的人民帶來“言論自由、敬拜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和免於匱乏的自由”。

面對沒有盡頭的藏人的犧牲，我們現在還能做的就是實踐索甲仁波切在《西藏生死書》一書中談到的方法，對死者，尤其是死於暴力和意外的死者，通過祈禱提供我們的關愛：

觀想從諸佛或聖者身上發出巨大的光，灑下他們的一切慈悲和加持。觀想這道光芒流到亡者身上，完全淨化他們，讓他們從死亡的混亂和痛苦中解脫出來，施給他們深度、持久的安詳。然後，全心全意觀想亡者化成光；同時，他已經被治愈和解脫一切痛苦的意識，騰空升起並永遠與諸佛的智慧心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鄭振煌譯《西藏生死書》第 397 頁）

噶嘛呢唄咪吽！

6.4 與中國知識分子談藏人自焚 (2012.12.13)

從 2009 年二月起，截止 2012 年 12 月 4 日，已有 92 名藏人在中國境內自焚，境外（印度和尼泊爾）還有 5 起自焚事件，死亡人數已上升為 77。2012 年年初，在我寫作《雪域血紅自由火》（收入《浴火袈裟》一書為導論）一文時，中國境內發生的藏人自焚事件已有 20 起（截止 2012 年 2 月 4 日），但短短的十個月，又新增 72 起。在人類文明史上，這是令人震撼的事件。

作為在多民族國家一員的藏民族經受如此災難，占據全國人口 92% 的漢民族有責任和義務瞭解事件的真相，傾聽藏民族的訴求，努力做出回應和改進，立即消除藏人生不如死的苦難根源，從而制止自焚事件的再度發生。

但迄今為止，中國政府的反應還停留在“陰謀論”的思維定勢裡：首先指控海外勢力（所謂的“達賴集團”和“反華勢力”）“組織”、“操縱”和“唆使”藏人自焚。其次，大規模動用警力和武力，驅散民眾集會、圍攻寺廟和抓捕僧人、重判所謂的“協犯”（其實大多是犧牲者的親人或寺廟的僧人）。最後，在地方上又用重金（例如甘肅省甘南州公安局出價人民幣 20 萬）懸賞舉報自焚“幕後黑手”。中國政府不僅把自己的責任推得一干二淨，

還把新的“罪名”強加給藏人受難者和他們的家屬。

面對藏人的災難和中國政府的不義，漢人的集體表現沒有體現出“仁、義、禮、智”的傳統美德。

中國知識界的難堪沉默

2012年11月13日《紐約時報》記者傑安迪從北京發出報導，題為“中國知識分子對藏人自焚集體沉默”。如果意識到《紐約時報》在國際輿論中的領導地位，以生產、傳播智慧和思想為業的知識分子不能不集體反思一下，為何漢人對藏人的苦痛缺少慈悲的情懷和道德情感上的敏感。旅居加拿大的著名藏人歷史學家茨仁夏加（Tsering Shakya）（見 *The Struggle for Tibet*，第91頁）曾寫道：

“想要中國知識分子，不管他們是共產黨官員、自由派民主人士或異議作家，去用客觀和理性的方式去思考西藏，似乎就是要求一個螞蟻舉起一頭大象。這是超越於他們的能力和意境的。他們的悟性被種族偏見所鈍化，他們的想像被殖民主義主子的信念和定見所蒙蔽。”

當然，首先我們必須明確，概言“中國知識分子”並不否認個別的中國學者為改變西藏人民的處境發出的吶喊和做出的努力。第二，中國知識分子的處境艱難，恐怕與藏人也有相似之處。如一位署名“林冰謙”的深圳讀者在讀完傑安迪的報導後，給《紐約時報》的來信中寫道：如果知識分子是指“官辦大學和研究院的教授、官辦媒體從業者等”，“他們因政府的選拔和控制制度，不存在合理的獨立性。其人本身就是政府組成部分，亦即藏人自焚的罪魁禍首的組成部分。他們的沉默作為政府的信息封鎖政策的一部分，是一種必然。”如果是指自由知識分子，“中國大陸能夠突破中共金盾工程的阻截而在 Twitter 上發言的人們的自身和家人仍在這個北京政府的威脅下，隨時會因在 Twitter 上發表的意

見被祕密逮捕甚至處決。”所以，作為身處自由世界的知識分子，我們必須意識到，中國的知識分子和藏人其實都是專制政治的犧牲品，他們都面臨著深刻的身分認同和本體價值的危機。對於藏人，它涉及到如果藏人沒有了佛教“三寶”（佛陀、佛法和僧團），藏人是否還是藏人的問題。對於中國知識分子，如果沒有了獨立、自由的思考和追求正見的使命感，是否還配知識分子的名分。也正因為這種相通性，所以，中國知識分子必須關注和支持藏人的訴求。

藏人災難是漢人災難的預演

回顧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藏人的災難經常成為漢人災難的預演。1962年班禪大師的《七萬言書》不僅詳陳了中共在藏區的“左傾”政策和對文化宗教的絞殺，也預見了未來全中國的“文革”浩劫。1989年三月胡錦濤在拉薩開槍殺人和實行長達一年多的“戒嚴”，測試了漢人和國際社會的反應，為同年北京的“戒嚴”和天安門廣場的“六·四”大屠殺做了預案準備。現在，中共維穩鎮壓的“卡特爾”（包括軍隊、武警、公安、國安和政法系統）又在藏區和維族區試刀演練，我們不能天真地認為，漢人就不會遭遇自焚（“強制搬遷”已製造出內地自焚悲劇）、斷網（“微博”也已被關閉過）、和被武力彈壓的殘酷（汕尾、石首、烏坎和什邡都已見證）。同時，如果我們仔細分析蘇東共產主義垮台消亡的歷史經驗，就會看到民族矛盾和族群危機成為摧毀極權專制體系的重要動力機制。以藏人的宗教炙熱和犧牲精神、寺廟的組織體系、藏民族視為觀音菩薩化身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國內和國際威望來看，中國的民主希望恐怕還寄託在藏人的自由抗爭運動中。

但對於藏人的抗爭，在漢人學者中間存在著普遍的誤解和冷

漠。在此，我們可以把漢人知識分子分為三類：第一，官方的御用學者，其中也包括一些藏人藏學家，他們對藏人或達賴喇嘛領導的海外流亡社區進行謾罵和詆毀。例如 2012 年春季官方的“中國西藏新聞網”發表了無署名的《七問達賴喇嘛》，給達賴喇嘛貼上了一系列的侮辱性標籤：“舊西藏最大的封建農奴主”，“叛國者”，“不是有病，就是有鬼”。該文還說：“達賴的言論不禁讓人們想起二戰中瘋狂的納粹。達賴的‘中間道路’、‘高度自治’背後，是赤裸裸的民族驅趕，和當年希特勒‘清洗’猶太人何其相似。”它還寫道：“達賴在舊西藏的所作所為，連希特勒都相形見拙。”在這篇代表官方立場的文章中，藏人自焚成了達賴喇嘛“蓄意鼓動”和“屢次唆使教唆殺生造下的惡業”。

我們都知道，1950 年中共宣布西藏“解放”，是年年底，年僅 16 歲的達賴喇嘛親政。1951 年《十七條協議》簽訂，1959 年 24 歲的達賴喇嘛流亡印度。不知已經在中共控制下的達賴喇嘛有何所作所為可以“連希特勒都相形見拙”。且不說達賴喇嘛倡導的“中間路線”明確主張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下”尋求西藏的“名副其實的自治”，而且，非暴力路線也是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行政中央的一貫政策。西藏的自由抗爭本質上是一個有虔誠信仰的民族與推行無神論的共產黨政權的衝突，與新疆的維族抗爭、漢地“法輪功”和“家庭教會”的維權都有相似之處，並非是漢、藏的種族衝突。但中共的宣傳機器和暴力鎮壓愈加把它演變成了族裔性質的衝突，正如著名漢人藏學家王力雄所言，尤其在 2008 年後，中共“反分裂的官僚機器”把藏漢關係轉變成了“種族對立”，製造了“自我實現的預言”。

同情卻曲解藏族的漢人知識分子

不幸的是，許多漢人學者對官方的宣傳和偏見不加分辨地照單

全收。例如，有海外的華裔學者接受“萬惡的奴隸制”、“奴隸主”等不實判斷，把毛澤東在西藏的作為與“林肯解放黑奴”相提並論，並把毛和林肯並立。又例如，許多的漢人學者總是用西藏的經濟發展來代替和迴避對宗教自由和文化權利的討論，無視西藏問題的核心是宗教信仰和人權問題，從而涉及到的藏民族的生存問題。還有，許多漢人學者無視流亡藏人社區在民主化上的成就和實現了政教分離的事實（可參見復旦大學國關學院培養出的台灣學者蘇嘉宏所寫的《流亡中的民主》和《民主在流亡中轉型》兩書），向中國人灌輸“達賴喇嘛要復辟農奴制”和“神職人員的絕對特權”之類的謊言。在我任教的大學也有教授依賴自己家庭裡“援藏幹部”提供的信息，來對西藏問題進行權威論證，全然不顧援藏的“黨政幹部”、“國企員工”或者“軍隊官兵”做為殖民主義體制的核心所帶來的偏見。

官方的謬誤宣傳和詆毀之所以還有市場，是因為絕大多數的學者屬於我要說的第二類：沒有官方背景，也沒有有意識地要去傷害藏人利益，但對西藏問題漠然置之，無意識中行方便，成了謬見的寄居體和無意識的謊言傳播者。許多人不知道佛教的真諦，輕易用無神論把宗教信仰貶為無知和落後。許多人不知道達賴喇嘛為何人，他有何著述和教導，他在藏人中和在國際上受到何等的禮待，卻隨意侮辱他的成就和名譽。許多人不去深究藏人自焚的訴求，充耳不聞他們在生命燃燒時仍然不忘心發善念、遠離貪嗔，而是草率地把他們看作“極端狂熱分子”，甚至“恐怖分子”。

毫無疑問，藏人自焚不是一個好的選擇。但是，今天的藏人並沒有如此的奢華，只是在“好”與“壞”之間選擇。藏人的困境和苦難在於，他們的“選擇集”裡，只有“壞”和“更壞”的選擇。比自焚還要壞的選擇就是西藏人民失去佛教三寶：佛陀、佛法和僧團。中共政權對藏人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肆意侮辱和詆毀，禁止在寺廟懸掛他的畫像，把堅持信仰達賴喇嘛為上師的僧

人逐出寺院，在寺廟建立黨組織直接控制的“寺廟管理委會”和進駐“工作組”，把百萬份所謂的“四大領袖像”（毛、鄧、江、胡）強行送進寺廟，都是西藏人必須面對的危及他們根本宗教信仰的威脅。自焚的僧人追求的目的就是要獻上個人身軀，捍衛藏民族信仰的自由和民族生存的權利。由於不理解這一困境，我們看到一些漢人學者儘管對藏人深懷同情，但仍然未能逃脫曲解藏人的思想誤區。這就是我看到的第三類漢人知識分子。

例如，暨南大學的姚新勇教授對中國的民族問題發表過不少論著。近日讀到他的兩篇文章：《中共政府與十四達賴真的無法勸阻藏人自焚嗎？》和《燃燒的身體與身體政治學之辯：關於部分藏人持續自焚現象的觀察與思考》，感到有必要與漢人知識分子對話溝通。姚教授清楚地意識到了“中共並不具備立即阻止藏人自焚的威信，”也不同意政府的“一味嚴控”和“升高了對達賴喇嘛的攻擊”，甚至認為這些措施“進一步激化了藏人的情緒，也客觀上影響了自焚的不斷持續。”但姚教授的下列觀點卻值得商榷：第一，他試圖站在“生命價值的高度來設法勸阻自焚”。第二，他以為，自焚是一種極端行為，遠離了佛教不殺生的戒律，超越了非暴力不抵抗的界限，聚集了“民族仇恨”。第三，他認為，“文化滅絕”和“種族”滅絕在西藏並不存在，藏人“作為一般人的生活權利並沒有被剝奪，最低限度的宗教信仰權至少也還存在，”“傳統藏族文化、藏地山河並沒有面臨即刻毀滅的危險。”第四，“心硬”的達賴喇嘛“刻意迴避”了自己的責任，他應該明確表態、甚至不惜以絕食就可以阻止藏人的自焚。

生命的終極意義

首先，如果要體會到藏人感受到的文化滅絕的危機，我們就不能把藏人看作漢人界定的“一般人”。藏人是有炙熱宗教信仰

的民族，這是與漢人主體的最大區別。他們各自領悟到的生命的意義由此分叉，也就是唯物主義的無神論者和有精神信仰的唯心主義者之間的鴻溝。因此，在大乘佛教的重要經典《法華經》的“藥王菩薩本事品”中，有“自燃身”來“以身供佛”和“燃臂供養”的論述。但今天的中國文化人難以理解佛教的“生死一體”的內涵，也難以理解我們先人“捨身取義”的士大夫作為。中國知識分子的主體已經忘卻了裴多菲的詩句（“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對“不自由、毋寧死”早已感到陌生，甚至無法理解共產黨人夏明翰的“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了。電影《南京！南京！》的編劇和導演顯然看到這一點，所以他們塑造出了一個悲劇英雄，受過教會學校教育的日本士兵角川。在他幫助電影中的姜老師儘快脫離生命的苦海後，又聽到唐先生在生命終止的最後一刻興奮地告訴他，“我老婆又懷孕了”。我們不難理解，角川說出了：“活著比死亡更艱難。”他讓兩位中國倖存者逃生，然後開槍自殺。對於給予他們重生的恩人的死亡，兩位中國人沒有任何反應或反思，只是陶醉在生還的狂喜中。這可能又是中國人“生存智慧”與日本人“武士道”的差異了。

在佛教看來，肉體的生命終有離散的一天，而意識和精神卻會永生。作為知識分子，如果無法從超越性的高度來認識人類生命進化追求的精神本質，我們就無法領悟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也更無法領悟加繆的“我反抗，故我們存在！”（Albert Camus, *The Rebel*, 第 22 頁）從此高度，人世間目睹藏人自焚，忍受精神折磨和痛苦最深重的莫過於達賴喇嘛，因為，沒有任何人比他更愛他的信眾，也沒有任何人比他為他的人民和宗教付出得更多。所以，作為漢族的知識分子，我們沒有資格去“美化”或“醜化”自焚行為，更沒有權力去譴責和指導達賴喇嘛。面對不斷的自焚，我們集體需要的是勇氣去發現、實踐和捍衛正見。

現在中國知識分子面臨的最大危機就是沒有追求“真、善、美、

聖”的意識、衝動和勇氣。我們知道，就連大名鼎鼎的大提琴家馬友友也因為在 1997 年白宮歡迎宴上，向同坐的江澤民提醒中國對達賴喇嘛和西藏政策有待改進，結果上了“黑名單”，好幾年不予以去中國演出。所以，西藏問題是一個學術雷區。要在中國政府和達賴喇嘛之間保持理性和客觀是不易的。在接受了要付出的代價後，我有緣與達賴喇嘛有過無數次會面（一次是在他達蘭薩拉的寓所），並多次聽到他的講經會，也在我的學校為他舉辦過兩場座談會。通過多次近距離的接觸，我可以告訴讀者，達賴喇嘛是一個有慈悲、有智慧、有童心和有幽默感的老人。通過閱讀他的著述（有上百種），我認識到，達賴喇嘛是打開藏民族心靈之門的鑰匙。企圖隔斷達賴喇嘛與藏人的精神關係、謾罵和詆毀藏人精神領袖，不能解決藏人自焚問題。所以，中國政府若要真正解決藏人自焚問題，必須從尊重藏人的宗教領袖和上師達賴喇嘛開始。

6.5 新聞人唯有抗爭才有自由 (2013.01.10)

2013 年剛開年，《南方周末》新年社論遭串改、媒體人的新聞道德遭強姦，再次提醒所有的媒體人士，中國沒有《新聞法》。當一個國家的外交部新聞發言人信誓旦旦地說，“在中國不存在所謂新聞審查制度，中國政府依法保護新聞自由，也充分發揮了新聞媒體和公民的輿論監督作用”，此時，身穿制服的警察們卻拿著相機和攝像機（“長槍短槍”）拍攝南方報社大廈門前的聲援者。如此南“槍”北調，也只會發生在世界第一荒誕大國里。

短暫的新聞開禁

面對“新聞自由”得不到法律保護的現實，公民和媒體不能只是期盼政權恩賜“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南周》事件和中國過去四分之一世紀兩次最大的新聞媒體的“春天”都是由實踐帶來的。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上海的《世界經濟導報》、北京的《經濟學週報》和《新觀察》通過“打擦邊球”戰術，不斷拓寬新聞自由的空間。1989 年北京之春的時節，全國媒體，包括中央諸多媒體，例如《人民日報》、新華社和《中國日報》等開

始大膽地講真話。它們的編輯和記者們甚至走上街頭遊行，宣稱從此拒絕講謊言。2008年中國中央、地方、民間和公民媒體在四川汶川大地震中群體崛起，掀起了“媒體大地震”，把“及時、公開、透明”的新聞標準提升到了一個新高度。

突發事件製造自由空間

儘管新聞界經歷的“89之春”和“08震撼”最後都被黨國的“倒春寒”肅殺，但他們都給我們留下了實踐新聞自由的寶貴經驗。具體說來有如下幾點：

第一：有意外突發事件，就有新聞；有大事件，就有大新聞。新聞界儘管有主體意識和部門利益，但媒體畢竟還是一個聯繫社會各界、各個層面和各個事件的中介。新聞從業人員搶新聞的“伊德”（Id）似的本能衝動要衝破外界的壓抑，必須要有大事件發生。由於對人性的震撼力如此之強大，八九年幾千學生絕食後和零八年汶川地震後，新聞界集體無意識地像發狂的野馬，掙脫了“黨的喉舌”的韁繩；重心傾斜從“黨的路線”滑向“群眾路線”；從弘揚主旋律、歌頌“偉光正”位移到唱多旋律、為民眾發聲。

突發事件總是不可避免，大事件也可以製造，所以，新聞自由的勃現和新聞管制底線的突破就會有機會。關鍵是人們要準備好利用突發事件，下決心製造大事件。

第二：黨國新聞控制體系的官僚運作總是比突發事件要慢一拍，時間差就是自由之窗。由於官場上人人自保、相互推諉，任何一點危機都會牽扯進上級領導，等上級領導拍板。而黨國“九龍治水”的決策機制和“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政治現實都讓統一、快速決策不可能。媒體若能打好時間差，推動透明和自由，就可能掀起更大的民變。八九年全國民主風潮的出現和零八年公民社會的崛起都與媒體的貢獻分不開。

第三：當突發事件還只是針對具體部門或地方層級時，黨國中央總是慣於玩“聖上英明、奴才混蛋”的的雙簧，把下級部門或領導人當“保險絲”燃燒掉。這時就有新聞自由、媒體監督的空間。在四川震區我就觀察到，地方媒體早早守規矩，中央媒體卻能更有力地監督地方政府和揭露地方政疴。只有當中央統一令下後，中央媒體才會鳴鑼收兵。在當今中國，如果一個地方的民變持續時間越久，媒體的運作空間就會越多，引發燎原之火的可能性就越大。

權利是爭來的

第四：與其空盼，不如實踐；行動總是勝於言論。做事就是行使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儘管《南方周末》的新年獻詞被串改了，但媒體人的抗議行動發出了更強大的聲音、傳遞了更尖銳的訊息。重要的是要有艾未未體現出的精神：騎著馬兒動起來！

第五：法律的重要性遠遠不及民俗鄉輿；如果公民意識提升，大家自破心獄，即便沒有《新聞法》、《記者法》，人民也自由了。在烏鎮，人民自由了。在《南方周末》廣場，所有的聲援者自由了。美麗又勇敢的年輕人有勇氣在警察們的相機前擺 Pose 的時候，這些年輕人就已自由。所有的旁觀者也獲得了爭自由、捍人權的勇氣。

自由不是賜予的。自由就在心裡，自由就在嘴上，自由就在腳下，自由就在街頭！

6.6 “西單四勇士”

(2013.04.14)

中共政權的最高層有一位博導教授級別的智囊，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遊學美國半年後，寫下了《美國反對美國》一書，幾乎把美國判作一個支離破碎的體系。在書的最後幾頁，該作者以日本為題發出了對“太陽帝國”的憧憬：一個“兇猛、殘忍”和“不承認人的基本價值和信仰”的國度能夠戰勝美國、最終取勝。二十多年後，這位作者登上了權力的高位，正在把他的政治信仰轉變為中共政權的核心理念，並貫徹進政府決策和政治實踐當中。一個“紅太陽帝國”已經在中國誕生，並向中國人宣示，它會把他們帶入建立帝國偉業的“中國夢”。

不做愚人的北京公民

2013年愚人節那天，我的“面書”轉來網友的帖子：3月31日下午，侯欣、袁冬、張寶成和馬新立等4人到北京西單廣場拉出兩條橫幅。一條寫道，“公民要求官員公開財產”。另一條寫道：“貪官裸官不杜絕，中國夢只能是白日夢”。在現場錄像的鏈接裡，我看到袁冬用擴音器進行講演反對腐敗，倡言政改，引起群眾圍

觀。但很快便衣、警察和特警從天而降。在僅僅六分多鐘的時間裡，人群就被驅散，“西單四勇士”被警方帶走，並被以“非法集會”的罪名拘禁。

匆忙趕來的警察試圖控制局面，對袁冬喊道：“你不要激動。”袁冬回答：“我沒有激動。我很平靜，我很好！”警察在驅趕人群：“走啦，走啦！別看了！這有什麼好看的！？”

兩週過去了，袁冬的“我很平靜”的回答一直縈繞在我的耳邊，讓我從此無法平靜。警察的“這有什麼好看的？”那句呵斥也一直讓我難以忘卻，許久以來我都試圖找到答案：“西單四勇士”在廣場上的舉動到底有何意義？為什麼專制機器的爪牙一方面要貶低它的意義，另一方面卻又怕得要死，試圖掩蓋某種骯髒的行為？

今天，從“面書”上又收到著名維權人士屠夫（吳淦）發出的“SOS”帖子：“西單那三位勇士最近情況如何？不單單需要律師，更需要聲音出來，唉！”由於身體健康原因，“西單四勇士”中的女豪傑侯欣已被取保候審，但袁冬、張寶成和馬新立至今卻還身陷囹圄，前途未卜。對維權人士吳淦來說，更大的悲哀還不在於此。更大的不幸是沒有更多的人發出更強的聲音，來喚醒國人和世人關注為我們的共同福祉勇敢獻身的英雄。

言傳身教“公民學”

我們先來聽一聽、看一看“西單四勇士”的言行，就不難明白，他們是向一個“紅太陽”燒灼著的“黑色帝國”發出挑戰和詛咒的平凡而又偉大的公民。在我收到的視屏開頭的第一分鐘裡，袁冬高聲對圍觀的民眾說道：“中國是我們全民的中國，是我們安身立命的家園，不是共產黨的私家花園，不是你予取予奪的私家倉庫。”

短短的三、五分鐘後，各路警察馬上雲集，開始阻止袁冬演講。袁冬繼續說道：“不要把你們的狠勁兒，所有的財力，所有的監聽用來對付我們。我們怎麼啦？我們要求官員公布財產不對嗎？我們要求杜絕貪官、裸官不對嗎？沒有貪官、裸官了，我們大家的日子都好過，你的日子也好過。我們不對嗎？動不動半夜把我們抓走，你一句廢話問不出來。弄不好今天晚上又抓我們。我們不怕，我們是正義的。我們人民交的稅養活你們，是要你們為人民服務，為國家進步。你打壓我們，國家能進步啊？你們到底是什麼東西？吃人民的飯，為狗看門兒！”

在最後被禁聲時，袁冬還繼續說：“我建議大家都買這本書看：《南京大屠殺》。如果我們不把貪官都杜絕，災難還會來的，我告訴你！”

我們再來看一看女傑侯欣的民主思想火花。在兩個月前的一次私下集會上，侯欣解釋了“六四屠殺”如何改變了她的政治觀和行動策略：“和平，和平，和平已經不復存在了！二十三年前，在廣場，我的同學死在我的身邊，從那時起，就喪失了一切和平！你說要政改，請你給我路線圖！你一百年不動搖，我傻啊！狼總是要吃羊的，獨裁者就認大砲！讓一個撒旦統治到死？坐而論道，清談誤國，在這裡能哭死董卓？我不主張暴力，但人民不能放棄暴力！槍桿子不具有方向性價值，同時槍桿子具有普世效用價值，在普世價值指引下射出的子彈就是正義的子彈。不公開財產，官員就是盜賊！要么公開，要么滾蛋！行動就是一切！”

就在侯欣與其他三位勇士走上西單廣場前，她對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做過如下發言：“我代表北京街頭民主派委託來講話。從二月份起，我們共上街十二次，其中四次成功八次失敗。有人說，你不用上街，我們男人上。我說不是所有男人都是男人，當中國男人上街時，我就退出。偌大中國，豈是無人？是的，我想對官員們說，亮媳婦不如亮財產！騙了我們六十四年，現在，我連你

的標點符號也不信了！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始，為民主做炮灰，乃我三生有幸！我們離亡國已經不遠了！我現在保證，我一周上一次街！我的想法很簡單：讓長輩前人，死而瞑目；讓子孫後代，生活在自由幸福之中！”

“悲慘世界”的人們

面對四位普通公民的勇氣和智慧，最讓人震撼反思的是，我們許多受過政治學專門訓練的人，經常把“公民學”教串味成了“權力學”。這些掛著政治學教授和博士頭銜的智囊，在幫助中共領導人給人民套上小鞋的同時，採用拿來主義的態度，雜糅東方傳統專制主義和西方法西斯體系，讓人民的痛苦呻吟消聲，同時還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拋出“合（和）鞋論”，為一隻破鞋塗上油彩。因為如此，習近平在全面接班後的第一次外訪時聲稱：“鞋子合不合適，穿了才知道”，來為中國特色的“高壓維穩體制”辯解，並在“中國夢”的幌子下把成千上萬的中國公民拋入噩夢的深淵。

“西單四勇士”就是直接衝著習近平的“中國夢”來的。“北京街頭民主派”已經開始了行動，他們甚至抱有“為民主做炮灰”的心理準備。他們也做好了追求和平轉型、但並不放棄暴力的策略準備。但是，他們也清楚地意識到，“悲慘世界”的人們可能並未意識到自己的被奴役狀態，也根本沒有做好認可、支持和參與共同的自由民主事業。在採取西單廣場行動前，侯欣就向外界發出了呼籲和期待：“各位老師，我們需要什麼？我們需要三樣東西：你們的道義支持、理論指導、網絡呼籲！”

“西單廣場民主四勇士”正在拉開一場歷史大戲的序幕，其內容和形式，這些戲劇性人物的表演都精彩無比。他們在給全體中國公民上一場“公民學”的大課，值得每一位中國人傳看、關注，甚至加入、參與。但如何我們才能使所有人能夠感到強烈的震撼，

積蓄足夠的勇氣，認同“西單四勇士”的事業，提供各類的支持，並最終投身其中、積極參與？如何我們才能把自己從冷漠和膽怯中驅趕出來，把沉默的大多數從昏睡和虛幻中喚醒？如何我們才能讓多數的人相信，警察們“為狗看門”完全錯了？

我苦苦地試圖找到答案，但仍然空無收穫，感覺茫然。此時的心境與喀麥隆·麥金塔斯的《悲慘世界》音樂劇的開場非常相似：

“天可憐見悲慘世界，無望苦囚雙眸毋望。俯首認降，低頭等死。烈日荼毒，此處是人間煉獄！用這塊土地上所有的憤怒，審判日何時才會來臨？何時這些腦滿腸肥之人，才會受到制裁？何時戰鬥的堡壘才會築起？”

世界第一人道主義作家雨果顯然看到了人性的多面和脆弱，制度的腐敗，革命的殘忍，學生的天真，民眾的冷漠和惡人的投機。但他對一樣東西是充滿絕對的信心，並認作是最根本解救之道：自我發現和復甦的靈魂皈依到上天的絕對力量和正義。正是有了書中米里哀主教體現出的最高神性的力量，我們才看到了囚犯冉阿讓的靈魂發現和他的善意之舉，才会有警察沙威不堪忍受靈魂痛苦折磨後的自殺，才会有馬呂斯的醒悟和與冉阿讓的冰釋前嫌。《悲慘世界》音樂劇中唱到：“看看人間的苦難，可聽見人民在吶喊？再不願忍受剝削人們，將這世道來推翻。讓你良心的碰撞，敲得那戰鼓聲聲響。讓我們以勇敢，去迎來新生曙光！”

個人與全體的拯救與自由

“時間到了，人們的血液開始沸騰。我們需要一個預兆與啟示，使人民聚集起來，使人民武裝起來，使人民組織起來！”

但在民主革命之前、期間和以後都會面臨個人與群體之間的衝突。雨果的人道主義和個人主義讓他在馬呂斯和激進學生領袖的衝突中，明確作出傾向性選擇：不願以革命和人民的名義來犧

性個人、愛情和人道主義精神。他的所有價值判斷的坐標都落實在每一個個體身上的。暴政帶來的不幸是降落在每一個具體個人頭上的；自由是每一個個體享有的；拯救也是從每一個個體出發，由個體組成社會群體來為每一個個體爭取的；每一個個人將會最終面對自己的良心、一個人面對天地承擔責任，領取人生的獎賞和遭受天譴報應。我們現在需要每一個個人嗑捫自己的靈魂，傾聽內心深處的聲音，獨立面對上蒼、承擔責任。你自由嗎？你爭取了嗎？你反抗了嗎？你聲援了反抗的勇者了嗎？你有勇氣參與嗎？你有勇氣為自由而戰，遵循至上的天志，維護根本的天道嗎？

現在，“西單四勇士”中的三位還被一個專制政權關押著。這個政權甚至赤裸裸到踐踏自己制定的法律，廢除公開承諾的權利，諸如言論自由、遊行集會自由和申訴的權利。袁冬妻子朱雅春女士在接到筆者的電話後，明確告訴我：首先，她丈夫所作所為沒有錯。他只是行使一個公民的合法權利。其次，如果她能替她丈夫去坐牢、甚至去死，她都願意，因為她12歲的女兒更多地得到了爸爸的教育和幫助，女兒更需要他。但是，即便有這樣的信念和獻身，朱女士最後告訴了我一個出乎意料的決定：她已向代理袁冬案子的律師提出與袁冬離婚。

為什麼會這樣？我的理解是，為了保證袁冬在拘禁期間不受虐待，為了使他能早日獲得自由，同時為了幫助他們的女兒免於騷擾和恐懼，這恐怕是最好的但也是最無奈的選擇了。我想質問習近平先生：身為父親，我想你能理解父母為女兒做出的犧牲。難道，你所許諾的“中國夢”必須使得中國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嗎？你能夠踏進他們的鞋子，從他們父母的角度為女兒著想嗎？

作為一個獻身政治科學三十多載的學者，我多麼希望能為朱雅春女士找到答案。但在“西單四勇士”面前，我意識到自己的理論蒼白和行動無力。正如歌德所言：生命之樹常青，理論總是灰色的。在中國經歷歷史大變動之際，我無法向“北京街頭民主派”

提供任何理論指導和建議；相反地，“西單四勇士”卻在向所有的中國人教授政治理論，向所謂的理论權威發出他們無法直面的理論挑戰。什麼“三個代表”、“和諧社會”、“中國特色的民主”、“三個自信”統統成了理論垃圾。

儘管我的智慧已經枯竭，但我的心卻掛念著袁冬勇士的妻女，腦子裡不斷重複著冉阿讓的祈禱：“主在上，定死生，請讓他，蒙主恩！我願死，換他生，保佑他，引領他。引領他，帶他回家。”儘管我的身體早已遠離中國，但我的神思卻不斷跨越海洋去擁抱“西單四勇士”，而且我的心頭激盪著《悲慘世界》的呼喚：

“你聽到人群的歌聲高騰了吧？
唱著人們心中的憤恨？
歌聲裡群情激憤，
只為不想再沉默為奴！
戰鼓的速度急促，
激蕩了心跳的韻律。
呼喚著新時代將至，
就在明日！”

第七章：面对魔鬼的誘惑

Aigry WeiWei



By YoYo Xiao(Wei Xiao)
cgim123@yahoo.com
肖维制于2011

7.1 特權是一根絞索

(2013.05.10)

猶太人在摩西的帶領下逃出埃及，流亡在荒漠之中，許多人不禁懷念起了埃及的肉鍋。生活在海外的中國人有幸逃脫專制的奴役，並免受匱乏的困擾，但許多人卻時常懷念中共體制下自己享受的特權。

最高的總特權

所謂特權是指某一個個人、小集團或階層可以獨享的權利和利益。由於其封閉性和排他性，特權通常是建立在損害其他個人、集團或階層利益之上的。在任何人類社會，我們都可以看到三類人：一部分寡頭精英試圖生活在法律之上，成為人上人，不僅享有優先權、特惠權，還有豁免權，也就是不受法律追究之特權。接受憲政權利意識的公民基本上謹慎地生活在法律的框架內，用合法渠道來追求幸福。所謂的中產階級就是這類最謹小慎微的良民。還有一類人則試圖生活在黑社會裡，逃離法律的管轄，通過犯罪和亂法來擴展自己的利益、攫取權力和聲望。但只有在專制社會，我們才可以看到政治體系建立在系統維護特權、甚至不惜官黑勾

結來否定公民權的基礎之上。

中國當今最大的特權是中共不需選舉、沒有政治責任卻可以壟斷永久執政地位。為了維持這一最高的總特權（政治、經濟、法律、文化和社會多方面的總合），中共系統地設計出了一套逐利分贓體系，通過讓渡部分特權，來引誘、吸納、招募和豢養部分有才無德之人，構建出龐大的維穩機制，恐怖鎮壓的卡特爾來對付人民。

從理想到圓滑

套用一句老話：年輕時如果你不是理想主義者，你沒有良心；成熟後你還是理想主義者，你沒有頭腦。中國名導演張藝謀的藝術謀劃走的就是這個套路，最後他進入特權階層。年輕時，張藝謀拍了幾部離經叛道、挑戰黨的禁慾主義的作品，也因此遭到過封殺。但反叛卻讓他獲得了民間和國際社會的追捧，張藝謀因此積累了等待招安的資本。聰明的張藝謀從荊軻刺秦王的詭計中獲得靈感，以此故事為題材，拍就了一部頌揚秦王暴政、謳歌舍生效忠的《英雄》大片，投入到“和諧大帝”的懷抱。從此，張藝謀成為了“崛起中國”的名片：申奧宣傳片導演，奧運開、閉幕式的導演，世博會海外廣告片的策劃導演，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週年慶典導演，等等。他也升堂入室成為全國政協委員，成為文化、政治雙料精英。

張藝謀為當今政權效力的又一個典型事例是為電影“審查制度”辯護。在他看來，審查制度“不可能被改變，而且將來也會一直存在。”他還提出了“在審查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的著名論斷。同時，他還否認他自己享有某種特權：“外國人認為，因為我執導了奧運會開幕式，所以我有某些特權，事實上完全不是這樣的。我的電影可能被審查得更嚴格。”當然我們對張藝謀的

否認大可不必太當真，因為“管事兒的領導常常私下里跟我說，我的電影會被更仔細地審查，因為我在國內和國外有更多的觀眾。”可見，張藝謀不僅有獲得巨額經費拍大片的優先權，還有“管事的領導”私下“打招呼”、“提個醒兒”的信息優勢。如果政治上的特權地位得到確立，在生活瑣事上，張藝謀自然可以享受許多中國人不敢夢想的特權，譬如享受事實上的一夫多妻制、違背“國家基本國策”的超生超育，等等。

特權的代價

特權固然使人生羨，但我們也不要忘記索取特權後面的代價。從吟唱“帝力與我何有哉”的百姓躋身入特權階層，也是從“獨立的存在”轉向“依附的存在”。具體說來，索要特權的手也給特權總管送上了一根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繩索，時刻等待主人使喚。這根繩索可能會勒緊，變成一根絞索。譬如，英國商人海伍德就被他的主子谷開來勒死了。

2013年夏天，中共官方媒體新華社突然拿張藝謀的“超生”說事，不知只是拉拉繩子給他提個醒兒，還是會掐斷他“第一御用藝術家”的生涯。畢竟，每一項特權都會有成群的狼狗追逐拼殺。再說，隨著“胡溫時代”的結束，平民出身的精英大概需要把代為暖座的位子讓出，騰給在中國寡頭制轉型中如日中天的“紅三代”。當然，最可能的是，新當朝的主子需要刷新政治效忠，所以“管事的領導”（發難的新華社領導是中宣部）需要再次提個醒兒。在此身處激流之際，張藝謀恐怕需要再次發揮才智，獻上一部謳歌主旋律的大片，譬如，《四川震區崛起中國夢》之類。畢竟五年後的又一次大震抖出了前任四川省委書記、現今宣傳部長劉奇葆的許多問題，也驚擾了習總的“中國夢”。

7.2 解讀中共智囊王滬寧

(2013.04.12)

習近平在 2013 年全面接班不到一個月，就已經顯示出他的決策風格和方式會有新的特徵。在他全面掌權後第一次外訪和近來的外事活動中，王滬寧、栗戰書和朱國峰出場不僅頻率高，而且地位顯赫。他們的頭銜分別是“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辦公廳主任”和“習近平主席秘書”。儘管他們的位置傳統上都比較低調，現在卻都已變得權高位重。三人以“智囊”、“管家”和“筆桿”組成習近平的核心幕僚，讓習成為第一個有類似白宮總統“顧問班子”輔佐的國家主席。

削履適足

習近平在全面接班後的第一次外訪中，面對國際上對專制中國的批評和壓力，提出了他的“鞋論”。習近平聲稱：“鞋子合不合適，穿了才知道”。言下之意，中國的事，只有中國人有發言權；西方國家無權對中國的理論、制度和道路指手畫腳。他以此來為中國特色的“維穩體制”辯解。

如果我們仔細琢磨就不難發現，習近平套用了西方民主理論

的著名的“鞋夾腳”的比喻，來捍衛他的“中國模式”，推銷他的“中國夢”。習的“合鞋（和諧）論”是他的政治化妝師繼推出胡錦濤的“和諧社會”後為他提供的一個高招。而後面的策劃者正是習近平的智囊王滬寧。

據我所知，最早提出“鞋夾腳”比喻的是美國民主理論家杜威。在1946年出版的《人的問題》（*The Problems of Men*）（英文原版第59頁）一書中，杜威這樣寫道：“底層大眾中的每一個個體也許並非很有智慧。但在有一點上，他們比任何人都更有智慧，那就是他們知道鞋哪裡夾腳，他們遭遇的痛苦在那裡。”三年前，為了紀念“四五運動”，我為香港的“自由寫作”雜誌寫了《莫把百姓當阿斗》一文。我在文章中寫到：“民主哲學家杜威曾說過，每一個個人最能準確地感受到自己鞋子哪個地方夾腳。民主體制就是承認每一個公民最能準確地感受自己在何種體制下生活幸福或經受痛苦。民主體制同時也承認每一個公民都有選擇公共政策和參與歷史創造的平等機會。”據我的親生經歷和觀察，我可以推定，中共最高智囊、江 - 胡 - 習的三朝幕僚王滬寧在杜威和習近平的“鞋夾不夾腳”理論之間構架了橋樑。

試圖掌握紅線

我與王滬寧在復旦大學國際政治係有十年相處：我作本科生時，他是研究生，後來還給我教授“西方政治思想史”一課。我讀研究生，他是青年教師。我做了助教，他又做了系主任。再後來我們都先後離開復旦燕園：我留美追求學術進步，他赴京踏上權力階梯。記得在我讀研究生期間，他的得意門生們與我相處甚密。王滬寧給研究生開設了“西方經典名著導讀”一課，所以我們的小圈子形成了觀念的互動和發酵。王滬寧涉獵的西方書籍很多，有一段時間，美國的政治思想家杜威激發起了他的想像力。尤其在1986年，上

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西方學術譯叢”翻譯出版了杜威的《人的問題》一書，該書自然成為“經典名著”討論的重點。在八十年代中國思想解放的黃金時節，王滬寧的著述也樂於引用杜威。

儘管王滬寧飽讀西方社科作品，但是，他的思想從未完成從國家威權主義向民主自由主義的轉變。他對西學的理解和吸收始終是由西方文明的偏門馬克思主義來引領和整合的。在王滬寧的政治思維中，他始終在苦苦地尋求阿基米德的“Eureka！”（我發現了！）瞬間，從而可以向世人宣布：不僅歷史至始至終貫穿著“一條紅線”，而且這條“紅線”還可以被發現、被掌握，從而用來組織和指導歷史。最能全面反映王滬寧思維特徵和思想內容的莫過於他為浙江人民出版社在上世紀九十推出的“當代中國政府理論研究叢書”作的“總序”。由於他當時已調入京城，在中南海紅牆內服務江澤民，所以叢書省略掉了王滬寧的主編頭銜，“總序”也未署名。

走火入魔

王滬寧在書中的幾個觀點值得注意：第一，他認為，“歷史唯物主義”是“不容抗拒的規律”，是人類社會不能超越的“定理”。第二，“世界上並無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優化政府體系的坐標。”從“政治生態學”的角度來看，政府體系依據一定的“歷史 - 社會 - 文化條件”而產生。第三，從“殖民奴役”的“帶血的暴力”到“新殖民主義”和“文化帝國主義”兩百多年的發展形成了“西方中心論邏輯”。第四，他相信，“21 世紀的曙光已經在東方的地平線上出現”。“我們體認一種截然不同於西方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和理想選擇的發展道路。”分析這四點，我們可以看到，前兩點製造了“馬克思主義絕對真理”和“政治生態學的相對主義”的邏輯思維矛盾。後兩點勾畫出“西方中心論”和“中國發展道路”

的矛盾衝突。王滬寧用構建馬克思主義定理來否定西方提出的普世價值，而後再來論述中國特色的合理性。

以此為背景，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美國最偉大的民主理論思想家的譬喻會成為專制政治的障眼法。在杜威那裡，民主的核心是要落實到每一個個人和社會生活的每一個領域（尤其包括教育和日常生活）。“鞋子夾不夾腳”，表達的是公民個人情感和政治參與的重要性，要否定的是現實中國流行的“被代表”，也就是主權代替公民權、國家代替民眾、共產黨代替民主制的現實政治。但中共的智囊卻只把杜威的邏輯局限在國際層面。正如中共在國際上鼓吹“國際關係的民主化”來對抗“國內關係（統治者和民眾）的民主化”，它又在用“國際關係上的合鞋論”來否定國內人民爭取的表達權、申訴權、參與權和自治權。通過渲染“暴力的西方中心論”來激發偏激的國內民族主義情緒，在中、西方對抗的話語體系下，把對人民的鎮壓變得合理化了，而且還給它賦予了一個宏大的帝國目標：“中國夢”。

王滬寧對西方的最終衰敗和東方（先是日本，後是中國）的必然崛起充滿了信心。儘管他曾在美國遊學半年，但他對美國的不理解和排斥始終未能克服。在他的《美國反對美國》（1991年出版）一書中，他過早樂觀地估計美國體制遭遇日本體制挑戰後會瀕臨破產。在他看來，“美國的體制，總體來說建築在個人主義、享樂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基礎上，但它正明顯地輸給一個集體主義、忘我主義和權威主義的體制。”而後面這種體制也正是王滬寧鍾情的。他似乎毫不懷疑地認為，中國體認的這種集體權威體制將戰勝美國民主體制。

學壞容易、學好難

王滬寧的思維定勢根植於大陸歐洲思想體系，是他承襲了某

些特定的思想家的必然結果。他的高等教育是以學法文為開始的。法國思想家似乎對他的影響很大。孟德斯鳩的“環境、氣候和地緣決定論”和王滬寧後來信奉的政治生態學一脈相承；布丹的“國家君主絕對主權思想”成為他研究的對象，也塑造了他的主權觀；孔德的“秩序和進步”也為他的新權威主義背書。後來他師從復旦國政系最頑固的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家陳其人，皈依了一套正統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批判理論，堅信歷史唯物論可以幫助理論家找到貫穿歷史的“紅線”。

其實，如果我們仔細評價歐洲大陸思想體系，並將它與英、美思想體系比較，不難分出孰優孰劣。近代以來，法國與英國在歐洲爭雄，人口、地理和資源更優越的法國不敵英國，後者在 19 世紀成為世界霸主。德國試圖在一戰中挑戰英、法，結果敗北。二戰中，德國、意大利和承襲了大陸傳統的日本結成軸心，再次試圖改變國際格局，結果還是被英、美聯手挫敗。“冷戰”又是一場以蘇聯為中心的歐洲大陸馬、列體系試圖埋葬以美國為領袖的西方集團，歷史的結果世人皆知。在歐洲，共產主義無論是作為政治理論，還是制度實踐，都被歷史宣告破產。就是以這樣的歷史記錄，中共的智囊們仍然似飛蛾撲燈，為中國最後一個專制王朝殉葬。有王滬寧提出“三個代表”和“合鞋理論”，有俞可平提出“三個有機統一”（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和依法治國），又有衣俊卿提出“三個自信”，來替共產黨補破褂子、修破鞋子，鼓勵它在邪路 and 老路上執迷不悟。

一方面，我們看到了中共智囊的智慧貧乏和囊中空空；另一方面，我們又聽到中共“不搞指導思想多元”的狂囂。中國決策層邏輯的混亂和中共意識形態的獨斷，預示著中國大難將至！

7.3 漂游的思者，飄逸的思想 (2014.01.28)

在中國共產黨六十多年的摧殘下，中國文化精髓的保存選擇了流亡的方式。設想一下，如果沒有 1949 年民國知識精英跨過大江大海、歸隱寶島，華人恐怕已失去自己的正體文字。再設想一下，如果沒有 1959 年尊者達賴喇嘛跨越喜馬拉雅山、回歸印度佛土，從而不僅保留了佛教的純潔並使之升華，中華佛教未來就難有重建復興的可能。最後又設想一下，如果沒有 1989 年北京屠城和全國範圍的紅色恐怖，沒有以百萬計的一大批年輕的知識分子告別專制體制、擁抱西方文明，就沒有當下華人文化創造力在中土以外全面井噴的壯麗景觀。

流亡是一種反抗

1938 年，德國作家托馬斯·曼恩擯棄希特勒的法西斯德國後，來到美國，自豪地向世人宣稱：“我身在何處，那就有德意志。”（“Where I am, there is Germany.”）半個世界後，與中共體制絕不共謀、絕不妥協的華裔歷史學家余英時不願向一個邪惡的政權低頭，三十多年從未踏上中土。他同樣自豪地宣稱，“我在哪里，

中国文化就在哪里”。今天，我們可以有足夠的理由認同余教授的判斷，並有完全的自信宣稱，中華文化的正宗傳承、底蘊、創造力和未來復興的希望都已集聚在了全球華人共同體文化圈內。

中華民族最純正的語言、最優美的文學、最先進的思想，中華傳統最優秀的載體和最具有創造力的主體，都已乘道德而漂游，游離出共產黨體制以外。有的已經身心雙雙位移。有的即便還堅守中土，但早已走出鐵籠、與共產體制決裂，完成了艾薩克·柏林所說的“內心的出走”（Inner Migration）。著述等身的華人作家余杰就是一個先完成“內心的出走”，最後徹底乘道德而漂游的典型。

余杰現象

在此有幸受余杰之邀為他的著作《螢火蟲的反抗》香港版寫些文字。對於本書的內容、風格和價值，讀者自有客觀評判，我只想說一句：本書描述了當代不同國家的知識分子以筆做武器，發現自我，書寫歷史，記錄暴政，解構專制，追求自由，創造時代的頑強、多樣努力。它是當今中國知識分子急需的明目、定神、去毒、強骨、壯膽的良方。更重要的是，我要藉此機會，解釋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余杰現象”，從而為讀者全面理解余杰、他的著作以及這些著作正在構建的思想體系提供一點參考。

作為一個少年得志出川成龍、風華正茂時已在文壇才華橫溢、剛剛步入不惑之年卻已著述等身的文學家，余杰在典型意義上代表了“文學英雄歸隱 / 出山的辯證觀”。我所說的“文學英雄歸隱 / 出山現象”，主要是從三個方面來界定：第一，我們看到了一組中國文學家從文學創造和文學批評涉足到社會批判和憲政構建。劉曉波和余杰師徒二人走過了這樣的路徑。僅僅在海外，我們同樣還可以看到黃翔、張玲夫婦，鄭義、北明夫婦，傅正明、茉莉

夫婦，高爾泰，蘇曉康，孔捷生，哈金，康正果，李喆，遇羅錦，廖亦武，馬健等群星燦爛形成的銀河系。正如叔本華所說，藝術家有著超越升華得神通的優勢。這群海外華人作家春江未暖，就已預報了春天的來臨；在專制體制肅殺囂張之時，就早已放聲謳歌自由的價值，自由對於生命、對於美的意義。

第二，文學家從他們慣於的具體敘事、典型案例出發上升到社會學想像和政治歸納。在一個常態的社會分工條件下，法學家和律師當為法治身為馬前卒，政治學家當為民主吶喊出力，經濟學家和企業家當為自由建功立業。而文學家當首先占領人們的閒暇，在閒暇的時間和空間裡擴展影響力。而這種影響力更多不是著眼於社會批判和政治反抗，而是更私密、更深層的對話、享受和升華。因為文學家對常識、獨特、荒誕都特別敏感，所以當有更多的社會科學專業人士可以為權力、金錢而放棄專業堅守，並為一個製造荒誕的政權和充滿怪異的社會進行合理化論證時，有更多的文學藝術家會在公共空間裡凸顯他們的牛虻角色。

荒誕時代激發想像力

哲學、政治學、法理學的理性思維和說服只能在大家都講道理的話語空間才能施展用處。而且這種運用啟蒙時代的理性、進步、自由民主的規範太過於精英化。在過去三十多年的時間裡，一批又一批的啟蒙思想家試圖用和平理性的方式在日益縮小的殘存割裂的自由空間裡尋找到撬動專制利維坦的阿基米德基點。但中共政權在 1989 年對學生運動的血腥鎮壓，在九十年代對民主黨組黨的嚴厲打壓，到新世紀對維權人士郭飛雄、《零八憲章》領頭人劉曉波和今天對新公民運動領軍人物許志永的惡判，都已明白無誤地向世人昭示，中共政權是一個已經不講理的政府。面對當下的逼人邪氣，我們不用思考，只需睜眼就能看見。所以，用

常識說話，把文學作品當成“匕首”和“投槍”，刺向專制政體，把它的惡人定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恐怕就成為了更為有效的戰鬥。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余杰的文學和政論創作都得益於中國社會無處不在的荒誕怪異。當連市井鄉里的平民百姓都已明白這個政權早已成為各種荒誕劇的總導演時，權力的狂妄和囂張卻讓那些掌權的人充滿了病態的自信。他們集體赤裸裸地炫耀他們硬邦邦的權力，嘴裡發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論自信”的妄語，還要強迫所有的看客相信他們包裹著華麗的裙裾。這一出所有荒誕戲中的荒誕之最為余杰提供了不盡的靈感和素材。作為一個文學家，余杰的細描、他透過個案解讀體制的社會學想像力成就了他的多產。如果說，憤怒出詩人，那麼，荒誕造余杰。詩人的憤怒可能是個人的，也可能是集體的。但造就余杰的荒誕卻是專屬那個黨國的。

肉身流亡、靈魂歸家

第三，余杰的人生軌跡反映出中國流亡知識分子的通性：形而下流亡，形而上歸家；或者說，肉身流亡，靈魂歸家。孔子有言，“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在傳統的天下大一統環境內，退隱和出山，求志和行道經常不可兩全。幸運的是，在自由民主價值觀主導的全球化體系內，所謂的從中共黨國體制退隱，並非意味著山野為唯一選擇。其實在專制體制殼體內正在消失的落後文明之外還有一個更為廣闊、更為先進的世界文明。所以，摒棄黨文化、拒絕被洗腦、更拒絕充當幫凶去荼毒人民、淨身出戶告別體制，結局不但不是邊緣化，而是獲得了真正全球化、主流化的機會。

想想官方圈養的文學家莫言，大半輩子就是試圖為了一個北京戶口、為了老婆的農轉非而憂慮煩惱。莫言在北京安了家。據

說他的諾獎還無法在京城四環以內買上一套體面的房子，但他和他的妻子可以安生了。相比之下，余杰失去了他在北京的房子，他被迫變賣家當，流亡他鄉。多少知識分子為此悔不當初。又有多少被迫流亡的知識分子從此心神不寧，像祥林嫂一樣詳述過去的待遇、熱鬧和威風。又有多少知識分子為了求得所謂的落葉歸根，接受黨國新的羞辱。但余杰走得那麼乾脆，在美國活得那麼瀟灑。如果說，余杰不是天生的美國人，但我們可以說，他天生就有一顆自由魂，所以，他能喜樂地在美國的總統之鄉擇鄰而居。

人傑地靈的美國

余杰創造力在更高層次上的繼續爆發，無疑得益於弗吉尼亞美麗的山山水水，也得益於滋養華盛頓、杰弗遜、麥迪遜、李將軍、威爾遜等偉人的深厚文化底蘊。但我猜測，弗吉尼亞作為美國的第一部宗教自由法，“弗吉尼亞宗教自由法規”的誕生地，恐怕是吸引他、呵護他、滋養他和成就他的關鍵。

“失去了大地，得到了天空。”對此，有的華裔知識分子心中充滿了缺憾，有的卻深感慶幸。真正的自由人，真正的世界公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對於一個有靈魂、有良心的思考者，喪家的感覺和不安不是來至於身居他鄉、遠離故土，而是來自於那顆敏感、挑剔、純淨的心不得安寧。作為一個正經歷初戀感覺的基督徒，余杰的肉體去國出走，但他的靈魂卻舒服地歸港、歸家和歸父了。

由此我們也就可以明白，有的人願受鬼差，所以中共龐大的帝國有文武兵團支撐；但有人更願為神差。余杰就是接受神差的僕人。有人說，生命短暫的莫扎特不是在創作，而只是在複述神的聲音，因為一個凡人即便把莫扎特留下的音樂抄寫一遍也就耗盡了人生。當我看到余杰四十歲完成四十本著述時，我不禁要說，他一定是神所恩寵、檢練的，所以他有驚人的勇氣與邪惡較量、

有無窮的創造力在天地人心之間做工。

余杰有一顆潤濕的心，可以成為一個好小說家觀察到枝末細節的情感。余杰又有一個充滿聖光的心，可以描述、記錄和撬動一個大時代。聽他說吧！他在預言未來！加入他的戰鬥吧，他在用身心照亮世界！

7.4 阿倫特：困境中知識分子的燈塔 (2013.07.28)

作為國際大都市，紐約的名人數目恐怕雄踞全球。但有一位特出的女性值得每一個紐約客敬佩：她是一位德國的、猶太裔的政治哲學家；她師從哲學大師卡爾·雅斯貝爾斯，與另一位存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爾演繹出了一段浪漫情史；為了逃離納粹的反猶大屠殺，她後來移居到“天堂”紐約；她以《極權主義的起源》成名，並在紐約新學院（New School）執教幾十年；現在她安靜地躺在哈德遜河畔的巴德學院（Bard College）校園。她的人生如此傳奇，她的思想如此迷人，2013年五月，一部以她的名字命名的電影故事片在紐約上映：《漢娜·阿倫特》。

阿倫特的意義

對於華人來說，阿倫特的現實意義不只是因為她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而是，作為一個生活在蒸蒸日上的德國第三帝國下的知識分子，她的思考、選擇和反抗對困境中的學者，甚至每一個普通人，都有啟迪。

全球範圍內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已經認識到，崛起的中國以

“紅太陽帝國”的態勢，正在步德國第三帝國、日本太陽帝國和蘇聯超級大國的後塵，全權控制中國人民，並在全球範圍內滲透、收買、恐嚇關鍵人士。對成千上萬的海內外華人來說，一個崛起的共產專制中國帶來的是黑暗時代。身處陰冷黑暗，如何有堅持、保守、信念、毅力和希望，如何抵制誘惑、承受迫害騷擾、辨別對錯是非，我們所有的人都可以從阿倫特的論著中找到指引。而以她名字冠名的德國電影又是一個容易被接受的精煉品。

無思是邪惡的根源

阿倫特的兩個思想值得我們關注：第一，無思是邪惡的根源。在歷史的轉折關頭，尤其是陰氣上升、邪惡當道的時刻，朋友轉眼之間離異，許多有地位、有智力的人向專制體制繳械投降，甘願成為專制機器的一個齒輪，成為一個“恪盡職守的守法”公務員，成為一個為邪惡論證合理性的辯護士。正因為有成千上萬人的合作，集中營、毒氣室才會高效運作，製造出人間悲劇。為什麼會這樣？根本原因在於我們失去了思考，我們放棄了在內心裡自我與本我不斷對話的機會，不願直面我們的良心，不願傾聽我們內省的聲音。

專制體制的實質就在於抹殺個性、阻止思考、滅絕自省。它的滅絕人性主要表現在，如果我們人類作為唯一的“思考的動物”，我思，故我在；那麼，沒有思想和思維活動的人就喪失了人類的本質特徵，與動物無異，無非是行屍走肉而已。所以，邪惡的產生，其土壤是不思考的人民。思考，就是對任何判斷都要審視、批判，要檢審它暗含的前提，要驗證它的邏輯推理，要確認它有內在的互洽，同時與客觀現實吻合。中國面臨的問題是，在政治宣傳洗腦和商業廣告操縱下，一個民族正在放棄思考。最為可怕的是，它的知識精英整體上甘願淪為御用，成為權力的奴僕，而放棄了

社會良心的功能，不敢對權力直訴真理。近來的“大國崛起”、“千年盛世”、“憲政屬於資產階級”、“民主屬於地方知識、不適用於中國”、中共信奉的主義是“宇宙真理”等所謂的學術觀點，都是學術界自甘墮落的寫照。

阿倫特說得很清楚，我們每一個個人都有自由意志，我們對我們的選擇也負有個人責任，而無法用“上級命令”、“制度大環境”等來推脫。我們每一個人都會受審，只不過可能以司法形式，或以歷史形式而出現，或是良心上的自遣和道義上的定罪。

邪惡的平庸

阿倫特的第二點天才思想表現在一個概念上：“邪惡的平庸”。在電影中，主要的故事情節圍繞 1961 年在耶路撒冷對前納粹德國頭目阿道夫·艾希曼的審判。阿倫特注意到，艾希曼是一個沒有魅力、沒有激情、沒有傳統認知上的惡魔法力的納粹官員。為此，她開始修正她原來接受的康德對邪惡的界定：類似撒旦、浮士德那樣有想像力、魔法和詭計的行為處事。其實，邪惡經常是由一些既無深度、又無惡意的平常智商的、按部就班的官僚小吏製造。即便混世魔王希特勒也只是一個藝術生涯受挫、完全沒有他所說的“金發碧眼”的雅利安人的特徵的平庸之徒。但他消滅了德國人的自由思想，把歐洲一個優秀的民族變成了盲從的瘋狂的人群。無思想的平庸成了邪惡的根源和特徵。

當今中國的困境就是漢娜·阿倫特所說的“邪惡的平庸”的經典例子。一個夾著尾巴看主人臉色的、被諷稱為“永遠一張撲克臉”的政治指導員胡錦濤留下了一個“河蟹橫行”的不公平社會。一個平庸、毫無個性、長著一張難看的臉、從工程師爬上政治權力高位的政工官僚的吳邦國提出“五個不搞”，放棄了幾十年才積累出的人大監督權力，讓中國政府可以無惡不作。所謂的中國

特色的“中國模式”可以找到歷史的參照點。我相信，它的未來也不會逃出歷史的既定邏輯。

作為一個自我認同“賤民”身分的新移民，阿倫特比誰都更清楚，如果我們放棄思考，如果我們喪失對遠方弱勢群體（譬如中國的訪民、農民工等）和少數族裔（譬如藏人和回族）的人文關懷，我們就會成為邪惡整體的一部分。阿倫特說道：“世界上最大的邪惡是是由庸碌無奇之輩製造的邪惡（The greatest evil of the world is the evil committed by nobodies）。”

7.5 敘利亞戰場上的中國人 (2013.01.23)

雕刻藝術家陳維明隻身潛入敘利亞，與敘利亞自由軍並肩戰鬥數十天，成為敘利亞戰場上的唯一中國人。原本他想直接進入敘利亞，但因為得不到簽證，只好迂迴進入土耳其，再偷渡進入敘利亞領土。由於土耳其政府只給了三個月簽證，所以他不得不離開前線、惜別戰友，借道土耳其返回美國。

為什麼陳維明要到敘利亞幫助自由軍，與阿薩德政權戰鬥？作為陳維明的朋友（我的《政治維納斯》一書的封面就是他的“民主女神”的雕塑），我有機會近距離觀察他的言行和思考，也向他請教過這個問題。在我看來，“藝術家”和“中國人”的雙重身分影響了他的決策和行為。

自由沒有邊界

沒有自由就沒有想像，就沒有超越，就沒有創造，就沒有藝術。藝術與自由的緊密關係決定了藝術家對不自由、壓迫的敏銳感受超出芸芸眾生。無論是“反右”和“文革”期間鋼琴家傅聰的去國出走、音樂指揮家和作曲家陸洪恩被共產黨槍殺，還是當今首

位華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在流亡中寫作、艾未未駐守北京以行為藝術來解構專制，都是例證。自由沒有邊界，藝術也沒有國界，所以文學、藝術家更容易成為以世界為家鄉的國際主義者、以人類共同體為效忠對象的人道主義者。19世紀詩人拜倫離開英倫到希臘抗擊奧斯曼帝國並最終獻出自己年輕的生命，20世紀作家喬治·奧威爾奔赴西班牙向法西斯開戰，到21世紀雕塑家陳維明到敘利亞支援人民反抗阿薩德專制政權，都是在踐行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誓言：為了自由，生命和愛情都可以拋棄！

陳維明於1982年畢業於北京中央工藝美術學院。他早期的自由之路追尋了富蘭克林的足跡，因為後者說過，“哪裡自由，那裡就是我的故鄉。”為了創作自由，陳維明離開了中國，基本在新西蘭和美國定居和工作。但因為是中國人，他的自由之路又總是把他引回到他的祖國。這樣的中國人情結再次把他引向了潘恩的自由觀：“哪裡沒有自由，那裡就是我的故鄉。”我們知道，作為國父之一的潘恩在美國獨立戰爭勝利後立即奔赴法國，幫助那裡的法國大革命。二十世紀，阿根廷裔的革命家切·格瓦拉在古巴革命勝利後，同樣放棄高官厚祿，去到玻利維亞領導那裡的革命。

他人不受奴役，自己才能自由

自由具有無限性的特徵。當自己獲得了自由，卻又在奴役別人的人並沒有最終獲得自由。特權是心理和生理的雙重囚禁狀態。更進一步，如果自身獲得自由，同時又能尊重他人的尊嚴和自由，但還容忍在自己所能觀見和想見的範圍內存在奴役和暴政，這樣的人實際上也未獲得全面的自由。他/她不僅要接受心獄，還必須與道德不安和內疚共處。身處自由世界的陳維明向所有的專制發出挑戰，不僅是要他人獲得同樣的自由機會，也是通過拓展自由的疆域來捍衛自由。

無論是在踐行富蘭克林的自由觀，還是潘恩的自由觀，家鄉的自由都是共同點。陳維明最為關心的還是他的家鄉的自由。在我的印象中，他的最著名的作品包括“六四大屠殺”浮雕、“民主女神”像和“西藏自由之路”群雕。他的最著名的行動，除了參戰敘利亞外，就是把民主女神像豎立在香港的維多利亞公園和香港中文大學，以及未來把她豎立在台灣金門島和最終讓她回到天安門廣場的各種努力。有人說，“愛國主義是雕塑家最後的避難所。”從雕塑家陳維明身上，我們可以看到濃厚的中國情結。他從杭州行走到新西蘭、美洲新大陸，再到絲綢之路的終點城市敘利亞內戰的“死亡之城”阿勒頗，其實都在圍繞著他的故鄉這個原點。他自己說，當看到中國三次在聯合國安理會上投票否決聯合國干預敘利亞草案後，他要用自己的行動向全世界、尤其是敘利亞人民表明，儘管中國政府與阿薩德政權捆綁在一起，但二者都是自由、民主的共同敵人。

自由的想像

最好的藝術總是留給人們許多想像的空間。藝術家陳維明給我們留下了什麼空間呢？作為藝術家，他不乏想像力和創造力。同時，作為手拿刻刀、榔頭和鑿子來再造世界的人，他懂得打擊和破壞是造就藝術精品的開端。雕塑家的陳維明能將想像和行動完美得結合起來。那麼，藝術家陳維明在公共空間的行動又在傳遞一個什麼樣的信息呢？當他放下手中的刻刀、拿起AK47衝鋒槍時，他是在幻想更大的破壞力、威懾力和創造力。

為了自由，在過去一百年裡，中國人有流血、也有犧牲。對暴政的反抗有以個人形式進行，也有以群體形式出現；有非暴力的，也有暴力的。現在的抗暴維權已經經歷了上訪、請願、遊行、騷亂和自焚多種形式。對社會全體來說，自焚是非暴力抗爭的最後質變。

如果突尼斯孤身一人的自焚掀起了中東“茉莉花革命”、帶來了“阿拉伯之春”，藏人的一百多人自焚卻仍然無法改變中國的死水微瀾。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雕塑家走上戰場，想迫使我們每一個渴望自由的人深思：我們還需要何種的想像力、創造力和威懾力？

7.6 陳平 60 大壽生日致辭 (2015.01.23)

今天(2015年1月23日)我們聚在一起,慶祝陳平的60大壽。

名副其實和名不副實

直陳其人,平易近人,平入平出,平平實實。沒有架子,沒有客套,沒有虛偽。這就是我認識的陳平。我說他名副其實。

但我又要說他名不副實,因為他不甘於做一個陳陳相因、平風靜浪、平淡無奇的人。生在馬年,身體裡流著自由奔放的熱血,他注定要做一個弄潮兒,站在歷史的浪尖,掀起驚濤駭浪,改變他周圍的人、甚至成千上萬華人的命運,並立志改變人類共同體的命運。

歷史運勢、機緣巧合讓我們匯聚在我們自願選擇的再生故鄉美國,在此我願借陳平生日之際,與新朋老友分享我對他的領悟和解讀,一是要表達我對他的景仰,他的勇氣、正直和對中華民族命運的關注和犧牲,是華人圈中人中驕驥,並將引領一代新潮。二是探討我們作為一個群體,一群新華人聚集在美國,並想以此新大陸作為阿基米德幾點來撬動中國的文明進步、提升華人的地

位，我們可以從他的言行上得到如何的啟迪。

人生三大使命

孔子說，十五而至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迄今為止，陳平都按時完成聖人的人生規劃。十年前，也就是2005年，也就是“知天命”那一年，陳平收購“陽光衛視”，開始齊頭並進幹相互關聯、層層相扣的三件大事：資本重組、思想重組、權力重組。

第一要務是他的天賦，所以他自我畫像的第一職業界定是“資本家”。最重要的是，它是一個“好資本家”，因為他能觀察社會、政治、經濟的歷史大脈動來發現商機，同時，又能用資本來推動思想的重組、創造和復興。他是一個儒商。

所以，我們很容易理解他的第二項事業界定：學者。一個好的學者首先要博覽群書。在陳平的著述《現代文明的衰變》和《陳平對話錄》六卷本訪談中，我們可以強烈地感受到，他讀中外古典、也讀馬列經典，無論中外左、中、右，他都能納入視野。更讓人佩服的是，他在人文、社會科學興趣之外，對新技術（譬如新能源和信息科技）還很痴迷。我們許多人也許還不知道，三十多年前，他的興趣集中在《新技術革命和我們的對策》著述裡。

其次，一個好的學者要有學術原創力。陳平的學術原創來源於他獨特的經歷：既懂市場，又諳官場。這種政經不分家、中外皆包容的思維方式讓他觀察到，中國企業、市場的經濟問題和解決方在於政治制度的改革和適應，而這種適應和調整又是全球文明所面臨的危機和需要解決的問題的症候群的一部分。他對中國作為“世襲帝國官僚社會”再到“黨閥官僚權而不貴專制資本主義社會”的認識，是他與現存體制告別的重要原因。而對於中國目前的困境，他的一個重要解決辦法就是“讓世界有光”：讓民主選舉和民主

監督作為陽光照亮政府和政府的決策程序。而這個聚光器就是媒體，通過它，民意、眾意可以匯聚成公共輿論，然後催生體制外力量雲集，結社成黨，產生政治效果，帶來民主政治和民主政體。

最後，一個好的學者總是樂學號群，身處一個知識群體來擴展公共的學術事業。陳平並非一個象牙塔內的經院學者。他是要“學以致用、立業種德”的。而且，如他所言，中國的社會、經濟、道德諸多問題都與現今的國家、政府、權力體制有關，所以政治體制變革成為歷史進步的必然。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是權力的重新配置。這要動某些人、某些利益集團的奶酪。陳平 25 年前扔掉自己的金飯碗可以被容忍，但如果要砸鍋，黨閥官僚就會動員舉國體制來做出反應，顯示它唯一殘存的優越性：鎮壓迫害。2013 年“六四”前一天，在香港他行出辦公室外，遭到兩名受僱歹徒的棍棒襲擊，臉部、肩背、手臂、膝蓋等多處受傷。

陳平的大衛挑戰高力士的戰鬥，或者說他的堂吉訶德大戰風車的戰鬥，急需圍觀人群、群體智慧和兵團戰鬥力。在過去的十年間，他在華人學術圈的發掘、投資、重組、聚合，就是為了建立一個思想群星燦爛的中華文化復興。而且，這種文化復興既與世界主流文明和普世價值相輔相成，而且，他有雄心促成復興的中華文化成為世界新文明的火車頭。這是一項宏大的事業，需要無限的幫助。我們在此聚會，慶祝陳平生命的又一重組，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顯示我們的關注、支持和參與。

最後，我們必須直面他的第三項、也是最難的一項事業：權力重組。

中國兩千多年的專制體系已經走到盡頭，將最終被民主體制代替，恐怕是我們在座絕大多數的共識。但民主化何時、如何發生？如果我們看看中共的德性，它明天垮台我都不會奇怪。但看看中國人的德性，專制政權再維持回彈能力、繼續混下去，也不是不可能。如何解決這一矛盾？如何告訴掌權者，“到時間了”？

如何告訴我們大家，“我們準備好了嗎？”我猜想，這恐怕是陳平要做的事。

華人的新挑戰

民主政治首先是“公共輿論政治”，其次是選舉政治、再其次是智囊團、思想庫政治，最後是多中心多層次的治理體系。陳平熱衷的“雲的革命”，他創辦的電視台、雜誌、出版社、紀錄片制作中心，等等，是要打造華人，尤其是民主派的華人，在全球和華人文化圈的發言權。有人曾指出，《陽光時務》周刊雜誌就是中國最大的反對黨平台，我完全同意。陳平在這個周刊上明確寫道：“今日中國，唯有愈發強烈的社會壓力，才能促發朝野健康進步力量的多黨民主憲政改革浪潮之匯流。”為此，還有許多事情也在悄然進行。未來還有更多的事要做。已到“耳順之年”的陳平當然更能完美地進入這個角色。

這裡我想說一點：我們面對的怎樣寶貴的歷史機遇。我們知道，在海外推動中國民主化已經不是新鮮事了。三十年過去了，為什麼我們還沒有質的突破？如果我們與猶太人做個比較，這種差異就很明顯了。二戰期間歐洲猶太人大量移民美國，三十年後，在文化、科學、教育和藝術各個領域，他們都有了大師級別的人物。在美國經濟和金融界，房地產，新聞和報業，等等，猶太人的影響更是無處不在。而且，猶太人還完成了復國，在阿拉伯專制國家的包圍下建立了自己的民主國家以色列。

我們中國人失敗在那裡？我們開始留學美國已有三十多年，但迄今為止，我們很難聲稱我們貢獻了能與愛因斯坦、費米、紐曼等相提並論的科學大師。我們也無法在大陸背景的華人中找出可以與施特勞斯、阿倫特、拉扎爾斯菲爾德、摩根索並肩的社會科學大師。多重因素中，我想指出一點：長期以來，華人留學的

莘莘學子並未有雄厚資本的資助，形成思想的重組。古人說，“空手無壯士，窮居使人低。”中國的學者和民主運動人士基本處於一種被擊敗的心理狀態。對許多人來說，生存成為第一也是唯一的要務，那還能侈談升入主流社會、爭取話語權、建立話語體系。

追尋生命意義

今天，從陳平身上，我看到，在海外的中國人有機遇、有能力、有雄心來推動資本重組、思想重組、權力重組，通過三個重組的再組合，我們所有的華人，無論在華夏故土，還是在新定居的家園，都有可能為我們自己、為我們的子女、為我們的華夏後代建立一個民主的故國，爭得在世界任何地方做人的尊嚴和做華人的榮耀，全面實現我們的生命意義和價值。

一位叫維克多·福蘭克爾（Viktor Frankl）的猶太裔心理學家在集中營裡倖存下來，寫了一本書，叫《人對意義的追尋》，他揭示了：人活著的目的不是像弗洛伊德所說的是為了愉悅，也不是像艾德勒所說的是為了權力，而更重要的是為了意義。生命的意義表現在工作中、在仁愛中，和在困難時期表現出的勇氣中。人有了對這種意義的追求，所以能在集中營生存下來，並能以勇者和勝者的心態創造出偉業。

今天，陳平舉家遷徙美國，而今邁步從頭做起。我們當然可以相信，在經歷跨海洋的遷徙後，他會體現和註解湯因比的“歷史英雄的退隱和復出機制”，再造更大的輝煌！

老馬不老，志在千里。今天我們在這裡見證他的天命，分享他的自信、瀟灑、和樂觀！

“田看收成，人重晚晴。”我們將來再重聚，慶祝陳平的七十大壽、八十大壽時，我們就會看到沉甸甸的收成、金燦燦的晚晴！

陳平，祝你生日快樂！

第八章：未完的北京屠城



8.1 培育仇恨的政權

(2012.10.16, 2015 修改)

廖亦武的名字是一個敏感詞，他的作品在中國是遭禁的。而且還因為在“六·四”屠城後他寫下了長詩《大屠殺》而被投入監獄長達四年之久。在中共的官方話語體系裡，詩人和作家廖亦武是一個被邊緣化的人物，他也因此而成為可以被政權隨意侮辱和迫害的對象。

廖亦武的受害

記得在 2011 年的金秋時節，我在紐約市的羅斯福故居見到廖亦武，聆聽了他朗誦自己的作品和欣賞了他的淒涼簫聲。我永遠不能忘懷的是他說的這些話：在獄中他因為唱歌受罰，獄警要他不間斷地唱下去，不能停歇。在唱了三十多首歌曲後，這位有音樂天賦的藝術家沒法繼續了。懲罰由此升級：廖亦武被兩位獄犯緊緊按住，獄警“用呼呼飛旋的電棍戳入我的肛門，我往前像青蛙一樣使勁跳。”此時，他又唱起了一首歌：“東風吹，戰鼓擂，現在世界上到底誰怕誰？”

就是這麼一位經受了肉體和精神雙重折磨的四川漢子從未屈

服過，他也未自暴自棄而倒下，沒有淪為一個施虐政權的犧牲品。相反，他把他所親身遭受的屈辱和國家迫害升華為對底層草民的摯愛，用筆為他們代言和吶喊，讓全世界聽到自己無法發出聲音的小民的呻吟和抗議。正是出於尊重他用“民間細語”對抗“官方宣傳”、構建“民間小傳統”來解構政權打造的宏大敘述和“官史大傳統”，我帶去了自己收藏的《地震瘋人院》、《趕屍人》兩書，並當場購買了《上帝是紅色的》，請求他留言簽名。

詆毀中國人的中國政府

轉眼到了 2012 年金秋收穫的季節，廖亦武獲得了德國文化界最重要的獎項 -- 德國書業和平獎。對此我一點也不吃驚，因為 2011 年我曾對他說起過：諾貝爾文學獎很快會給中國作家，而我相信他是有機會獲得此項榮耀的。一個被政權長期踩在鐵蹄下、過著賤民不如的生活的華人作家再次獲得世界的承認。當此項消息傳出後，中共的宣傳機器又開動了起來，像對待諾貝爾獎獲得者達賴喇嘛、高行健和劉曉波一樣，開始對廖亦武抹黑。

官方喉舌《環球時報》發表了評論員單仁平的評論文章：《海外異見者需有走出仇恨的精神》。該文的出籠針對的是廖亦武在 2012 年 10 月 14 日的頒獎儀式上的講話，尤其是最後的幾句詩句：

“這個滅絕人性的血色帝國，
這個地球災難的源頭，
這個無限擴張的垃圾場，
必須分裂。
為了孩子不再死於無辜，
這個帝國必須分裂；
為了母親不再無辜地失去孩子，
這個帝國必須分裂。

為了中國各地的人們不再流離失所，
淪為世界各地的累贅，
這個帝國必須分裂。
為了葉落歸根，
為了將來有人守護祖宗的墓園，
這個帝國必須分裂。為了全人類的和平和安寧，
這個帝國必須分裂。”

《環球時報》的專評稱廖亦武是“一個偏執古怪的”、“精神出了問題”、“判斷力和情緒自控力也一定與正常人有偏差”的“不知名的‘作家’”。當然，一個作家有幸成為世界上最大專制政權的“國家敵人”，本身就說明他的歷史重要性。最有意思的是，該文對乘道德而漂游、流亡海外的華人知識分子作了如下總評：“西方選擇支持的中國異見人士，有一些屬道德和智慧的平平者，是無力應對中國社會內的正常競爭，而用政治上的出位‘另闢蹊徑’的人。還有的人完全沒有從個人遭遇跳出來的精神力量，他們把個人恩怨強行往社會意識形態中塞，試圖把刻骨的個人仇恨變成全社會的咬牙切齒。”“他們把個人仇恨發展得更極端，思想變得越來越狹隘，把配合西方同祖國作對當成自己的生存之道，他們看上去已經同對中華民族利益的‘匹夫有責’一刀兩斷。”

“他們將自己綁在西方對付中國的箭頭上，角色被固定化了，已無發揮和自我調整空間。中國不會因一兩個海外異見人士就不同西方交往，而西方也不會同越來越強大的中國決裂，像德國同中國的關係陰晴不定，冷三天熱兩天。這決定了異見人士們注定會痛感世態炎涼。背離了祖國，那些文人只能是自生自滅的孤魂。”

文章最後告誡：“出走國外的異見人士需要有化解仇恨的能力，這是他們飄零海外的生活能多一些精神陽光的關鍵所在。”

正在分裂的帝國

《環球時報》的文章可以說是通篇謬誤。例如，中共“帝國”的分裂，其實已經不只是一個期盼或預言，而是正在發生演進的一個歷史過程。如果我們看看北京自己發布的《國際人才藍皮書：中國留學發展報告》的數據，從1978到2011年，中國共送出了224.51萬留學生，回國人員總數81.84萬人，回歸率為36.5%。當超六成（142萬）的中華民族精英滯留海外、放棄了黨國掌控的“帝國”後，這個帝國已經從核心開始分裂了。過去幾十年（從逃港風潮算起）每年數以萬計的中國人偷渡海外，2010至2012兩年多的時間里西藏人的自焚事件達到近六十起，回歸十五年的香港城邦自治的呼聲高漲，重慶獨立王國以王立軍叛逃美領館而坍塌，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成功逃進美國大使館並登陸美國，中國富人群體大規模移民海外，無不是帝國坍塌症候群的一部分。

再比如，中國權力精英創造力的日益流失、萎縮和僵化已成了不爭的事實。當官方的宣傳機器和御用文人在實用主義的詭辯和挑戰常識的謊言中越陷越深而不能自拔時，可以替代他們的中華新文化正在世界華人圈崛起。反對派精英不僅有文學藝術界的領軍人物（諸如劉曉波、高行健、哈金、艾未未和廖亦武等人），也有學界的泰斗（諸如余英時、嚴家祺等），更有高考恢復後進入大學經歷過八十年代洗禮的文化、新聞、財經、法律、藝術等專業人才。其創造力和影響力都在急劇提升。至少西藏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八九”學運領袖王丹、“公民力量”組織人楊建利都分別是哈佛貨真價實的法學、歷史學和政治學博士。民主黨全委會共同主席王軍濤和王有才都有原子核物理學的學術背景，分別獲得哥倫比亞大學的政治學和伊利諾大學核物理的博士學位。

“道德和智慧的平平者”、甚至是低劣者（薄王事件只是掀開了冰山一角）到底是在紅牆內外，也就不言自明了。

最後，《環球時報》把世界用家國天下的觀念分割開來，把西方與中國對立起來並轉換成道德評判的基礎；把“祖國”與“黨國”捆綁一起，把中華民族利益和人類普世價值和普遍利益對立起來；把黨國的政治迫害輕描淡寫為“中國社會內的正常競爭”，把系統的人權災難說成“個人際遇”，把逆歷史潮流而動說成“時代潮流”，也都不值一駁。

政權的虛偽

但最為可笑無恥的是，一個以暴力起家、製造恐懼、散布謊言、培育仇恨的專制政府卻自認有資格宣講“要有化解仇恨的能力”；一個具有濃重的幽暗心理、習慣於暗箱操縱的流氓政府還要侈談“多一些精神陽光”。六十多年的中共執政史其實就是全方位、多層次培育仇恨的歷史。且不提“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六·四”等全局性的仇恨運動，恐怕我們每一位讀者都曾看到過天真無邪的兒童在法場上嬉笑玩耍、全體人民把行刑當作節日來慶祝的畫面。且不說中共掌權後即開始背叛自己的盟友（“反右”）、餓死自己的人民（“大饑荒”）、迫害自己的功臣（“文革”）、吞噬自己的子女（“上山下鄉”），最後它把自己領袖的未亡人也投進了監獄、讓她走投無路、上吊自殺，也把自己的“偉大領袖”變成了“反革命家屬”。就說近期政府利用釣魚島事件，操縱民情，煽動民族主義情緒，仇視外國，傷害本國公民，也是在用仇視作為治理手段。

正如廖亦武在《上帝是紅色的》一書中所言：“雲南彎彎曲曲的山路是紅色的，因為多年來它們都被鮮血浸泡著。”從對“法輪功”的迫害到對“家庭教會”的打壓，從鎮壓西藏到妖魔化新疆回教徒，我們都可以看到斑斑血淚。拿近期事件來說，即便遠在北京，王立軍也要聽到刑場上的槍聲來獲得快感，但他萬萬沒

有料到，很快他就成被“精神失常”，成為他人感受快感的源泉。中共的國家機器已經完全背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的先訓，變成了一台沒有朋友的“政治絞肉機”。中共政權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帝國註定要分裂，因為它的治理者和幫凶已經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廖亦武失去了祖國，但他的到了自由和關愛。劉曉波失去了人身自由，但他捍衛了知識分子的尊嚴，並獲得了靈魂的自由。截至 2015 年，130 多位自焚的藏人雖然失去了生命，但他們生命最後燃燒的火焰向全世界宣示：儘管仇恨試圖征服我們，但我們永不放棄慈悲！這就是為什麼，一個培育仇恨的政權不可能維繫下去。

8.2 六四， 64！ (2013.10.09)

由於天安門屠殺的緣故，“六四”成為了敏感詞。中國最大的收索引擎“百度”會自動彈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2013年十月一日是中共建政64週年，對“64”關鍵詞的屏蔽有所放鬆，在網絡和微博上，人們乘機打擦邊球，紀念“64”。

為民主削發明志

“六四”已經是一代人前的事情了。對“六四一代”的深厚情結人們不難理解。但是否新生代還能記住“八九民主運動”，就難以斷定了。可以理解，一方面，“六四屠城”使許多人失去了工作、升遷機會、甚至許多人獻出生命；但另一方面，它又讓許多人，尤其是平庸但卻能討好共產黨的那些人，終於可以踩在青年烈士的鮮血和軀體鋪就的升遷之路騰達。記得十多年前我曾經為上海市委組織部培訓過留美幹部。一位副處級的女性幹部對自己的成就頗為自豪，談起1989年的熱血學生竟用了“他們太天真，太無知，太傻！”我實在無法克制自己的衝動，明確告訴她：

你可以用各種污名，但他們都是一群出類拔萃的英才。如果他們都想像你一樣獲得一個副處級幹部位子，他們會得到得更快。

難道只有“六四遇難者”家屬才關心天安門屠殺嗎？難道只有“天安門母親”才會回憶 1989 年驚心動魄的民主運動嗎？2013 年在紐約參加和目睹了由一批“八零後”和“九零後”組織的“64 二十四週年”紀念活動，為我提供了明確的答案。六月的紐約，太陽光照已經很強，氣溫也很高，但一群中國民主黨黨員卻不知疲倦，在中領館和聯合國廣場舉行了一整天的抗議中國政府、紀念“64 死難者”的活動。看著一張張年輕的臉龐，注意到一位男孩眼睛裡的淚花在滾動，為一位女性演講人動人的演說感動。出人意料的是，一位叫陳曉敏的廣東女孩上台發表演講，敦促世人毋望“六四”、為中國民主化出力。為了表達她矢志不移獻身中國民主的決心，她竟然拿出一把剪刀，剪下了她烏黑漂亮的秀發。為中國民主削发明志，卧薪尝胆，好一個脫俗的巾幗英雄。

帶著好奇和佩服之心，事後我找到了陳曉敏，想要了解她的更多情況。她告訴我，她來自深圳，大學畢業後在那裡為 IBM 工作。2010 年去香港的一個偶然機會，結識了一些香港人，參加了那裡的“六四”紀念活動。後來由於家庭變故，原男友的幹部家庭擔心受到不利因素影響要兒子斷絕與她的來往。面臨家庭的壓力，她和男友分手，以後決定隻身來到美國。她告訴我，她在美國很快就有了一個新發現：她擺脫了束縛，獲得了自由。所以她的自由夢想讓她走上了一條為中國民主抗爭的道路。

啟動民主化新動力

陳曉敏的削髮明志為民主讓我產生了至少兩個感想：第一，“八零後”和“九零後”的中國青年，對個人自由更加敏感。他們不願意接受政治因素對他們生命和生活選擇的破壞，所以他們渴求

民主，也更願意為自己的利益抗爭。第二，他們面臨的政治生態惡化程度，例如官員腐敗、政府專斷和治理暴力，都已經遠遠超過了“八九民運”時代的水平。比如，1990年處理的鐵道部副部長羅雲光受賄案，羅收受現金人民幣2000元、金戒指一枚（價值465元）、電冰櫃一台（價值2354元）和非法所得950元。一年後查處的鐵道部副部長張辛泰接受價值人民幣兩萬兩百元的物品，以幫助行賄人獲得計劃外車皮一列，張被處以三年徒刑（緩期五年）。而在2013年處理的鐵道部部長劉志軍案中，鐵道部運輸局局長張曙光貪污數額，光在起訴書裡就達4775萬元。劉志軍本人收受的賄賂在起訴書裡列有6460萬元。而如果算上他們在國內的資產和海外的房產，都要以億元來計。很清楚，如果二十四年前中國“八九民運”明確受到反貪腐、要政改的驅動，今天，這一動力不是減弱、而是更強化和迫切了。

很顯然，如果當今中國政府官員更加肆無忌憚地貪腐、政府更加大規模地使用暴力、更多的無辜民眾受到傷害，我們就會看到產生“八九民運”的同樣的、甚至更強的結構性根源、政治和社會張力。在1989年，我們還未看到大規模的上訪群體，對法輪功的鎮壓及其冤案還未產生，藏人還未走向自焚，新疆也未被置於軍管，也還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強制搬遷以及由此而觸發的受害者自戕、自焚。如果我們比較20年前後鐵道部的貪腐有萬倍的差別，今天中國政治、社會、道德的惡化，甚至對幾千萬弱勢群體來說經濟狀況的惡化，如果不是萬倍的差異，也可以量化為幾十倍、甚至上百倍。楊佳、夏俊峰被逼上梁山的抗暴行動就是震撼中國人人心的兩個例證。更為重要的是，二十多年前，中共黨內還有改革派力量，民眾、甚至學生都還對政府的反腐能力和改革決心抱有一定的希望。但今天，不僅報如此希望的人越來越稀少，而民間對政府的敵對態度卻與日俱增。正是這樣的社會心態和社會背景，產生了“茉莉花革命”、“同城飯醉”和“重歸天安門廣場”

的號召。

2013年10月1日中共建政奴役中國人64週年，也是殺官維權的夏俊峰被惡政權槍決的頭七紀念日。人們難免不想到“天安門64屠殺”。積惡如此深重，中共政權留是死。

8.3 屠殺依然進行時 (2014.06.09)

“吃人血饅頭”

25 年前，在北京發生了一場大屠殺，世人稱之為“天安門大屠殺”。一代人的時間已經過去，有人試圖把 1989 年的歷史事件變為“非事件”，把一切歷史記錄扔進奧威爾描述的“記憶焚化洞”裡，讓從未開眼的人們永遠無從建立歷史記憶，或者讓有過記憶的人重塑記憶，接受黨國對歷史和現實的控制。這種漂白歷史、實施腦控的“美麗新世界”獲得了部分人的認同，以致北京一位署名高雨華(Helen Gao)的記者在《紐約時報》撰文“忘記天安門”，聲稱：“中國領導人已經從天安門吸取了教訓，把政治從我們的生活中剔除。”她還寫道：“年輕中國人拚命工作，拚命購物。我們不回望。”

不可否認，即便曾親眼目睹或身心投入那場運動，有許多人誌願選擇了忘卻。君不見 25 年前，北京屠城送給留美的近 10 萬留學生每人一張綠卡；今天，不到十分之一的人，甚至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會在“六四”這一天走到公共空間，表達他們的哀思和感恩。有人把代表生命和希望的綠色去掉，從實際的粉紅卡中

看到了年輕民主鬥士的鮮血，因此叫永久居留卡為“血卡”。如果想想這十萬人在 25 年間在美國落地生根、開花結果，我們甚至可以說，不到千分之一的得利者會為他們的幸福公開感恩。更有甚者，一些人搖身一變成為美國人，馬上折回中國撈名撈利，加入到吃“人血饅頭”的盛宴。

良知依存、堅守抗爭

但是，更多的有良知和正義感的華人是永遠不會忘記 1989 年大屠殺的。其中的緣由多種多樣。或是和我一樣，作為 89 一代，我參與了中國現代史是最為壯觀的民主運動，被上海市委認定為上海學運“黑手”，而學生們把我們幾個年輕教師譽為“復旦七君子”。儘管失敗，我為我的選擇而自豪。同時，我的學生參與了絕食，後來我的學生、上海高自聯副主席文江平自殺身亡，我的學生、上海外灘絕食現場總指揮陳雅君失蹤後至今不見踪影。我的另一位學生、上海高自聯主席姚勇戰（又名張才）至今流亡海外、無法歸國，而他的父親姚文田又因在香港出版有關中國政治的書籍（包括我的《政治維納斯》）而在 2014 年五月被大陸惡判、古稀老人還在遭受牢獄之災。我們還有未完成的事業，所以我們還要戰鬥下去。

或者像天安門母親們，她們失去了愛子和愛女，而且亡者和未亡人都還背負著汙名，令前者靈魂無法安息，後者良心不得平衡。所以她們還執著抗爭堅守。但更為重要的是，我們看到了“六四”後出生的新一代加入到了還原歷史真相、追思民主烈士的各項活動中。儘管由於 25 年來最嚴厲的高壓，我們無法清楚地知道大陸境內的紀念情況，但在香港、台灣和美國的校園燭光晚會上，我們都看到了成千上萬的青春面龐。

屠殺的常態化

為什麼此時此刻紀念 89 歷史事件，絕不是小事一樁，它與每一位中國人、甚至每一位地球村居民都休戚相關？因為，天安門屠殺是一個致命的政治病毒。對它的容忍、接受和漠視只會讓這個致命的病毒傳染擴張，最終導致極度的邪惡統領政治，吞噬一切權利、公正和道義。

首先，天安門屠殺這一表述需要調整。因為我們看到，1989 年屠殺首先在三月的西藏拉薩開始，然後軍事戒嚴運用到了五月的北京，北京“六四屠城”是中共獸性瘋狂的高潮，爾後在成都、長沙等地也開始了屠殺行動。在以後的幾個月裡，從太原到上海，從瀋陽到廣州，從西安到合肥、杭州，中共又開始了全國性的抓捕行動，無數的民主運動參與者被捕、被關、被失蹤、被槍決。他們不僅有學生，還有大量的市民、工人、農民工和農民。

其次，我們要認清，1989 年屠殺不是為了“穩定”和“發展”而不得已而為之的最後暴力，而是標誌著屠殺成為經濟發展和政治治理的一個常規手段。在建政六十多年的時間裡，中共為了奪取政權、鞏固政權的屠殺，後來演繹為政治失誤的濫殺和派系鬥爭的自戕殘殺，到了 1989 年演變為政治治理工具的屠殺，再到後來發展到常規行政的屠殺。屠殺的常態化、非戲劇化，生殺予奪大權的分散化帶來了 2005 年廣東汕尾開槍、2008 年在西藏、2009 年和當下在新疆的再次濫施暴力，也讓世人看到了廣東烏坎的薛錦波、北京的曹順利被當地公安毆打致死，浙江樂清的錢云會被壓死在鏟車下，湖南邵陽的李旺陽“被自殺”，等等。

習近平扛上“六四”負資產

最後，我們看到，面對鄧小平留下的 89 屠殺有毒政治資產，

習近平沒有政治勇氣和政治智慧進行剝離。習近平並非像江澤民和胡錦濤那樣是它的直接繼承人，但習近平連華國鋒結束和否定“文革”的勇氣和智慧都沒有，他通過“六四”以來最嚴厲的抓捕關押和抵制對“六四”問題的問責，把 89 屠殺變成了他自己的政治包袱，直接成為鄧小平有毒資產的所有人。對暴力治理的全面接受讓習近平獲得了天安門屠殺的所有權。

對暴力的崇拜和對人民的殺戮成為“兩個三十年”互不否定、貫穿一氣的內在邏輯。它造成的中共自體中毒表現在“極端主義、恐怖主義和分裂主義”已成為當今習近平政權的權力學：他用唯物論、無神論、大漢族主義、反憲政、極權主義等極端主義來奴役人民，構造他的“中共夢”、試圖建立中共千年帝國。然後，他用國家恐怖主義來行政統治，把中國置於永久的緊急狀態，肆意剝奪人權和侵害自由。這些逆歷史發展而動、反普適價值的做法，讓中國八方受敵、內外交困，刺激各方反抗：台灣開始了“反服貿”、香港興起了“抵制蝗蟲”運動和後來的“占中運動”，新疆東突獨立勢力異常活躍，達賴喇嘛提出的尊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中間道路”卻受到漠視和詆毀，中共的所作所為正在分裂中國，把她帶入萬劫不復的地步。

中國政治病毒源於共產黨，爆發於鄧小平的 89 屠城，流行於習近平全面接受 1989 年屠殺政治的有毒資產。中共暴力政治傳染病早已超越 1989 年天安門的時間和空間，正在四處瀰漫威脅每一個中國人，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紀念“六四”，要終結政治殺戮的原因。

8.4 民主女神，自由女神

(2013.04.06)

我是參與了“八九民運”和見證了“六四鎮壓”的一代中國人。1989年正逢我的本命年，以“蛇”為像徵的“啟蒙者”挑戰以赤龍為像徵的共產黨政權，注定了我生命中最激動人心的人生篇章以悲劇而告終。隨著天安門廣場的“民主女神”像在肆虐進行暴力鎮壓的坦克履帶下轟然坍塌，和我的母校復旦大學的“民主女神”像被撤除，我決心已定，一定要離開這個不講道理、而只用槍砲對人民講話的專制的國度。

嚮往自由女神

在以後的兩年裡，經歷多次受挫、被阻撓以後，我終於在1991年又一次獲得美國大學的博士項目獎學金，離開了對我來說是永遠不能癒合的創傷的國家。我的目的地是美國費城，這個美國民主的誕生地永遠是激發我自由的活力和民主的想像的地方。當時我去國出發時，身上只有一百美元。我的預算是：五十元的車費，“灰狗”長途公共汽車可以把我送往費城。另外五十元我可以用作前往參觀自由女神像的費用。如果說，中共的殘酷鎮壓

是促使我離開中國的“推力”，那我書桌前的自由女神雕像就是激勵和引領我追尋歐風美雨的“吸力”。

命運猶如已有天定，自由成為我生命的根基和羅盤。我在費城生活了整整六年，生命的軌跡穿梭於自由鍾、憲法廳、獨立廳、富蘭克林雕像和他建的圖書館、博物館和大學之間。離開了“貓頭鷹”雕塑矗立中央的天普（又譯“坦普爾”）大學校園，我來到了紐約城市大學任教。因為我住在紐約市五大區中最小的區裡，當人們問起我居家何處時，我總是這樣解釋道：你去過自由女神島嗎？從華爾街金融街往自由女神像眺望，後面的一個大島就是我的安家之處。由於我從紐約城市大學斯德頓島學院到大學研究生院都要乘坐渡船，經過自由女神像，十多年來，從遠到近，然後又從近到遠，我都會像遠道而來的遊客們一樣倚立船欄，永遠新奇地久久凝望自由女神。這似乎已經成為了我的敬拜儀式。猶如觀想觀音菩薩，我會培育和提升自己的慈悲情懷，觀想自由女神，又會不斷激發我追自由、求解放的衝動。因為有著對民主女神的共同的熱愛，著名雕塑家陳維明把他的“民主女神”雕塑的畫像送給了我，我把它用作了我的《政治維納斯》一書的封面，所以我也能時常觀想民主女神，希冀民主體制能夠最終在中國落地生根。

八九一代的歷史責任

作為“八九一代”，“六四”情結已經成為我們為中國民主奮鬥的動力，因為我們在1989年激動過，吶喊過；流過淚，流過血；憤怒過，失望過。“六四”慘案的最終昭雪一定是中國民主化的一個重要標誌性事件。但歷史的發展以社會各種勢力平衡後的合力為推動力，而且在一定的時間段和在某些國家，歷史並非一定以自由、平等、正義和幸福等價值觀為目標，從而演繹出一條最

優化的路徑。也就是說，民主是專制勢力頑固阻撓和民主力量不懈努力長時期較量出的結果，它來到中國還需要一個歷史過程。如果“六四”的最終昭雪是以中國民主化的啟動甚至完成為前提條件的，那我們還必須接受一個殘酷的現實：專制暴政還將是未來幾年中國的基本政體。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我們有必要回答下列幾個問題：每一個個人如何在政治現實與政治理想最終彌合的這段時空獲得最高的生命的價值？如何避免在暴政的淫威下喪失我們自己的幸福？我們如何能夠超越個人、具體和現實的苦難，以樂觀向上和充滿自信的心態與專制政權較量？我們如何能找到新的阿基米德基點，實現內心的升華，最終能夠在道義上鄙視中共專制政權，在智力上以更多的創造力和自信心超越和解構中共的霸權話語體系，在心理上獲得更大的喜樂和平靜，把恐懼、不定和無望留給專制者們？

作為活著的“八九屠殺”的倖存者，我們可以選擇在仇恨、復仇心理和愧疚心理中不愉快地活著。作為“八九”烈士的親人或朋友，我們可能既有苟延殘喘中的負疚，又有肩負歷史使命的焦慮，這雙重感情讓我們對現存政權還抱有希望，我們選擇在期盼該政權能夠對我們死去的親人或朋友平反昭雪的虛幻中活著。不幸的是，這種病態的期盼形成了我們對殺害我們親人和朋友的獨裁政權的心理依賴。一個建立在通過屠殺學生和平民來震懾人民的政權是不可能為它的受害者平反昭雪的。我們對這種政權的期盼只能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一種表現。其實，我們完全不必把“八九血案”作為我們的枷鎖扛在身上、放在心上。我們不會忘記它，我們也不會原諒那些劊子手。但“八九血案”完全可以成為我們與這個政權心理斷奶的最後契機，是一次最徹底的啟蒙。它可以成全我們在未能獲得民主之前，勇敢而果斷地逃離專制，欣喜地去擁抱自由。不錯，它向世人顯示了中共專制機器的暴力，但並未說服人民這個政權有力量。惶惶不可終日的是中

共的官僚們，因為它的歷史記錄只會是對中共的詛咒，成為套在專制者脖子上並不斷勒緊的絞索。

堅守自由意志

一個專制政權可以剝奪我們生活在民主體制下的公民權利，但它無法剝奪我們的自由意志。我們可以行使我們的自由意志，不對專制政權懷有虛幻，不對專制體系形成物質上、利益上和心理上的依賴，不接受專制政權的宣傳機器的洗腦和拒絕它強加和灌輸的內容。我們可以行使自由意志，去蔑視、惡搞和解構執政黨試圖維持的價值體系和治理體系，暗中破壞和公開抵抗黨國的政策和行政，讓政權形象設計師試圖維持的神聖光環褪盡顏色。我們可以努力逃脫專制政權的魔掌，如果它不讓我們做公民，我們絕不做它的臣民：要么我們可以逃逸和移居到一個給我們公民權利的民主國家（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已經用雙腳做出了選擇）；要么我們可以逃離國家控制下的體制，流入民間（成為民營企業家或獨立學者和藝術家）；要么我們可以在精神上飄遊出體制，恪守“不作惡”的起碼道德底線。甚至，我們可以犧牲自己的利益，去與暴政周旋、抗爭。最後，我們甚至可以犧牲自己的生命，去動員、激勵民主力量，去衝擊和動搖專制根基。在 1989 年，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在北京這樣做了；無數的中國人在成都、長沙、上海和其他城市這樣做了；西藏民眾在拉薩這樣做了。今天，在過去短短的三年時間裡，也有上百的藏人燃起了自己的身軀，作為燃燒起的自由火炬去激勵更多的反抗。

記住 89 的犧牲者

因為“八九民運”的被鎮壓，我有學生失蹤。上海高自聯宣

傳部部長、絕食現場總指揮、復旦新聞系學生陳雅君在北京屠城後與我在電話上匆匆訣別，二十多年後至今沒有音訊。我也有學生自殺。上海高自聯副主席、復旦國際政治系 1986 級學生文江平不堪忍受發配回湖南農村的報復和當地安全、公安部門的迫害而喝農藥自盡。每當我想起他們時，悲傷之餘卻又為他們獲得了最終的自由和解脫感到某種不安的欣慰。在中共的專制體系下，至少在屠殺後的兩年間對於我的感受來說，與其生在暴政下，還不如死去。今日的中國，所謂“崛起的中國”和“千年盛世”無非是權貴寡頭們的分贓盛宴，它給人民的期盼要少於“八九民運”前的政府，它對人民的殘酷甚至還要深於學生運動聲討的政權。如果今天八九英烈在世，他們一定會義無反顧地重新赴湯蹈火。同時，對於民主英烈的鮮血，我又充滿了無限感激之情：是他們的生命和我與他們並肩戰鬥的經歷讓我和更多的中國人完全覺醒，最終自絕於黨國，選擇了自由。而自由的獲得又成為我和類似我的處境的更多的中華兒女實現個人價值、為人類社會貢獻更多的價值的前提和保障。

選擇自由

中共專制政權是一個暴政，如果我們選擇了自由，就是對它的唾棄。中共意識形態根植於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如果我們能意識到至上的心智，就是動搖了它的思想根基。中共是一個無神論政權，如果我們通過內省去發現靈魂、仰望上天去追尋無限和永恆，就是對這個毀滅精神信仰的貪腐政權的徹底拋棄。我們並不需要祈求中共來為我們卸去枷鎖，那是與虎謀皮。我們可以砸爛鎖鏈、自卸枷鎖，首先從每個個人做起，做一個自由的靈魂和超越性的存在。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已經做出了這樣的選擇。而且，這群脫離中共體系的人群數量在劇增，質量在突變（至少我們可以從

中看到達賴喇嘛、高行健和劉曉波三位諾貝爾獎獲得者）。這群擁抱了自由女神的人們將是把民主女神重新豎立在中國大地上的中堅力量。所以，從每一個個體的最大幸福和中國整個民族的最大幸福雙重考慮出發，當下每一個中國人選擇多種形式的各種自由是保證個體生命意義和價值全面實現的第一步，也是實現中華民族整體生活在民主體制下的關鍵。

我們應當選擇何種生活方式、工作態度和人生目標，才能讓已經死去的“八九”英烈死得其所？首先，我們必須確立自己的價值評價體系來記錄歷史和定位英烈。所謂的要求“英明的黨中央”為“六四”犧牲者“平反昭雪”仍然還未跳出中共價值體系的窠臼。十幾年來“天安門母親”所做的重現歷史真相的努力，現在出現的民間祭祀“六四英烈”則是建立了獨立的歷史評價體系。流亡海外的學者吳仁華所作的《天安門血洗清場內幕》、《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兩部著作就是重要成果。

第二，拒絕和拋棄與黨國維持“施虐和被施虐的依戀情結”。權力是一種關係。如果我們拒絕與專制政權維持紐帶關係，專制權力就無法在我們的身體和心理上產生效力。記得在“六四屠殺”後，我就開始拒絕在各種政治學習上被洗腦，乾脆塞上耳機聽西方音樂，不與專制權力發生互動。後來我又決定“下海”到一家民營企業兼職，把個人收入翻兩番。最後乾脆遞交辭職報告，離開復旦教職，遠走他鄉。可以說，今日中共政權最大的威脅來自八九年後拋棄了“體制”的群體。

踐行自由

第三，通過踐行個人自由來瓦解中共專制體制、消解極權控制，構建公民社會，從而最終建立國家民主體系。最容易實踐的自由是內心精神的自由，也就是艾薩克柏林在《自由的兩種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 一文中所說的：“讓我們擺脫順應的恐懼、喜好或欲求就是要把自己從某種我們無法掌控的專制主義中解放出來。”他還說到：“只有當我根據我自己的意志規劃人生時，我才是自由的。”他強調：“自由概念，無論是‘積極’還是‘消極’的意義，其核心是抵制某種東西或某個人，或那些進犯到我們的場域或對我們行使權威的人，或者是某種痴迷、恐懼、心理障礙、非理性力量等等，亦即形形色色的侵犯者和專制者。”柏林提到了“內心的移居”(Inner Emigration)就是一種簡便易行的自由選擇。對中國人來說，從李白到陶淵明，從“隱士”到“遊俠”，中國歷史上早就出現了綿延不斷、人才濟濟的“流人社會”。老莊的“逍遙飄遊術”更是中國知識分子對抗腐敗專制官府的古老武器。

泰戈爾在《飛鳥集》裡曾這樣描寫過花兒與果實的對話：

“果實啊，你離我有多遠？”

“花兒啊，我藏在你心裡。”

中國民主的果實離我們有多遠？其實它就藏在我們每一個擁抱了自由的中國人心裡。如果自由女神已根植民心，民主女神降落到神州大地還會遠嗎？

8.5 香港城邦革命 (2014.12.11)

早在2011年，一位香港的年輕學者就向我推薦陳雲的《香港城邦論》，並預言一股強大的本土革命衝動正在香港暗湧。2014年年末已持續兩個多月的香港“占中運動”證實了陳雲和我的朋友的先見之明。

城市與民主

香港與北京的衝突大爆發當然是由許多具體的事件和訴求互動而成。但如果我們從長程的大歷史觀之，這種衝突完全是由一對古老的政治邏輯先定的，而且它只是兩千年城市革命史的一個環節。

25年前為了完成我的研究生學位，我在復旦大學做了一篇碩士論文：《城市革命與西方民主制》。我注意到西方民主史上一個有意思的規律：每一次大規模的城市勃興，都會跟隨著民主體制的突變。兩千多年前的古希臘城邦革命造就了雅典的直接民主制，後來的羅馬城邦運動建立了羅馬共和國。一千多年以後，大約十五世紀前後，以威尼斯為代表的地中海商業城市的興起和後

來北歐漢撒同盟的出現，宣布中世紀的終結和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大革命的到來。荷、英、美、法的城市市民革命創立了現代代議民主制。到十九世紀西方工業化產業大城市的擴展，又推動了爭取普選權的運動，選舉真正成為程序性民主的核心。

今天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國際大都市正在彌補民族國家在治理上的捉襟見肘，塑造出一個全球化、民主化的全球治理模式。用我校（CUNY Graduate Center）著名教授本傑明·巴伯在《如果市長統治世界》裡的話來說，“城市在地方和全球範圍為民主治理提供了真正的希望。”

香港作為世界上居於領導地位的一個國際大都市、作為珠江成長三角洲的龍頭，也正是中國民主治理和地方民主治理的一盞希望明燈。

北京政治霧霾使人窒息

不是說城市就一定培育民主希望和未來。馬克斯·韋伯曾說過，“城市的空氣使人自由。”中國在幾千年以前就已建立過長安、洛陽等世界最輝煌的大都市，今天的北京也列在世界十大都市之列。但是，北京的空氣不僅無法使人自由，它的政治霧霾足以使人窒息。因為北京和香港體現了不同的城市精神，顯示出不同的城市功能，所以出現衝突。

馬克思、韋伯、魏特夫都曾注意到，西方的城市首先是因為商業集市而出現的，而中國的城市更多是皇權政治所在地、行政控制中心、軍事重鎮等。中國的都市缺少一個活躍的商業社會和中產階級，公民社會就無從談起。占據霸權地位的是專制皇權、層層的官僚機構和為他們服務的官營工商業。沒有形成獨立的資本力量，沒有擺脫專制王權和官僚政治的控制，就不可能發育出公民社會。所以，巴林頓·摩爾在《專制與民主的社會起源》一書

中斷定：“沒有布爾喬亞，就沒有民主。”

在中國的所有大都市中，如果以 1949 中共奪權年為分界，在此之前，上海是中國最具有布爾喬亞氣息的都市。不管喜歡還是不喜歡，以江澤民為首的“上海幫”帶給中國的洋氣還是要比其他所有的中共領導要多一些。在此之後，香港取代上海，成為中國版圖上最有自由氣息的商業城市。當中共新黨魁“習大大”（“大大的壞”）熱衷於把中國人帶回窯洞時，吃包子的土氣和喝拉鐵的洋氣在“一國兩制”的包辦婚姻中，自然會鬧出彀扭。

北京皇城與上海的較量在五十年代很快搞定。就連青紅幫的頭頭黃金榮最後都不得不服服帖帖、出門掃地，抱著掃帚頭孤苦伶仃死在他曾呼風喚雨過的昔日“十里洋場”街頭。上海被美國學者稱為“打開近代中國的鑰匙”，成為中共建立封閉社會後關上的最後一扇門。香港作為中共法權治外的一個英國殖民地，成為封閉的中國與外部世界聯繫的唯一橋樑，也因此存活和興旺起來。

但無論是上海，還是香港，儘管在近代資本主義史上發展出了不同於京城內地專制官僚控制的亞細亞城市特徵，也還主要體現的是買辦資本主義，所以表現出對東方全權政權和西方金融資本的雙重高度依賴，本土資本、本土意識和地方自治都未取得決定性優勢。香港的工商界被紅色資本家掌控，他們熱衷於與中國權力寡頭勾兌以獲得牙慧，勢必成為沒有脊梁的群體。香港內力的孱弱導致港中衝突的膠著狀態。用印度聖人室利·羅摩克里希那的比喻來說，中共新教主習近平色厲內荏，像是一條已喪失前輩強大毒性的青蛇，緊緊咬住香港，而香港市民又像頑固的牛蛙，死不從命。結果，青蛇與牛蛙形成互為折磨的困境。

香港出路何在？

擺脫港中目前的困境，可以有兩個辦法：一是中國國內和海外

的力量能做出實實在在的事來，打蛇打擊三寸，讓中共放棄徹底吞併香港、扼殺自由法治的意志；二是香港人能繼續擴大占中努力，上升到“城邦革命”的水平，捍衛殘存的自由、擴大更多的自治。陳雲在他的《香港城邦論》中指出，香港必須爭取成為“以城市為核心範圍的自治體”，通過提升城邦開放共融的精神、多元主義、市民的政治文化參與和強化中西交流互動，捍衛香港的本土文化和利益。但陳雲似乎沒有意識到，在青蛙還未嬗變為王子時，“放棄民主中國、保衛香港城邦”只會是得其其一，不得其二。

香港本土主義顯然在動員民眾參與、爭取民主自由過程中有積極意義。但如果因為有了它，香港人把自己變成井底之蛙，奉行“井水不犯河水”的哲學，也因此期盼大河不會洪水滔滔，那就只會落得“溫水煮青蛙”的結局。魏特夫在半個多世紀前就明確指出，“東方水利專制主義”的全面實現必定是絕對權力、全權控制、全面恐怖、全部服從和完全孤獨。

北京上演和導演了半個多世紀的屠城悲劇系列，中國人就像是電視機前的觀眾，甚至就是魯迅筆下描繪的一百年前的華老栓和圍觀女傑秋瑾被殺頭的那群人：“頸項都伸得很長，彷彿許多鴨，被無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著。”1989年中共血洗長安街、天安門絕非空前絕後，它只是中共暴政系列的一集。新一集的序奏已在香港開場。香港人，中國人，世界上所有的華人，我們有智慧和勇氣不做屠刀下伸得長長的脖子嗎？我們能夠“保衛香港城邦、建立中國民主”嗎？我們還會選擇坐在CCTV前，讓六十多年的專制悲劇、兩千多年的東方專制主義和全權政治繼續推出下一集嗎？

附錄 8.1:

未來“六四”的解決會成為中國民主革命的一個原因
(2014.06.09)

法廣流芳採訪

發生在北京的“八九 - 六四”民主運動剛剛送走了 25 週年紀念日。今年六月四日前後，全球多座城市發起悼念六四的活動，各派人士在緬懷那些當年倒在槍彈下的無辜犧牲者英靈的同時，高聲疾呼為六四正名。應該說，即使是在歷史的長河中，25 年也絕非一個可以忽略的數字。25 年來，中國的局勢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從經濟層面講，它已從一個落後的發展中國家躋身於大國之列；從政治層面看，它的領導層也更換了多次。然而，25 年前發生在天安門的這場血腥鎮壓，至今卻未能獲得官方一個令人信服的說法。“六四”的話題甚至被列在禁忌之列。從中國目前的情況看，短期內為“六四”正名的希望是否存在？這塊持續了 25 年之久的歷史傷痛，究竟要等到何時才能夠治愈？我們請紐約城市大學教授夏明先生來談談看法。

法廣：今年“六四”事件 25 週年前後，中國政府對各派民主力量實行了嚴格的監控或打壓，採取的措施似乎勝過往年；您對此一現象作怎樣的解讀？

夏明：我覺得一個最根本的，就是習近平沒有政治勇氣。把他和華國鋒比，可以看到，華國鋒在“文革”還沒有結束的時候，他可以宣布“文革”是錯誤的。對毛澤東的許多負面的政治資產進行剝離。但是在“六四”25 週年後，我們看到，習近平對鄧小平留下的負面資產不僅不加以剝離、相反全面地繼承下來。他做

為鄧小平負面資產的繼承人和看管人，恐怕是“六四”25年之後最大的一個現象，就是習近平把一系列政治包袱扛下來。因此，他做為政治包袱的捍衛人，他對所有的要求對“六四”平反的民主人士都更嚴厲地進行打壓，我覺得這恐怕是最值得我們關注的一個現象。

法廣：應該說，“六四”是一塊歷史傷口，當年人民軍隊將槍口對準手無寸鐵的學生，引發數百人死亡的慘劇。由於當局至今沒有對此一事件做出一個公正的結論，導致這塊傷口始終不能癒合。北京政府為什麼始終對此一事件諱莫如深？難道一段歷史真的可以在忘卻中被抹煞掉嗎？

夏明：這裡面我覺得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就在於，我剛才拿它和“文革”相比，“文革”就是中共黨內的派系鬥爭引發了中華民族的全面的災難。這樣的情況下，中共有部分領導人會對“文革”進行清理。但是，鄧小平模式不是一個派系鬥爭。它更多地是一個寡頭轉型。它使得中國的當權者全都得利。所以在中國目前形成了從它的黨政機構、從它的高級領導人、它的低級官員，全面得利的一個發展過程。中國的矛盾已經不再是過去的派系鬥爭的矛盾，相反，是寡頭針對目前發展過程中被剝奪政治權利和經濟利益的人民之間的矛盾。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看到，為什麼習近平非常強調黨內的統一。而且為什麼現在在黨內、在中共體制的內部，基本上沒有改革的慾望、也沒有任何改革的努力。這點正顯示出了中國目前政治鬥爭性質已經發生了轉換，正好也說明習近平內心十分清楚，就是下面任何大的政治變革，它已不是中國共產黨可以通過它的各方面的政策調整所能解決，相反，更多地會是一種現成的共產黨的寡頭體制跟老百姓的爭取民主和自由這方面的衝突。所以我覺得習近平非常擔憂，他認為這種衝突在他的體制下、在他的政治智慧和政治的想像力裡邊，他是根本就沒有辦法解決的。所以他為什麼就會一直堵住“六四”這個政治事件平反的過程。

法廣：“六四”之後的 25 年，中國統治階層是否發生了變化？這又是怎樣的一些變化？

夏明：“六四”對於中國的老百姓和中國的政治精英權力層，都有各種經驗教訓可以總結。對於中國治理的權貴階層來說，當然他們有兩部分人。一部分是失勢的、像趙紫陽這一派。他們總結出一條道路就是說，中國非實行自由民主、議會民主制度不可，而且中國一定要扶持反對黨。但是中國現在當權的權力階層，他們看到之所以“六四”會爆發這麼大一個事件，一方面不僅有老百姓追求民主的渴望和需求，另一方面是因為政治精英當時出現了分歧。政治精英的分裂導致民間跟權力的互動，形成了全國近億人的大規模的示威、而且是幾千學生的絕食。所以現在中共學了一個根本的經驗就認為，如果他們的權力層、大家沒有分歧的話，“六四”就不可能再次出現。所以我們就看到，中國的權力層第一建立了一個分贓的體系，就是每個人、每家的鍋底都一般黑。大家都是貪腐、魚肉人民都一樣多。這樣的情況下，大家都在同一條船上。他們要同心協力、要把這個體制撐下去。所以他們得出的一個經驗教訓就是要建立整個黨的內部團結的維穩體系。另外，習近平現在把這個維穩體系，又往一個新的高度去推了，把中國推向了一個“緊急狀態”這樣一個新的高度。也就是，中國現在的政治體制已經是一個緊急狀態體制。無論是從四川的地震、還是從西藏事件、還有新疆的各種事件以及天安門“六四”紀念等等，他基本上每天都把中國宣布進入緊急狀態。他就用緊急狀態這種措施進行抓捕、進行槍決、進行鎮壓。這恐怕是中國當前政治發展的一個最新的變化。

法廣：最近 25 年來，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中國已列位於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但是，人們所期待的更多的政治上的自由空間卻沒有實現。您認為，這主要原因是什麼？

夏明：主要原因有幾個：第一，中國政府結成了一個寡頭制，在阻礙民主化進程。而且習近平作為一個比較弱勢的領導，相對於鄧小平來說他不是一個鐵腕人物，往往弱勢領導更擔心船會翻，所以就會作出更強烈的反應來阻止任何自由化和民主化過程。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看到，短暫時間內，習近平對中國整個政治空間的打壓，在人權上的倒退，是非常明顯的。但我相信這是一個短暫的過程。另一方面，還有國際的大環境。我認為過去的 25 年，之所以中國的政治沒有出現民主化，其中最大的一個環節就在於過去 25 年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給中共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空間。因為過去 25 年，整個華爾街、全球資本在尋求市場、尋找廉價勞動力的時候，中國共產黨把廉價勞動力和中國廣大的市場其實是拱手給了全球的資本主義。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中國的經濟發展，應該說對老百姓的角度來說、對中國的生態資源、對中國未來的可持續發展來說，其實都是一種糟踏。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它的權貴，把這些機會、把中國老百姓的一些賸餘價值其實轉移給了西方的投資銀行、轉移給了西方的消費者。從而買得了西方大國對中國竊賊政權、暴力專政的政權一種容忍和接受。所以我覺得過去的 25 年，對中國民主化的最大的阻礙，我相信是西方各大國的漠不關心、還有就是西方各大銀行到中國去淘金。把中國做為一個取錢機、來分贓的一個原因。這樣的情況下，做為中國的民主化運動，它的阻力就非常巨大。但是我相信今天，這些阻力都在逐漸消失。因為我們看到中國在八方樹敵。不僅它內外交困、它跟周圍所有的大國、小國都在關係惡化。另外，中國現在已經開始對西方在華投資企業進行各種打壓和刁難，我們就看到在華企業的一個撤資潮。最近大量的美國資本基本上在撤離中國、進入墨西哥。所以我相信，未來對中國民主化阻礙性的因素，尤其是西方大國和西方資本，這些因素會逐漸消失。他們會變成中國政權最主要的敵人和批評者。

法廣：中國新一屆領導人習近平掌權以來，發起了大規模的反腐運動。似乎帶來了一些新的氛圍。在習近平執政期內，中國有否可能加速民主化進程？“六四”問題有否可能在短期內看到正名的那一天？為“六四”正名需要什麼樣的條件？

夏明：我覺得在習近平的治下，基本不可能看到對“六四”的平反。因為我剛才講過他把“六四”的負面資產變成了他的政治治理的一部分了。他變成了負面資產的所有人。但是，我相信在習近平的任期內，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完成他的任期，因為在中國目前政治各種變數非常多。習近平如果明天就面臨全民上街，我不會吃驚。但是他現在還有這麼多的資源，夠他去消耗、去維穩的話，他如果還能持續下去，持續幾年，我也不會吃驚。但是我相信未來“六四”的解決，已經不可能在中國共產黨手中完成了。未來“六四”的解決會成為中國民主革命的一個原因。“六四”的平反會成為團結中國人、激發中國人進行政治訴求的一個因素。我相信未來“六四”的最終解決，就會隨著中國專制體制的崩潰、這段歷史重新書寫。因為我們要記住：“六四”發生的那一天，正好是蘇東的第一個共產黨國家崩潰的那一天。1989年6月4號，當中國在北京開槍、在全國開始大屠殺的時候，波蘭的統一工人黨失去了他們的議會選舉。團結工會獲得了組閣的權利。所以我覺得89年的這一天，儘管中國沒有得到民主，卻給蘇東作出了許多貢獻；讓蘇東國家的民主化進程急劇地加速。我相信“六四”未來的平反、未來歷史的重新書寫、也會像波蘭六月四號發生的事情一樣，一定是以共產主義權力的終結、以民主政權建立為根本基礎的。

第九章：帝國的黃昏



9.1 “錢荒”帶來政權恐慌 (2013.07.04)

中共北京政府近年來對內殘暴維穩、對外飛揚跋扈，是因為它“不缺錢”。專門研究金融貨幣歷史的哈佛教授尼爾·佛格森也被財大氣粗的中國政府搞得有點迷糊，以至提出了“中美共治”的古怪概念：Chimerica（China 和 America 雜交成的怪物）。但不要忽視，佛格森在他的名著《金錢關係》（The Cash Nexus）一書中明確提出，一個世界政治、軍事大國的崛起和維繫靠的是金融權力。而金融權力來自於制度構建創造的制度優勢。以此觀察，當下中國正在爆發的貨幣金融危機實際上反映的是深層次的金融體系危機，它有可能引發全方位的政治制度危機。

強國的“權力正方”

佛格森提出了著名的“權力正方型”：一個強國的金融體系由四大支柱構建而成。首先，一個國家要有一個專業的稅收體系。其次，要有一個民主的代議機制來決定稅收和開支，並賦予政策和體系合法性。第三，有一套複雜完備的債券發行體系，包括財政系統、銀行中介、債務評級機構等。最後，要有一個獨立的中

央銀行來管理和監控債務和貨幣的發行，尤其是通過獨享的貨幣發行權獲得鑄幣收益，同時控制通貨膨脹。縱觀全球爭霸史，佛格森發現，法國屈服於英國、蘇聯敗給美國，無一不是基於這套“權力正方形”優劣較量的結果。

過去三十年來中國財富的急劇增加首先源於中國人生產力的解放和創造力的爆發。但我們也不應忽視“財富效應”因素。由於中國經濟的快速貨幣化和金融化，人們手中的錢增多了，造成財富增加的幻覺。比如，觀察中國經濟貨幣化的指標（“廣義貨幣量”占 GDP 的比例，M2/GDP），我們可以看到貨幣帶來的財富效應。在 1978 年，這一數字是 31.98%，到 2008 年已躍至 157.97%，到 2013 年已接近 200%（而同期美國只有 67%）。同時，全國樓市的總值已經超過 GDP 總值的 2、3 倍；而據說空置房的總值也超過了 GDP。正是在帳面財富增長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國政府像一個超巨型賭局的操盤手，把攫取之手伸進了社會，變著各種花樣，像抽水機一般汲取民間財富，滋養出一個巨型腫瘤國家。

“泰坦尼克號”的風險

與“權力正方形”的制度構建背道而馳，中共從未建立代議體系，直至今日憲政理念還遭受圍剿。“無代議、爛徵稅”成為中國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特徵。但在費、稅、罰款滿天飛的總體格局下，一方面又有農民不斷抗稅，以至中央政府在 2006 年廢除了農業稅；另一方面又有既得利益集團強力抵制征收房地產稅。對維持政府的收入，公有體制其實比稅收體系更重要。由於黨國對經濟的所有權控制，掌管債券發行的財政部和各級地方政府及融資平台缺乏透明度、公平性和責任心。中央銀行也沒有獨立性。如果說財政部是黨的財會，中國人民銀行就是個出納。

雖然整個國營經濟部門經歷了三十年的改革，“財政軟約束”

仍未擺脫，“財政硬約束”仍未建立。貪腐纏身而又缺乏效率的國有企業能在2008年後的“國進民退”中獲益，靠的是權力的後台和銀行的輸血。而中國的銀行儘管受到政治干預以至壞帳可能拉跨整個銀行系統，帶來銀行危機。但幾次威脅都是有驚無險，靠的是國家財政買單、國家資本管制和國有銀行壟斷盤剝居民存款的特權。黨國的所有體制不是通過部門責任實現優勝劣汰，提高制度效率和競爭優勢，而是通過層層的捆綁和背書，最後結成了一個巨型逐利共生體。猶如“泰坦尼克號”巨輪未能將風險分散化，最終導致滅頂之災，“中國號”豪華巨輪也把它終極安全押在了“大塊頭的優勢”上，而忽視正在到來的危機。不知不覺中，中國經濟巨輪正在撞上致命的冰山。

對於“泰坦尼克號”似的中共龐然大物，任何個人、區域的反抗或者具體部門和產業的危機都難以撼動它的根基。但它也有一個致命的弱點，那就是它對社會全方位的干預每天都在消耗它的資源（例如：軍費、維穩、公務員開銷、貪腐、面子工程、災難事故和汙染帶來的資源浪費，西藏、新疆、地下教會、法輪功和上訪人群的反抗）。既然任何資源都是有限的，而且其使用還受到邊際效益遞減的約束，只要有全方位的危機，黨國的政體安全恐怕不保。而近期銀行系統的流通性危機正是這樣一種全方位的挑戰。

下一輪金融風暴

十幾年前章家敦發表的《中國即將崩潰》一書和他的系列文章早已把下述結論闡述得家喻戶曉：中國銀行危機和由此帶來的金融風暴不可避免。在全球金融風暴後，中國金融研究權威尼古拉·拉迪再次警告中國面臨的諸多結構性失衡：增長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內需和民間消費疲軟甚至萎縮、能源和原材料的低定價、

生產能力過剩、房產投資出現泡沫、外匯儲備過大、金融體制繼續受到抑制、銀行爛帳和灰色信貸項目急劇增長，等等。但中國政府沒有理會“任何危機都不能被浪費”的道理，未能趁機借用外力動大手術，實現經濟內部結構的調整。相反，因為對政治安全深層的焦慮，政府大手筆投入四萬億救市，繼續加深了上述的不平衡。當美國經歷了“創造性的破壞”並在 2013 年後半期開始看到危機後的紅利後，中國經濟卻開始步入地雷陣。引爆全方位危機的正是房產泡沫的破滅暴露出灰色信貸項目的問題，引起資金鍊條斷裂、銀行流通性短缺，以此造成的民眾的恐慌、擠兌和攜款外逃風潮。它把現體制下得利最多、因而也最保守的有產階級拋進恐慌之中。

2013 年六月，中國銀行界進入動盪。首先市場傳出光大銀行向興業銀行拆借的 60 億元人民幣的資金出現違約。兩家銀行都出面否認。後有媒體“21 世纪网”報導稱，中國銀行違約，無法支付，資金缺口達千億規模。後來這一消息也被收回。中国工商银行在六月底的一個週末出現系統“癱瘓”，柜面取款、自動取款機、網上銀行、電話銀行等業務辦理均受影響，多個網點貼出“機器故障”的告示。一周內，銀行間互相借款利率從 4.8% 飆升到 13%，而最高曾到 30% 的高利貸利率。全國的股市因此受到重創，股災爆發。全球股市也跟著動蕩起來。

全球金融風暴後，中國的發展戰略更加側重亞洲，但現在從韓國到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新的一輪亞洲金融風暴已顯端倪。中國也寄希望於“金磚國家”共度難關，而印度、巴西、俄國也已進入經濟停滯、社會動盪階段。逃過 2008 金融風暴一劫、被世界看好的土耳其也出現社會動盪。2013 年上半年出現的經濟下滑是否也意味著中國在劫難逃？由於中國政府大規模掩蓋和扭曲政治、社會、經濟和金融信息，信息無效率使任何外界預測都沒有可靠基礎。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信息失靈是與金融風暴一樣的整體性

危機。如果二者惡性互動，必將帶來全社會的人群失向和心理恐慌。說到底，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都是由心理危機引發的。如果“吃喝嫖賭全報銷”都難以激勵各級官員為黨國分憂解難，現在要過緊日子，中南海的決策者不能不擔憂政權的未來命運。

9.2 布爾喬亞的美德 (2014.03.11)

中國城市的歷史可能有五千年之悠久。而在 2012 年這漫長的歷史經歷了最偉大的一次突破：城市居民（包括常駐的農民工）首次超過農村人口，城市化率達到 51.3%，中國從一個農民國家變成了一個城市居民為主的國度。

城市空氣使人自由

當中國城市居民正在被無處不在的霧霾困擾得喘不過氣來時，人們只會抱怨“城市的空氣使人窒息”。恐怕很少有人會想到，在人類社會政治經濟史上，城市最大的貢獻正是：“城市的空氣使人自由。”早在一千年前的歐洲，商業經濟帶動的城市革命瓦解了封建莊園經濟和中世紀專制體系。當時的農奴和依附的農民如果逃離莊園進入城市，就可以獲得自由市民權，成為自由的公民。中國幾億農民工雖然已在城市就業和安家，甚至他們的子女就是在城裡出生的，仍然無法獲得城市居民權，從一個角度折射出中國政治的中世紀階段特性。但令人樂觀的是，一波又一波的城市革命（最早從希臘的城邦革命算起）在西方造就出了以市場經濟

為基礎的自由民主制度，帶來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物資財富積累和教育文化藝術的繁榮，亦必然會被中國的市民階級再造。

但是，中國市民催生中華文藝復興、搶占市場經濟的制高點、引領民主變革的前提條件是“布爾喬亞美德”的養成，而後者又必須仰賴市民階級主體意識的強化。

布爾喬亞的定義和分類

說起“布爾喬亞的美德”，我們首先必須為“布爾喬亞”正名。對“布爾喬亞”最荒謬的理解無過於在中文中翻譯成“資產階級”。其實，前者來自於法文的 *Bourgeoisie*，講的是城里人；而後者更當是英文 *Capitalist* 的中文翻譯。美國學者迪爾德麗·麥克洛斯基 (Deirdre McCloskey) 在她的煌煌巨著《布爾喬亞的美德》(The Bourgeois Virtues, 2006 年) 裡是這樣界定的：“布爾喬亞是指從事體面職業的城市居民，他們或擁有自己的生意，或在他人的企業、機構（包括政府的和非贏利組織）管理層就職。”（第 85 頁）另一個常用的說法是“城市中產階級”，這裡的“居中”主要是針對享有特權的權貴集團（封建時代的世襲貴族、現代的權力精英）和從事體力勞動的藍領工人和農民而言的。

具體說來，布爾喬亞（或“城市中產”）又可細分為三類：上層中產主要包括公司銀行的董事會成員、大企業家和投資家等；專業人士和知識中產（受到良好教育和專業訓練的“創造性階級”）構成中間；小業主、小店主和公司白領又構成了“小布”階層。根據麥克洛斯基的研究，布爾喬亞群體在過去的五百多年的時間裡整合出了西方的倫理傳統，以“信、望、愛、義、勇、節、慎”七個主要價值觀演繹出一整套價值體系，來規範市場經濟和行為，創造出物質和精神的雙重文明。

反資的斯大林、毛澤東

布爾喬亞美德的價值和魅力很容易從它的反對者和圍剿者那裡看到。在二十世紀，反人類的罪人斯大林、毛澤東、波爾布特和霍梅尼用血與火的手段和犧牲百萬、千萬的生命試圖剷除布爾喬亞美德。鞋匠兒子斯大林對蘇聯最偉大的理論家布哈林的處死，對思想家托洛斯基的暗殺，和對蘇聯最偉大的音樂家肖斯塔科維奇的迫害，與保爾在冬妮婭面前自卑後自狂表現出的是同一症狀：底層人物對雅文化的恐懼和拒絕。農民家庭出生的毛澤東儘管坐上了紅色的龍亭寶座，但也時常局限於從染上性病卻又不治療的下體找到娛樂的辦法。他除了把幾千萬的窮人變為餓殍外，還把上百萬擺脫了肚皮飢餓的困擾而開發了心智的布爾喬亞趕盡殺絕：留過洋的“紅色公主”孫維世被他姦汙而後被處死，大上海影星上官雲珠被他霸占而後忍辱自殺，他的老婆、上海二流影星江青也被他搞得瘋瘋癲癲、最後不得好死，等等事例，不勝枚舉。最能表現毛痞子性格的還在他垂涎國家主席劉少奇年輕美貌的妻子，最後在“大革文化命”中動員暴徒以旗袍、項鍊、高跟鞋的裝束來惡搞王光美。毛支持的紅色高棉頭目波爾布特在柬埔寨也是濫殺無辜，尤其針對受過教育的作家、教師、醫生和工程師，最後搞得國家死掉上百萬（至少四分之一的總人口）、專業人才屈指可數。

但布爾喬亞的美德畢竟順天承運，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當今中國，儘管習主席 / 習總書記 / 習主任還沒有完全擺脫“蕨菜、炒肝、肉包”的重口味，畢竟他的夫人又穿戴上了旗袍、項鍊、高跟鞋，而且他的千金也遠渡重洋來到布爾喬亞的文化教育中心哈佛大學濃金重抹。這與土豪陳光標揣着剛從垃圾堆裡刨出的銀子到資本主義首都紐約來顯富檔次要高得多。馬克思講過，金錢無臭味。金錢是天生的平等派。從廁所裡、從垃圾堆裡、從

古墓裡或從銀行國庫得到的錢都是等值的，但畢竟美國已經富裕三代以上的富人還持有遠離“偉大的蓋茨比”的美德，而更願模仿低調的比爾·蓋茨，用金錢來追求後物質主義的價值。

“沒有布爾喬亞，就沒有民主”

因為布爾喬亞追求的自足其實只是保障自由的物質基礎，所以自治和自由成為了布爾喬亞更加看重的價值。對布爾喬亞來說，自由不僅意味著擺脫肚皮的奴役，也意味著擺脫暴政，獲得追求個性、超越性和神性的權利。他們勢必成為近現代政治轉型的動力，倡導“生命權、自由權、和財產權”。所以，巴林頓·莫爾會在《專制與民主的社會起源》一書中斷言：“沒有布爾喬亞，就沒有民主。”

面對上層的暴政和下層的暴民日漸形成的兩極分化政治的惡性循環，中國的城市中產階級除了積極擔當，幾無別的選擇。中國知識分子作為新興的布爾喬亞階層的精神領袖，已經踏上歷史舞台，成為推動經濟自由、創業自由、信仰自由和結社自由的領軍人物。新世紀後中國的維權運動、“零八憲章”運動、人大獨立候選人現象、新公民運動、民主黨組黨運動，以及形形色色反強拆、爭環保、抵抗“洗腦”、組辦家庭教會、通過微博推特參政議政，都是中國布爾喬亞主體意識成熟的表現。香港市民組織的“占領中環”和意見領袖倡導的“城邦革命”，又是一個更加成熟的市民社會在已近黃昏末日的暴政前所展示的創造力和獨立精神。

在中國的地平線上，一場社會、政治大較量正在展開：“土”對“洋”，“恨”對“愛”，“粗俗”對“雅緻”，“反憲政”對“民主憲政和普世價值”，“封閉保守”對“開放和全球化”，“黃土文明”對“藍色海洋文明”。究竟以追求“真、善、美、聖”為終極目標的布爾喬亞階層能否取得歷史性的勝利，我們只要注意觀察，是不是越來越多的人願意認同和實踐布爾喬亞的美德。

9.3 吃喝拉撒皆有道

(2014.05.09)

中國剛踏入城市人口占多數的城市化社會，所以不得不面對兩大現實（或曰“國情”）：第一，“農民中國”和“城市中國”兩大板塊正處於摩擦、角力的衝突高峰期；第二，即便在“城市中國”，“城中村”和“城裡鄉下人”的慣性思維和行為習慣還依然是強大的殘留物。

“吃喝”壓倒“拉撒”

幾千年以來，農民中國發展出自己一套根深蒂固的價值觀和審美體系。當今的中共領導基本還在這一框架裡不能自拔。“中國夢”所許諾的“小康社會”也基本沒有超越在吃喝飢餓定律限定下的“肚皮的暴政”和“民以食為天”的低層次需求。當今“崛起的大國”中國其實是如此的貧乏，它的領導人除了關心“吃喝的政治”、明白了“發展是硬道理”外，還無暇思考“拉撒的問題”，以致，農村人到城市裡不懂“不隨地大小便”的基本道理。例如，有小城鎮人到沿海大城市，會在地鐵、電梯和花園隨地方便。一些內地遊客到香港、台灣也會如此。甚至一些已成規模效應的

中國遊客到外國旅遊景點也會隨地汙染、信手塗鴉、高聲喧嘩，做出各種令同胞汗顏的不文明舉動。中共“吃喝政治壓倒一切”，忽略了“拉撒政治”，“醜陋大陸人”的形象（我們不排除誇大之嫌）已經引發了各種社會衝突、族群衝突和甚至可能催生國際政治危機。

近來互聯網和各種社交媒體上瘋傳各種大人小孩隨地便溺的圖片和視屏，引發了一場多方大戰：大城市對鄉下人，港台對陸客，外國公眾對中國人，明裡的口水仗、當街對陣叫罵；暗裡的嚼舌頭、傳閒話。至此，我突然明白了《莊子：知北遊》中所說的，“道無所不在”：“在螻蟻，在稊稗，在瓦甕，在屎溺”。

李光耀調教新加坡人

人體汙穢和排汙遠離人們的五官感覺是現代城市文明的產物。但我們無須諱言，現代城市人在汽車尾氣中呼吸，很難說就不比鄉下人呼吸的糞香更危害健康。每次從歐美來到香港，你都會感到香港尾氣汙染的強刺激。可以說，城市人對鋼筋水泥叢林裡的汙染習以為常，等同於農村人鍾愛空氣中瀰漫的糞肥飄香。

在中國農民文化里，有著一種尿尿的崇拜情結。最早在七十年代初我就聽說童子尿是“金汁”，因為一位退休的小學校長一大早就端著一個杯子要我們男孩子給他尿尿。據說，童子尿有醫治跌打損傷等諸多特效。後來，學校要強迫城市學生學工、學農，我們被迫收集糞肥，堆在校園裡，然後再一畚箕一畚箕地端到鄉下、倒進田裡。學農的目的是要我們對比田間勞作的美、小資情結的醜，認知糞肥與香噴噴的大米飯之間的密切關係。再後來，改革了，民眾生活水平提高了，我們也就在屏幕上看到張藝謀在《紅高粱》裡撒上一泡尿，釀出的上乘高粱酒。等到我進入中國研究的堂奧後，遇到一個常用詞彙“夜土”（Night soil，“金肥”是另一優雅稱法），

對於中國農民來說，糞肥的寶貴可見一斑。甚至在城市化程度較高的香港，半個世紀以前，“倒夜香”也是市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如廁”當然也是城市文明進化的一部分。作為農民的兒子，毛澤東在延安時期是不喜歡上公共廁所的。據毛的衛士李銀橋回憶，一旦有生理需求，毛會向他交待：“我要解手，你扛一把铁锹帮我挖坑。”該衛士曾問道他“为啥不在厕所大便呢？”毛回答說，“我嫌它臭。”衛士注意到，“可是，我见你跟老乡聊天时用手捏碎糞肥，拍拍手又拿烟抽，你可没嫌臭呀。”毛回答說：“此一时，彼一时也。”毛還透露，“拉屎的时候正好想事情。”由此可見，拉撒時刻影響了毛的哲學思維和中共的決策制定。

六十年代獨立後如何改變國民的如廁習慣讓新加坡領導人李光耀傷透了腦筋。李光耀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他們原本住棚屋，要方便，不是在地上挖個洞，就是到放在屋外廁所的木桶去解決。如今搬進了現代衛生設備的高樓，他們的習慣卻沒有改變。”據說，新加坡曾在廁所裡裝上監控器，以便截獲和懲罰那些占蹲在坐式馬桶上或便後不衝水的“不法之徒”。通過這樣的“保姆之邦”，新加坡建成了“城在花園中”的國家。也正是在李光耀的建議和督促下，中國政府在八十年代從人民大會堂撤出了無處不在的痰盂，視煙如命的鄧小平開始有意識地以身作則，不隨地吐痰。

張藝謀：撒泡尿具有革命含義

總之，吃喝拉撒皆為大事，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時代發展出各自的文化傳統。至於孰是孰非、誰對誰錯，完全視發達與落後、城鄉、內地沿海、不同職業和身分而定。但隨作城市化、全球化的發展，我們就必須思考何種傳統要保持、何種美德要養成。又如《莊子：知北遊》所說：“調而適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

白話說來就是，“調和順應，便是德；隨機適應，便是道。”可見，入鄉隨俗，進城循規。城鄉之間、港台和內陸之間、中國和外國之間都需要有一個相互學習、相互適應的磨合過程，民眾能明白私人空間和公共空間要求不同的行為規範，大家不僅應該做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更能發育出敏銳的道德情操，以美麗、高貴、優雅為舒適。

但如果我所討論的吃喝拉撒之道只是停留在道德層面，顯然就會浪費我的政治科學訓練。我必須說，這裡的大道理還涉及政治。連張藝謀在二十多年前都認識到，撒泡尿具有革命含義：“喝了咱的酒，見了皇帝不磕頭。”從孫悟空大鬧天宮、在如來佛手心上撒尿、並留下“齊天大聖、到此一遊，”我們就已經看到撒尿作為反抗方式在中國文化中已經浪漫化和神聖化。反觀過去三十年的大陸、港台互動交通，前十五年港台商人到內地四處撒尿播種，不能不說與後來十五年陸客到港台發洩有一定的因果報應。但不可否認，在大陸專制體系愈發橫行霸道試圖顛覆港台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時，港台同胞痛感“北京撒尿撒到頭上了”。正是這樣的羞辱和憤懣才會讓“金汁”和“金土”引發出涉及愛國主義、殖民主義和祖國分裂的大辯論（或者曰“大便論”）。

從港台的角度，我們來重讀五十多年前中共領導毛澤東寫的《送瘟神》一詩。如果任其“一國兩制”變為糞土，港台同胞真有理由擔心，他們會誦唱《迎瘟神》：“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遙看一千河。”

9.4 2014: 你有離岸船票嗎？

(2014.02.06)

在 2008 年西方世界陷入歷史上最大的金融風暴後，好萊塢推出了一部有關災難末日的大片《2012》。意味深長的是，西方主要大國和中、俄的政治權勢精英、經濟寡頭早已暗中做好大撤退的準配，利用職權或花上天價預訂好了最後的方舟的包房。為了迎合中國大國崛起的炒作，延續人類文明最後的四艘方舟是“中國製造”，而且隱藏在西藏的山谷。

危險的不確定性

人類文明挺過了“2012 年”的末日，發達國家也逐漸走出了 2008 年的金融風暴。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過去幾年自以為逃過一劫，甚至認為自己的體制和模式都勝過西方的新興市場國家，包括“金磚五國”，都已開始走低。摩根·斯坦利甚至認為，“金磚五國”時代已被“脆弱五國”（Fragile Five，土耳其、巴西、印度、南非和印度尼西亞）所替代。社會抗議和危機在巴西、印度、土耳其和烏克蘭等重要新興市場都已出現。隨著美聯儲退出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巴西、南非、印度、阿根廷等國的貨幣大幅度下跌。

儘管這些國家的中央銀行立即調高利息率，試圖穩定儲戶的信心，但資本逃離脆弱市場，美元回籠美國或發達國家市場已成定勢。

2014年與一百年前的1914年相類似，成為世界政治經濟危險的一年。而危險的主要因素都與中國有關：首先，中日關係繼續惡化，兩國都已出現戰爭叫囂。如果雙方不能在馬年懸崖勒馬，中日衝突勢必帶來中國與西方三連環聯盟（美日軍事聯盟、美國與歐洲的北約軍事組織、美澳新軍事同盟）的全面對抗。其次，中國經濟發展減慢，地方政府債務和影子銀行隨時可能爆發危機，在國內貶值而在國際升值的人民幣可能出現國際國內同時貶值，帶來通貨膨脹危機。最後，中國社會危機已經積重難返，大爆發的可能性每天都在增加。

由於中國政府全面操控信息機制，中國社會、經濟都已喪失信息效率，普通的廠商、消費者和民眾基本都是在有限的理性條件下，甚至是在非理性的狀態下做出決策選擇。所以中國未來的最大危險來自於其不確定性。那麼，誰對中國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掌握最全面的情報信息呢？我們有理由相信，由黨的政工系統、宣傳系統、國安、公安、總參、外交部、新華社和線人構成的告密系統每天都在向中共決策中樞輸送敏感信息。中共權力機構不斷集中化，打造維穩機制、國安決策機制、信息控制天網、大外宣戰略等等，都是想強化中共內部信息效率。在黨國壟斷和操控信息，而民眾和社會信息閉塞扭曲的對比下，我們只能通過解讀他們的行為模式來破解他們占有而我們不知道的關鍵信息。

中共權貴的諾亞方舟

常言道，行為比美麗的言辭更能說明問題。當中共最高領導人在給中國人許諾“中國夢”時，當許多中國人還耽溺於“蕨菜、炒肝伴大包”時，黨國的權勢寡頭們早已瓜分完中國國民經濟的

盛筵，攜贓款而逃了。

根據總部設在美國的獨立新聞組織“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在2014年一月發布的報告：該組織獲得了總部設在新加坡的保得利信譽通集團(Portcullis TrustNet)和總部設在英屬維京群島的聯邦信託有限公司(Commonwealth Trust Limited)兩家公司的秘檔，發現它們服務的22,000多家的離岸公司客戶的註冊地址來自中國大陸和香港。在經過全球幾十家通訊社和報社五十多名記者初步梳理後發現，至少有十幾家“紅色家族”在所謂避稅天堂的離岸金融中心持有秘密資產。他們包括：習近平的姐夫鄧家貴、溫家寶的兒子溫雲松和女婿劉春航、胡錦濤的堂侄胡冀時、李鵬的女兒李小琳、鄧小平的女婿吳建常、王震的兒子王之、王軍和孫女王京京等。國際調查記者同盟獲得的秘檔還顯示，中共“八大元老”之一彭真的兒子傅亮在1997年至2000年間，至少註冊有5家BVI(英屬維京群島)公司。騰訊創始人、全國人大代表馬化騰和騰訊另一名創始人張志東也持有離岸公司TCH Pi。全國人大安徽省代表、國企銅陵有色金屬集團董事長韋江宏，於2006年在英屬維京群島註冊成立銅冠資源控股有限公司(Tong Guan Resources Holdings)。中國女首富楊惠妍、SOHO中國創始人地產大亨張欣也開設了離岸公司。天獅集團董事長李金元還是7家BVI公司的董事。

由於離岸金融中心註冊公司簡便、便宜，還提供單人公司註冊、客戶信息保密等服務，往往成為藏富、避稅和洗錢的天堂。具體到中國用戶，主要用於國有資產流失到私人名下、轉移贓物、母公司合資公司間的財務手腳、鑽進出口稅收的空子、假外資利用經濟特區和出口加工區的優惠政策等等。其實早在2003年，中國官方《人民網》就已報道，在英屬維京群島註冊的離岸公司中有20多萬家與中國有關，因此十多年前通過設立離岸公司來實現避稅等目的已成普遍現象。但由於中共的官員和國企高管以及

他們的家屬等通常都有多份護照、使用不同化名、以及拼音轉回漢語的困難，国际调查记者同盟還無法把絕大多數的離岸公司的所有人梳理清楚。尤其除去維京群島外，香港、新加坡、倫敦、紐約、迪拜、法蘭克福等地都有離岸金融中心的服務，我們所知道的中共權貴離岸現象只能是龐大冰山的一個小角。但即便這個小角已經揭示出了一個大道理：中共權貴無祖國。祖國已經成為中共權貴和寡頭的犯罪現場，他們亟需轉移贓物、做到金蟬脫殼，所以海外各種離岸金融中心就成了他們最重要的天堂去處。和好萊塢的想像正好相反，對中共權貴來說，他們的諾亞方舟儘管用的是中國原材，但卻是由國際跨國銀行和理財公司打造，停泊在加勒比海的。

什麼都不是的百姓

中共的宣傳機器曾以威逼的口氣告訴它的人民，“沒有了祖國，你們將什麼都不是。”此話道出了兩個赤裸的現實：由於中共建政六十多年一直實行高度集中的外匯計劃管理體制，儘管許多個人和企業賺取了不少外匯，但全部被國家外匯管理局強制收購，外匯配額申請和使用受國家金融機構直接監管。也就是說，中國的國家政權積聚了世界上最大的外匯儲配，為中共權貴提供了最大的流通性，保證了他們充足的盤纏可以隨時棄國而逃。其次，中國老百姓既沒有國外定居權、又無海外帳戶和離岸公司，一旦中共政權崩潰，銀行里存的人民幣救命錢，要么會急劇貶值，甚至會成為廢紙。中國的百姓真會什麼都不是。

中共現在還在高調反腐，但面對海外媒體揭露出的中共高官驚天的腐敗現象，官方的發言人洪磊不是感激笑納，而是質問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居心叵測。對許多國家和政府來說，媒體曝光是在幫政府做善事。只有中國政府會認為媒體成為了更可惡的敵人。

中國政府又居心何在呢？他們當然有一個深深的恐懼：如果中國人明白了現實中國在一代人不到的時間裡，已經被中共權貴把資源掏空、經濟瓜分、人心汙染，現在已開始走人；而眾生是無緣搭船離岸的，那中國人就會造反。

中國人已經過完 2014 年新年，又開始操心購買返鄉的車船票了。但每一個中國人應該抽空想一個更大的問題：你有離岸的船票嗎？

9.5：周永康：劫後天府毀證忙 (2014.10.09)

中共前政治局常委、“政法沙皇”周永康在北京百盛商場與央視女主播葉雲春玩完車震，他的最後一滴權力燃料也就耗盡。兩天後周被雙規，爾後被交送司法機關面臨審判。周的垮台引發了四川官場大地震。中紀委派出 300 官員進住四川，近萬名各級官員受到牽連和查處。四川官場原來是一個特大的政治“豆腐渣工程”。而這一個“豆腐渣工程”為我們解讀 2008 年汶川大地震震出的校舍豆腐渣和以後的瘋狂粉飾提供了答案。

一個特大“政治豆腐渣”工程

如果說狡兔三窟，有“百雞王”之稱的周永康為自己打造了無數處養雞掏蛋的窩。以北京為最高點往下俯視，他至少可以看到兩條線：“黑金”石油系統、“刀把”政法系統。他還可以看到三大片：關外的發跡地遼寧、老家的江蘇和西南的天府四川。中國《財新》雜誌的深度調查報告《周永康的紅與黑》顯示：“與周永康一起倒下的，是一個貪腐集團——從已公布的調查進展來看，至少包括兩名十八大中央委員、兩名候補中央委員、三名副

省級以上高官，數百名公務人員、國企和私營企業負責人，以及周永康的絕大部分近親屬。”

從 1999 年到 2003 年，周永康出任四川省委書記。綜合歷史、地理、政治、軍事、戰略、經濟、民族和人口等多方因素，四川可以說是中國最重要的省份。由於它還有“天高皇帝遠”的地緣政治優勢，經常成為野心政客打造一方獨立王國的天府。“四川、石油、政法”是周氏“紅頂黑金王國”的一點兩線。作為四川的封疆大吏，周永康當然不會放過耕耘收穫、封妻蔭子的大好時機。我這裡並非只是在做文學論述，而是事實描述：正是在四川任職期間，周永康設謀暗殺原配發妻王淑華，甩掉黃臉婆，重做新郎官，娶佼續弦，央視女主播賈曉燁升堂入室。他的兒子周斌更是把天府良原變成自己的自留地。據媒體報導：在中國尤其在四川，周斌的生意涉及水電、石油、採礦、旅遊、房地產投資等，其商業帝國的價值以億萬計。

周也把他的親信帶到四川，在他到北京擔任公安部長後也留下他們繼續收割。周永康的四川兄弟圈顯著人物包括：省委副書記和成都市委書記李春城、省文聯主席和原副省長郭永祥（周從石油系統帶入四川的秘書）、原省委副書記和省政協主席李崇禧、冀文林（周的秘書跟隨他從石油系統到四川再到公安部，最後升任海南副省長）、原四川綿陽市委書記而後任海南省副省長的譚力、以綿陽為大本營的黑社會集團劉漢、劉維兄弟，等等。“二李一郭”三人組是其核心。

周氏川幫掌控喉舌

又據《財新》披露，李春城在成都成立了幾十家政府融資平台公司，在城投、城建、土地、旅遊等領域通過權力瘋狂尋租。在 2000 年後四川的水電大開發時期，劉漢、周斌都加入“跑馬

圈水的浪潮”，尤其得到分管水利的副省長郭永祥的眷顧。在汶川抗震救災過程中見到胡錦濤頓時滿面春風而有“譚笑笑”臭名的譚力，在綿陽的政績也被概括為“喜歡搞面子工程，撈錢不遺餘力”，尤其是其妻插手市政綠化工程獲利。後來劉漢、劉維兄弟等36人被控15項罪名，涉及組織和領導黑社會罪，被判處死刑。起訴書稱，該黑社會集團在四川省成都、廣漢、綿陽、德陽、什邡等地稱霸一方、形成地方和行業非法控制，還拉攏和腐蝕國家工作人員尋求保護。三名政法官員因為官黑勾結一起被起訴：原德陽市公安局刑警支隊政委劉學軍和裝備財務處處長呂斌、原什邡市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劉忠偉。曾引發大規模騷動和抗議的四川彭州的聚乙烯和煉油廠家開發項目也是周家在四川的利益鏈條上的一環。

周氏川幫在宣傳系統的勢力也很可觀。有媒體披露，主管宣傳的常委李長春有遼寧背景，他與李春城還有哈爾濱軍工大的校友關係，在四川地震中，宣傳口的配合是及時到位的。儘管當時的媒體也經歷了大地震，官方媒體對災情的報到要快速透明得多，但2008年6月2號，李長春攜帶胡錦濤指示赴震區德陽貫徹對媒體的收緊措施。當時我和《劫後天府淚縱橫》的攝製組正好在德陽，由于風聲很緊，我們計劃拍完“六一兒童節”紀念死難學生的活動就鳴鑼收兵。但当天我們攝製組五人就在成都被從德陽趕來的警察扣留，並經過大半夜的審訊記錄後，被立即驅趕出境。可見，政法、宣傳兩條線合作得天衣無縫。

也一點不奇怪，後來四川省委書記劉奇葆升任中宣部部長和書記處書記。譚力升任海南宣傳部部長和副省長。成都市宣傳部部長何華章升任遂寧市市委副書記和市長。在宣傳機器的吹捧下，為了掩蓋震區校舍的“豆腐渣工程”，更推出了“劉漢希望學校”巍然屹立的正面樣板。四川省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宣布，近七千所垮塌受損的學校，沒有一所是因為質量問題所致。以致周永康四川權錢網要員、幫助周斌攬得大渡河許多電站工程的雅安市委書

記徐孟加在汶川地震後仍然以 7 級抗震標準建設施工，結果 2013 年雅安蘆山地震，再次出現豆腐渣工程。

“太子黨”藏金香港

據此，我們不難悟出，四川汶川大地震後，由於胡錦濤的怯懦無能、溫家寶的華而不實，在借助軍頭徐才厚和郭伯雄的幫助後，周永康和李長春的政法、宣傳兩大系統在四川震區化腐朽為神奇，一方面掩蓋了他們在四川政壇和經濟領域腐敗尋租的汙泥濁水，另一方面還欺世盜名、彈冠相慶，繼續升官發財。六年多了，四川震區失去子女的可憐父母至今無法為他們的孩子討得公正，原因就在於：四川的校舍“豆腐渣工程”是中國政治“豆腐渣工程”的一個表徵。

周永康的權力利益網絡當然還聯到了海外，聯到了美國，而香港就是他們在海內外資本市場圈錢、然後離岸的天堂。例如，1999 年，中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組建，周永康的親信蔣潔敏（後來的國資委主任）出任董事兼副總裁。第二年，該公司股票在香港證交所和紐約證交所掛牌，立即躋身世界石油大公司十強行列。周家包括子女親家在海外都賺得盆盈鉢滿。

從四川到香港，給我們理解北京對待“占中”的強硬打壓政策不是有很多啟發嗎？自從 1980 年中國建立沿海經濟特區和 1992 年鄧小平“南巡”，香港就成了太子黨的金屋藏嬌之處，是中資國營和太子黨壟斷的金融、保險、貿易等抽取大陸財富的工作站，權貴寡頭財富打包離岸的樞紐。從習近平到溫家寶，從鄧小平到各元老，在香港都是盤根錯節、根深葉茂。香港“站中”動的必然是太子黨們的奶酪，危及的是“中國夢”的政權豆腐渣工程。所以我們可以肯定地說，習近平儘管打掉了大老虎周永康，但並不會重訪、清理四川的“豆腐渣工程”，因為他的男兒志向就是

要力挽黨國於危難之中。同樣道理，習近平更不會對香港學生讓步，因為，“傘花革命”觸及到了“大國崛起”虛幻下的中國模式豆腐渣工程！如果香港特首不再是同惡相助的梁正英，誰又來為“太子黨”在香港守金庫呢？四川的學子和香港的學子儘管時世相隔，不幸都成為了同一豆腐渣工程的犧牲品。

9.6：中國變局：評估和預測 (2015.01.20)

人首先是社會動物，其次，人又是政治動物，同時還是經濟動物。但把我們與動物分別開來的根本特徵是，人是思想動物。我們時刻都在觀察社會、政治、經濟環境，承擔個人責任和履行各種角色，來實現對安全、福利和榮譽的追求和最大化。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決策者，在微觀、中觀和宏觀不同的層面上，不斷進行評估和抉擇。為了服務所有決策者，在此，基於我在本書中的個案研究，我試圖完成一項綜合，在總體上對中國的政治、社會大環境做出近期和中期預測。

時間軸：2008-2018 年

我這裡的評估和預測涵蓋的時間是2008-2018年的十年間斷。未來三、五年的政治、社會走向其實都是由過去七年的治理體系結構性變化、民眾個人行為和精英層戰略選擇決定的。

為什麼我要以2008年為起點？隨著時間流逝，未來將不斷證明，2008年是中國21世紀最重要的一年，也是中共歷史上由盛轉衰不可逆轉的一年。多事之秋的2008年出現的各種政治事件也

為未來中國變動的模式、動力機制和追求方向提供了模板。後來幾年的重大政治事件基本都遵循 2008 年的模式進行演繹。

2008 年的變革模式包括：

（1）災變。當年一月的南方“雪災”、五月的“汶川大地震”都帶來了社會危機和促成了社會抗議（明顯的是震災地區父母抗議“學校校舍豆腐渣”）。民眾對政府的執政能力產生懷疑。以後的青海玉樹地震（2010）、甘肅舟曲泥石流（2010 年）、四川雅安蘆山地震（2013）、雲南地震和大火（2014 的魯甸和香格里拉）等等都成為社會衝突可能的起爆點。

（2）少數民族起事。西藏拉薩的“3.14”事件反映出中國邊疆地區的不滿和對未來中國版圖完整的挑戰。新疆的“7.5”事件（2013）、昆明火車站和湖南長沙的維人砍殺事件（2014 年）、藏人自 2009 年以來的 130 多起自焚事件等等都成為威脅中共統治的敏感事件。

（3）經濟危機引發社會政治動盪和變革。2007 年美國的次貸危機、在 2008 年爆發西方全面的金融風暴和經濟危機給以出口為導向的中國經濟帶來衝擊，企業開工不足和大面積破產帶來的幾千萬民工返鄉，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問題。尤其是農村的矛盾和不滿在國家“圈地賣地”財政的壓力下受到更大的刺激，成為農村“群體性事件”的溫床。

（4）自由派啟動的民主轉型。當年 11 月由劉曉波、張祖桦等人發起的“零八憲章”運動提出了全面轉型中國專制政體的民主化方案，為中國的未來提供了以自由民主為理論基礎的全方位願景，也為反對黨替代共產黨提出了系統的預案。劉曉波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成為自由主義陣營的一面旗幟。以後出現的“茉莉花革命”和中國政府的大搜捕、艾未未的行為藝術、維權人士被鎮壓（例如陳光誠出逃和闖入北京美國大使館）、許志永的“新公民運動”和被鎮壓，以及 2014-15 年在香港的“占中運動”和“傘

花革命”都可以看成自由民主運動的繼續。

(5) 共產黨內部高層的權力爭鬥，尤其是“新左翼毛派”的政變企圖。2007年年底薄熙來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赴任重慶任市委書記。2008年他以重慶為基地，提出“重慶模式”，用“唱紅打黑”等形式，開始以“新左派”領袖自居，試圖在未來政治接班過程中賭博一把。以後王立軍出逃成都美領館、薄熙來和妻子谷開來被捕受審入獄、周永康集團在習近平“蒼蠅、老虎一起打”的反腐中被端掉，等等，都是中共內部“左翼毛派”與習近平的權力衝突

(6) 政府“面子工程”勞民傷財帶來帝國的過度擴張而衰落。北京奧運會以官方投資420億的總開銷超過以往所有現代奧運會開銷的總和，是中共黨國在合法性欠缺的情況下採取的一個補救，但成本代價卻是耗費過去三十年經濟的積累，並留下了許多“白大象”工程。第二年的上海世博會，以後的亞運會（廣州2010年）、世界大學生運動會（深圳2011年）等等，無不大把撒金，只顧黨國的虛榮，無視百姓的民生。而大工程後面的貪腐帶來了更多的突發危機，例如，高鐵在溫州發生的事故（2011年），等等。

(7) 社會突發事件引起“蝴蝶效應”，促發無序的和不可預測的社會騷亂。在“7.1”中共建黨日，“刀客”楊佳隻身一人闖入上海靜安公安局辦公大樓，刺殺十來名公安幹警，造成6死和5傷。九月份，“三鹿毒奶粉”事件曝光，30萬人受害、幾千嬰孩發病、6名死亡，不僅引發父母抗議行動，也讓中國人對本國產的食品產生全面懷疑和憂慮。以後出現的“地溝油”事件、出口日本的“毒餃子”事件（2008-09年）、“蘇丹紅”事件（2011年）、出口美國的有毒玩具、含毒寵物食品（2012年）等等，都使中國品牌的食品在全球喪失聲譽。2015年上海外灘新年（除夕夜）發生的人群擁擠踩傷、踩死上百人惡性事故，也引發了官場地震。其後續還在演繹，並可能成為政治和社會危機的引爆點。作為世

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中國城市化程度已經超過 50%，城市公共安全危機還會加速到來。

（8）中國與國際環境的摩擦增加，中外還在加深的相互不信任成為未來危機的根源。無論從奧運火炬全球傳遞受阻，還是拉薩事件，還是王立軍、谷開來，還是向海外出口有毒產品，還是諾獎得主劉曉波被惡判，還是中國遭遇金融風暴，都顯示出中國與國際環境密不可分。在過去的六年時間裡，“茉莉花運動”、“占領華爾街”、維基解密和斯諾頓事件，都給中國政府帶來了預想不到的危機。在改革初期有力的國際環境逐漸變為更不友善、甚至帶有敵意的國際環境。國際資本對中國的博彩已接近尾聲，資本流向（中資和外資）大勢是遠離中國，走向歐美和印度、墨西哥和巴西為首的發展中國家。中國與西方國家、中國與日本、中國與鄰國（尤其是東盟國家和印度）的張力都成為中國政治中的強大變數。中國與以美國為首的盟國（北約和亞太聯盟）的軍事衝突可能性在急劇增加。

習近平能否完成第一任期？

由於有上述各種變數，中國國內有地位非常高的“太子黨”代言人認為，胡錦濤和溫家寶時期在玩“擊鼓傳定時炸彈”的遊戲。爆炸隨時可能發生。習近平上台後有沒有撤出“定時炸彈”的引子？一方面，習近平以強勢領導人的姿態出現，似乎給人們一種變革希望；但另一方面，習近平又在國內四面出擊、在國際上八方樹敵，招致對他權力的抵抗和耗損。由於習近平既清洗以薄熙來為代表的“新左派”，又大肆抓捕自由派知識分子和網絡意見領袖；既對精英層貪腐官員展開“派系清洗式反腐”，又對草根上訪群體進行無情打壓，所以我們無法認定除去維護自生的權力以外，習近平還有何種實質性的、綱領性的新政。民眾和知識精英對他

的期盼和認同已經急劇下滑。面對官員的抵制和可能的反抗（甚至以軍事政變的方式出現）和民眾的叛離，我們很難肯定習近平可以穩坐高位、完成兩屆任期。

第一：當下政治和政治大環境的主要特徵和走勢

我們可以從意識認知和理念、制度、政府官員人事、反對派勢力、國際政治力量五個層面來分析。

第一：在結束毛澤東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革命激進主義意識形態後，中國經歷了鄧小平的實用主義階段，江澤民的帶有國際意識的功利主義階段，和胡錦濤的帶有狹隘本土意識的合作主義階段。在習近平任期內，曾經淡化的意識形態重新凸顯，專制權力意志惡性膨脹，中共進一步擁抱仇外的、進攻性的民族主義，提出“大國崛起”、“北京模式”、“中國夢”、“中國獨特性”、“美國危機”、“西方衰落”、“中國世紀”等核心概念，在全球化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中，推出極權主義的價值理念和政策實踐。通過“援外”、“投資”、“大外宣”和“孔子學院”等各種方式，試圖搶奪國際輿論話語權，批量生產“定制的現實”（mediated reality）、隔絕中外信息的自由流通，對國民進行“洗腦”，灌輸極權主義的價值觀。中國人，尤其是89年天安門屠殺後出生的青年人，對外部世界抱有強烈的“自卑-自大情節”（Inferiority-superiority complex）。

第二：作為“太子黨”、“紅（官）二代”的代表人物，同時依仗中國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的塊頭和資源，習近平的權力意志擺脫了鄧小平時代“文革”創傷留下的陰影，在“中國奇蹟”的支撐下急劇膨脹。他在整合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後，更是把黨國永遠壟斷權力的政治意志推向絕對化。中國政治體制更趨向專制，決策體系權力集中到個人。習近平已經成功地發動了一次“憲法政變”，顛覆了82年憲法的總理向人民代表大會負責、國家元首作為虛位的集體領導制度，通過建立委員會（尤其是國家安全委

員會），習近平實現了“委員會治國”的模式，甚至讓人大、國務院和書記處都被極度削弱。政治體制走向“緊急狀態國家”。在不斷扭曲外部世界、誇大中國面臨的外部敵視、強化國內的敵人意識的宣傳下，國家元首獲得了更多的權威和自由裁量權，有限任期制（不超過兩屆，共十年）的突破成為可能。習近平的終身元首體制可能是未來走勢。

第三：當今中共官場的最主要特徵是“知青治國”。在中央最高層和省部級的官員大多數在 55-65 年齡段，他們下過鄉，很多參軍當過兵，在此過程中入黨提干。這個人群完全在共產黨政權毒性大發作期間（“反右”、“大躍進”、“大飢荒”、“文革”等等）成長和思想固化，通過逆向淘汰機制篩選，養成了察言觀色、阿諛奉承、陰險狡猾、自私自利等行為特徵。官員道德、知識和精神素質低下，官員體系更加腐敗，權力尋租更具有末日心態。人員素質低下尤其表現在中共官員普遍的下層社會習氣，例如，沉溺吃喝嫖賭，行事飛揚跋扈，缺乏自我反省，完全放棄靈性。肉慾主義和反智主義成為官場人員兩大特徵。

第四：中國官場的腐敗導致官員自體中毒，他們完全無視絕大多數民眾的疾苦，把自己花天酒地的揮霍誤以為普通中國人都能享受的“小康生活”。官員對民眾困難的同情和理解幾乎蕩然無存。在“讓一部分官員先富起來”的政策導向下，勝者心安理得地接受和宣揚社會達爾文主義。官民矛盾更加尖銳，官民衝突增加，暴力和破壞性升級。積極和消極的抵抗興起。以精神信仰團體和邊疆人群的反抗尤為突出。我們已經看到，法輪功信眾、藏傳佛教徒、回族（尤其是維吾爾族的穆斯林）、沿海和內地的基督教地下教會已經成為異化的板塊。而 1989 年的民主運動、世紀交替時期的維權運動和組黨運動（中國民主黨、中國自由民主黨等）、2008 年的“零八憲章”和近年來的“新公民運動”都造就出一批反對黨領袖。在台灣和香港，脫中棄共的勢力也在製造大規模的

社會運動。中共的合法性遭到全方位的懷疑和破壞，中國社會和政治大變革正在經歷快速的量變，而為不可避免的突變做準備。

第五：中共對世界自由民主秩序的挑戰公開化，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會進一步緊張。中共政權毒性的積累和擴散與美國的對華政策有關。具體說來，克林頓政府的“一廂情願”（自由市場帶來自由民主的想法）和布什政府的“綏靖政策”（主要是在2001年後國際反恐和2008年後國內減稅救市上有求於中國）養癰遺患，讓中共惡勢力在國際上做大。但2008年後，隨著西方國家復興自己的製造能力、西方資本回流或轉向印度和拉美，華爾街與中共的矛盾顯形（債務危機、貨幣戰爭、美國政府調查華爾街公司僱傭“太子黨”、馬雲的阿里巴巴賣假貨等），西方和以它為首的民主國家聯盟對中國的態度也開始轉變。美國對華貿易制裁和抵制（汽車輪胎、太陽能板、反對戰略收購、調查華為等），孔子學院受到懷疑和拋棄（芝加哥大學、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斯德哥爾摩大學、多倫多學區都已關閉孔子學院），美國決策層呼籲直面中國挑戰等等，都顯示出國際環境正在發生板塊位移。

第六：中國政治的不可預測性和風險性增加，四種可能走向

（1）政府無能（表現在成事不足、壞事有餘）繼續造成中國社會全方位潰爛，尤其是道德良心的稀薄和徹底喪失，會形成一個全面犯罪化的中國，也就是超大型的“失敗國家”。

（2）繼續反動和法西斯化可能會繼續在表面上整合中國，但會製造出一個“超級流氓國家”。由於這樣的法西斯政權成本太高，它維持的時間就一定不會太長。比如，現在中共的維穩經費曾經一度超過國防費用，一方面顯示中共政權正在開展一場針對人民的內戰，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它的不可持續性。

（3）宮廷政變或軍事政變。兩個因素決定了中國產生宮廷政變的可能：一是，中共內部不是完全沒有想要變革的進步力量。胡耀邦和趙紫陽兩個領導人，就為我們提供了中共內部出現戈爾

巴喬夫式變革的可能。而林彪事件和粉碎“四人幫”也是失敗的和成功的正反兩例。二是，中國領導人普遍道德和心理素質低下。如果他們生活在焦慮和不安之中，採取非理性的行動就成為可能。在“反腐”日漸成為剷除派系、清除政敵的手段後，我們可以設想，薄熙來、周永康、徐才厚、令計劃這些曾經掌握政法、軍政大權和資源的政治野心家不會甘心坐以待斃。他們身家性命難保、自己和家人身陷囹圄的結局一定會給其他被獵捕的政客某種啟迪。無論是先發製人還是後發製人，中共內訌的可能性都會隨著爭鬥的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而加劇。

（4）民眾起義和民主革命。現在每年數以十萬計（由於中共封鎖數據，有學者認為近一兩年已經突破 20 萬）的群體性事件就是一種全民起義。可以說，從民眾的心理氛圍上來看，中國已經到了革命的前夜。革命尚未發生，主要是由於中共絞殺任何體制外的組織化力量，製造民眾相互不信任的原子化分離狀態，使得反對派勢力還未能夠建立組織化基礎結構，反對派力量還遲遲未能完成組黨。但是，現在共產黨體系外的組織化力量已經產生，例如，“零八憲章”運動，“新公民”運動，訪民團體，法輪功組織，地下基督教或天主教教會，藏傳佛教系統，海外民運和反對黨力量（中國民主黨），香港和台灣等開放空間裡存在的各種組織化力量，等等。他們中的部分力量雲集組黨的可能性在增加，並可能在未來 3-5 年成為現實。

經濟大環境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中國未來政治經濟大趨勢會由下列一些明晰化的發展所匯聚而成：

第一：強勢國家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還會延展，國家的主導作用還會加強，但它的“發展性功能”會減弱，而尋租行為和掠

寡特性會增加。由於在中共主導下黨內的“新階級”已經完成寡頭轉型，過去一代人時間裡造就的既得利益集團——中共權貴寡頭集團已經壟斷了國家主要的支柱產業：鋼鐵、化工、石油、能源、礦產、軍火、電訊、銀行、保險、房產、電腦網絡、移動電訊、影視娛樂產業，等等，這一壟斷必然繼續早已出現的“國進民退”現象，也會對外來資本形成政治壓力和公開歧視（可以表現在市場行為規範和准入上，也可以表現在通過國家安全、刑事犯罪和治安等藉口來騷擾和排擠外國公司）。

第二：由於中國經濟運勢已去，總體上是下行趨勢，對民營和外資企業，盈利機會和空間會繼續萎縮。而政治上內鬥的加劇，又會讓在沒有透明和法治環境下做生意的民營和外國企業在政治上遭遇更多的不測風雲。尤其重要的是，民營企業家和外國企業家的人身安全會遭到來自政權和社會的更多傷害（比如，逮捕、酷刑和綁架等）。

第三：資本外流、基礎設施“豆腐渣工程”的逐漸暴露、人口紅利的消失、勞動力的稀缺和成本增加、老齡化增加、環境的毒化、自然資源的耗盡、腦力外流繼續都可能使得中國陷入“中等收入國家陷阱”。

第四：官員的腐敗和黑社會的氾濫、官黑勾結而為一體使得中國社會環境不穩和暴力化成為常態。尤其是在大都市（北京、上海、廣州等）以外，社會失序、地方治理缺失、黑社會獨霸一方更會變得普遍。

第五：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精英和他們的家庭會加速從邊遠地區流向都市，從內地流向沿海或香港，從大陸流向海外（新加坡、歐美等國），成為兩種制度投機的雙栖人。如果現在的趨勢沒有辦法逆轉，中國經濟最終會不可避免地進入核心 - 邊緣的依附性發展模式。

中南海視角和海外視角比較

中國體系性的最大缺陷是信息的扭曲、信息無效率和信息流失。作為極權主義的中國政府有意識地阻礙信息流通（例如建立防火牆、封鎖谷歌、臉書和其他媒體）、破壞信息效率（例如羅列敏感詞、建立保密體系等），而且政府是中國信息體系最大的造汙中心，使得假信息、偽信息、謊言流行充斥社會、政治、經濟生活，徹底使得官方體系外各層次和體系內部底層的所有決策者失向，任何決策都變得隨機和非理性。但是，如果我們明白“螳螂理論”的原理，亦即，如果你看到了一隻螳螂，那就一定有一群，那麼，現有非官方管道（例如社交媒體和海外媒體）透露出的支離破碎的信息就可以幫助我們想見中國制度體系整體的問題。在海外，由於中共“大外宣”的強大攻勢，許多媒體、媒體人和學者都已跳上了“中國大國崛起”的宣傳車，所以他們樂於“宣傳主旋律、弘揚正能量”，積極掩蓋中國的社會、政治、經濟真相。獨立分析的勇氣和成果就變得非常稀少。可喜的是，拐點已經出現，這部分學者的成果正在從暗流上升為主流。

基本結論

中國社會已經看到下行和上行兩股巨流。幾對矛盾首先從經濟變化開始：經濟增長遞減率（2014年經濟增長率下降到7.4%，24年來最低；2015年的目標又下調到7%）帶來民眾收入下降。政府的財政收入隨之相應下降（全國地方省市財政滑坡更為全面明顯，遭遇了1981年以來的最大危機），必然會削弱政府能力。短期內，政府財政儘管增速減慢（例如2014年的8.6%是1991年以來首次回到個位數增速），但仍然快於國民經濟增長。這意味著政府的攫取和尋租沒有減輕，而是相對加重。尋租機會的消

失帶來官員貪腐遞增率。不僅貪腐本身會帶來行政效率遞減，而且，掠奪性國家政策在資源日加稀缺的情況下又會進一步激化官民矛盾，民眾的群體性事件增加，暴力執法增加，行政成本更要攀升。在加強政府控制時，中共扭曲和堵塞信息自由流通，造成信息流失，帶來整個社會和政府信息效率遞減率。政治控制遞減率必然發生在中共治理中。所以，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中國社會、經濟、政治中的兩股巨流上下相聚，形成了一個剪刀型交集。中共正在把頭伸進這個剪刀口。

中國社會在過去三十年積累的矛盾由於改革成功和失誤的雙重作用，已經進入發病期和擴張期。中國政府作出了急劇的反動，政治上更具保守性，暴力在中國社會的運用更趨頻繁。政府尋租行為更加氾濫，決策的非理性因素也急劇增加。中國社會和政治整體上更加不可預測。在中共黨國總體運勢走低的情況下，我們如何選擇就變得至關重要。

第十章：21 世纪世界之癌



10.1 “網絡戰爭”： 國際大戰和鎮壓人民的內戰 (2013.03.30)

2013年2月18號發布的《曼迪昂特報告：揭秘中國的一個網絡間諜機構》成為中美網絡戰的一個重要事件。令人遺憾的是，中美兩國的輿論和媒體對此報告的關注基本上流於表面和短視，未能看到一個大的格局早已在幾年前就初現端倪，並將決定21世紀人類的命運和世界格局。

互聯網自由

2009年1月21日，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新聞博物館，美國國務卿克林頓做了一個關於互聯網自由的講話。這個講話沒有標題。但從全文來看，我想可以給它冠以“互聯網自由是四大自由在21世紀的核心”。正如克林頓國務卿所言：“我今天概述的這些原則將成為我們對待互聯網自由及其技術使用問題的指導方針。”歷史將證明，克林頓所警告的“有些國家豎起了電子屏障”，“一個新的信息帷幕正在世界上許多地方降臨”，其重要性可以與丘吉爾的《鐵幕演說》相提並論。中美“冷戰”早已爆發，

其內涵包括中美間的“理念之爭”（意識形態的較量，表現在“北京共識”挑戰“華盛頓共識”），“媒體戰爭”（以《紐約時報》為領軍的全球輿論已經向中共寡頭制宣戰），網絡戰爭，“貨幣戰爭”（中美債務關係和愈發升級的貨幣濫發）和間諜戰。而且，當沒有硝煙的戰場不斷加深相互的不信任和製造仇視升級時，中國和美、日（和他們的盟國）也在走近一場西太平洋海戰。

中國政府主導的網絡攻擊

就網絡安全，我不是一個專家。但我可以說，中國政府、甚至軍方組織對美國社會機構全方位地發起網絡攻擊，卻是不爭的事實。首先，我們可以細細閱讀長達 76 頁的《曼迪昂特報告》（下載網址：<http://www.mandiant.com/apt1>），不難辨別事情真偽。該報告用翔實的具體事實證明，上海浦東高橋的總參三部是對美國和其他 14 個國家發起網絡戰的大本營。其次，作為一個在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學習和工作十年的學者，我清楚地知道上海浦東高橋總參三部二局與國際間諜戰的關係。我所帶的 1986 級國政班就有三位畢業生分配到該機構。而該報告指名道姓披露的 61398 部隊的一位成員就是我的學生。最後，至少在過去五年中，我本人就遭遇無數次網絡攻擊（例如，偷竊我的電腦信息，進入我的郵箱，給我發送病毒文檔，甚至在中國建立一個我的個人網頁，把試圖與我聯絡的人引向一位神秘的版主，等等）。我的朋友、《縱覽中國》主編陳奎德也遭到病毒攻擊，結果電腦被毀，文檔被毀。

中美重大分歧

中美之間走向直接衝突的危險還不僅在於中國政府和軍方對美國企業、科教機構、信息產業、能源航空等基礎設施發起的廣

泛而長期的攻擊，更大的危險是，對於美國的警告，中國政府不以為然。中美兩國之間就一系列重大問題產生的分歧和誤讀，集中表現在了對《曼迪昂特報告》的不同解讀上。

第一，中美兩國對主權概念和內涵有不同的理解。

作為一個在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的一個後進者，中國對“主權至上”的概念還無法完成嬰孩期的斷乳（有趣的是，中共最高的智囊王滬寧以“主權論”研究在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拿得碩士學位，並指導自己的第二任妻子就同一主題完成博士論文獲得學位）。更重要的是，中共的主權概念非常強調國家對“物理空間”和“人民身體”的控制，當它在追求這種控制，而且這種努力已經傷害到他國、甚至世界的神經系統時，中共領導層還經常渾然不知。對中共來說，政治治理就是維護權力地位，龐大的維穩體系就是它的基礎設施。

但在美國看來，“四大自由”（言論、敬拜、免於恐懼和免於匱乏）卻是治理的本質、手段和目標。克林頓說得再明白不過了：

“信息網絡的擴展正在為我們的星球建立一個新的神經系統。”在21世紀，互聯網就是我們這個世界的具有代表性的“基礎設施”。說的誇張一點，在全球化下的後國家主權時代，對美國絕大多數居民來說，失去整個阿拉斯加對美國人生活的影響恐怕都不會大於網絡安全的喪失。但中國政府和它的御用“文膽”認識不到這一點。當政府的代言人把釣魚島這個不毛之地上升到國家安全高度並大作文章、煽動民族情緒時，他們（包括2013年新上任的總理李克強）卻以敷衍塞責的態度否定美方就網絡襲擊的指控、完全不顧美國人的感情受傷。

第二，中美兩國對政治和經濟、國家和企業的邏輯關係有不同的認知。

中國政府和其代言人之所以對美方的強烈反應不以為然，反而以原始的抵賴方式來掩蓋其在網絡空間的犯罪、甚至入侵行為，

是因為他們自以為，《曼迪昂特報告》不過出自一個私人公司，頂多是很快就會平息的“茶壺裡的風波”。他們無法理解，在美國的社會權力體系裡，《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等中國網絡進攻的受害者直接左右公共輿論，是動員和行使媒體輿論的“第四權力部門”。其他直接捲入中美網絡戰爭的企業，如谷歌等 141 家機構，都是美國經濟和社會的重要部門，他們的反應直接影響華爾街股市，投資者和融資者（包括許多中資上市公司）都會受到衝擊。

克林頓國務卿申言：“那些在我們國家或任何其他國家破壞信息自由流通的人對我們的經濟、我們的政府和我們的公民社會構成了威脅。從事網絡攻擊的國家和個人將承擔後果並受到國際社會的譴責。在一個靠互聯網連通的世界裡，對一個國家的網絡的攻擊就是對所有人的攻擊。”

在美國人看來，如果私人、民間對政府和軍方進行網絡襲擊，經常還情有可原（例如，在美國，人們對“維基解密”事件態度分歧很大），甚至可能是為信息開放、知情權而做出的高尚行動。但如果政府和軍方對個人和民間機構發起網絡襲擊，或者甚至只是控制監視，都會成為引發政治危機的違憲大事件。在中國政府的邏輯裡，政府和軍方享有對民間任意監視控制的特權，而民間對政府和軍方的任何網絡入侵或監督都會成為危害國家安全、顛覆國家政權的滔天大罪。中美兩國對“公權”和“私權”孰重孰輕有 180 度的差異。圍繞網絡戰爭，中美兩國猶如在望遠鏡的兩端對視，認知誤差猶如天壤之別。克林頓擔憂地指出，“從歷史上看，不對稱的信息獲取能力是國家間衝突的主要原因之一。”從圍繞《曼迪昂特報告》的言辭戰來看，中美未來衝突的升級幾乎不可避免。

第三，中美兩國對互聯網自由和政治治理的關係有不同的態度。

在陳舊的“完全主權”（相對於“有限主權”而言）觀下，

中國政府把發動國際間的網絡戰爭和中國政府對人民的網絡戰爭看作主權的天然組成部分。但在美國看來，對他國非軍事設施的常態入侵和在國內維持“網絡警察國家”，都是對人類共同體的傷害。

克林頓說得很清楚：“有些國家豎起了電子屏障，阻止本國人民分享世界上的一部分網絡。他們從搜索引擎提供的結果中刪除字詞、名稱和短語。他們侵犯了那些發表非暴力政治言論的人的隱私權。這些做法違反了《世界人權宣言》，因為《宣言》告訴我們，人人都有權通過‘各種媒體不受疆界限制地尋求、接收和傳播信息和思想’。”

特別針對中國，克林頓還警告道：“限制自由獲取信息或侵犯互聯網用戶基本權利…這個議題不僅關係到信息自由，最終還關係到我們希望有一個什麼樣的世界以及我們將會生活於一個什麼樣的世界。它關係到我們生活的地球是有一個互聯網、一個全球社會以及一個造福並聯繫全人類的共同知識體，還是支離破碎、獲取信息和機遇要取決於居住地點和審查者的心血來潮。”美國的決策者把互聯網自由放在了關乎人類共同命運和人類共同體根本性質的戰略高度。而與此相比，中共只把它看作維護一黨寡頭權力地位的手段而已。

攘外必先安內

中國國內討論沒有、也不敢提及的一個議題是：中國政府和軍方在美國的所有行為方式其實都更肆無忌憚地運用在了中國社會。早在2010年，著名媒體人北風就透露，400多位維權人士收到含“木馬”病毒的郵件攻擊。也就是說，軍方、公安、國安和國保早已大規模地控制了互聯網，在“金盾工程”和“防火牆”下，沒有任何用戶享有網上隱私和安全。所有的民主運動積極分子、

異議人士、敏感部門的敏感人物和政府官員（例如，中國傳媒大學校長方濱興在重慶幫助薄熙來和王立軍建立的網絡控制體系）恐怕都不能免於自己的文檔被植入的惡意軟件打包、偷出，最後送往情報安全部門。任何一台電腦的檯面都有可能已經被“網警”遙控。對所有中國人來說，《曼迪昂特報告》所披露的所有入侵和竊取手段只是掀開了“中國網絡警察國家”龐大控制體系的冰山一角。

所以，普通中國人不只是中美網絡戰的看客而已。中美網絡戰的結局不僅會決定美國人是否能繼續享有“四大自由”，也將決定整個人類共同體的未來自由程度，更會直接決定中國人能否生活在自由之中。

附錄 10.1

斯諾登事件提醒世人任何監聽活動都是對自由的一種限制、威脅或潛在威脅（2013-06-24）
“法廣”記者流芳專訪

美國中央情報局前技術人員斯諾登向媒體曝光美國情報機構大規模監聽公眾電話通訊，以及通過“棱鏡計劃”從網絡獲取大量公眾電子通訊信息引發的震盪仍在延續。此一事件將如何收場？斯諾登將何去何從？一個國家對網絡的監控應該掌握怎樣的尺度，才可達到即保護國家安全又尊重網絡言論和自由的雙重目的？對此，美國紐約城市大學教授夏明先生在斯諾登離開香港之前接受了本台的採訪。

法廣：目前，斯諾登事件吸引著全球的關注；如果斯諾登最終受到美國的司法起訴、被引渡回國，那麼他將面臨怎樣的一種命運？

夏明：現在有兩種不同的說法。一種是說他是叛逃；另一種是說他叛國。如果是叛國的話，我們都知道美國在冷戰時期是用死刑的。叛逃的話，將面臨各種懲罰，甚至終身監禁。現在美國司法部和律師談論的是斯諾登的違規或者犯罪不止十項。因此，無論是犯得那一條，恐怕他受的監禁都會比較長。

法廣：斯諾登不顧後果，曝出美國情報機構的監聽行動，雖然得到來自各方的許多支持，卻似乎並沒有得到他家人的理解。他的這種做法究竟出於什麼動機、反映了怎樣的一種心態？關於目前流傳的種種如：斯諾登是中國間諜等說法，有沒有可信度？

夏明：這其中的確有許多值得思考、令人迷惑的地方。我覺得可以從幾個層面來理解為什麼斯諾登會出走，為什麼會選擇香港。第一，從表面上看，就像斯諾登自己所說，是為了制止非正義，制止犯罪。他覺得美國政府對國際，對國內進行監聽是一種邪惡和犯罪。他因此採取這種勇敢的行為向全世界曝光，是為了制止美國的這種做法。這當然是最崇高的一種說法。我覺得這種說法很難說沒有道理。從價值層面上他有認同。但是如果他是為了這個目的，就有一個矛盾，即：他為什麼選擇中國。如果為了維護人類信息的公開化，網絡自由最大化，顯然中國不是比美國更好的一個國家。中國對網絡的監視和控制是全方位的，而且使用了各種不同的途徑的。

這樣的情況下，他選擇中國很難與他的理想和目標相吻合。第二個猜測：他選擇了中國，恐怕是受到了經濟因素的驅動。雖然他說在美國的工資很高，達到了六位數，作為一個年輕人，既沒有大學學位，高中也沒有畢業，他受僱能拿到六位數的工資已經是很高了。基本上是大學教授奮鬥十幾，二十年才能夠拿到的

工資。這種情況下，他說不是衝著錢來的。但是我相信，根據他的情況，受僱於中央情報局，當時也曾出了一些事故，中央情報局後來把他扔出去了。後來他又在國家安全局下面幹，當然也出現了一些違規的東西。他的雇主也開始對他進行了一些調查和居於倫理方面的因素，對他進行了一些懲戒。我們顯然可以看到，他在美國的社會結構中應該說雄心是很大的。但他的教育，工作能力和背景是很難實現他所要的追求的。

另外，他的女朋友是一個跳脫衣舞的，因此從他生活的環境以及他的工作的經歷來看，我覺得他有強烈的物慾的追求。另外他在美國的現實社會中，如果他有更大的物慾追求的話，美國社會是無法回報他所希望得到的東西。那麼，現在世界上哪一個國家可以給他這樣的回報呢？我想，這就是中國。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說，中美關係處於非常緊張的狀態，尤其是中美就網絡戰爭打得白熱化的情況下，美國在不斷地討伐和譴責中國，因為網絡信息戰爭，中國的軍隊進行了對美國網絡的進攻。這樣的情況下，他抓緊了機會，尤其在奧巴馬和習近平會見之前。我想這裡面的砝碼是很高的。我相信有很大的利益驅動。第三，我不排除一種可能，就在於斯諾登教育的缺乏，他其實對國際關係，對中國的現狀，甚至於對中國與香港的關係根本就沒有任何的理念和認知。他以為中國是世界上最富的國家，最強的國家，而且代表二十一世紀。甚至認為中國是世界上有自由的，維護正義的國家。由於他的盲目和無知，也不知道香港和中國的關係，他就投到香港，把他的身分暴露了出來。

法廣：這一事件曝出之後，奧巴馬政府受到了很大的衝擊；“國家安全”和“反恐”的理由能否令廣大民眾信服？

夏明：現在奧巴馬在好幾個方面受到老百姓的抨擊。應該說奧巴馬政府現在遇到了很大的危機。他的第二屆任期顯然很不順暢。但是奧巴馬現在的危機主要是來自自由派的，就是傳統上支

持他的人。這些人很失望，覺得奧巴馬做的很多事情延續了小布什的許多做法。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看到，他傳統上的敵人，包括共和黨人，美國前總統切尼出來講話，說這種做法是應該的，是出於保護國家的安全。這些做法是由一些專業人士來做。而且美國政府也專門有對外國的通信、網絡還有電話監聽的法律。根據這項法律，它是不會對美國公民進行監聽的。第二，它對外國或居住在美國的外國人進行監聽，可能會牽涉美國公民。另外它是不監聽內容的，主要是看誰與誰聯繫。根據聯絡和活動的頻率，預測活動同時進行控制。再有，它如果對具體的人有證據，證明他們從事恐怖或者間諜活動的話，法庭是可以授權對他進行監聽。美國有一套複雜的法律程序和規範。所以切尼就說美國的公眾不要過於驚慌。監聽沒有涉及到美國公眾的隱私。相反，這種做法保證了美國公眾和國家的安全。保證了美國的反恐質量。所以我覺得對於奧巴馬來說，他目前失去的是自由派的一批支持者，但是沒有引起太多共和黨在這個問題上做文章。

法廣：美國的網絡監聽行為與中國設置防火牆等措施有沒有可比性？

夏明：有共同點，也有不同點。共同點在於，斯諾登做出的一個貢獻，就是從個人的隱私或者個人的人權角度提醒大家：所有的監聽活動都是對自由的一種限制，一種威脅或者潛在的威脅。因此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隨時警惕，不應該讓國家可以對我們的通訊，隱私，民主權利進行肆意的剝奪或者侵犯。這一點是相同的。無論是發生在美國還是發生在中國，監聽都是危險的，都應該想辦法把它減到最小程度。這裡面就有一個安全與自由之間的權衡。但是美國的監聽和中國的監聽有些區別：根本之處就在監聽行動發生在不同的制度的框架和環境之內的。我剛才提到美國的監聽是由行政部門來進行的，有國會的關於外國情報監聽的法律來規範。另外他要受到法院的授權。法院授權只許半年。如果授權得

不到法院的認可，則根本無法進行監聽，否則就屬違法。

從現在的情況看，監聽都是受到了美國國會法律的授權和美國法院的相對許可。但是在中國，監聽行為是由國家來進行的。而這個國家與美國有點不一樣，中國的國家是包括它的黨和政府，法院和公安，以及中央和地方，全都包括進去了。所以中國國家的監聽這個概念就很大。而且是在全社會不同的層面都在進行。美國顯然沒有走得這麼遠。第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我覺得美國今天的監聽行為發生之後，引起軒然大波；顯然美國愛好民主，因此不能允許國家走得太遠。相反中國的監聽，滲透到了每一個角落，中國的防火牆已經存在了十幾年了。但是中國從來沒有在公眾層面進行過討論。所以顯然我們可以看到，美國愛好自由的政治文化其實就是在對國家的權限進行一種抵制和限制；公共輿論就在呼籲每一個人對國家權力進行警惕。中國的防火牆存在十幾年了，就沒有出現一種公共輿論，也沒有出現民間社會的強大反應。兩件事一比較，就可以看出同一件事的威脅、危害在兩國顯然有不同的後果。

10.2 中南海馬年三馬鬧心 (2014.04.08)

“2014，馬到成功！”中國人對馬年充滿了期盼。一張具有官方政治宣傳口吻的新年年畫這樣預言：“祖國大地好風采，一花引出萬花開。三中全會剛閉幕，萬馬奔騰送春來。”

對中共來說，今年有點像是2008年的回放。“08必發”，結果引起遍地開花：西藏咆哮、四川地震、三鹿奶粉醜聞、金融風暴登陸、劉曉波推動《零八憲章》，等等。馬年伊始，結果就看到北京霧霾籠罩。北京霧霾包括大氣霧霾和政治霧霾，導致中南海的中共大佬們呼吸不暢、噴嚏連連。最讓人鬧心的事都與“馬”相關。

“馬航失聯”

先說說“馬航失聯”。2014年3月18日馬來西亞航空公司MH379航班與地面空管失去聯繫。機上239名乘客，包括153名中國人，在一個月後仍然生死未卜、下落不明。危機處理過程中，中國乘客家屬要求死要見屍、活要見人。不滿馬來西亞政府的處置和信息發布，後來家屬情緒日漸失控，出現對馬航工作人員扔瓶子、

對記者拳打腳踢砸相機的現象。儘管馬來西亞航空公司派除了 700 名的安撫人員，仍有家屬向馬來西亞方面的人員大叫“殺人凶手”。還有的家屬大罵：“馬來西亞人都是騙子。”在馬來西亞大使與家屬會面時，部分家屬罵他是“騙子”和“無賴”。部分家屬還打出橫幅，到馬來西亞大使館去遊行抗議。中國媒體上出現了譴責馬來西亞政府犯下“滔天大罪”的指控，說馬來政府是“間接的殺人凶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也對馬來政府拋出些狠話。

當然，中方的反應引起了馬來西亞國內的反彈。馬來政府的國防部和交通部部長提醒中方，飛機上還有 50 名馬來公民。馬來西亞的輿論要求，“平常我們稱之為朋友的國家應該證明對我們的友誼。”同時輿論要求馬來政府“捍衛國家的榮譽和尊嚴”。一場航空事故正在演變成一場政治危機。

中南海應該至少有三點擔憂：第一，中方把責任過度推給馬來政府後，對失控的家屬情緒可能會火上澆油。家屬組織的遊行可能失控、引發針對中國政府的各種抗議。第二，馬來西亞不是普通中國人小瞧的小國。看看他們的通天雙塔，就可以知道馬來人的雄心抱負。馬來西亞是東盟十國的領頭雁。同時，它還是 57 國伊斯蘭合作組織的重要成員，正在成為伊斯蘭經濟區的銀行金融和服務中心。中國與馬來西亞關係的緊張，就是中國在東盟和伊斯蘭世界的雙重外交失敗。第三，馬來西亞近三千萬人口，有 22% 的華人。中馬關係的惡化直接會導致馬華族裔關係的惡化和衝突。所以我們看到，進來中國官方媒體已經開始給中方家屬降溫，提出 2014 年是“中馬建交四十週年，兩國之間的友好關係不應受到傷害。”

“馬總統失算”

再說近年來台灣與大陸關係的改進讓中共在國內得分不少，

兩岸統一的“中國夢”似乎很快會水到渠成。但國共兩黨從黨派利益出發套進，卻引發了台灣民眾的警覺和擔憂。面對一個時刻準備吞併台灣的共產黨專制政權，“服貿協議”提出對大陸開放台灣的服務業（包括新聞出版等行業）觸發了台灣大學生組織的“太陽花運動”。學生在2014年3月18號組織抗議，後來占領了立法院和行政院，占據立法院持續了一個多月，並獲得台灣社會各界的關注和支持。馬英九總統原來的強攻硬上策略失算，只好提出讓步，同意將“服貿協議”退回立法院重審。但即便如此，台灣的政治危機仍然無法收場。“倒馬”運動威脅台灣內政穩定和民主未來，“反中（共）”讓中南海用經濟利益換取政治統一的如意算盤落空。多年的經營如春雨中的落英飄散。

“馬回子造反”

最後說說“馬回子造反”。許多漢人恐怕不知道，百家姓中的馬，有一個來源是伊斯蘭教的穆聖穆罕默德，所以中國舊時稱穆斯林（穆民或回民）為“馬回子”。過去二十多年，甚至過去五十多年（依塔逃蘇事件），甚至一百多年前（回民大起義），穆斯林就與漢人、滿人產生了無數衝突。官方數據說，2012年新疆就有190起“恐怖事件”。2013年10月底，從新疆來的一對夫妻和老母在天安門廣場駕車自殺式攻擊，顯示穆斯林對中國政府的聖戰出現新變化（中年夫妻和母子是較難同時成為聖戰戰士的）。2013年12月底，在喀什，16人（包括兩名警察）在恐怖襲擊中身亡。2014年一月24號，在新疆發生三起爆炸事件，殺死三人，傷兩人。三月一號，在昆明火車站，一群維族人手持砍刀，瘋狂砍殺漢人。至少29人死亡，140多人受傷。兩週以後，在湖南長沙，維族回人衝突引發又一輪對漢人的亂砍亂殺。兩人當場被砍死，兩人在醫院死亡，眾人受傷。

我們知道，穆斯林與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已開戰。“9.11”事件、倫敦爆炸、車臣動盪、孟買爆炸、巴厘島爆炸，等等都與伊斯蘭教聖戰有關。可以說，為了信仰，穆斯林不怕死，敢於獻身聖戰。而中國人一般怕死，中國政府卻又不講道理，所以回漢的衝突成了死結。

據外電報導，新疆的穆斯林面臨不斷增壓的迫害，紛紛取道雲南，偷渡泰國，輾轉來到穆斯林國家馬來西亞。這一因素加上雲南的回民社區（中文《古蘭經》的兩種文本的譯者馬復初和馬堅都是雲南人，不要忘了馬三寶，即鄭和，也是雲南人），成為昆明事件的大背景。

儘管馬來西亞、馬回子還有點關聯，但馬總統與它們卻是有點風馬牛不相及，怎麼會一起成為中南海的鬧心事呢？其實，三者真還有共同的政治原因，那便是虛幻膨脹的、自我中心的民族主義情結，在馬來西亞表現為“醜陋中國人”的大國主義，在台灣表現為霸權主義，在新疆表現為大漢族沙文主義，它們共同引發了邊緣地帶對一個崛起的專制大國的抵抗和不滿。對一個剛醒過來的獅子來說，閏年馬亂踢蹄子，確實讓中南海內外忙作一團。

當然國人也不是完全沒有一些輕鬆的馬年花絮。一是一貫替政府站台的富豪馬雲搞的“餘額寶”遭到四大銀行聯合封殺。二是女演員馬伊俐的丈夫文章被曝與女演員姚笛有染，在媒體上被熱炒。為此，網上有人寫了一副對聯：上聯：馬雲、馬航、馬伊俐，下聯：失意、失聯、失文章，橫批：泥馬。

馬年剛過完四分之一，中國政府就已連連失蹄。下面我們就等著看“泥馬”和“神馬”的更多意外了。

10.4 中共四砸孔家店 (2014.07.07)

聖人孔子活著命運多舛，死後其歷史地位也曾經歷大起大落。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皇帝秦始皇帝製造了“焚書坑儒”，對孔門學者大開殺戒。而最後兩次帝制復辟（袁世凱和張勳）又都提出了“拜孔尊教”。如何對待孔子，真是冰火兩重天。但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手中，孔子才會從聖人之尊跌進糞土，爾後又在“大外宣”中化糞土為神奇，反反覆復。如果聖人在天有靈，恐怕也不會想到在儒學天下化外之邦，以他命名的“孔子學院”引起了一場又一場的風風雨雨，以致許多國家的大學教授和學者聯名呼籲，要把“孔子學院”掃地出門。中國文化大儒受此大辱，不能不讓人們擊額反思。儒學和中共，放在一起為何如此彣扭？

反孔毀儒的歷史

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就是一部中共反孔毀儒的歷史。在上個世紀的早期，中共創黨的領導人在他們主導的“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中，成為倡導“砸爛孔家店”的激進力量。陳獨秀發表的《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李大釗的《孔子與憲法》和《自

然的倫理觀與孔子》把中國的專制和落後歸結於孔子學說，並斥之為“專制政治的護符”和“專制政治之靈魂”。中共黨史權威胡繩在《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一書中指出：與戊戌維新和辛亥革命相比，受馬列影響的、後來成為中共理論刊物的《新青年》的作者們，具有更強的鬥爭徹底性：“他們把打擊的矛頭直指封建時代的聖人孔子，掀起了‘打到孔家店’的潮流。”

共產黨奪取政權後，用國家暴力系統地剷除了儒家學說，從肉體上消滅了該學說的載體——紳士階層。在“破四舊”的運動中，再次砸爛孔家店。“文革”中，狂熱的紅衛兵乾脆衝到孔子故里曲阜去砸孔廟、毀孔林。據紀希晨在《史無前例的年代》中記載：

“1966年11月間，在孔子的故鄉毀壞文物6000餘件，砸爛歷代石碑1000多塊，燒毀古書2700冊，字畫900多軸。”

孔子成權力遊戲道具

如果說，前兩次毀孔，一是為了要奪權，二是為了要穩固政權，在1974年，毛澤東和他的妻子江青之流發動了“批林批孔”運動，把林彪和孔孟之道捆綁在一起，目的則是為了權力之爭。批復辟、批周公，一方面是要打壓周恩來和鄧小平以及他們的溫和政策，另一方面也是為左派的激進路線提供理論支撐。孔子成為了中共權力遊戲的方便道具。但每一次，孔子都是以反派角色登場的。

直到1980年代初，我在復旦大學讀書時，當時的副校長、歷史學家蔡尚思出版了《孔子思想體系》一書，向我們談到孔子“野合而生”：“孔子是個私生子，他的母親是個受沒落貴族凌辱的貧賤婦女。”“所謂野合，只能是指這位少女在野外被老奴隸主叔梁紇強姦，迫使她懷孕而生下孔子。叔梁紇根本不管自己獸慾所造成的後果。”而且，蔡教授還談到“鬧離婚成了孔子祖孫三代的遺傳病”：“孔子出妻，孔鯉也出妻，孔鯉之子子思也出妻，

所謂‘孔氏三世出妻’。”在官方言語體系下，孔子名聲和家風之差由此可見一斑。

但在人類文明誕生之初，儒教和諸子百家與印度教、佛教、古希臘文明、猶太教和基督教共同構建出“軸心文明”，對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的貢獻都是功不可沒的。進入 21 世紀，中共突然提出以德治國、以人為本，並開始在全球大把撒金，宣稱要在全球建立五百所“孔子學院”。如果你認為這一大舉措是因為中共也意識到孔子思想的價值，那就大錯特錯了。有人說，你第一次受騙，是騙子的錯；第二次受騙，就是你的錯。等到第三次受騙，就是你的傻。在中共三砸孔家店後，如果它突然提出要建立孔子學院、樹孔子塑像，警惕的人們不能不牢記“黃鼠狼給雞拜年”的告誡了。

其實，孔子學院就是一項政治統戰項目。它不僅配合中共“大國崛起”和“北京模式”的對外、對內宣傳，而且，也幫助中共使領館對各國大學進行滲透，干預學術獨立和自由，甚至摻雜情報人員，恐嚇獨立的、批評性的中國研究專家，把遵守中國的法律強加在外國的研究人員身上。西歐某國家的一位中國研究專家親口向我講述，在他擔任孔子學院院長時，他的大學邀請了達賴喇嘛到學校做演講。中國駐該國大使館的教育參贊要他以孔子學院的管道向校長施加壓力，力圖取消安排。由於他的不合作，從此再也不被邀請到使館參加活動了。

“孔子學院”的全球尷尬

由於有各種的政治干預（包括對有法輪功背景的教授刁難），加拿大的麥馬斯特大學關閉了它的孔子學院。2013 年 12 月，加拿大的大學教師聯合會敦促各大學停止孔子學院。2010 年，芝加哥大學 170 位教授聯名上書要求該校中斷與中國“漢辦”的合作，稱孔子學院為“學術上和政治上都很曖昧的項目”。2014 年四月，

108 位教授（包括七位系主任）再次連署簽名，要求芝加哥大學不再續延“孔子學院”的協議。六月，美國大學教授協會也發出呼籲，鑑於“大學和它們的教職人員的完和品質受到犧牲”，要求美國一百多所大學切斷與孔子學院的關係，以保障學術自由。

可見無論中共是孔子儒學的敵人，還是試圖成為它的推銷者，最終都製造出同樣的毀儒效果。因為，無論哪一種作為，中共都沒把孔子和儒學當作人類文化和中華文明的財富來共享，而是把它作為了維護權力利益的工具。一個連鄉校都不願投資的政府（想想 2008 年四川大地震中震毀的 7 千多所學校），又怎麼可能成為弘揚儒家文化的工具？所以，孔子學院缺的正是“仁愛”、“中庸”、“君子不器”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中共自己推崇的文人魯迅在 80 年前說的話現在也沒錯：“孔夫子之在中國是權勢者們捧起來的。”這個所謂的萬代師表“也總是當着‘敲門磚’的差使的。”（《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

如果中共有誠心想向全球推廣中華文化，為何不可在孔子學院之外建立一所“老子學院”，談一些“無為而治”和男女平等？或建一所“墨子學院”，推廣“兼愛、非攻和天志”？甚至可以考慮“莊子學院”、“華佗學院”或“木蘭學院”？當然根本的障礙還是，中共不會讓“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得到真正的實行。

10.5 居中夜叉國 (2014.01.08)

從孩提時代我們就接受了一個觀念：中國乃居中之國。長期在我們心中存在的一副世界地圖就是以中央王國為中心的。官媒所代表和塑造的中國人可以自狂到如此地步，以至將中國等同於“東方”，根本無視文明水平已超越自己（昔日文明之師）的日本，甚至把燦爛的印度文明和更古遠的波斯伊斯蘭文明也不放在眼裡。

中國文明的恥辱

跳出鐵籠、逃離竹幕以後，世界主義的價值觀逐漸衝淡了狹隘的民族主義，我才真正認識到世界文明發展的主流和方向，認識到地緣上仍然居中的中國在文明意義上已經回到蒙昧昏暗的洞穴。比如說，在2013年，“自由之家”認定世界上195個國家中，已有118個國家建立選舉民主制，占61%（該項指標在2004-05創歷史最高，達64%，亦即，123個國家建立了選舉民主制）。全球有47個國家被列為“不自由”，它們占到國家總數的24%；58個（30%）國家被列為“部分自由”；90個（46%）國家為“自由”。在所謂的“壞中之壞榜”上，中國赫然有名。最說明問題的是，

全球有 23 億人生活在不自由狀態下，而中國就占到 13 億以上；世界上 57% 的不自由人是中國人。

一個不自由的專制大國赫然矗立在亞歐大陸，其投下的長長陰影，最令人震撼因此最難以忘懷的莫過“面書”2010 年發布的全球用戶分布視覺效果圖。中國龐大的版圖成為“面書”靚麗版圖上的一塊黑洞。如果我們查看谷歌全球用戶的分布圖、世界森林綠地分布圖和二氧化碳的排放圖，都會得到同樣的震撼。今日，中華大地更是被霧霾籠罩。不知中國的探月器從太空高處回望，又會攝下一番什麼景象。這讓我想起了“夜叉國”的故事。

處處作梗的夜叉國

在《佛典譬喻經》中開篇第一就講到“薩薄降鬼喻”，說的是一個名叫“薩薄”的商人皈依佛祖、遵守十善法，他想與千里之外一個“民多豐樂、寶物饒好”的國家通商，苦於有夜叉居於兩國之中，“得人便啖”，阻塞交通，斷絕往來。薩薄立志降伏夜叉，做“通道導師”，“通萬姓道，益天下利”。而夜叉鬼自稱：“我為神中王，膂力大無邊。吃人有多少，無人能知曉。”但終歸邪不壓正，夜叉王被征服，薩薄實現了他的志願：“道路歸於萬民，利益歸於天下。”

過去十來年間，中國人民的辛勤勞作和智慧的發揮給中國文明復興帶來了一線機會。但黨國將這一歷史進程綁架到了一條邪路上。無論在日本、俄國、意大利、韓國還是新加坡的民眾中，或是在華盛頓決策者圈裡、歐盟思想庫討論會上和華爾街的投資商內圈裡，一個急劇膨脹的專制中國已經成為令人擔憂的夜叉國。甚至在法國巴黎的蓬皮杜藝術中心，我看到一幅“中國崛起”的繪畫，描繪一條赤龍、扭動著長城構成的身體。

在 2013 年年底，中國政府單方面宣布了“東海防空識別區”，

更是引發周邊一系列國家的敵視反應。不錯，美國、日本甚至韓國都有自己的“防空識別區”。但中國政府頒布的有三點差異：第一，美、日要求所有進入本國目的地的航空器聲報飛行信息，中國要求所有進入識別區（包括路過）的航空器履行聲報。第二，美、日的識別區是為了加強空中安全、減少誤判為主要目的，中國是通過“防空識別區”來解決釣魚島的主權爭議問題。中國政府無視二戰劃定的蘇、美勢力範圍給日本對釣魚島的實際控制權，試圖採取單方行動來控制釣魚島，勢必引發地區緊張。第三，美、日設立識別區在先，沒有與既存的識別區衝突的問題。中國的識別區在後，勢必要與既存的識別區協調。也就是說，在先占原則下，先下手者是單邊行為，但後下手者就一定涉及多邊談判。中國是在沒有與任何鄰國通氣的情況下一意孤行的。

維護利益需要價值和制度

批評中國政府的草率單邊行動，並非要否認中國人的國家利益。孔子說，“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捍衛和拓展國家利益也是國際政治的基本規律，但它也有道可循。如果個人和國家要講道理，也就是要踏上“抽象的階梯”。知名的語言學家、日裔美籍參議員早川雪（Sen. S. I. Hayakawa）在他早年寫的《語言與思想行動》一書中講到，抽象有同義反復的“死胡同抽象”，也有“向上走的抽象”和“向下走的抽象”。舉例說來，如果中國政府要論證自己利益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如建立航空識別區，不能只是說“這是我們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是我們的核心利益”，“我們的主權不容侵犯”，等等。這是在利益層面上的邏輯循環論證。從鄰國角度來看，有的國家會跟著“向上走的抽象”，擔心中國可以單邊任意改變國際秩序，這勢必引起美國的擔憂。有的國家又會跟隨“向下走的抽象”，例如東盟

各國馬上擔憂在南海，中國是否會推行同樣的原則，把各國排擠出南海。所以，中國政府的航空識別區會遭到亞太國家的普遍抵制。

其實，中國人的老祖宗就留下了許多處事立國的道理。比如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道德金律，墨子的“兼愛、非攻、天志”的“抽象階梯”都是範例。我們也可以用三個“I”來闡明論證的抽象階梯：“利益”（Interest）需要在“制度”（Institution）層面上來論證，“制度”又需要在“理念”（Idea）、也就是價值觀層面上得到合理論證。用英國哲學家羅素的話來說，我們的價值論證需要科學、哲學和神學的抽象階梯。看來東西方文化最終都要求證於“天志”、“神旨”。這裡我們就來到了“普世價值”。

一個在國內和國際上都否認普世價值的政府，又怎麼可能為自己的政策找到價值支撐和合理論證呢？難怪，中國政府不顧世界輿論，繼續封殺台灣的生存空間，甚至在災難時期也刁難它與世界衛生組織的合作；中國政府繼續阻撓達賴喇嘛的出訪、射殺翻閱喜馬拉雅上出走尼泊爾、印度的藏人和報復接待達賴喇嘛的國家和政府；中國政府繼續支持在對自己人民和親長犯下令人髮指罪行的金正恩，阻撓南北韓的和平統一進程。像無數的其他海外華人一樣，我也在2011年遭遇過在中國航空港國際航班轉機不許通行、而被無理扣押的待遇（如果你有在迪拜轉機的經歷，你就知道，所謂轉機就是從一個出口轉到另一個出口，無需與當地任何機構打交道。這一點中國連以專制著稱的阿聯酋都不如）。

亞洲的“伏地魔”

國際上越來越多的人士和國家把當今黨國控制的中國看作是“青春騷動期的國家”，“流氓無賴國家”，“法西斯政權”。在2014年新年伊始，中、日駐英國大使又展開了一場到底“日本軍國主義”或是中國是“伏地魔”的國際爭論。首先，新年第二

天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在《每日電訊報》發表署名文章：“中英共同贏得二戰勝利，日本拒絕正視過去的侵略事實成為對世界和平的威脅”。文章第一句話就寫到：“在《哈里·波特》的故事裡，黑巫師伏地魔難斷氣，因為裝著他的靈魂碎片的七個魂器已經被毀滅了。如果說日本軍國主義是陰魂不散的伏地魔，那東京的靖國神社就是一個魂器，再現了她這個民族魂的最陰暗部分。”

一周不到，日本駐英國大使林景一在同一報紙發表署名文章：

“中國有成為亞洲伏地魔的危險：日本忠於和平、民主，參訪靖國神社並不會改變這一立場。” 有意思的是，作為不信靈魂的一個共產黨官員投機取巧，拿起一個方便卻可能會自傷的武器來進攻；作為對中國文化和政體有獨到深刻理解的日本，接過“伏地魔”的比喻，把中國的威脅在國際媒體上挑開辯論。這一事件本身似乎預示著，在未來的幾年裡，全球民主國家聯盟會進一步形成共識來對付夜叉國，一個重要的挑戰和中心必定是專制而又惡性膨脹的共產黨領導的專制中國。

10.6 拯救中國人於恐懼之海 ——讀陳破空的《不受歡迎的中國人》 (2015.04.06)

在“大國崛起”、“千年盛世”的喧囂下談論“醜陋的中國人”這個話題，注定要承擔極大的風險。對中國人國民性的批判、對厚黑學的論述、對中國圓滑文化的剖析、對中國人文化劣根性的抨擊已經形成傳承。在魯迅（以《阿Q正傳》為代表）、李宗吾（《厚黑學》）、林語堂（以《吾土吾民》為代表）、李敖（例如《中國性研究》）和柏楊（以《醜陋的中國人》為代表）的著作中對此都有提及。但他們畢竟是在中國（或者是台灣）處於孱弱、危難之際時的當頭棒喝。而此時此刻，陳破空藐視中共“大外宣”無處不在的滲透和威脅，直接挑戰自我感覺越來越好的中國人，推出《不受歡迎的中國人》一書，其勇氣可嘉，其文字淋漓盡致。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關注。

中國人的通病固疾

在《不受歡迎的中國人》（以下簡稱《不》）一說中，陳破空首先從國際視野觀察全球化過程中的中國人，提出“全世界討

厭中國人”的大膽命題。然後從國際交往轉向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分析中國人的文化、心理和行為模式。他寫道：“當今中國人的基本特征，就是這樣：缺乏公德，偷奸耍滑，見錢眼開，唯利是圖，明哲保身，冷血無情，熱衷內鬥，欺軟怕硬，貪生怕死，奴性十足……”最後，作者從中國政治歷史角度，尤其是野蠻落後的異族暴力文化和政治來分析統治權力體系對傳統優良的中國文化，尤其是諸子百家“軸心時代”產生的多元文化的摧殘，和權力對當今中國人全方位道德淪喪所負的責任。陳破空論述到：“中國人以奴性著稱，由來已久。這種國民性，自大一統的秦朝之後，更趨成形，並日漸加重。而完全打斷中國人脊梁的，卻是歷史上的三大劫難：蒙古人滅亡中國，滿清人滅亡中國，共產黨為禍中國。”他認為，“曆經蒙古、滿清、共產黨，三大劫難，一次比一次深重，中國的熱血志士幾乎死絕，英雄豪傑成為‘稀有動物’。留下的，大都是小人、懦夫、爬蟲。從龍的傳人變為鼠的傳人。唯唯諾諾，戰戰兢兢，誠惶誠恐；不敢造反，不敢革命，不敢越雷池一步。作為一個民族，中國人被徹底打斷了脊梁，再也站不起來。或者說，肉體上站著，精神上卻跪著。”

陳破空上述觀察和結論可以得到魏特夫論述的佐證。在《東方專制主義》一書中，魏特夫繼承了馬克思有關“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論述，同時結合馬克斯·韋伯的官僚國家研究，提出：在秦漢以後中國根本沒有進入類似歐洲的封建制，而是在“亞細亞生產方式”下，國家利用灌溉和治水的功能需求，形成了官僚所有制和依附皇權的零星的官僚資本主義，從而建立了“以鞭撻統治的政府”，帶來了全權主義體制。魏特夫引用阿克敦勳爵的名言，指出在東方專制主義下，人們很容易發現，“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腐化。”在中國，普遍的跪拜成為卑賤屈從的象徵，而這在其他社會裡是罕見的。他還觀察到，“統治者不相信任何人”、“官員永遠在

猜忌中”、“平民擔心被牽連”。他還寫道：“自願參加公益在開放社會是受鼓勵的，在極權力量條件下卻是非常危險的事情。由於害怕同一個無法控制的和無法預料的政府打交道，謹慎的臣民便被限制在他自己的個人事情和業務的狹小圈子裡。這種恐懼心理使他和所處的廣闊社會的其他成員隔絕開來。”

一種文化行為模式

對於自己的觀察和結論會遇到質疑和批評，陳破空早已做好了思想準備，同時也在他的書中前瞻性地做了回應。如果一個讀者認為自己並沒有如書中所言的那麼糟糕，從而認為本書以偏概全、誇大其詞，那就沒有領會作者的苦心。正如小說創作的人物典型來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我們每一個人可能都可以在典型人物中（譬如阿Q或華老栓）找到自己的影子，但又知道那不是自己。抽象的特性就是通過凝練提出精華、通過舍象拋開枝末，找出高概率的模式，而絕非建立決定論的總結和預測。這裡有兩個重要的隱形理論作為前提支持著作者的論述：

第一，穩定的文化、心理、行為模式並不否定個人的能動性和自願選擇。而在結構 - 能動體的互動條件下，每一個細小的個人選擇都可能集聚，從而帶來從量變到質變的飛躍。因為有這樣的前提，所以作者意識到了“大概不超過5%”的“少數例外的中國人”：“產生宗教信仰的中國人”，“那些幡然醒悟、痛感民族劣根性的中國人，”還有更稀少的一類：“天生純質，如荷花，出汙泥而不染。”在邏輯思維中，黑格爾提出了“正題、反題和新的綜合”，它也影響了後來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者的辯證法思維。如果中國和中國人要進步，我們就必須承認，“醜陋的中國人”相對的必然是“美麗的中國人”或者“美麗的非中國人”，這樣我們才能找到具有超越高度的、提供批判視角的“阿基米德基點”。

幸運的是，因為台灣、香港和海外華人集聚點帶來的特殊情況，傳統中國在現實中的分裂，中國被全球化的外部環境、尤其是以西方為主導地位的國際體系所包圍，這些都為中國提供了變革、進步的可能。但更重要的是，中國人自我反省意識和能力在部分人群中從未被共產黨徹底鏟除、或在經歷冰凍後又復甦了，知識人、思想人內心精神的超越性也為我們原來自身存在的“醜陋的中國人”提供了自我診療、自我昇華的可能，從而可以擺脫文化劣根性和讓自己遠離身、心、口惡業。

從書中論述、尤其是著者在書後的附錄中，我們可以看到在陳破空身上，有多種因素做工：本人有“天生純質”（家庭帶來的遺傳和教育因素）、宗教情懷、後天醒悟（尤其是閱讀、煉獄經歷和跨越海洋的遷徙出國施加的昇華作用）等。所以，他才能跳出苦厄、遠離顛倒夢想和虛偽奸詐。也正因為他的內心深處有著對“只可遇而不可求”的“美麗中國人”的堅強信念，他才會有動力奮筆疾書、發出令人耳聾的強音。

個人和集體自省

第二，透過陳破空的文字，我們可以感到他在書中流露出的悲觀論、批判性和懷疑精神，但他的這些態度是一貫的、普適的和適用於自身的。因為有這種普遍性，他為我們留下了許多空間，所以我們可以對他的論述和結論表示懷疑、持悲觀態度、甚至進行批判。比如說，他觀察到，只有人會把人囚禁在監獄裡，而任何其他動物都不會這樣做，所以人性可以走到惡的程度可能還會超過獸性。但我們也必須認識到，只有人可以產生超越身體的抽象意識和靈魂良心概念，這又為人的昇華和自我拯救开辟了空間。又比如，他對台灣、香港和新加坡的華人持有更高的評價，所以他把他們基本排除了他的“令世界討厭的中國人”之列。但我們

並不否認，一方面我們對自己的族群、社區有著某種批判的特權（我們很難想像，作為中國人我們可以討伐任何一個其他族裔而不有失良善或不招致譴責），另一方面，對其他族裔我們有意無意地浪漫化他們的文化習慣，所以難免“此山望著那山高”。例如，在陳破空遭遇的兩次被香港出入境處警察遣返的過程中，我們也看到了香港人身上惡的一面。不過，我還是同意他的基本判斷：大陸中國人與其他地方的華人和其他許多民族還是有質和量的差異。當然，我們每一個華人／中國人也可以集體行動起來，證明他的判斷和結論只適合于特定時間、特定地方和特定人群的概括，並不適應于當下絕大多數中國人。我們對他的命題的集體證偽恐怕正是他用的激將法所期盼的。

公共產品的私人供給

陳破空的《不》一書，揭示了中國文化和人群中存在的一個固疾：面對具有公共性質的問題（挑戰、困難、厄運，以及自由、正義、民主等公共產品），中國人基本無法形成集體行動，而是精于尋找個別的、特定的、私人的解決方式，讓自己避害得福，而不管他人禍福得失，甚至還刻意建立在犧牲他人利益的基礎之上。個人的解決方式必然帶來關係、圓滑、狡詐、猜疑和冷血等醜陋中國人的特性。與此對照，集體行動的解決方式在中國普遍缺失，社會運動和政黨組織也就步履艱難、甚至無從談起了。“一個自私自利、冷血無情、唯利是圖的物化民族”這個問題的嚴重性表現在連知識人群體都失去了自我反省能力、社會批判能力和對社會、歷史的擔當。所謂的“民族的脊梁”、“社會的良心”也已經墮落為官府的奴才。

美國已故社會學家查爾斯·賴特·米爾斯在《權力精英》一書中寫道（英文版第318頁）：“在真正的公眾裡，知識人能夠把他

個人的困難轉化成社會問題，看到它們與整個社區的相互關連。他明白，他思考到和感覺到的個人困惑經常並非個別的，而是許多其他人共同面臨的問題，因此，個人解決方案于事無補，而是需要修改調整他所在的不同組織間的結構，有時甚至是整個社會的結構調整。”今天，中國知識精英的犬儒化就是因為，知識人故意迴避思考個人問題可能存在的結構性根源，而是積極為不公正的整個制度結構辯護，以換取個人利益的增加和自家處境的改善。與此形成鮮明對照，在《不》一書中，陳破空展示了他的豐富的“社會學想像力”（米爾斯的用語），通常能夠把他的個人經歷、觀察和常識轉化為社會學和政治學的結論，強使讀者思考問題的制度根源。

在任何制度下，無論是民主或專制，我們都可能看到個人的惡、環境的墮落帶來的不義和缺德。但最令人擔憂的是，一個整體制度設計成為一個結構性根源，建立了一套助紂為虐的價值觀，從而全面地腐蝕、毒化生活其中的人民。陳破空相信民主制度可以使人民變得更遵紀守法、使民風更加良善；而專制體制卻能形成“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效應。他寫道：“筆者相信，中國人國民性的敗壞，最大因素，在於專制制度。因為，專制制度的本質，就在於，以粗鄙的力量壓制文明的力量。一旦中國發生制度變革，成為一個民主與法治的正常國家，筆者堅信，中國人的國民性必將轉向正面發展，假以時日，必獲得根本改善。”

從心靈渡己渡人

在幼年我就喜歡去成都的衆多寺廟去看佛陀、菩薩、羅漢，但從來未問過、也從未聽到誰解釋過三者的關係和差別。後來讀到《法華經》知道，觀世音菩薩可以成佛卻繼續留在人間修菩薩行，自利利他，發誓以千眼千手，循聲救苦、普度衆生。再後來又讀到《地

藏菩薩本願經》，震撼于地藏菩薩的宏願：“地獄未空，誓不成佛。”原來，人世間有修菩薩行的大德之士，他們出入地獄、受盡苦楚，是要首先救度衆生，除盡苦難邪惡，然後才會乘風而去、歸于永恒。想著陳破空兩度走進煉獄，遭受身心皮肉雙重痛苦，被恐怖記憶所追討、被精神抑郁所困擾，儘管自己已經平安逃離苦海，卻難以舍棄自己的同胞，放不下對母國的牽挂，不舍不棄地從大小善事做起，去清除專制體制、尤其是中共極權體制給中國人和中國社會造下的大大小小的罪惡。

陳破空在《不》書中回憶道，他在大學時期接觸到阿夫托爾哈諾夫的《斯大林與中央委員會》一書，受到強烈震撼，他的人生由此改變。碰巧我在大學時期讀到同一本書（我記得國內翻譯的書名是《權力學：黨治制的由來》），同樣也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迹。當深陷虛無懷疑之網的同學質問他，何以見得他所讀是真時，陳破空作如是回答：“沒錯，我們的眼睛，只能看見眼前的事物；我們的耳朵，只能聽見周邊的聲響；我們的手，只能觸及近旁的東西。但是，我們有心靈，心靈比眼睛看得更遠，比耳朵聽得更多，比手觸及得更深。”

抱著和陳破空對人類心靈的同樣信心，我知道很多人會拿起他的書，通過閱讀思考，走出“山窮水盡疑無路”的困境，進入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五年、十年、二十年後，我不懷疑我們會讀到同樣的文字：“一本書，喚起我的民主意識。”只不過這一次的書名要麼可能是陳破空的《中南海厚黑學》，要麼就是這本《不受歡迎的中國人》了。

附錄 10.2:

習近平掌權的兩年，中國人權極度倒退

(2014.12.02)

法廣流芳採訪

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當政已兩年有餘。習近平掌權後，大刀闊斧地展開反腐，似乎為中國的政治生活帶來了新氣象。然而，在意識形態領域，採取的卻是更為嚴厲的政策，對異見人士打壓的力度似有增強之勢。如何看待習近平掌權後的中國，對此，紐約城市大學教授夏明先生接受了本台的採訪。

法廣：2014年11月21日這一天，新疆自治區看守所內對維族學者伊力哈木·土赫提進行了二審宣判，維持一審以“分裂國家罪”對伊力哈木的無期徒刑判決。有關當局對伊力哈木提出的二審公開開庭審理的申請，隻進行了“書面”審理，並且選擇在一座不公開的看守所內進行宣判，這樣的做法是否符合正常的司法程序？

夏明：中國現在就是用所謂的國家安全這方面的罪來指控這些平和的學者。我想它有兩個問題在裡邊。第一，它用國家安全來為自己祕密審判提供一個法律的依據。但是另一方面，我覺得是用祕密審判去掩蓋它在法律上是沒有依據的這個事實。所以我覺得這當然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倒退。

法廣：伊力哈木一案的宣判結果，引發了眾多維權人士的不滿。當局打算通過對此案的宣判傳達怎樣的信息？重判伊力哈木意義何在？

夏明：現在我覺得習近平有非常大的一個焦慮，他通過對黨內的派係各方面的整合，各方面的平衡，討價還價，坐上了中國

最高領導的職位。但是他坐上了中共領導最高的職位以後，很快就發現他跟中國的這些學者沒有太多的相互信任。尤其是中國的知識界現在基本上是被具有自由和民主取向的學者所占據主導地位，也就是說中國的知識界與習近平新政權的蜜月期其實是非常短暫。中國知識界很快就認識到習近平的專制、獨裁，而且很暴力的一些政策。所以知識界和習近平很快就發生了很大的一個對抗。我覺得習近平採取對伊力哈木這種溫和學者強力打壓，他傳遞的信號，當然第一是針對知識分子、學者、大學教授，他希望通過這種強力的打壓政策讓他們噤聲。當然第二，因為伊力哈木他有少數民族回族的身分，這個維吾爾族的身分讓習近平在針對新疆的問題，他提出的所謂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他當然也是通過伊力哈木這一事件，來表達他在這一事問題上的強力措施。當然對伊力哈木下手的話，也是針對其他的少數民族。對西藏少數民族也有警示作用。今天我們看到香港還有“占中”問題。“占中”還沒有解決。而“占中”其實很大程度上是由學者和學生組織的。所以我覺得對習近平來說，他是針對整個知識界，他的目標已經非常明確了。

法廣：同樣是在11月21日這一天，資深媒體人士高瑜“洩露國家祕密”一案在北京閉門開庭審理。當局為什麼要採取這樣一種不公開審理的做法？他們的顧慮是什麼？

夏明：我覺得第一，它認為這裡面涉及到國家機密。因為高瑜被認為是向海外泄密了，被逮捕、被起訴的。但是其實這個裡面非常荒唐的地方是什麼呢，因為它所認為的國家機密是一個根本不存在的機密。第一，它講的是習近平的一個講話，講話裡面有“七個不講”；這個東西第一是黨內的一個內部的講話，這裡面不存在你一個黨員講的東西是一個國家的機密。第二，他的講話向外傳達了。高瑜聽到了這個講話，她把它就記下來，然後把它給發表出來了。而且在互聯網的世界，不存在在國外發表、還

是國內發表，或是向國外提供這種信息。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中共對高瑜的懲罰，第一表示它自己是一隻紙老虎。中共在講“七個不講”的時候，高瑜這樣一個資深媒體人還在挑戰這個“七個不講”。因為“七個不講”是針對新聞自由、資產階級的新聞自由觀。高瑜作為一個資深媒體人，她當然要反對這“七個不講”。我覺得更大的問題不在於高瑜的所謂泄密，其實更大的問題在於高瑜作為資深的新聞記者，她敢站出來，捍衛新聞的獨立性。這恐怕是令中共惱火的。

對習近平來說，尤其在這個問題上直接地、快速地跟他作對，我想一定讓習近平十分地惱火。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對高瑜的這種懲戒，就等於像鄧小平對魏京生個人的惱羞成怒、對魏京生一定要重重地懲罰是一樣的。我相信在高瑜的問題上，習近平出於個人的惱火，一定要對高瑜進行嚴處理。另外一方面，中共也意識到它現在所作的許多事情沒有道理可講，在法理上是沒有辦法公開的。所以如果它把高瑜的審判公開的話，其實會變成對中共自己的荒唐、暴力、反歷史、反人類普世價值的一次公開審判。它也意識到這種審判只會讓它變成被告人。中共現在有一個很大的擔憂，就在於中國現在到處有很多的幹柴，如果有人點火的話，中共真的不知怎麼樣應付。而且我們看到中國的經濟危機也正在爆發，尤其是民營企業，包括中小企業，生存也非常的艱難；這種情況下，它不願意通過這個審判引發知識界、公眾的各種關注和聲援，想避免更多民眾的嘩變，或者知識界各種的活動再產生。

法廣：習近平掌權已滿兩年。您怎樣評論兩年來中國人權領域的現狀？

夏明：我覺得中國在過去兩年，人權當然是在極度地倒退。我們知道，在胡錦濤的十年執政期間，尤其在2008年以後，他有許多保守的做法。如果把它作為底線的話，如果習近平還在倒退，我覺得這就非常可怕了；習近平目前在人權問題上的倒退，其實

是向中國人發出的更大的信號。我認為習近平目前的做法，第一，就是有可能把“文革”招魂回來。因為我們看到他無論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他的作為，對高校思想工作要狠抓、要加強。現在《遼寧日報》又針對高校裡邊的社會科學和哲學界，對他們好像在“抹黑中國”這些導向進行批判。從所有這些東西，就此看出中共在習近平下面，有一種強烈的反智主義的傾向。而且習近平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對毛澤東那一套整肅知識分子那些做法，他有一點下意識地感到親和。他想用這些辦法來治理中國的知識分子，尤其是哲學、社會科學、人文界的知識分子。所以我覺得很大的擔憂就是文革是否會重現。其實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中國已經有“文革”的前兆了。

第二，還有一個問題就在於，習近平多大程度上會把西方國家的、歷史上的法西斯主義、尤其是德國的法西斯主義、這種領袖體制、這種緊急狀態的法律、緊急狀態的國家運用到中國。目前他以國家元首來通過各種特別委員會來治理國家的體制，已經開始把上述因素糅合在一起。所以我覺得在習近平目前這兩年來的任期內，其實我們已經看到兩個幽靈在中國大地上晃蕩了。一個是毛的“文革”的幽靈，另外一個就是法西斯德國的納粹的幽靈。我覺得這兩個都是中國目前最大的威脅。

法廣：習近平未來執政的八年中，您認為，中國政治改革面臨怎樣的前景？

夏明：我覺得習近平沒有太多的政治方案。也沒有大的藍圖。他更沒有一個堅定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甚至他連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觀都沒有。所以第一，我不認為習近平能夠做完八年，我認為習近平會是中共最後一個領導人；第二，我認為習近平根本做不完八年，他沒法任到兩屆。我相信習近平會垮台、中共也會垮台。所以我不認為習近平會對中國政改產生任何積極的推動。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有幾個很明顯的做法，我們可以看出中共已經不

可能進行任何政改了。第一，我們看到意識形態上的不斷轉換。習近平在意識形態上已經回複到毛的起點。他反對普世價值、反對民主的基本價值觀，基本上可以看到他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全面倒退。他在用法西斯思想武裝自己。第二，看到中共以前容忍的、一些有限度的民主試驗，也就是在地方、在具體的事務上進行的所謂治理的創新也被叫停了。其實治理的創新在中共目前的框架下，也不予鼓勵了。原來，在2011年之前進行的各種治理創新，包括像俞可平他們在北京大學和中央編譯局進行的了，其實現在都已經壽終正寢。中共已經失去熱情去做這些小的改動了。第三，看到中共在推行新的一個敘述，就是中國現在已經是一個民主國家了。而且中國的民主是一個獨特的民主。它已經超越了西方的民主、超越了一人一票的這種選舉的民主。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中共根本就不認為還有學的空間。相反它認為它目前的做法，已經比其它的國家還要好了。所以它哪有動力、哪有想法要去進行政改？

最後一點就在於今天中共的領導人全部成為中共最大的既得利益的權貴集團、寡頭集團。我們看到從習近平、到溫家寶、到周永康、到徐才厚、到薄熙來，哪一個不是貪腐？他們都已經達到價值連城的貪腐，他們的整個家族、無論是通過婚姻、還是血緣結成的家族，都成為中國目前整個國民經濟上的蛀蟲，他們中飽私囊、養肥自己、即便把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利益和前途全部都葬送，他們也在所不惜。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麼期盼既得利益的寡頭集團能夠進行政治改革呢？

結束語：黑暗中尋找陽光



結束語：黑暗中尋找陽光 (2015.02)

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讓世人痛心的不只是我們面對着一個邪惡的黨國。更讓人痛心的是，絕大多數中國人沒有意識到這個黨國的邪惡，不知道這個黨國不值得人民的尊重和服從。但最讓人痛心的是，成千上萬的中國人不但對這樣一個政權沒有鄙視，要么得過且過、苟且偷生，要么賣身求榮、同惡相助，卻對少數有良知、有勇氣、有擔當的仁人志士閉塞眼睛，對他們和他們家人為中華民族背負十字架而經受的磨難熟視無睹，甚至乘火打劫、攀附政權助紂為虐，讓正不壓邪。正如英國思想家埃德蒙·伯克所言：“邪惡上升得勝的全部必要條件就是好人無動於衷。”

邪惡的定義和諸種表現

什麼是邪惡？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在《論邪惡》（On Evil，第2-3頁）一書中說，“稱某個行為邪惡本身就意味著這是不可理喻的。邪惡是無可言表的。它就是一個自在的存在，就像身纏一條大蟒蛇進到一個擁擠的列車廂裡。不存在任何場景可以來解釋清楚它。”他又說，“越是讓人不可理喻，就越是邪惡。”

除了與自身以外，邪惡與任何東西（譬如原因）都沒有關係。事實上，這個詞已經變成了多個意思，‘毫無理由’是其中一個。”約翰·克基斯（John Kekes）在《邪惡的根源》（The Roots of Evil，第2頁）一書中這樣界定邪惡：“一件事的邪惡有三個部分組成：行惡人的惡意，他們行為造成的嚴重的、極端的傷害，他們的行為沒有任何道德上可接受的托詞。”某些行為是邪惡的，不僅僅是因為它們是壞事，而是因為“它們威脅文明生活方式的基本狀況。”

我們知道，全世界有心智的正常人都會同意，希特勒針對猶太人和其他所謂“劣等民族”的種族屠殺，把猶太人關進毒氣室等，帶來6百萬猶太人的死亡，是邪惡。但是，許多中國人不認為毛澤東在既無外敵入侵、又無嚴重天災的情況下餓死3千多萬的三年大饑荒是一個邪惡。有更多的中國人也不認為“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十年加上大饑荒造成一億中國人死亡是一個邪惡。但我要說，所有這些，加上後來的八九年天安門屠殺、1999年以後迫害法輪功、活摘人體器官、三十年的強制計劃生育以及相關的強制絕育、人流等，都是邪惡。

對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等惡人來說，人們是不會太在意數字的。所以，成千上萬、上百萬、甚至上億的人就在這種“抽象”中消失。無數的“好人們”也在“抽象”中忘卻了惡人造下的惡。因此，我們必須把“抽象的統計數字”還原成活生生的生命。王友琴的《文革受難者》、吳弘達的《勞改》、楊繼繩的《墓碑》、吳仁華的《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廖亦武的《中國冤案錄》、唯色的《殺劫》、李江琳的《當鐵鳥在天空飛翔》等書都在做着還原歷史、拒絕遺忘的工作。中共的血腥歷史就是一部充滿邪惡、惡人當政的歷史。

中共長期以來的僅次於毛澤東的領導人周恩來有個養女叫孫維世。她在延安長大、莫斯科留學，出落成年輕美麗的藝術家，並有“紅色公主”之稱。後來，她在陪同毛澤東訪問蘇聯擔任他

的譯員時被毛在專列上強暴。他的養父周恩來要她封口，並草率將她嫁出去。後來，藉口她有反對偉大領袖的言論，她被逮捕，而且周恩來親自在逮捕證上簽字。孫維世可能是遭處決，也可能是被迫害致死。總之，她死後，手銬腳鐐都沒有除下。那時，她正值人生黃金時節，只有 46 歲。這就是邪惡。毛澤東和周恩來都是惡人。

上官雲珠是民國時期上海灘上著名影星。毛澤東奪取政權後，時常到上海度假，把上官雲珠變成自己的情婦。“文革”後江青大做文章，上官雲珠被打成“特務”，受盡羞辱和折磨，身患乳腺癌的多重折磨，在 1968 年正值“文革”高峰時期，絕望之下，跳樓自殺，年僅 48 歲。這就是邪惡。毛澤東和江青都是惡人。

著名黃梅戲藝術家以《天仙配》揚名全國的嚴鳳英，在毛澤東發動“文革”後的初期即遭到迫害。罪名是“黑線人物”、“封資修代表”。1968 年，年僅 38 歲的嚴鳳英被迫害致死後，軍代表劉萬泉下令開膛破肚。用小斧頭從咽下砍起，經肚臍到恥骨，說是要“尋找藏在體內的發報機”。劉萬泉恬不知恥地說：“嚴鳳英，我沒看過你的戲，也沒看過你的電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型了。”這就是邪惡。毛澤東和他的爪牙劉萬泉之流都是惡人。

遼寧省委機關女幹部張志新在“文革”後第二年就被下放幹校，因反對“文革”被打為現行反革命。在獄中，她遭毆打、頭髮被扒光，政府官員多次派遣男犯對其強姦、輪姦。在對她執行死刑前，遭到多日“坐小號”（只能坐不能躺的特小牢籠）、並被當時的遼寧領導、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下令割喉。當時她已被迫害得神經失常，坐在大小便裡，用饅頭蘸著經血吃。死時年僅 45 歲。這就是邪惡。毛澤東、毛遠新等人都是惡人。

如果我們繼續羅列，著名翻譯家傅雷和妻子朱梅馥、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洪恩、復旦大學歷史學教授王造石等等，等等，要么被迫自殺，要么被槍決，要么被打死，都是邪惡的犧牲品。進

入 21 世紀，文明社會已經把人權認定為普世價值並把“反人類罪”普及到了國內法。根據聯合國、國際法庭和國際刑事法庭的諸多文件，大規模和系統地針對平民進行傷害的下述所有行為都是“反人類罪”：謀殺、滅絕、強迫奴役、大規模遣返和遷移人口、監禁和違背國際基本公約剝奪人身自由、酷刑、強姦、性奴、強迫賣淫、強制懷孕、強制絕育、和嚴重性暴力、強制失蹤或人間蒸發、種族隔離等。

但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計劃生育的國策養活了至少五千萬的計生大軍，他們成為強制絕育、懷孕晚期強制墮胎的制度因素。例如，湖南涟源市 25 岁的龚起凤，懷孕七月卻在 2012 年被强制墮胎。儘管她一再向准备给她打引产针医生祈求怜悯，但卻被好几个人压在床上，注射了引产药剂。龚起凤遭受了 35 个小时的疼痛，本该是她第二个儿子的胎儿就这样流产了。類似的例子在陝西、江蘇、廣東、山東、福建等地都有。全國各地出現的計生口號反映了這類殘忍的常態化：“計生大革命，叫你雞犬不寧”，“該流不流，扒房牽牛”，“超生多生，傾家蕩產”，“寧添十座墳，不添一個人”，“打下來，墮下來，流下來，就是不能生下來”，“寧可血流成河，不可超生一个”。

對死刑犯活摘器官、甚至對病人或法輪功學員活摘器官，也是一種反人類罪。中國過去幾十年裡，每年處決人數從幾千到幾萬不等（如有運動、嚴打等數目就會驚人）。他們都成為器官移植的來源。美国作家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在《屠杀》一書中指控，2000 年至 2008 年間，遭中共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 65,000 人。大連哈根斯人體屍體工廠涉嫌活摘器官、捲入全球屍體標本展，甚至被指控成為薄熙來人間蒸發懷有身孕的情婦的犯罪現場。

中國實施幾十年的戶籍制度，加上對所謂“盲流”的收容、關押、遣返、對藏人、維吾爾族等人員的歧視性管控，甚至把整個藏區

和新疆置於事實上的軍管狀態，在這兩個地區大開殺戒、濫殺無辜。例如，2006年9月30號，一組藏人在逃離中國和尼泊爾邊境時遭到中國邊防武警射殺。一位羅馬尼亞的攝影師記錄下了一位藏人中彈身亡、一位藏人受傷的場面。在2009年後，新疆也發生多起武警、警察射殺維吾爾族人的事件。從2009年2月到2015年初，藏人（主要是僧人僧尼還有牧民）共有130多人自焚抗議宗教迫害和壓制。這些都是事實上的種族隔離造成的惡果。

在“土地財政”（賣地財政）的驅動下，暴力強制拆遷席捲華夏大地，成千上萬的居民、農民成為受害者。他們上告無門，到北京上訪卻被截訪關進“安元鼎”的黑監獄，遭受酷刑折磨。僅在2003年一年內，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發生十幾起自焚事件，其中數位就是因徵地強拆而起。面對強遷，走投無路，2009年11月13日成都的唐福珍在自家樓上自焚而墜亡。2010年九月江西撫州宜黃的鐘家一家母女（母親羅志鳳、女兒鐘如琴和親戚葉忠誠）在自家房頂上自焚。2011年4月21日，湖南株洲汪家正在推土機鏟向自己的瓦房時點火自焚。漢人的自焚在過去的十來年裡也達到幾十起。

拍攝過揭秘遼寧馬三家女子勞教所內幕紀錄片《小鬼頭上的女人》的導演杜斌，2014年出版了新書《陰道昏迷：馬三家女子勞教所的酷刑倖存者證詞》。受害者劉華作證說，她曾經被扒光衣服電擊，“有法輪功學員被電過乳房、陰道，還往陰道裡灌辣椒麵，上死人床；有學員被電棍插到陰道裡；有學員褲子被脫光，用棉簽往她小便處戳。”另一位受害者朱桂芹說：“把我綁在死人床上，兩腿八字形拔開，把我的外褲、內褲都脫到膝蓋以下，上面灌食，下邊倒尿灌腸，大小號都不讓，造成我婦科炎症，拿棉簽捅我陰道下邊，慘無人道。”杜斌在2011年三月出版的《牙刷》的詩歌描寫了在監獄裡，獄卒用牙刷插入女性囚犯的陰道的酷刑。2000年10月馬三家還發生了另一起駭人聽聞的性侵害事件：18

名女法輪功學員被剝光衣服後投入男牢房慘遭蹂躪。

當共產黨從革命黨試圖轉換為永久的執政黨時，它已徹底墮落為“通姦黨”。據媒體披露，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在地方和中央任職期間，至少有 29 位情婦、玩弄明星、節目主持人等女性至少 400 人，放肆搞權色、錢色交易。他的情婦裡有半打來自中央電視台。為了能夠與央視主持人賈曉燁完婚，不惜製造車禍謀殺髮妻。在中共高官中，軍委副主席徐才厚、中辦主任令計劃、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山東省委副書記杜世成等等高官還共享“公共情婦”（據報導有著名歌星、並有“軍中妖姬”之稱的湯燦、雲南女商人李薇等人）。江蘇省建設廳廳長徐其耀有 146 名情婦名字記在日記中，其中還有一對“母女花”。江西省政府副秘書長吳志明在自己的“快樂日記”上載有 136 名情婦的簡介，並附有 100 多位情婦的陰毛。他還立志在 2015 年完成的五年規劃裡至少要睡到 1000 人，而且三分之一是“良家婦女”。河南開封市組織部長李森林不僅玩弄三百多名女性，還剃下她們的陰毛，準備日後做一隻“陰毛筆”。山東臨沂市委書記連承敏為延年益壽，聽信中醫院一位院長“採陰補陽”的偏方，從臨沂藝術學校的舞蹈專業挑選 12-13 歲的少女，供其姦汙，人數上百。江蘇省東海縣委書記關永健以提拔副縣長為誘餌，試圖在辦公室與下屬的青湖鎮黨委書記徐艷發生性關係。但因徐艷發現關永健有嚴重性病而拒絕，招致關的報復，命令警察局長設陷阱，20 多名警察以捉姦為名毒打徐燕，並用一把尖尖的雨傘插入徐燕的下體，致使徐燕的陰道被撕裂、子宮完全破裂。如果我們繼續搜索，我們會有足夠的材料編寫一本《中共貪官情色淫亂糜爛大全》和《中共官員荒誕邪惡變態吉尼斯紀錄》。總之。從上倒下，中共的黨員官僚對中國婦女正在犯下“反人類罪”。

邪惡產生的根源

中共黨國就是一個邪惡帝國。這個結論本身應該已成為一個常識。但奇怪的是，有一部分人會視而不見、置若罔聞；有些人會認為這只是很小一部分極端例子，無損黨的“偉、光、正”；有的人會說，從來、全世界當官掌權的都是這般醜惡，因此，中共也無任何特別。更還有人會說，這些事是“反華勢力”、別有用心者的汙衊和潑汙。所有這些人，都會用一個更苛刻的道德尺度來審問作證的犧牲者，為作惡者辯護，懷疑甚至詆毀證人的證詞和他們的人格，從而為整個黨國制度解套。為什麼在這樣一個施虐的政權下，還有無數的樂意受虐的大眾？為什麼有成千上萬、甚至上億的中國人（包括我自己的親朋好友）可以面對肆虐的邪惡泰然處之、安然淡定？為什麼芸芸眾生對作惡者沒有阻止，沒有憤怒，甚至沒有鄙視；對受難者沒有援手，沒有同情，甚至沒有理解？“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何時消失了？不忍人之心、怵惕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是非之心何時泯滅了？為什麼一個在六十載惡政下三代人受虐後，中國人還患上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一廂情願地期盼惡人未來某一天會突然改邪歸正、惡政會自動進化為良政？

要回答上述問題，我們所有中國人（包括曾經是的）都不得不面臨一個可怕的結論：中國人患上了集體精神神經病（collective neurosis）。奧地利著名精神分析學家維克多·福蘭克爾認為，群體精神疾病可以反映在抑鬱症、侵犯行為和成癮性（濫用毒品、酗酒、吸煙吸毒等）在人口中急劇增加。（見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第 141 頁）這個病症的一個主要症狀是“移情互感能力”（empathy）的喪失，導致同情心、友誼、情誼、兄弟之情、團結一心、勇氣的普遍喪失，以致個人失去正義感和俠義行為、集體失去助弱抗暴、匡扶正義的意識和能力。對整個國家和民族來說，政治完全沒有了道德基礎的支撐。而這一可怕的病症又來自於一個更深刻的根

源：隨著神靈的放逐，良心和靈魂在中國人的身體上消失。正如印度一位聖人斯瓦米·欽馬亞南達（Swami Chinmayananda）在評論聖書《薄伽梵音》時所言：“真理使人意識到他是一個有肉體的靈魂，但在愚昧之中，他以為他是有一個靈魂的肉體。”進一步而言：邪惡使人成為一個沒有靈魂的肉體。排除藏人、穆斯林回族、基督教徒、佛教徒、法輪功和其他民間宗教信仰者群體，以及把真善美幾乎看作宗教的無神論者，中國多數人（尤其是迫害信仰的共產黨官員）都是沒有靈魂的肉體，他們生活在邪惡之中。三者的區別在於，一顆覺悟的心以正見為居所，有靈魂在其中，並與天意大道溝通，以最完美（經常以最高神靈的形式出現，但真理本身也可以成為一種宗教）為矯正方向的北斗星。一顆愚昧的心就是失去了對自我和世界的清晰的意識和領悟，把“我”和“我的”看作了世界的根本和生命的意義。而邪惡之心，主要在於由惡意和惡願啟動，對眾生帶來身心的傷害。

劍橋大學心理學和心理分析教授西蒙·巴倫·科亨（Simon Baron-Cohen）在《邪惡科學研究》（The Science of Evil）中指出，邪惡和人類的殘忍可以由“移情互感的喪失”來解釋。所謂“移情互感”（Empathy）是指“我們有能力識別其他人在想什麼、感覺如何，並對他們的想法和感覺以適當的情感做出回應。”他指出，我們可以“一心一意專注自己”，也可以“隨時心想掛念別人”。在前一種情況下，我們的注意力只有一個焦點，例如我們當下的利益、目標、願望和計劃等等，而不顧其他人的想法和感覺，或者把其他人賓格化、只看作一個對自己有用的物件或工具。這時，我們的“移情互感”就處於關閉狀態。自閉症患者、自戀者、精神變態者和反社會的人都屬於這類例子。相反，如果我們停止把他人僅僅當作一個物件或工具，而是把他／她看成一個平等的、有血有肉、有感情有尊嚴、避痛苦就歡樂的主體，我們的移情互感能力就處於一種開放活躍狀態。

另一位美國心理學家保羅·艾克曼（Paul Ekman）（見 Emotional Awareness, 2008 年）把“移情互感”分為四個階段：情感識別（emotion recognition）、情感共鳴（emotional resonance）、同情慈悲、利他主義。首先我們要有識別能力，知道別人的困境或苦楚；其次，我們要能真正感同身受；再次，我們要能產生慈悲心去幫人解除和擺脫痛苦；最後，我們必須要有利他精神，因為拔人出苦可能會給自己帶來不方便、風險甚至犧牲。

巴倫·科亨教授和他的同事們提出了一套“移情互感指數”（EQ-Empathy Quotient）測試體系，可以把我們所有人定位於兩頭大中間小的正常分布曲線（“鐘形曲線”）上。從“0”到“6”，移情互感的能力逐步增加。在此基礎上，他提出“0- 負型”和“0- 正型”兩類：自戀者、精神變態者和反社會的人多屬於前一類，而一些自閉症患者、許多阿斯伯格（Asperger）綜合症的患者則屬於後一類。例如，在阿斯伯格患者中有許多在某個特定方面具有天賦的人（例如音樂、數學、藝術等），一方面他們表現出驚人的發現固定模式和規律性的能力，另一方面他們通常對他人和動物經常表現出特別的依戀和關愛。在“移情互感能力”裡又可分為“認知型部分”和“愛慕型部分”。比如，在中國關係文化中，許多圓滑投機的心理變態者可以有前部分，卻沒有後一部分。

巴倫·科亨教授總結出“移情互感腦神經系統（或板塊）”（Empathy Circuit）的活躍或死寂決定了我們移情互感能力指數的高低。他指出，“邪惡產生是因為移情互感腦神經系統運行失靈造成的”（第 170 頁）。而這一切是由成長經歷和環境、教育、基因、神經生理多種因素造成的。他提出了“移情互感腦神經系統”的十二項決定因素：意圖 / 發願（Intention）、面對的威脅（Threat 迎戰 / 逃跑的選擇）、文化獎懲（Cultural sanctions）、意識形態 / 信仰、早期成長經歷、從眾看齊 / 服從、集團內外差別、壞情緒（憤怒、仇恨、嫉妒、報復心等）、基因、神經病理、霍爾蒙、身體狀況（疲

乏、缺睡、飢餓等）。

這裡我們可以用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來做具體說明。

“文革”是中國人移情互感腦神經系統集體錯亂造成的人類邪惡。首先，毛澤東有意圖想通過“天下大亂”的方式來達到維護自己權力地位的目的。不僅毛感到劉、鄧等走資派的威脅，而且蘇聯的變化和美國的存在都對他形成威脅。他把這種威脅傳遞給中國人，尤其是青年。中國傳統的底層江湖文化鼓勵和浪漫化造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加入敵我矛盾、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等都鼓勵了暴力傾向。毛的個人崇拜帶來的全民盲從，青年人在封閉匱乏的條件下身體裡湧動的霍爾蒙的衝動，憤怒、仇恨、嫉妒、報復心理的大爆發，匯聚成歷史的邪惡。如果用巴倫-科亨的理論來觀察，毛澤東具有“O-負型”裡的“精神變態者”（Type P）的典型特徵：認知型的移情是正數、愛慕型的移情是負數、道德品質是負數。

如果我們研究一下毛澤東的童年，我們會發現他具有殺父戀母情結。他的人生經歷（尤其是他的所有親人都不同程度受到傷害）造就出了一個冷血動物。首先，毛是上述 12 項因素扭曲出的一個犧牲品。同時，他又成為一個施害人。中國人至少有三代人都是在極端惡劣的社會、文化、意識形態、家庭、環境下生長的。在毛澤東和共產黨革命集團看來，“移情互感”就是資產階級人性論、小資情結、分不清敵我、立場有問題，是無產階級革命、階級鬥爭和“反（美）帝反（蘇）修”的大敵。為了徹底改造中國人民的世界觀，毛澤東乾脆在中國教育體系裡廢除了哲學（僅保留馬克思主義哲學）、倫理學、宗教學、心理學和美學。語言學也被完全扭曲，服務於傳媒和溝通、宣傳、意識形態灌輸、心理控制和洗腦。毛澤東和他的中共廢除了中國人的神靈信仰體系（儒釋道穆耶）、終止了中國社會的禮俗儀軌、推翻了中國家庭倫理道德、擊碎了個人內心世界的良心和靈魂。當每一個個人已被剝奪了自

由意志，僅僅是黨國發號施令下的龐大機器上的一個螺絲釘後，倫理責任和道德擔當就失去了主觀前提。全社會移情互感能力資源的全面枯竭就不可避免。“仁、義、禮、智、信、勇”構成的陽剛價值體系，“溫、良、恭、儉、讓、忍”構成的陰柔價值體系，雙雙徹底坍塌。在過去幾十年，中國人時時都要哀嘆圓明園的毀滅、在廢墟上繼續強化恐懼、威脅、仇恨、復仇，但少有人意識到、就更不要說哀嘆中國人精神家園的毀滅和靈魂的失落了。

重建中國政治社會

人類的根本屬性是多重的。我們既是社會動物，政治動物，經濟動物，同時又是道德動物，思想動物。人類文明進步的一個重要標誌是“心性至上主義”（也是中文經常翻譯的“唯心主義”）認識到了思想的重要性，並把它看作區分人類與其他動物的根本特徵，所以有十七世紀法國哲學家笛卡爾宣稱：“我思，故我在！”與唯物主義的認識正好相對應，心性至上主義認為，人類的思考活動和思想特徵決定了我們是否會成為好的社會動物、政治動物、經濟動物和道德動物。正如政治思想家漢娜·阿倫特在揭示邪惡的根源時認識到的，“邪惡不一定要由惡魔般的怪物帶來災難結果，而也是由低能兒和白痴造就的。”（Eichmann in Jerusalem, 導言第6頁）所謂“平庸的惡”是由無數沒有臉孔、沒有大腦的低級官僚職員做出的。“邪惡產生於失去思考。一旦思想試圖認識邪惡，檢審產生它的前提和原則時，它立即拒斥思考。思考受挫，因為它無法在邪惡裡發現任何東西。這就是惡的平庸。”（同上，第14頁）

黑格爾說，“哲學就是思考，是思考一般性。”而在康德看來，哲學包括邏輯、物理和倫理三個分支。我們可以說，邏輯理性和移情互感構成哲學的兩大內容，是任何健康社會的兩大認知

性支柱。歐洲大陸文明，尤其是德意志民族，傾向於從邏輯理性來構建精神世界，所以也成為它的倫理學特色。康德構建了他的絕對律令包括下列幾項：（1）普遍的行為法則：“要只按照你同時認為能成為普遍規律的準則去行動。”（2）人是目的：“你的行動，要把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在任何時候都同樣看作是目的，永遠不能只看作是手段。”（3）自由意志和道德：“自由是道德律存在的原因，道德律是自由存在的知識基礎。”（譯自 *The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第 384 頁，見 *Kant Critiques*，2008）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一書中提到權利的絕對律令是：“做一個人，也尊重他人做人。”（*Philosophy of Rights*，第 37 頁）他還說到，“奴隸不知道他的本質、他的無限、他的自由。他不瞭解自己作為一個人的本質，因為他自己不思考。”（同上，第 30 頁）但我們知道，儘管德意志民族構造出了最精細的道德哲學，但德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尤其是二戰的納粹德國）都給世界帶來了人道災難。

在心智的側重上，如果說德意志民族較偏向於“（理）智”，那盎格魯-薩克森的英美則較偏向“心（性）”，走出了一條更道德、更人性的歷史路徑。資本主義理論的創建人蘇格蘭的哲學家亞當·斯密給人類左手帶來了《道德情感論》（1759 年），右手帶來了《國富論》（1776 年）。在《道德情感論》裡，斯密早於康德提出，“我們關於對錯是非的最堅固的判斷是由理性演繹出來的準則和觀念。”但是，我們有關對錯是非的“第一直覺”卻不是“理性的客體，而是直觀和感覺的客體”。斯密從我們人類所有的隨喜心、憐憫心出發，認為即便在“社會上最鐵石心腸的違法者”身上也可以看到這種情感不會完全泯滅。“通過我們的想像力，我們可以設身處地地想見受到的所有同樣折磨，我們就像進入他的身體，在某種程度上變成與他成為一體。”這就是“同胞情誼”的來源，由此我們產生同情心。斯密繼續說道：“而且，同情心激活我們的

喜樂、減輕我們的悲傷。通過帶來有一個滿足的源泉，它激活了喜樂。同情作為唯一適合被接受的情感，通過進入另一顆心，它減緩悲傷。”（譯自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第 19 頁）斯密的觀點和他的好友大衛·休謨產生了強烈的共鳴。作為西方歷史上一個最為有名的道德倫理哲學家，休謨在他的《人性論》巨著中，提出人性作為道德哲學的基礎，而親身體驗和觀察又是其重要方法。在休謨看來，同情心是心智的一個特徵，我們可以“進入他人的情感”和“分享他人的快樂、分擔他人的不適。”作為一種“溝通交流感情的工具”，即便在動物中，同情都會產生。有足夠的證明讓我們相信，“動物野獸對相互的痛苦和快樂都有感受”。（見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第 255-56 頁）。由於英美的這種傳統，所以我們在後來的詹姆斯、杜威、羅爾斯以及社會學家科爾曼和政治學家普特南的“社會資本”概念中都可以感受到“人心”、友情、愛的重要性。這也是為什麼英美思想體系和政治社會體系能夠主導全球，而德國只能屈從適應的原因之一。

西方文明崛起的兩大思想支柱（邏輯理性和移情互感）令人讚嘆。但這樣的珠聯璧合卻並非西方的獨特傳統。印度文明和中國文明在兩千多年前的軸心時代也獲得了這樣的成就。聖人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金律和亞聖孟子的“不忍之心、怵惕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就是這樣的絕配。而墨子的“兼愛、非攻和天志”也是把邏輯理性和同情博愛聯通一起的例子。所以，今日中國人，無論選擇向外國學還是向古人學，都可以很容易找到指路燈塔。

至此，中國政治社會邪惡化的根源就可以從下面的因果邏輯鏈得到詮釋：一方面，共產黨控制下的中國人基本上在邏輯理性上未能完成發育，反而出現退化，以致中國人總體上基本不講邏輯和道理。否認普世價值的存在就是一個經典例證。另一方面，中國人的情感出現內轉：好的情感，諸如孟子說的“五心”、佛

家所說的慈悲心、行善心、隨喜心、無貪心以及傳統上的俠義精神都在不斷衰退、枯竭。相反，貪、瞋、痴、暗、鬥諸種心放任橫流。中國社會人群日益深化的原子化孤立狀態反映了心的深層次危機。隨著情感的內轉，道德情感的枯竭、道德敏銳的鈍化、道德模糊的盛行，中國政治失去了情感和道德的基礎。

芝加哥大學的政治哲學教授瑪莎·納斯包姆（Martha Nussbaum）在討論政治情感的重要性、尤其是愛心對正義的重要性時，有如下的論述：“反對我的人可能在想：國家需要技術算計：經濟思想、軍事思想、更好地利用計算機科學和技術。因此，國家需要這些東西，但它們難道不需要心嗎？它們需要專業技術，但我們作為父母、情人、朋友所必需的日常的情感、同情心、眼淚、笑聲和凝思美所有的驚奇心，這些東西難道不需要嗎？如果一個國家像（反對我的人設計的）那樣，那我最好住到另一個地方。”

（譯自 *Political Emotions*，第 397 頁）

對於道德在政治中的重要性，耶魯大學的政治哲學教授伊安·夏皮羅（Ian Shapiro）有如下論述：任何政權都必須有合法性，也就是說在民眾的眼中和心中它是正義的、有道德的，因此值得公民尊重的。“基於民主在當今世界的普遍性，任何對政治的道德基礎的探究都必須著眼於民主在賦予政權合法性所起的作用。”（譯自 *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Politics*，第 190 頁）

中國政治的最大危機還不僅僅在於理智和情感在政治中的喪失，而還在於這種雙重喪失是由一個專制國家頂層設計然後系統推行的政權工程。在唯物主義的幌子下，心性被壓抑和失落。在辯證法的掩飾下，一個政權可以同時接受 A 和它的反面 B，例如黨的領導和人民民主，黨的領導地位和法治，馬列主義和反外來思潮，等等。在無神論的口號下禁止宗教自由卻又把官方的意識形態變成宇宙真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號下，一手反對憲政，另一手打壓公民社會。以人民民主專政的理論來專政工人和農民，

卻給政權寡頭無限和無責任的特權。就黨國的厚黑治國，中國國內的網絡流傳了下面一個概括：“你和他說道理，他跟你耍流氓；你跟他耍流氓，他跟你講法制；你跟他講法例，他跟你講政治；你跟他講政治，他跟你講國情；你跟他講國情，他跟你講接軌；你跟他講接軌，他跟你講文化；你跟他講文化，他跟你講孔子；你跟他講孔子，他跟你講老子；你跟他講老子，他給你裝孫子；你給他裝孫子，他說你是傻子；你真的成了傻子，他就跟你真的講道理。”正是在這樣的政治生態下，功利主義、道德相對主義、犬儒主義、失敗主義、虛無主義、政治無效能感、抑鬱成為中國公民的無奈選擇。而殘存的政治反抗不得不以自殘、反社會、甚至反人類的暴力和極端主義的形式出現。政權的邪惡化和社會的犯罪化結成了同構的惡性循環。

如何走出這種怪圈？在中共統治的六十多年來，中國人實踐了各種努力：首先，拒絕作惡。無論是廣東人逃港、藏人流亡印度、新疆人逃去前蘇聯、大批學生學者和普通公民移民海外，還是學者、藝術家、律師、民營企業家脫離官方體制、立足民間，都是一種抵抗。中國社會出現的各種民間道德重建努力，例如閱讀“心靈雞湯”類的書籍和參加瑜伽活動等，都是有意義的心性提升活動。其次，重建民間社團和公民社會。各種宗教組織是中國最有韌性的抵抗團體，也是培育道德規範的最重要土壤。從民間教會（包括被共產黨政權妖魔化的會道門）、法輪功到地下教會、家庭《古蘭經》研習班、藏傳佛教，我們可以看到整個地域板塊或者一個社會階層游離出中國的官方價值體系和控制系統。他們在恢復社會禮儀和規範，重建傳統，並把良好的個人和社會價值觀熏教給自己的子女。中產階級中的環保組織、車友會、網友圈等也成為城市化的中國有生命力的友情紐帶。訪民團體成為中下層和受侮辱較深的人群網絡。在他們中間和他們組織的各種活動中，我們已經看到信任、互助、團結的力量。第三，公開反抗惡政。學潮（89

民運和香港學運就是重要例子）、群體性事件都是例證。自焚已經成為藏人和漢人最慘烈的反抗方式。第四，組織反對黨，推動社會轉型，建立民主制度。劉曉波等人發起和領導的《零八憲章》運動、許志永、浦志強等領導的“新公民運動”、各地公開和暗地下的民主黨等組黨運動是系統反抗惡政的明顯例子。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已經認識到，只有民主政體是最道德的。而對於這種想法，中共愈發不可理解和感到惶恐不安；但對於持這些想法的人群，中共也越來越無法控制了。

尋求自我診療和自我拯救

從理智和情感來討論中國的拯救，個人的自我拯救自然變成了民族國家拯救的起點，而未來的最終個人實現又成為這一歷史進程的終極目標。這是我找到的生命的意義。

完全由於各種複雜的原因，我有幸逃離了一個瘋人院國度。而且，在四分之一個世紀以後，隨著獲得政治自由、遠離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周圍社會環境豐富的移情互感資源這些諸多變化，尤其是在精神信仰上可以自由地追求提升和進化，我有機會得到各種高人大師指點幫助，同時自己也可以努力，進行自我排毒。奧地利著名心理分析學家維克多·福蘭克爾在《人對意義的追尋》一書中提出了“自我閱讀療法”（autobibliotherapy）（第161頁），亦即，人們在遇到生存意義和精神危機時，可以通過閱讀宗教經典、偉大著作、心理輔導讀物等來尋求鼓勵、指導和獲得拯救。

當某一天我意識到自己在匱乏、恐懼、冷漠、充滿憎恨、鼓勵猜疑和告密的專制的體制下長大成人，我感到後怕和恐懼。我長久沒有意識到自己經受的傷害、中毒和由此導致的移情互感能力的欠發達。直到2004年我在北京講學，由於時差的緣故，半夜我都無法入睡，所以決定看一個沒有洗腦、比較輕鬆的文藝頻道

來催眠。剛換到央視的文藝頻道，出現的恰好是白毛女遭黃世仁強暴後聲嘶力竭的控訴：“我恨！我要報仇！”我突然意識到，我就是在這樣的環境氛圍中長大的。我一下子回憶起，我還是一個孩童時在黃昏時節孤零零一人站在一個空曠的操場上，聽著大喇叭播放長篇小說《戰地紅纓》，講述惡霸地主金老歪虐待童工的悲慘故事。

幸運的是，我少年時去到中國最西化、最有小資情結的上海求學，而且在中國最開放活躍的八十年代、在西方思想進入中國的登陸點復旦大學系統接受當時能夠得到的最西化的教育。有神論、唯心主義（其實應該翻譯為“心性至上”更好）、個人主義、人道主義、多元價值都能進入我的思想空間。與普通國人相比，我受傷、中毒恐怕還不算最深。

在美國學習工作 25 年的時間裡，三個事件促使我反思自我、反思中國文化、反思我們的整個民族。一是，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我開始了中國黑社會的研究項目。目睹人類的殘忍、人性的醜惡、社會的冷漠，我自己的精神衛生受到傷害，心情變得抑鬱起來。二是，2008 年我回到四川參與制作《劫後天府淚縱橫》的震災紀錄片，實地看到政痞帶來的“豆腐渣工程”和大量學校垮塌帶來的災難，深感中國邪惡的根源還來自於腐敗專制的政權。從此，我踏上了一條反叛者的孤獨之路，用筆作劍向邪惡的政權挑戰。最後，隨著我捲入海外民主運動越深，我愈發意識到，儘管民主運動步履艱難原因很多，但一個主要原因是民運中大大小小的領導人幾乎無法合作，海外從未建立統一協調的民主運動或政黨。那麼，為什麼具有共同民主理想的人也無法合作呢？其根本原因也在於這個人群裡移情互感能力資源的匱乏。如果我們看到，共產黨政權裡面有許多像毛澤東一樣的精神變態者，那麼，在民主運動裡面有許多重度自戀者（Type N），他們可能有認知型的移情互感能力和道德能力，但尤其缺乏愛慕型的移情能力。

中國人集體的自戀情結是由幾十年民族主義的宣傳培育的，儘管民主運動中不乏堅定的反共人士，但對許多人來說，要從盲目自大的民族主義擺脫出來，睜眼看到世界其他民族燦爛的文明，意識到中國與世界的差距，還是很困難的。

面對政治現實中重重的邪惡，投眼前方卻只見厚厚的黑暗，這樣的沮喪、絕望恐怕無人能理解。但幸運的是，在 2009 年佛緣把我帶到了達賴喇嘛身邊，從此我和尊者見面十二次之多，幾次還與尊者面對面請教，一次還在他達蘭薩拉的寓所聆聽教誨，長達 90 多分鐘。我要說，達賴喇嘛是我見到過的具有最高 EQ 的人。用巴倫 - 科亨教授的分類，他靠近 EQ 曲線分布的 6，具有“超級移情互感能力”。他的諸多著作，尤其是他的《吾土吾民》、《流亡中的自由》、《超於宗教》、《建立多種信仰的親和》、《新千年的倫理觀》、《中道》、《動亂世界的幸福藝術》、《領袖之道》和《情感意識》，對管理情緒、控制憤怒、消除我執、慈悲為懷、心性教育、遠離暴力、營造幸福、建立和平都有精闢論述。

在達賴喇嘛身邊還聚集着一批對佛教教義、佛教哲學和佛教科學都造詣很深的大師，他們也做了許多工作、留下許多著作。記得我曾兩次拜會流亡藏人社區學問最高的哲學家桑東仁波切教授。他曾是西藏宗教和文化高級研究所的所長、流亡議會的兩任議長、流亡政府的兩任首席部長（首席噶倫）和現任達賴喇嘛的顧問。在讀完他的《妥協世界裡不妥協的真理》一書後，我曾經在他的寓所向他請教一個問題：如何每天修煉作好一個佛教徒？他給了一個字的回答：“Mindful（念）。”另外，索甲仁波切的《西藏生死書》是學習瑜伽和修煉心性極好的入門書。而藏傳佛教裡面有關修心的“自己和他人置換方法”（the method of exchanging self and others）（見 Mind Training Like the Rays of the Sun，第 79 頁）更是提升移情互感的不二法門。“自他交換”又叫“施受法”，其核心思想是“把一切利益和好處給別人，把一切損失和失敗由

自己承擔。”索甲仁波切說：“在我所瞭解的一切法門中，施受法（藏文的意思是“給予和接受”）是最有用、最有力的方法之一。當你發覺遇到瓶頸，施受法可以開放你去接納別人的痛苦；當你發覺心被阻塞，它可以摧毀那些阻礙的力量；當你發覺和面前受苦的人有點疏遠，或覺得難過失望，它可以幫助你在內心發現和顯露真性的可愛、廣大的光輝。我執和我愛是一切痛苦和冷漠無情的根源。就我所知，摧毀它們的方法，以施受法最為有效。”（《西藏生死書》第256-257頁）我們可以肯定，西藏佛學在心性研究和訓練上的成就會成為中國人的一項寶貴資源，幫助我們找回情感、重建道德、恢復良制、建立民主。

如果我們認同巴倫 - 科亨教授對邪惡與移情互感關係的分析，那我們每一個個人就可以成為阻止邪惡的志士義人，也就是邁出了抵制專制、促成民主的第一步。巴倫 - 科亨在他的書中得出三項重要結論：“移情互感是當今世界上最寶貴的資源之一。”“移情互感是一個全能普適的溶解劑。”“移情互感是可以免費獲取的。”明白了這三個結論，我們也許對自身的處境、對中國的前景和世界的未來會有更多的樂觀。

藏傳佛教有一本重要的修心著作題目叫“修心猶如沐浴陽光。”我很慶幸走出了洞穴，看到了陽光。我更感到慶幸的是，我沒有如柏拉圖“洞穴比喻”裡所描繪的囚徒不能適應陽光的刺眼、因而害怕真正的太陽，又折回了洞裡。當我擺脫了蒙昧主義、在真理之光的照耀下仰望太陽時，我知道，中共的“紅太陽”不過是一群邪惡之徒在陰暗的洞穴裡投射在石壁上的幻影而已。

黃花岡光復網

www.huanghuagang.org

Youtube：光復之聲

以及梅花電視Mei TV

Twitter：@guangfuwan

以及@meihuatv

Facebook：@huanghuagang

以及@chinayouthforum



復國新銳

revivingroc.wordpress.com

Twitter：@revivingROC

Facebook：@Sun.Yat.sen1911

聲明

本電子書的編輯與傳播跟黃花岡光復網無關，乃復國新銳團隊出於熱心推薦。